莱尼和他们

海因里希·伯尔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海因里希·伯尔

莱尼和他们

杨寿国　潘再平
马仁惠　孙秀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HEINRICH BÖLL

HEINRICH BÖLL WERKE

GRUPPENBILD MIT DAME

本书根据科隆 Kiepenheuer und Witsch
出版社版本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莱 尼 和 他 们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海因里希·伯尔著

杨寿国　潘再平　马仁惠　孙秀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3.625　插页5　字数506,000

1981 年 8 月第 1 版　198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6,000 册

书号：10188·198　　定价：（五）1.35 元

第 一 章

本书第一部分情节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四十八岁的妇女，德国人，身高一米七十一，体重六十八点八公斤(穿便服)，因此比标准体重不过少三四百克。她有着一对时而深蓝时而黝黑的眼睛，一头略显花白的浓密的金发，松散地下垂着，活象一顶头盔裹住她的头部。她名叫莱尼·普法伊费尔，父姓格鲁伊滕。她有过一段历时三十二年之久(当然有所中断)，被人们称之为工作经历的独特经历：先在她父亲的办事处做过五年非科班出身的办事员，后来又半路出家，当了二十七年花场工人。坐落于新市区的那幢结实牢固的出租房子，本来是她的一笔价值可观的不动产，要是在今天出售，足以卖它四十万马克，可是她却在通货膨胀的年头漫不经心地将它让给了别人，因此，自从她在既非生病也未达到退休年龄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退职以来，就几乎一无所有了。由于她在一九四一年曾与德国国防军[1]的一个职业军士结婚，过了三天夫妻生活，如今她享受着烈属抚恤金，这还有待于转为社会保险金。人们完全可以说，莱尼眼下的境遇——不仅在经济方面——十分糟糕，尤其是当她的爱子入狱之后。

要是莱尼将自己的头发剪得短一些，再染得灰白一点，看上去就会象一个颐养有方的四十岁的妇人；象她现在这样，留着年轻人的发式，同她不再那么年轻的容貌真是太不相称了，人们会

① 德国国防军于一九三八年二月改称德国武装部队，本书仍用原名。

认为她已年近半百；这固然不错是她的实际年龄，但她却放弃了一个她本应利用的机会。她给人的印象有如一个——事实上并不如此——正在过着或追求着放荡生活的、风韵已衰的金发妇人。莱尼是那些在她那种年纪还有资格穿超短裙的寥寥无几的女人中的一个：她的大腿和小腿上不但不显青筋，而且肌肉也不显松弛。但是莱尼仍然墨守一九四二年前后流行的裙子长度，这主要是由于她总还是穿自己的旧裙子，喜欢穿外套和衬衣的缘故，因为她的胸脯丰满（有一定根据这样说），穿套衫显得太刺目。至于大衣和鞋子，她始终还在使用颇为充裕、保存得很好的存货，这些都还是她在做闺女的年头，父母亲一度富有时添置的。她有各种颜色的提花花呢衣服：灰色和粉色交织的，绿底托蓝的，黑白相间的，也有天蓝的（单色）；如果她感到合适，还要配上一条头巾。她的鞋子，都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期间所能买到的——只要经济条件许可——那种"久穿不坏"的高档货。

眼下莱尼孑然一身，没有男性的经常照顾和参谋，因此，她一直不知道她的发式配不上她的年龄和容貌；其实，也只怪她的那面梳妆镜实在太老了，这件一八九四年的老古董，居然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而仍然完好无损，莱尼倒霉就倒霉在这里。她从未进过一家理发厅，也从未光顾过镶有不少镜子的超级商场，她是一家即将被淘汰的小铺的老顾客，因此她就只能依靠这面梳妆镜，尽管她的外祖母格尔塔·巴尔克尔（娘家姓霍尔姆）就已说过，它把人的容貌美化得太过分了；莱尼经常照这面镜子。莱尼的发式是引起莱尼苦恼的原因之一，但她对这一点并未意识到。她充分感到的是，在她周围，在她住的楼里以及左邻右舍，对她的蔑视在日益增长。就在前几个月中，莱尼有过许多男客：有恼贷机构派来的人员，他们因为莱尼对催还贷款通知书不加理睬，

登门向她提出最后的、甚至是最后最后的警告；有执达员；有律师代表；还有奉执达员之命前来搬走依法没收的东西的法警。此外，由于莱尼还有三间带有家具的转租房间不时调换房客，自然也会有一些年轻的男人上门来看房子。在这些男客中间，有些人动手动脚，不怎么老实，当然他们一无所得。可谁都知道，恰恰正是这帮调情一无所得的男人，偏要吹嘘自己的纠缠如何大有所得，从而很快就败坏了莱尼的名声，这是人人都能意料得到的。

对于莱尼的整个身世，对于她的精神生活和爱情生活，笔者无缘亲眼目睹，然而为了获得有关莱尼的情况，掌握人们常说的客观材料（甚至还要在有关的段落提到提供情况的人的名字），笔者也尽了一切努力，而这里的报道，十拿九稳地可以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莱尼这个人平时沉默寡言，遇事更守口如瓶——这里既然提到了两种非属体质上的特点，就有必要再补充而点：她既不怨天尤人，也不饮悔于怀，她甚至没有悔恨自己不曾哀悼第一个丈夫之死。莱尼遇事从不反悔，对于她，丝毫谈不上什么懊悔"太多"或"太少"；大概她根本不知道懊悔是怎么一回事。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想必是宗教教育对她失败了，或者应该说是失败了，也许这对莱尼倒是一桩好事吧。

根据知情人提供的情况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莱尼再也无法理解这个世道了，她怀疑自己是否曾经有过理解这个世道的时候。她不理解：为什么周围环境不容于她，为什么人们对她如此生气，如此恼恨；她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也不曾得罪过别人。近来，每当她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而不得不外出时，常常受到别人公开嘲笑和奚落，诸如"脏货！""破鞋！"之类的话，还算是比较

客气的。甚至还有人重新搬出近三十年前的事情来骂她："共产党婊子！""俄国佬的姘头！"莱尼对这些辱骂不加理会。别人指着她的脊梁骨骂"破鞋"，对她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人们认为她感觉迟钝，或者说简直是麻木不仁。其实这两种看法都不对，根据可靠的证人（女证人：玛尔雅·范·多恩）反映，她有时坐在家里会一连哭上几个钟头，她的眼结膜和泪腺非常忙碌。甚至一向与莱尼友好相处的街坊孩子们，也被人唆使和她作对，在她背后喊出一些连他们自己和莱尼都莫名其妙的话来。可是根据大量详尽的旁证材料——包括有关莱尼的最新的、最新最新的材料——可以得出结论：莱尼一生中迄今十拿九稳地大概跟男人总共同房过二十余次：其中两次是跟后来同她正式结婚的阿洛伊斯·普法伊费尔（一次在婚前，一次在总共才历时三天的夫妻生活期间），其余各次是跟另外一个男人；如果当时条件许可的话，她甚至会同这个男人正式结婚的。等到莱尼直接进入本书故事情节（还需等待一些时候）以后几分钟，我们将会看到，她第一次做出人们常说的那种失足的事情：她居然会答应一个跪倒在她跟前，用她听不懂的语言叽哩咕噜向她献搬求宠的土耳其工人，她之所以——作为让步——答应他，仅仅是因为她不忍心看到有人在她跟前下跪（至于她自己不会向任何人下跪，那是莱尼之所以成为莱尼的秉性）。另外还有一点也许需要补充说明：莱尼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有几个别扭的婆家亲戚，还有几个住在乡下的不太别扭的娘家亲戚和一个二十五岁的儿子，他取她小时候用过的名字，目前正在坐牢。再有一点颇为重要的身体上的特征，对于判断男人们的纠缠也有参考价值：莱尼有一对几乎永不变样的高耸的乳房，这样的乳房，是一个令人钟情的女子的骄傲。然而，尽管如此，人们偏偏不容莱尼，希望她

滚蛋，甚至在她背后叫一声："去你妈的！"或"滚你娘的蛋！"据调查，时而还有人要求用毒气置她于死地，这种愿望确实存在，至于是否有可能实现，笔者就不得而知了；他只能再补充一点：这种愿望是十分强烈的。

对于莱尼的日常生常习惯，还得提供几点细节。她讲究吃喝，但饮食适度。她的主要的一顿是早餐：必不可少的是两个新鲜松脆的小面包，一只煮得嫩嫩的新鲜鸡蛋，少许黄油，一两汤匙果酱（具体说，就是在有些地方称为波维特① 的那种李子酱），放糖极少、调以热牛奶的浓咖啡。所谓午餐的那一顿，她不太讲究：汤和少许餐后水果、甜食就足够了。晚上她吃冷餐：两三片面包，少量色拉、香肠和肉——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莱尼最最看重的是新鲜的小面包，她不让别人代买，而是亲自去挑选，她并不伸手去挑，只要看看色泽就知道；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至少饮食方面是如此——比瘪塌塌的小面包更叫她讨厌的了。为了吃上新鲜小面包，也由于每天的早餐对她来说都象节日的盛宴一样，她甚至一清早就出门，走到人群之中，任凭人们对她辱骂和讥讽。

至于吸烟，要说的是：莱尼从十七岁开始抽烟，一般是每天八支，决不会超过，常常还要少于此数。战争期间她曾一度戒烟，为了把香烟省给自己心上的人（不是她的丈夫！）享用。莱尼是喜欢偶尔喝上几口葡萄酒的人，每次从不超过半瓶，有时根据天气情况喝一杯烧酒，遇上心情好和手头宽裕，还来上一杯雪利酒。另外还要说明一点：打从一九三九年起，莱尼就有一张驾驶执照（是经特许领到的，详情留待下文介绍），但一九四三年以后

---

① 波维特，来源于捷克语，意为李子酱。

她就没有汽车了。她欢喜驾驶汽车，几乎达到着迷的程度。

莱尼一直住在她出生的那幢房子里。这一带市区，不知由于什么弄不清楚的原因没有毁于轰炸，不论如何，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保存下来了，仅仅百分之三十五遭到破坏，可谓得天独厚。不久前发生过一件事，竟使莱尼一反沉默寡言的常态，立即就告诉了她最要好的女友，主要的知己，亦即笔者的主要证人。莱尼带着激动的声音说：一天早上，当她穿过马路去买小面包时，她的右脚认出了石子路面上的一个小洞，那正是四十年前她和其他女孩子在那儿玩跳房子游戏时，它（她的右脚）最后一次踩过的那个洞，恐怕还是早在一八九四年左右铺路时，被铺路工人敲出来的。莱尼的脚立即把它的感觉传给她的脑干，脑干又进而反应到全身各个部位的感觉器官和感觉中心，而且，由于莱尼这个人天生富于性感，她会把一切，立即把一切都转化为性爱，因此，这一经历使她沉浸在兴奋、感伤、回忆和无比激动之中。这种经历，在神学词典中另有一番解释，可能被称为“绝对存在之满足”；而庸俗的恋爱学家和性博士们，则不尴不尬地把它简化为极度的快感。

为了避免使人感到莱尼似乎离群索居、落落寡合，还得介绍一下她的所有朋友。这些朋友中，多数人与她共过平顺的日子，而个人则与她既共过平顺的日子，也一同经受过生活的波折。莱尼的孤寂，完全是由于她生性沉默寡言和守口如瓶，人们甚至可以说她是不苟言笑的人。的确，她难得有“快人快语”的时候，甚至当她与密友玛格丽特·施勒默尔·蔡斯特和洛特·霍伊泽·伯恩特根待在一起时，也是如此，这两个人，在生活的波折接二

连三层出不穷的艰难岁月，仍然同莱尼待在一起。玛格丽特与莱尼同年，象莱尼一样寡居，不过这种提法可能会引起误解。玛格丽特跟不少男人胡搞过，至于她为什么这样做，后文还要交代，她决不是为了要钱，只不过偶尔——如果手头确实过于拮据的话——取点酬劳费而已。也许下述事实是对玛格丽特最恰当的说明：她生平唯一一次接受报酬给予爱情的，是在她十八岁那年正式同她结婚的那个男人；也就是这一次，她向莱尼说了唯一一句查有实据的行同娼妓的话（那是在一九四〇年）："我逮住了一个阔佬，这家伙非要娶我不可。"目前，玛格丽特住在一家隔离病院，患有严重的、看来无法痊愈的性病，她把自己说成是"全完了"——她的整个内分泌系统完全失调。来病院探望她的人，只能隔着一层玻璃与她谈话。不论谁送给她一包香烟，一点烧酒，哪怕是市场上买得到的最小的扁酒瓶装的最便宜的烧酒，她都感恩不尽。玛格丽特的内分泌系统已经如此混乱不堪，以致她"不会感到奇怪，如果有一天从我眼睛里流出来的不是眼泪丽是小便"。不论任何麻醉品她都欣然接受，鸦片、吗啡和印度大麻她也一概欢迎。

隔离酒院坐落在市郊的绿荫深处，式样象一座有游廊的高级平房。为了能够见到玛格丽特，笔者不得不使出种种颇不光彩的手段：行贿，吹牛，结合伪造身分（他冒充是娼妓社会学和娼妓心理学讲师！）。

介绍玛格丽特时，必须先补充一点："究其实"，她的情欲远远不及莱尼强烈；玛格丽特的堕落，并不是她自已贪恋情欲，怪只怪她这个人身上讨人喜欢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把它们施舍出来，乃是她天生的本领；关于这一点，后文还要谈到。总之一句话：莱尼是痛苦的，玛格丽特也是痛苦的。

本书一开头就已提到过的那个女证人，现年七十岁的玛尔雅·范·多恩，早先是莱尼双亲格鲁伊滕夫妇家的女佣，"其实"她本人并不痛苦，她之所以痛苦，完全是由于她所十分关切的莱尼遭受着痛苦的折磨。目前她隐居在乡下，靠着残废保险金、一块菜园地、几株果树、十二只鸡以及半头猪和半头小牛犊（与人合养），过着还算舒适的晚年。玛尔雅和莱尼仅仅共过平顺的日子；使她忧虑的只是遇上"波折连连"的时候，这种忧虑——必须明确指出——并不是着眼于品德方面，而是意想不到地出于民族原因。看来，玛尔雅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前还是一个"胆子很大"的女人，而如今，她身上这个被人们估计过高的器官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如果说总算还在的话，不过肯定没有掉进"裤裆里"①，她从未胆小怕事过；使她大为吃惊的是，有人竟然这样欺负她的莱尼，她的确是深深了解莱尼的，肯定比那位给莱尼的名字挂上一个姓氏的男人更加了解。不管怎么说，玛尔雅·范·多恩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六〇年一直生活在格鲁伊滕家里，她看着莱尼出生，经历过她一生中的种种起伏波折，目睹了她一生的所有遭遇。她决定仍旧搬到莱尼家去住，但目前她还是尽力设法，争取实现把莱尼使到她那里去住的计划。莱尼最近的遭遇和面临的一切，使玛尔雅感到震惊，她甚至准备相信历史上的某些可怕事件，对于这些事件，她过去也并非认为不可能，只是不一定认为十分严重而已。

① 原文是套用一句德语成语"心掉进裤裆里"，意为：胆战心惊、心胆俱裂。

在提供情况的人物中，音乐评论家赫尔韦格·席尔滕施泰因博士占有与众不同的地位。四十年来，这位博士一直住在一幢房子的后进，这幢房子在八十年前算是相当高级的府邸，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就降了格，被隔成两半。他住在底层；这幢房子朝着院子的那一部分紧挨着莱尼的家，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可以细心聆听莱尼的钢琴声，从她启蒙初学，继而有所进步，以至后来日见纯熟，而他始终都不知道弹钢琴的就是莱尼；虽然他认得莱尼的面孔，四十年来有时与她邂逅街头（甚至当莱尼在孩提时代玩跳房子游戏时，他也完全有可能站在一旁观看，因为他对儿童游戏兴趣颇浓，曾以《儿童游戏音乐》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但由于他对女性的魅力并非感觉迟钝，因此，历年来一定注意观察过莱尼的容貌体态和风度举止，有时一定还为之点头赞叹不已，甚至有可能动过欲念。不过必须说明，他认为莱尼——拿她和那些曾同席尔滕施泰因发生过关系的女人相比——"有点俗气"，面而未予认真考虑。如果他早知道那个弹钢琴的原来就是莱尼，是她在完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经过勤学苦练，熟练地掌握了尽管只是舒柏特的两支乐曲，数十年来翻来复去的弹奏竟然从来不曾使他感到无聊，那么，他这位有本领使一个名叫莫妮克·哈斯的女子见到他不仅发抖，而且肃然起敬的人物，也许会改变自己对莱尼的评价吧。至于席尔滕施泰因后来是如何下意识地与莱尼发生并非双双心心相印，而只不过是单方面遥相钟情的爱情的，还有待在下文中述及。说句公道话：席尔滕施泰因也会与莱尼共患难的，只不过是苦无缘分罢了。

对莱尼的父母亲了解甚多，对莱尼的内心世界了解不多，而

对莱尼的外界生活几乎全部了解的一位人物，是现年八十五岁的总会计师奥托·霍伊泽，此人退休迄今已二十年，住在一所兼具豪华大旅馆和高级疗养院特点的舒适的养老院里。他常常来看望莱尼，有时莱尼也去看望他。

他的儿媳洛特·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是一个很可靠的证人。可靠程度稍逊一筹的是洛特的两个儿子：三十五岁的维尔纳和三十岁的库特。洛特·霍伊泽反映情况时言谈犀利，以致有些辛辣，但从来都不是针对莱尼而发的。洛特现年五十七岁，办事员，和莱尼一样也是军人寡妇。

洛特生性嘴巴尖刻，说话毫无顾忌，甚至不顾至亲骨肉的情分，把自己的公公和小儿子库特斥之为歹他，把造成莱尼目前不幸的一切几乎统统归咎于他们祖孙。直到不久以前，她才“听到一些事情，但没有勇气讲给莱尼听，因为连我自己都难以完全置信。这简直无法理解。”洛特住在市中心区一套有两个房间、外带厨房和浴室的住宅里，房租的支出占了她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她正在考虑仍旧搬到莱尼那儿去住，这是出于对莱尼的好感，同时，正如他气势汹汹（原因暂时不明）所说，也是“为了看看，他们[1]是不是真的也会把我撵出来。我担心他们是做得出的”。洛特在一家工会当职员，他“没有信仰”（这是他自己说的，笔者并来问及），“这仅仅是因为我还想混口饭吃，想活命”。

其他并非一点也不重要的情况提供人还有：斯拉夫语言学

[1] 即指洛特的公公和儿子，一九四五年后与洛特分家，断绝来往。见本书第八章。

家朔尔斯多夫博士，由于某种复杂的瓜葛，他与莱尼的一生纠缠在一起；不管这种瓜葛多么复杂，后文还会交代。基于多种原因（也将在适当的场合交代清楚），朔尔斯多夫学非所用地误入了金融界，担任高级职务。他想再过不久，就提前退休，以结束财界生涯。

另一位斯拉夫语言学家亨格斯博士，所起的作用比较次要，不管怎么说，把他当作情况提供人是成问题的，虽然他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强调这一点，甚至为之高兴。他称自己是一个“十足堕落的人”，正因为此话出自亨格斯本人之口，笔者对此未敢苟同，他不打自招，说当年他在苏联给一位不久前遭暗杀的伯爵出身的外交官当差时，为了给德国军火工业“招募”劳工而“出卖了我的俄语，出卖了我那呱呱叫的俄语”。亨格斯的“经济条件不算不宽裕”（亨格斯自述），他住在波恩附近的乡下，为各种研究东方政治的刊物和办事处做评述工作。

如果现在就将所有情况提供人都一一罗列出来，未免为时过早；随着情节的发展，自将对他们一一作出介绍。这恩需要略为提一笔的，倒是还有一个人，把他作为情况提供者，不是为了了解莱尼本人的情况，而是为了了解一个对莱尼一生影响重大的天主教修女。这位情况提供者出身古书商，他只同意用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缩写 B. H. T. 相称。

一个虽然了解情况不多、但至少还活着的情况提供人，是莱尼的小叔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这个人，只有问题涉及到他

本人时，他的话才是靠不住的，不能相信。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现年四十四岁，妻子名叫黑蒂（娘家姓伊尔姆斯），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威廉，十八岁，小的叫卡尔，十四岁。

还有多名情况提供人，笔者将在适当场合，根据其重要程度恰如其分地详细介绍给读者。他们是：三位男性显赫人物，其中之一是本地区的政界人士，另一位属于大工业部门，再一位是负责军工生产的高级官员；两个丧失劳动力的女工；两三个苏联人；一个拥有多爿花店的女店主；一个年老的园艺师傅；一个年纪尚不十分老的前花场老板，现正“一门心思经营自己的不动产”（据此人自述！）；以及其他一些人。在介绍到重要的情况提供人时，将具体说明他们的身高和体重。

自从莱尼将家财什物七典八当，抵债充公以后，她房间里余下的家具摆设，就都是一八八五年和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这两个时期的东西了。她的父母在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二年提承下来的祖业中，有几件带有二十世纪初期风格的家具——一个五斗橱、一个书橱和两把椅子——落到莱尼手中。这些古色古香的珍贵家具，执达员们却不曾注意，只当是不值得抵押的“废物”。由于典押到期无力偿还债款而被法警抄走的，计有十八幅当代本地画家作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五年的油画真迹，它们绝大部分取材于宗教，仅仅由于是真迹，竟被执达员们视为珍宝，莱尼对失去这些油画倒丝毫也不心疼。莱尼房间墙壁上的装饰品，是一幅幅清清楚楚的彩色人体器官照片挂图，这些都

是她的小叔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给她弄来的。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在卫生局当职员，兼管教材和资料，“尽管我并不是那么问心无愧”(海·普法伊费尔语)，他还是把卫生局剔除出来的旧挂图拿来送给莱尼，为了帐面上不出差错，他多少付了几个钱，算是买的。由于他还“经手”为公家添置新挂图，因此莱尼间或也能通过他直接向出版公司购买张把新的，不用说是由她自己掏(不怎么充裕的)腰包。对旧挂图，她都亲自进行修饰：用肥皂水或汽油仔细擦去上面的污渍，用黑铅笔把模糊不清的线条一笔笔描出来，然后再用她儿子小时候用剩的一盒廉价水彩颜料给画面上色。她最心爱的，是一只十分精确地放大的人眼挂图，挂在她的钢琴的上方(为了赎回这架已典押多次的钢琴，不让它被执达员搬走，莱尼曾低声下气地向亲友乞哀告怜：乞援于父母生前的老相识，恳求她的房客预付房租，找小叔海因里希借钱，更多的则是登门向老霍伊泽借钱，尽管他那表面上的亲昵使莱尼感到不是滋味。根据三个最可靠的证人(玛格丽特、玛尔雅和洛特)的介绍，她甚至声言：为了这架钢琴，她愿意“去当马路天使”——这可以说是莱尼极其大胆的一次自我表白)。象人体五脏六腑这类比较次要的器官挂图，也装饰着莱尼房间的墙壁，甚至也不缺少仔细载明其各种功能的被人忌讳的人体生殖器官放大挂图。这些挂图，早在色情神学推广这类挂图以前很久，就已高挂在她的房中了。为了这些东西，当年玛尔雅和莱尼曾发生过激烈争论，玛尔雅认为它们有伤风化，可莱尼态度强硬，顽固地坚持自己所好。

考虑到后文中总要谈到莱尼同玄学① 的关系，不妨在这里

一开始先说明一下：莱尼对玄学丝毫也不感到困难。她同圣母玛利亚关系亲密，几乎每天都在电视屏幕上看见她。但莱尼每次都一再惊奇地发现：圣母玛利亚也是一个金发女人，已远远不是令人倾慕的那种芳龄了。她和圣母玛利亚作这种无声的会面，一般都是在深夜，左邻右舍均已进入梦乡，其他电视节目（包括荷兰电视台）也都发出了结束信号。这时，莱尼和圣母玛利亚面对面地微笑，就这样笑笑罢了。倘若有一天，电视节目结束后在荧光屏上把圣母玛利亚的儿子介绍给她，她也决不会觉得奇怪，更不会感到吃惊。笔者不知道她是否甚至盼望着有这么一天。不过，在他获悉了种种情况之后，如果说她果真盼望有这么一天，那他也不会感到奇怪的。莱尼会两种祈祷文：主祷文和万福玛利亚，她常常信口念念，此外也做点念珠祷告。她没有祈祷书，不上教堂，相信宇宙间有"神灵"（莱尼语）。

在挂一漏万地介绍莱尼的学历之前，让我们先浏览一下她的书橱。这儿陈列着积满厚厚一层灰尘的书籍，其中大部分是她父亲当年连同那十八幅油画一道买下来的，不过至今未被抄走。此外，还有一批连续多年完整无缺的（天主教）教会月刊画报，莱尼不时还要翻翻看看，这些旧杂志——稀有的古籍——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完全是多亏执达员无知，被它们表面上的不显眼所蒙蔽。可惜的是，一九一六年至一九四〇年的全套《高原》

---

① 原文为 Metaphysik，又可译"形而上学"，这里指一种研究神、灵魂和意志自由等感观不可达到的东西（即超经验的东西）的哲学。这一用法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著作中即已出现，至今仍流行于资产阶级哲学家之间。

杂志[1]以及威廉·巴特勒·夏芝[2]的诗集——那些都是她母亲的财产——未能逃脱执达员的注意。比较细心的观察者，如长年给藏书拂尘掸灰的玛尔雅·范·多恩，或是战时长期作为莱尼第二号知心朋友的洛特·霍伊泽，都发现在这个二十世纪初期风格的书橱里摆着七、八部惊人的著作：布莱希特[3]、荷尔德林[4]和特拉克尔[5]的诗集，卡夫卡[6]和克莱斯特[7]的两本散文集，托尔斯泰的两部小说（《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七、八部作品都已经被主人怀着对其作者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心情，翻阅得破旧不堪了，以至于只好用各种粘合剂和胶纸不很在行地补了又补，有的只是用橡皮筋草草地箍成一束。如果有人提出送给她这些作家的作品的新版本（作为圣诞节、生日以及命名日等节日礼品），莱尼总是以一种几乎使人难堪的坚决态度予以拒绝。笔者想借此机会作一个超越自己权限的议论：他深信，要是早在莱尼的文学顾问对她还有影响时，贝克特[8]的散文集已经出版，或者说已经为这位顾问所了解的话，贝克特的散文集也同样会被收进莱尼的书橱的。

---

① 《高原》杂志（Hochland），德国天主教会一九〇三年起创办的一种文艺性月刊。

② 夏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0），爱尔兰诗人，戏剧家，作品带有浓厚的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

③ 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剧作家，诗人，反法西斯主义战士。

④ 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德国诗人。

⑤ 特拉克尔（Georg Trakl，1887—1941），奥地利诗人。

⑥ 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犹太人，作品带有浓厚的神秘气息。

⑦ 克莱斯特（Heinrichvon Kleist，1777—1811），德国剧作家。

⑧ 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 ），爱尔兰当代作家，一九五一年起用法文创作，所著小说和戏剧多描写“人类生活的疯狂失常”。

莱尼所热中的，不仅是每天抽八支香烟、虽属旺盛但不失有节的食欲、弹奏舒柏特的两支钢琴乐曲、欣赏人体器官（包括内脏）挂图，也不仅是对现时身陷囹圄的儿子莱夫作温情脉脉的思念。她也喜欢跳舞，早先一直是个热情的舞迷（这曾一度使她遭殃，从此使自己的名字和叫她难受的普法伊费尔这个姓难解难分）。现在，象她这样一个不容于世人，要被别人用毒气置之于死地的四十八岁的单身妇女，能上什么地方去跳舞呢？到那些年轻舞迷麇集的酒吧间去吗？那种地方，她肯定会被人家错当成风流老寡妇，有可能给糟蹋的。以跳舞作为余兴节目的神甫聚会，她也没有资格参加，因为打从十四岁起，她就再也不进教堂了。倘若除了玛格丽特——看来她一直到她生命结束时都和跳舞无缘——以外，莱尼还能找到其他年轻女友的话，说不定她会稀里糊涂地去参加那种专跳脱衣舞或交换舞伴的舞会的（尽管她自己没有舞伴与人家交换），而且会使她一生中第四次红脸；莱尼在她一生中迄今已经红过三次脸了。那么，莱尼怎么办呢？她就一个人跳，有时只穿内衣内裤在卧室里跳，有时干脆脱得精光，在浴室里对着那面讨人喜欢的梳妆镜跳起来。遇到这种时候，往往有人隔着门缝大看其西洋镜，甚至莱其不备破门而入——结果当然对她的名声不会有任何好处。有一次，她同她的一个房客、过早地秃了顶的法院推事埃里希·克普勒一起跳舞；如果不是这位先生的手过于情急鲁莽的话，莱尼当场差点就要脸红的。反正她不得不请这位房客搬家，因为他——并非不机智，更不是缺乏本能地——发现莱尼极其富有性感。有一次他跑来交房租，正好遇上莱尼在收听舞曲，便和她跳起"冒险的

舞”(莱尼语)来。从此，每天晚上他都在莱尼的房门口苦苦哀求。莱尼不愿理他，因为她不喜欢他。从此以后，克普勒——他在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住下——就成为一条专门在背后咬人的恶狗，三天两头钻进那家由于跟不上时尚化步伐而即将倒闭的杂货店，找老板娘私下密谈，无中生有地编造一套他与莱尼的风流故事，描绘得淋漓尽致。这个老板娘——一个冷面西施，丈夫白天不在家(他在汽车厂工作)——竟被逗得春心撩乱，一把抓住这位后来当上了法律顾问的秃顶法院推事，将他拉进店堂后面的一个里间，直到整得他浑身精疲力尽方罢。这个女人名叫克特·佩施特，二十八岁，她也是一个对莱尼议论得最凶的长舌妇，败坏莱尼的名声，尽管正是她自己趁博览会期间大批男宾云集该市时，通过她丈夫的介绍，在一家夜总会跳“博览会脱衣舞”赚大钱，演出前还让一个油腔滑调的报幕员宣布：她准备彻底满足由于看了她的表演而引起的激动。

新近，莱尼不时又有机会跳舞。基于以往的某些经验，她现在把房间只租给已婚夫妇和外籍工人，例如她以优待价格把两间房子租给一对讨人欢喜的年轻夫妇——为简便起见，我们就管他们叫汉斯和格蕾特——，这是为了照顾他们的经济情况；正是这对夫妇，在与莱尼一起聆听舞曲的过程中，正确地把握了她外表的和内心的有节奏的颤动，这样，莱尼就有机会不时和他们跳跳“高尚的舞”。汉斯和格蕾特有时还小心翼翼地试图进言献策，给莱尼分析她的情况，劝她把衣着换得入时一些，改换一下发式，劝她找个情侣。“莱尼啊，你只要稍稍收拾打扮一番，穿上一件时髦的粉红色衣服，给你动人的大腿套上一双摩登长袜，你马上就会发现你的吸引力还有多么大。”但是莱尼听了摇摇头，她心灵上遭受的创伤太深了，她不再进食品店了，而是请格蕾特

代劳。汉斯则每天早上给她跑面包铺，赶在自己上班前（他在道路工程局当技术员，格蕾特是美容师，愿为莱尼——至今尚未收到效果——免费服务）给她送来两只不可缺少的新鲜小面包；对于莱尼，这比旁人享受任何圣餐都来得重要。

莱尼房间里的墙饰，当然不是清一色的人体器官教学挂图，也还有一些照片，主要是死者的遗照。其中的一张是一九四三年四十一岁时去世的母亲，摄于死前不久：母亲头发稀疏、花白，瞪着一对大眼睛，面带病容，身上裹着一条毛毯，坐在来因河畔黑尔泽船码头附近的一张长凳上，在这个码头上可以看到地名，背景是修道院的围墙。可以看出，莱尼的母亲感到冷，疲惫而无光泽的眼睛显得特别突出，在毫无生气的脸上，她的双唇却又意外地表现得那样坚强；从她的神色来看，她是不想再活了。要判断她的年龄，那可不太容易：她是一个因一种神秘的疾病而未老先衰的年已三十上下的妇女呢，还是一个徐娘虽老、风韵犹存的六十老太呢？确实难下断语。在这张照片上，莱尼的母亲微微含笑，并不勉强，但却是费劲的。

挂在墙上的另一张照片是莱尼的父亲，也是在他一九四九年死去前不久，用一架简易照相机拍摄的，时年四十九岁。他也微微含笑，丝毫不显得勉强。他身穿一件细心地补了又补的泥瓦匠工作服，站在一幢倒坍了的房子跟前，左手拿一根行家们称之为"分叉凿"的那种撬棍，右手握着一把榔头，行家们叫做"手锤"。在他的前后左右，满地都是各种规格的钢架，也许就是这些钢梁引起他称心微笑吧。正象一个钓鱼归来的人，面对着自己一天的收获满意地微笑一样。的确，这些东西——后文将要详

细介绍——就是他一天的收获，当年，他给上文业已提及的那位前花场老板收购废钢，此人早就预感到“废钢看涨”(洛特·霍伊泽语)。从照片上看，莱尼的父亲废有戴帽子，头发长得很密，只有一点灰白。对于这样一个身材高大瘦长、两样工具拿在手里显得十分自然的男子，很难给他加上一个带有社会属性的雅号。他象无产阶级呢？还是象一位绅士呢？象一个在干不习惯的活计的人，还是干这种显然很苦的活计的熟手呢？笔者倾向于认为，两种说法都对，各有各的道理。洛特·霍伊泽把这张照片上的他说成是“无产者先生”，这就更加坚定了笔者的看法。莱尼的父亲甚至没有流露出丝毫不想再活下去的迹象。同他的实际年龄相比，他既不显得年轻，也不显得年老，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快五十岁的人”，他甚至可以在征婚启事中保证“使一位年纪最好不超过四十的快乐的生活伴侣得到幸福”。

另外的四张照片是四个男青年，都在二十岁光景，三人已死，一人(莱尼的儿子)还活着。我们先看其中的两张。这两张照片要说有缺点，只不过是反映在影中人穿的衣服上：虽然这是两张头像，他们两人的胸部毕竟还是拍得多了一些，以致清清楚楚露出了德国国防军制服上象征性的装饰品——国徽之鹰和卐字，即行家们所说的“兀鹫”。这两个人，一个是莱尼的哥哥海因里希·格鲁伊滕，另一个是她的表兄艾哈德·施魏格尔特，他们——象下面第三个死者一样——不能不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牺牲品。海因里希和艾哈德“显得有些德意志风度”(笔者)，他们俩都“有些”(笔者)象人们不难找到的那种照片上的有教养的德国青年。这里不妨引用洛特·霍伊泽的话，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她把他们两个说成是“班贝格骑士”①。后来事实将会证明，这的魏不是肉麻的吹捧。事实上，就他们的头发来看，艾哈

德是金黄色，海因里希是褐色，两人都面露笑容，艾哈德的笑"出自内心，极其自然"（笔者），十分予人以好感。海因里希的笑就不是完全出自内心了，他的嘴角上已可看到一种虚无主义的神气，一般被误解为愤世嫉俗，不过从拍摄这两张照片的一九三九年来看，这样说则未免过早，甚至是把他夸奖得过于进步了一些。

第三张遗照，是一个名叫博里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的苏联人，面无笑容。这张照片是他一九四一年在莫斯科时自己拍的一张放大的证件照，几乎象一幅铜版画。照片上的博里斯面容严肃、苍白，高高的前额十分显眼，乍一看会叫人产生过早谢顶的感觉，其实那只是博里斯·科尔托夫斯基生就的特征而已，因为他长着一头浓密鬈曲的金发。他的眼睛又黑又大，配上一副红军军用镍镜，这就有可能予人一种经过艺术美化的错觉。显而易见，尽管此人表情严肃，面容消瘦，额门高得出奇，但拍照时年纪还是很轻的。他身着便服，席勒式大翻领衬衫领口敞开，没有穿茄克衫，想必照片是在天热时拍的。

最末一张照片上的人还在世，即莱尼的儿子。他在拍这张照片时，虽然与艾哈德、海因里希和博里斯拍照时的年龄相同，但看上去比他们三人都显得年轻，这可能是后来的照相器材的质量比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一年要好的缘故。无可否认：年轻的莱夫不只是微笑，他在这张摄于一九六五年的照片上笑得可欢啦；管他叫"快乐的小伙子"，那是谁也不会犹豫的。显而易

---

① "班贝格骑士"，班贝格为巴伐利亚古老城市，建于十一世纪初（十三世纪重建）的班贝格大教堂中，有早期哥特式的巨型浮雕组，塑造了当时骑士的故事，"班贝格骑士"即指此。后文第三章中，洛特再次使用这一称呼与农民战争对照，隐喻海因里希和艾哈德两人沉湎于理想和浪漫，缺乏实际。

见，莱夫长得很象外祖父，也很象父亲博里斯。他兼具“格鲁伊滕家的头发”和“巴尔克尔家的眼睛”(莱尼母亲的娘家姓巴尔克尔——笔者)，因此也就有点象艾哈德。看看他的笑容和那双眼睛，毫无疑问地可以断言，他肯定不具备他母亲的那两种性格：平时既不沉默寡言，遇事也不守口如瓶。

说到这里，还得提一下一件衣裳，这是莱尼的一件浴衣。这件浴衣是她不能缺少的东西，正如她不能没有那些照片、人体器官挂图、钢琴以及新鲜小面包一样。她硬要名不副实地把它叫成晨服。浴衣的料子是一种具有“战前质量的厚绒布”(洛特语)，从背部和口袋边可以看出，它当年的颜色是枣红的，但现在——事隔三十年后！——已经褪色，变成了淡淡的木莓酱色，不少地方还用橘黄色棉布补过，说句实在话，补得还很在行哩。莱尼难得有不穿这件浴衣的时候，几乎再也舍不得把它脱下来了。据说她曾说过，“到时候她想穿着它入土呢”(汉斯和格蕾特·黑尔岑语，他们俩是有关莱尼日常起居情况的知情人)。

对于莱尼目前房间转租的情况，也许还需要简单提一笔：她把两个房间租给了汉斯和格蕾特；另外两间租给了一对有三个孩子的葡萄牙籍夫妇，这一家姓平托，两个大人的名字是若阿金和安娜-玛丽亚，三个孩子叫埃特尔维纳、曼努埃拉和若泽；还有一间租给了三个土耳其工人，他们是卡亚·顿奇、阿利·基利奇和梅赫梅特·沙欣，三人都已经不怎么年轻了。

第 二 章

不言自明，莱尼并非生来就是四十八岁，有必要回溯一下她以前的情况。

看看莱尼年轻时的照片，无疑可以断定，她是一个既标致又活泼的女孩子。就连穿上纳粹少女组织制服——那是在她十三岁到十五岁的时候——的莱尼，模样儿也是怪可爱的。任何一个男人见到她，对她体态的魅力都会作出不下于这样的评论："嘿，长得可真不坏！"人们出于求偶的欲望，往往会由一见钟情进而产生一种自发的愿望：只想立即脱衣解带，与一位异性或同性的对象尽片刻之欢，同时并不考虑双方的永久结合。这种欲望最后会引起十分炽热的、无法抑制的激情，引起人们从心灵到肉体的纷繁不宁和辗转反侧，种种表现形式简直无法无天，每一种表现形式——从最表面的一直到最严重的——都有可能、并且事实上也确实由莱尼所引起。她十七岁时，完成了从好看到漂亮的飞跃；比起有着一对淡色眼睛的金发少女来，黑眼睛的金发少女更容易实现这个飞跃。到了这一阶段，任何男人对她的评论都不会下于："引人瞩目"。

关于莱尼的学历，还必须再谈几点：十六岁那年，她进入父亲的办事处。父亲意识到女儿正处于从好看到漂亮的飞跃年

华，尤其是看出女儿对男人具有吸引力（我们现在回溯一九三八年的事），就将她带在身边，参加重要的业务会谈。在这种场合，莱尼总是手拿笔记本和铅笔，伏在自己的膝头上扼要地做些记录。她不会速记，看来也从未学过。她对抽象的东西和抽象化虽然并不十分陌生，但对被她称之为“七歪八扭的符号”的速记，她却不高兴学。莱尼读书求学也是活受罪，而老师受的罪又比她本人还要多。经过两次并非留级而是“自愿降级”之后，她念完了小学四年级，得到一张评语颇多的成绩中等的文凭。现年六十五岁、业已退休的施洛克斯校长，是今天还在世的莱尼小学时代的见证人之一——笔者是在他乡下度晚年的居处找到他的。据他所知，莱尼有一段时间本该降到补习班去的，只是由于两个原因，才使她避免了这种不幸：一是她父亲有钱，不过这一条——施洛克斯强调指出——从来未直接起作用，只是间接起作用；二是莱尼十一岁和十二岁时，连续两年获得“全校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的称号，这是由一个在各校进行巡回调查的人种学委员会授予她的。莱尼甚至一度被提名为“全市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候选人，但她却屈居于一个新教牧师的女儿之下，名列第二，因为那个姑娘的眼睛比莱尼明亮，而莱尼的眼睛，当时已经不再完全呈淡蓝色了。难道能把“全校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贬入补习班吗？十二岁时，莱尼升入一所修女主办的女子中学，但到十四岁，就由于实在不行而被勒令退学。两年内，她曾以极坏的成绩留级一次，升级也是一次，因为她父母向校方郑重具保：允许让她升一级，下一学年就自动退学[①]。他们的确这样

[①] 这是当时德国学校中将学业成绩差的学生摂包袱的办法，即经家长请求，让不能升级的学生破例升级，作为交换条件是下一学年该生必须自动退学。

做了。

为了避免引起误会，还得提出一些具体材料，说明莱尼求学时代学校里种种恶劣的情况。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什么责任问题，无论是在小学或女子中学，莱尼都不曾犯什么重大过错，有的仅仅只是学非所宜，教不得法而已。莱尼是完全跟得上班的，甚至对学习感到如饥似渴，而且个个教师也都努力使她止饥解渴。问题只在于向她提供的饮食，都不适合她的智力，不适应她的天分，和她的理解力对不上口径。大多数情况下，几乎可以说一无例外，所提供的教材都缺少具体形象的感性内容，而没有这些，莱尼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就说书法吧，她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困难，尽管它属于高度抽象的学问，人们会以为她会感到困难的。因为对莱尼来说，书法毕竟是看得见、摸得着，甚至是闻得出味道的(这是指各种各样的墨水、铅笔和纸张散发出的气味)，所以说，她甚至练就了各种复杂字体的书法，掌握了正字法的细微差别。她写的字——可惜她写得并不多——刚劲有力，非常吸引人，而且——正如退休校长施洛克斯(有关莱尼上学一切基本情况的提供者)令人信服地断言的那样——简直能“使人顿生爱慕之心或引起性欲冲动”。莱尼最倒霉的是两门相互有联系的课程：宗教和算术或数学。如果在男女教师中，哪怕有一位想到要给年甫六龄的小莱尼讲解清楚，她非常喜爱的布满星星的天空能使人们断次进入数学和物理的领域，那么，她也就不会见到乘法九九表就头痛了，而她之讨厌九九表，竟有如人们之讨厌蜘蛛哩。对于那种将核桃、苹果、母牛和豌豆画在纸上进行直观计数的教学法，莱尼感到莫名其妙；她生就不会算术这一门。相

反对自然科学，她却无疑天资聪颖，而且，如果说除了一般教科书和挂图中常有的那些红色、白色和粉红色的孟德尔① 豌豆花之外，她还能得到一些更为复杂的遗传学知识的话，那她一定会——用好听的话来说——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一头"钻进"这一门的。由于当年的生物课内容贫乏，这门学科的许多乐趣她都失之交臂，只是在她上了年纪以后，用廉价的水彩颜料一笔一笔地给复杂的人体器官挂图描色时，她才感到乐在其中。范·多恩令人信服地提到，莱尼在上学前生活上有一件小事使她难以忘怀，而且至今她还感到"不是滋味"，如同莱尼房间里的生殖器挂图一样：孩提时代的莱尼，就对自己的排泄物兴致勃勃，而且还要问个明白："真要命！从我身上钻出来的这些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呀？"但是——可惜得很！——她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无论母亲或范·多恩，都没给她解答！

莱尼一生迄今先后和两个男人同过房，其中倒是后一个，偏偏是个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苏联人，能够发现：莱尼的感受力令人吃惊，才智过人。她还告诉过这个男人她第一次得到完全的"存在之满足"的经过，后来她又把这个故事——四三年底到四五年年中这段时期，她还远远不象今天这样沉默寡言——告诉了玛格丽特：十六岁那年，在她刚刚离开寄宿学校后不久，六月里的一天傍晚，她骑自行车外出，途中经过一片长满石楠的草地，她下了车，仰而躺在石楠丛中，"张开四肢，放松肌肉，和大自然紧紧拥抱"（玛格丽特引述莱尼的原话），两眼注视着刚刚开始闪烁的、还映照着晚霞余辉的布满星星的天空，这时，她达到了

---

① 孟德尔(Gregor Mendel, 1822—1884)，奥地利生物学家，遗传学奠基人，总结豌豆杂交试验中花的变异，阐明遗传规律。

今天人们过多地追求的那种快乐的顶点。莱尼——据她对玛格丽特所说，她对博里斯是这样说的——在一九三八年的这个夏日黄昏，伸开四肢，躺在那暖烘烘的石楠丛中，“袒怀”以待，此时此刻的她，实实在在完全沉醉在“施”与“受”的幸福感里，而且——后来她又向玛格丽特解释——如果她因此而钟灵受孕的话，她也一点不会觉得奇怪的。因此，对莱尼来说，童贞女怀胎也决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莱尼带着一张糟糕的学习成绩单离开女子中学，宗教和数学两门功课都不及格。后来，她又进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念了两年半，所学课程有家政、德语、宗教、一些历史常识(至宗教改革止)以及音乐(钢琴)。

在为一位已故的修女（此人如同往后还将占有大量篇幅的那位苏联人一样，对莱尼的学识影响重大)树碑立传之前，需要先介绍一下三名还活在世上的修女证人。这三名修女与莱尼相识至今虽已时隔三十四年和三十二年，但她们对莱尼的印象都还历历在目。笔者带上铅笔和笔记本，分别在三个地方对她们进行了走访。一提起莱尼，她们都脱口而出:“哦，您是说那个格鲁伊滕姑娘啊!”这句不约而同的感叹，笔者认为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莱尼给她们留下的印象多么深刻。

这三名修女不仅一致发出感叹:“哦，您是说那个格鲁伊滕姑娘啊!”而且还有一些相同的身体特征，因此，为节省笔墨起见，某些细节不妨并在一起交代。她们三人都是一脸略呈黄色、

皱纹隐约可见的所谓羊皮纸皮肤，颧骨瘦小；三位都给笔者献上(或叫人献上)茶点，三家的茶都不怎么浓，这样说倒并非笔者不知好歹，而是为了如实报道情况；当笔者开始吸烟(不客气地未征求主人许可就吸，因为他不想冒遭到拒绝的风险)时，三位都禁不住咳了起来；三位都是在格局几乎相同的客厅里接待笔者，客厅里的布置都是清一色的宗教宣传品，一幅耶稣蒙难像，一幅现任教皇和一幅地区红衣主教的肖像；三处客厅中的三张桌子上都铺有毛绒台布，笔者坐的椅子都同样不舒服；这三位修女的年纪，都在七十到七十二岁之间。

第一位修女名叫哥伦巴努斯，是莱尼念了两年成绩不佳的那所女子中学当年的校长。这是一位秀外慧中的人物，有着一对失去光泽但非常聪明的眼睛，整个谈话过程几乎从头至尾都坐在椅子上摇头，她摇头，那是因为她对自己未能启发培养莱尼而感到内疚。她一再说："这个姑娘不简单，甚至可以说是很不简单，但我们没有对她启发培养。"修女哥伦巴努斯——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数学家，至今还(借助放大镜！)阅读专业着述——是早期妇女教育解放运动的典型代表人物，但可惜由于身穿修女服，因而很少得到人们的了解，更少受到人们赏识。当笔者彬彬有礼地问到她本人的生平细节时，她说：早在一九一八年，她就穿上粗麻布袍子四处奔走了，她所受到的嘲笑、蔑视、奚落，比之今天有些流浪汉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她听到笔者谈及莱尼一生中的某些具体情况时，她那疲惫无光的眼睛显得略为明亮起来，连声叹息，但语气有些激动地说："太过分了，唉，真太过分了——这是她命该如此！"这种评语使笔者目瞪口呆。告别时，他不好意思地瞥了一眼主人桌上那只葡萄叶形的陶质烟灰缸，这只烟灰缸平素也许很少使用吧，可能只是偶尔有一支教会头

面人物未抽完的雪茄熄灭在里面，而这一回，竟胡乱一气地躺着四个大模大样的香烟屁股。

第二位修女名叫普鲁登蒂亚，莱尼的德语教师。她略为不象哥伦巴努斯那样高贵，脸颊比后者稍显红润，但也说不上脸颊红润，只不过她早年的红润还依稀可见，而哥伦巴努斯修女早在年轻时就脸色苍白，如今则苍白得更厉害了。普鲁登蒂亚修女（当她听到莱尼名字时发表的感叹见上文！）提供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细节。她说："为了不让她退学，我确实尽了一切努力，但不顶事。尽管我的德语课给她打了个二分[①]，也是正正当当的二分，因为她写了一篇很了不起的作文，题目是：'《O侯爵夫人……》[②]读后感'。您知道，这是一本禁书，甚至很不受欢迎，因为它的内容实在叫人难以下褒贬——但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十四岁的女孩子尽可以读读这本书，并且用脑子想一想——，嘿，格鲁伊滕真写出了一篇了不起的文章：她以火一般的热情为书中的F伯爵辩护……，她居然懂得体贴——叫我怎么说呢，她懂得体贴男性，这使我感到惊奇。真了不起，简直可以打一分。但还是有不及格的学科，即宗教课，按说本应该打个六分的，但老师实在不忍心给女孩子的宗教课吃这种分数。此外还有一门般学分数不及格，尽管哥伦巴努斯修女为这件事流下了眼泪，但没有办法，因为成绩实在太差，她不能不秉公办事——就这样，格鲁伊滕退学了……走了，只好走了。"

莱尼从十四岁起一直到快十七岁在寄宿学校继续上学。这

---

① 德国学校中的记分制度是从一分到五分。一分即"优秀"，二分即"良好"，三分"及格"。下文中提到的"六分"，指比不及格更坏的分数，连"鸭蛋"都吃不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② 《O侯爵夫人……》是德国作家克莱斯特的一篇短篇小说。

所学校的修女和女教师只有一个还找得到下落，即这里介绍的三位修女中的最后一位切契莉阿。就是这位修女，给莱尼个别教了两年半钢琴。她一开始就发觉莱尼有音乐天才，但同时也感到吃惊，甚至失望，因为莱尼竟然不会读乐谱，更不用说通过读乐谱来认识所表示的音了！最初的六个月，她给莱尼听唱片，让她跟着唱片学，这种方法——按切契莉阿修女的话说——虽然值得商榷，但还是有收获的，通过这样练习甚至——切契莉阿修女语——证明，“莱尼不仅能领会旋律和节奏，甚至能理解音乐的结构”。可是怎样——切契莉阿连声叹息不止！——才能教会莱尼非掌握不可的识谱呢？她想了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天才的想法——绕道试用地理课的办法。虽然地理课颇为枯燥乏味——主要是靠死记硬背和就着地图说出地名，象念经似地翻来复去背诵来因河的所有支流，同时机械地复述为这些河流所隔开的中等高度的山脉或地域——然而，看地图这一招，莱尼倒是学会了：在她的心目中，地图上那根弯弯扭扭处在洪斯吕克和艾费尔之间的黑线，即摩泽尔河①，可决不是黑色的曲线一根，而是代表一条的的确确存在着的河流。好啊，试验成功了，莱尼学会识谱了，吃力得很，勉强得很，常常急得哭出来，但她还是学会了。由于切契莉阿修女得到莱尼父亲一笔优厚的额外报酬，作为修道会的收入，因此她感到有责任让莱尼“也能学到点东西”。这一点她是做到了，此外“我佩服她一点：她很快就认识到舒柏特是她的极限——想要超越这一极限的种种尝试，都失败了，以致连我也劝她就此止步，尽管她父亲硬要我教她弹

① 洪斯吕克和艾费尔，地名，均在德国西南，来因河左岸，境内多山，摩泽尔河自西南向东北经洪艾两地区之间流入来因河。

奏莫扎特和贝多芬等名家的作品。”

关于切契莉阿修女的皮肤，还要补充一点：她那象牛奶般白净、柔软的皮肤，有几处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并不十分枯皱。笔者坦白承认，他内心深处禁不住产生一种也许属于无礼的愿望，满想多看几眼这位极其和蔼可亲的独身老太的皮肤，尽管此举有涉嫌钻研老人学的危险。遗憾的是，当笔者向她问起一位对于了解莱尼身世干系特别重大的修女时，她就顿时变得冷若冰霜，几几乎要下逐客令了。

有一点在这里只能约略提示一下，以后有机会时还可以深入一步加以证明：莱尼是一个被埋没了的感性天才。她不幸长期属于被人们信口骂为呆头呆脑的笨鹅的那种女人，老霍伊泽甚至至今还认为莱尼是这种女人。

有人也许会以为，一生十分讲究吃喝的莱尼，当年定然是一名烹饪成绩优秀的学生，家政课也一定是她喜爱的课程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烹饪学是在炉灶边和厨桌旁授课，且有闻得出味、可以品尝和看得见的实物作教材，但这门课程对莱尼来说（如果笔者对切契莉阿修女的一些陈述理解正确的话），却比数学课更加抽象，就象宗教课那样令人难以感知。很难断言，莱尼本来是否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卓越的女厨师，更不能肯定，是否由于修女们对香料的简直莫名其妙的害怕，因而使莱尼对烹饪课上做出的菜肴感到太“不够味儿”。莱尼如今不是一名好厨师，可惜是无庸置疑的；只是做汤这一门她有时还行，再有餐后甜食也还可以。除此以外，她还是——决不能认为理所当然——煮咖啡的能手，而且是一个和颜悦色的婴儿厨师（经玛尔雅·

范·多恩证实)，只不过要叫她开出一份象样的菜单来，那她是怎么也无力胜任的。莱尼的宗教课也很糟糕，就象人们调制一种调味汁时不顾配方胡乱加料，结果产品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一样，她的宗教课也彻底失败了(或者不妨说是幸而没有学好)。至于面包或葡萄酒，拥抱或捏手，那么，只要是尘世间实实在在的东西摆在眼前，她是丝毫也不感到困难的。直到今天，她还完全相信涂点口水就能给人治好病。可是，有谁会给一个病人去涂口水呢？可莱尼就不同了，她不仅用口水治好了一个苏联人和她自己的儿子，光是捏捏手，就使这个苏联人乐不可支，快慰莫名，也使她的儿子得到欣慰(洛特及玛格丽特语)。可是，有谁会去捏别人的手呢？当莱尼初领圣体(她最后一次参加教会活动)时，她吃到的是什么样的面包呢？而且，真见鬼，不是说还有葡萄酒么？葡萄酒又在哪里呢？为什么不给她葡萄酒呢？那些堕落的女人，圣母之于经常接近的许多女人，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使莱尼感到极其满足，而且竟象看到布满星星的天空那样置她于狂喜的境地①。

不难想象，一生中把每顿早餐的新鲜小面包视为命根子，甚至为此而甘受街坊邻居嘲笑的莱尼，当年是怀着多么迫切的心情渴望参加初领圣体呀。要知道，莱尼未蒙获准在女子中学读书时参加这一仪式，原因是，她在仪式前上准备课时就已等不及了，一个劲地盯住宗教课教师不放。这位教师在当时就已经上了

① 这一段后半部所谈，涉及一些《圣经》故事和天主教徒初领圣体(第一次参加圣餐)的仪式。据《圣经》记载，耶稣曾用唾沫治好病人，伸手一摸就使麻风病人痊愈，并要受到人们歧视的堕落的女人经常去找他，使她们恢复身心健康。按天主教习俗，举行圣餐时，由神甫将一小块面包(即圣饼，象征耶稣身体)放入领圣体的教徒的口中，象征耶稣血液的葡萄酒则只由神甫自己饮，不给教徒喝。

年纪，头发花白，一个严格的禁欲主义者，可惜已于二十年前去世。那一次准备课刚刚上完，莱尼就带着稚气的急切心情连连向老教师要开了："快点呀，您快给我那块活命的面包呀！干吗让我老等呢？"这位名叫埃里希·布林格斯的宗教课教师有一些著述传之后世，他认为莱尼的这种自发的感性表示无异是"犯罪"。在他看来，这种要求不啻是"感性的欲念"，简直太可怕了。他对莱尼这一无理要求，当然断然予以拒绝，并以"已表明对圣餐意义无法理解和不成熟"为由，将莱尼推迟两年开始领圣体。这件事有两名证人：一名是老霍伊泽，他还记得很清楚，他说，"那次好不容易才避免了一场风波"，只是由于莱尼本人并不知道的修女内部的糟糕情况（一九三四年！），人们才决定"不让此事张扬出去"。第二名证人就是那位老教师自己，他爱好圣饼碎块学，那是这样一门学问：一连几个月，如有必要则成年累月地挖空心思，设想种种可能的情况，研究如何切圣饼、分圣饼及其一切有关问题和注意事宜。就是这位以圣饼碎块学专家一直还有点名气的先生，后来在一家神学文学杂志上分期发表了《我的生平素描》一文，文中透露了莱尼的这件事。他不顾羞耻，毫无想象力，以缩写字母点出莱尼的姓名："有那么一个名叫 L. G.① 的女孩子，当时十二岁"。接着，他描写莱尼有着"热情兴奋的眼睛"和"肉感的嘴唇"，还以轻视的语气说莱尼讲话带地方口音，说她家是"标准的暴发户，俗不可耐"，最后归结一句："对于这样一种要求获得最崇高的圣物的无产阶级唯物主义欲望，我当然必须予以拒绝。"莱尼的父母亲虽然算不上宗教迷，对教规也不怎么特别笃信，但地方风俗和周围环境所造成的气氛，毕竟

---

① 莱尼婚前的姓名是：Leni Gruyten（莱尼·格鲁伊滕）。

使他们感到，“莱尼还没有跟上大家”是一件憾事，甚至是丢人的事，因此，当莱尼十四岁半时（已就读寄宿学校），他们就让莱尼——用一句俗话说——“随大流”。可是，由于当时的莱尼已经——据玛尔雅·范·多恩令人信服的陈述——不是一个幼稚的小姑娘了，这种宗教仪式对于她已完全失去作用，即使教会举行百年大典，也是如此。当时，莱尼是那样热切地渴望着那块面包，她全身的感觉器官都已作好准备，只等实实在在地沉浸到无限喜悦之中去——“可是”（她这样告诉当时感到惊恐的玛尔雅·范·多恩）“放在我舌头上的，竟是一块白不龇咧的、又干又瘪的、说不出什么滋味的东西——我差点没一口吐出来！”玛尔雅连连在自己胸前划十字，并且惊诧地发现，明明白白摆在眼前这么多可以感知的东西，例如，蜡烛、乳香、风琴乐曲和合唱圣诗，都没有能够帮助莱尼摆脱这种失望。就连可以吃到芦笋、火腿、香草奶油冰淇淋的例行大会餐，也无法使她摆脱这种失望情绪。其实，莱尼本人就是一位“圣饼碎块学家”①，她每顿饭都要把盘子里的所有面包屑拣起来，塞进嘴巴里（汉斯和格蕾特作证），天天如此，不就是明证么！

本书理应尽量避免谈及种种伤风败俗之事，但为了求得故事的完整性，不得不在这里提一提寄宿学校的性知识课。这门课的对象是年轻的女学生——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二十一岁——，时间是在她们毕业离校之前，主讲人是宗教课教师。这

① 原文是 Partikularistin，本意为政治上的“各州独立主义者”或宗教上的“特殊神宠论者”，此处系针对前文“圣饼碎块学”而言，源出一词，语带双关。

位教师名叫霍恩，年纪不大，也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他是仅仅迫于女校长的压力，才同意让莱尼参加初领圣体的。他讲授性知识课时曼声细语，避而不谈生物学方面的细节，哪怕是暗示一下也没有，完全使用烹饪学上的比喻。他把男女同房——用他的话说是“必要的繁殖过程”——的结果比之为“草莓掼奶油”，讲到洋洋得意时，他还即席借用各种比喻来描写合法的和非法的接吻。只有当他举“蜗牛”①作比方时，女学生们则个个傻了眼，怎么也弄不明白。必须指出，就在他曼声细语，引用难以形容的、纯属烹饪学上的比喻讲解有关接吻和同房的无法指写的细枝末节时，莱尼生平第一次红了脸（玛格丽特谈），而且，由于她自己从不饮悔于怀——这一事实使她心安理得地把忏悔当作只不过是口中随便念念有词的一种例行公事而已——，她身上某些此前尚未开启的感觉中心，看来一定是受到了这些讲解的触动。笔看认为，既然要对莱尼率直的、无产阶级的、几乎称得上是天才的感性②多少作出令人信服的介绍，就必须补充说明一点：她决不是不知羞耻的人，因此，不能不把她的第一次红脸看成是一桩非同小可的事。不管怎么说，反正莱尼本人对她无法控制自己不使自己红脸这件事感到非同小可，十分难受，极其痛苦。莱尼内心深处潜伏着对爱情和性生活的巨大期望，已用不着再在这里强调了。不过，一位宗教课教师以这种方式向她讲解，并且象赞美圣餐之为圣礼那样向她推销这一套，使她火冒三

---

① 指食用蜗牛，以吃蜗牛作比喻，同时也有以“蜗牛”(Schnecken)一词的音摹拟“味美”(Schmecken)一词的音的意思。

② 原文为 Sinnlichkeit，这个词有“感觉能力”或“感性”以及“性感”或“情欲”两种含义，作者在本书中多处用到这个词，时而指前一含义，时而指后一含义，此处系指前一含义，译“天才的感性”，是为了和上文中的“感性天才”相呼应。

丈，也使她对自己至今弄不明白为什么会红脸更加感到莫名其妙了。她气得讲不出话来，满脸通红地断然离开了课堂；这使她又得了一个五分——不用说是宗教课——，记在她的毕业成绩单上。除此以外，宗教课向她灌输的，但始终没有激发她的热情的，还有坐落在西方世界的三座名山：各各他、阿克罗波利斯、卡皮托[1]——对于各各他，她并不是没有好感的，她从《圣经》课中知道，那只是一个小山丘，位置也根本不在西方世界。莱尼仍然记得主祷文和万福玛利亚，甚至还加以使用；她会做一点念珠祷告，感到与圣母玛利亚见面是很自然的事，如果考虑到这一事实，那么，这里也许可以说明一下：对于莱尼的宗教天才，人们并没有正确理解，正如没有正确理解她的感性天才一样；本来，她也许是值得人们发掘并加以培养造就，成为一个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哩。

行文及此，终于有必要开始为一位女性树碑立传初步勾划出几笔轮廓了。可惜的是，笔者根本无缘亲自拜会这位女性，无法延请她出场作证，因为她已于一九四二年年底去世，死因至今不明。她不是死于直接的暴力，而是死于暴力的胁迫，以及周围环境对她的忽视。曾经疼爱过这位女性的，大概只有 B. H. T. 和莱尼两人了。尽管作了一些细致的调查，还是无法弄清她的俗名，既不知道她的籍贯，也不知道她的家庭出身。已经了解到的只是——这一点倒有足够多的证人：莱尼、玛格丽特、玛尔雅，

[1] 各各他，亦译髑髅地，在耶路撒冷附近，相传为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的地方。阿克罗波利斯，指古希腊都城雅典的卫城，筑在小山上，建于公元前六世纪。卡皮托为罗马的一个小山丘，上有古迹朱辟特神殿。

以及那位只同意用 B. H. T. 相称的前古书商学徒——她在修道院用的名字：拉埃尔修女，外加一个绰号：肠卜僧①。当她开始结识莱尼和 B. H. T. 时（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年纪大约四十五岁。她个子小，但筋骨很好（她曾对 B. H. T.——不是对莱尼——谈起：她得过女子八十米障碍赛跑的全德少年冠军！）。也许——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那阵子，她完全有理由不细谈自己的出身和学历——她是当年那种所谓“有学问的人”，而且决不排除她有可能得过博士学位，甚至可能（当然是用别的名字）在大学任过教。她的身高可惜只能根据证人的回忆，估计约有一米六十，体重大概五十公斤左右；发色黑中夹白，眼睛淡蓝，有可能是克勒特人，也有可能是犹太人。B. H. T. 此人现在是一家中型市立图书馆的馆员，没有得过学位，研究古书目录，对购书方针有一定的影响。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和和气气，尽管说不上十分主动热情。他与这位修女虽然至少相差二十岁，但看来却曾经钟情于她。一九四四年以前他一直逃脱了兵役义务，从而也就成了莱尼和拉埃尔两人之间脱链的一环②（不过他在战争的第五年应征入伍，时已近二十六岁，据他说身体倒是棒棒的），这说明，他具有一种顽强的、工作计划有方的才智。

当笔者问起拉埃尔修女的情况时，B. H. T. 就变得健谈起来，甚至可以说兴致勃勃。他不抽烟，是个单身汉，根据他的那

---

① 肠卜僧，古代意大利北部伊特卢利阿和罗马的一种僧人，他们查看祭神用的牲物的内脏而占卜神意。

② 笔者的意思是：莱尼与 B. H. T. 均和拉埃尔要好，因此 B. H. T. 本应了解莱、拉两人之间的关系，但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B. H. T. 竟“没有想到去看看拉埃尔”（见后文），以致无法为笔者查明她们两人的关系提供情况，拉本人已死，莱尼则守口如瓶，所以叫“脱链的一环”。

套有两间半房间以及浴室的住宅中散发的气味判断，还是个烧菜的能手。在他的眼睛里，只有古书才是书，新书他根本瞧不起："新书不算什么书"(B. H. T.语)。他过早地秃了顶，营养看来不坏，但失之单调，身体有发福的趋势：粗毛孔很显眼的鼻子以及笔者多次拜访时都曾看到的耳朵后边的小肉瘤，说明了这一点。他生性不大爱说话，但一提到拉埃尔-肠卜僧，他却变得健谈起来。对于莱尼——他只听那位修女讲起过，说她"是个漂亮得出奇的金发姑娘，还有许多美好的事和痛苦的事在等着她呢"——他怀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年轻人的火热的心，以致笔者禁不住有心在事隔三十四年之后的今天，执柯作伐，让他们俩结成伉俪，如果笔者愿意而自己又不曾爱上莱尼的话。不管这位老光棍 B. H. T. 秉性如何古怪(隐蔽的一面和明显的一面)，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对人忠诚，可能对自己也忠诚。

关于这位老光棍，可以有许多话好说，但在此从略，因为他与莱尼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只是可以作为一面反光镜映证某些情况而已。

倘使有人以为，莱尼就读这所寄宿学校是活受罪，那就错了；不，她在那里过的美得根，简直有如天之骄子：她遇上了好老师。凡是课堂上讲授的东西，她都不怎么感兴趣，唯独重视娴静、和气的切契莉阿修女个别教给她的那一门，并且学得不坏。对于莱尼一生道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至少与后来出现的那个苏联人不相上下的，要算是拉埃尔修女了。这个修女(一九三六年！)校方不准许她开课，只有资格干女学生称之为走廊修女才干的那种所谓下贱活，其社会地位相当于一名根本谈不上高贵的勤杂工。她专管按时叫醒女学生起床，督促她们遵守起床后的净身教规，遇到她们突然发生象妇女通常发生的那些现象时，

向她们解释——教生物课的修女坚决拒绝这样做——那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么办。此外她还兼管一项差事，对于这项差事，所有其他修女无不厌恶，死也不高兴干，而修女拉埃尔却满腔热忱和倾注着深情认真地担负起来，这就是观察鉴定女孩子们的固体和流体排泄物。未经拉埃尔观察鉴定，她们一律不得擅自将自己的排泄物倒掉。她给由她负责监护的十四岁的女孩子们做这项工作，做得有条不紊，判断准确，女孩子们无不为之愕然。不用说，对自己的排泄物至今好奇不解的莱尼，当然会成为拉埃尔的得意门生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拉埃尔只要对谁的排泄物看一眼，就能准确地说出谁的身体健康好坏和精神状态是否正常，更有甚者，由于她有本领根据粪便预卜学业成绩，因此每次进行课堂测验之前，她都被大群前来找她卜凶问吉的女孩子层层包围。有一位后来想以记者为业的她的早年的学生，给她取了肠卜僧这个绰号。从一九三三年起，历届同学都这样叫她，她也欣然接受，认为这是出于对她的敬爱。看来(得到后来成为拉埃尔的知己的莱尼证实)她的观察鉴定是逐个进行登记的，而且记载很详细。如果每学年上课天数平均以二百四十天计，那么，不难算出：为十二名女学生做五年定廊工(类似修道院的值勤班长)的拉埃尔修女，共记录消化道排泄鉴定约达两万八千八百人次，每次均作有提要性的分析。显然这是一部千金难买的科学验粪法和验尿法的文献，只是估计早已被人们不屑一顾地全部销毁了。笔者根据 B. H. T. 的直接介绍和莱尼的间接介绍(经过玛尔雅的筛选)，再根据玛格丽特的直接介绍，从拉埃尔的举止和谈吐来分析，可以认为，拉埃尔的学问包括三个方面：医学、生物学、哲学——三者都带有来源完全不明的神秘的神学色彩。

另外，拉埃尔还插手不属她的职责范围内的事情：美容；头

发、皮肤、眼睛、耳朵、发式、鞋子、内衣——请看，她建议黑发的玛格丽特穿暗绿色的衣服，对金发的莱尼则劝她穿暗红色，出席有天主教大学生参加的家庭舞会，她劝莱尼穿朱红色的鞋子。她还向莱尼推荐用杏仁粉作护肤剂，平日洗脸沐浴倒不一定用冰凉的水，以能受得住为度。从这些事实来看，可以总的说一句：她不是那种不修边幅的人物。此外，对于擦口红，她不但不劝阻，而且——当然，擦多擦少和口红品种都要因人而宜——积极提倡。由此可见，她远远走在她所处的时代的前面，更不用说已经远远越出了她周围的人们。她还严格要求保护头发，主张经常，特别是晚上，用发刷反复使劲梳头。

拉埃尔在修道院的地位是叫人难以确定的。在大多数修女看来，她的地位介乎厕所女工和勤杂工之间，即使此说不假，也是够卑微的了。不少人尊敬她，有些人害怕她，她同女校长处于"永远敬而远之"(B. H. T. 语)的关系。女校长严厉，有学问，是一个长着金灰色头发的美人儿。莱尼离校后，这个美人儿脱下道袍，钻进纳粹妇女组织干了一年。她从来没有责难过拉埃尔用美容术破坏修道院的传统。女校长绰号"雌老虎"，她教授的专业是数学，副课是法语和地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认为肠卜僧搞的那一套，不过是一种"排泄物的神秘学说"，谈不上有什么危险，只是可笑而已。在她看来，一个称得上女士的人，对自己的排泄物哪怕是瞅上一眼，也有失自己的身分（B. H. T. 谈），认为那是多少有点"邪门歪道"，虽然(又按 B. H. T. 谈)看来正是这种"歪门邪道"，才驱使她一头栽进那个纳粹妇女组织的。不过(全都按 B. H. T. 谈）也得说句公道话：即使在她离开修道院以后，她也没有出卖拉埃尔。莱尼、玛格丽特和 B. H. T. 都说她是个"高傲的人"。根据所有能够找到的证人反映，虽然

她非常漂亮，肯定也是个"对异性有吸引力的人"（玛格丽特语），但她在脱离修道院后始终没有结婚，也许是由于高傲吧，因为她不甘示弱，不愿暴露自己的任何短处。在她四十九岁的那一年，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她以高级参议官的头衔担任负责推行"文化政策"的要职，在伦贝格和切尔诺夫策①之间的某地失踪了。真可惜，笔者多么想亲自对她进行一番"讯问"啊。

拉埃尔在寄宿学校并未正式担任教学或医务工作，但实际上她两者都兼而有之。她的份内工作，只不过是发生重大问题——严重的腹泻，有传染危险的征兆——时作报告，也要求她报告同消化系统有关的突出的不洁净现象，以及违犯教规伤风败俗等行为。这后一方面的工作，她是从来不管的。她认为要紧的是，在女学生入学的第一天，就向她们作一个小报告，说明在各种类型大便之后净身的方法。她首先指出经常保持肌肉、尤其是小腹肌肉弹性收缩功能的重要性，向她们介绍，做到这一点应该参加田径和体操运动，接着话题一转，就大谈她最欣赏的题目：一个健康的和——正如她所强调的——聪明的人，不花一张纸头就可以完成这档子事。不过，考虑到这种理想境界可能根本难以达到，或者说实属罕见，因此，她又不厌其详地讲解万一需要用纸时的一应注意事宜。

她曾经——关于这一点，B.H.T. 是唯一的情况提供者——大量阅读过有关上述问题的著作，几乎都是些囚犯和监狱文学。她悉心钻研过各种囚犯（刑事犯和政治犯）撰写的回忆录。做这种报告时，她是有思想准备的，女学生们一个个听得张口结舌也好，傻乎乎地吃吃痴笑也好，她都毫不在乎。

---

① 伦贝格（现名利沃夫）和切尔诺夫策均为苏联乌克兰西陲城市。

这里需要谈到一点，因为玛格丽特和莱尼都证明确有其事：当拉埃尔修女第一次看到应由她过目的莱尼的大便时，她不禁欣喜万分。她对不习惯这样当面下评语的莱尼说："姑娘，你象我一样，是有福之人哩！"

之后几天，当莱尼仅仅出于对这种"肌肉玩意儿"感到好玩而达到"免纸"水平时（莱尼对玛尔雅语——，由玛格丽特证实），她博得了无可置疑的好感，有了这一点，往后其他所有学科成绩再差，她都不感到任何痛苦了。

写到这里，如果读者诸君以为，拉埃尔修女的天才仅仅反映在粪便方面，那就错了。经过复杂的学习过程，她首先成了生物学家，继而当上医生，往后又成了哲学家，皈依了天主教，进了修道院，有心用生物学—医学—哲学—神学的配套知识去"教育青年"。不料在她开课的第一年，罗马教会就勒令她停止教学活动，理由是她有纯生物学观点和神秘唯物主义的嫌疑，作为处分，她被贬谪为走廊工。按理，她会因此对修道会生活悲观绝望的，而且人们已经准备好让她"体面地"还俗（以上均系拉埃尔亲口对 B. H. T. 所说）。可她对此竟毫不在乎，不但甘心接受这种贬谪，而且打心底里认为这是高升了。在她看来，为了有机会运用她的学说，当走廊工远比站在讲台上正式开课来得方便。由于她与修道会之间的纠葛正好发生在一九三三年①，因此她没有按常规被开除，而是留下来当了五年"厕所女工"（拉埃尔向 B. H. T. 自述）。光是为了采购卫生用品、手纸、消毒剂以及床单枕套之类的东西，她就得三天两头骑着自行车到附近的中等

---

① 此处似指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罗马教皇与希特勒第三帝国签订了有关处理政教关系问题的协定，拉埃尔虽系修女，但又是教师，因此教会方面未便将拉埃尔公开革出教门。

大学城去，在大学图书馆里消磨许多时间，后来又好几天泡在馆内藏书丰富的古书部，同那位B. H. T. 结下了柏拉图式的，然而却是火热的友情。他听任她在自己上司的藏书中随意翻阅，甚至违反规章，拿给她仅供内部使用的目录手册，让她随便蹲在哪个角落里查看，还献上自己暖瓶里的咖啡，如果她用功太久，往往还要递给她一块黄油面包。她的主要兴趣是阅读药物学、神秘主义和生物学等方面的专业书籍，草药学她也感兴趣。就这样，她依靠故纸堆中的大量神秘主义著述，钻研思考，杂学旁收，经过两年时间，竟成了一门怪诞不经的学科——粪便学赘生物——的专家。

为了查明拉埃尔修女的背景和出身，笔者虽然尽了一切努力，但始终未能获得比B. H. T.、莱尼和玛格丽特三人所介绍的更详细的情况。对切叡莉阿修女进行的第二次、第三次访问，均未得到有关这位和她昔日同院的修女的材料，笔者再三追问，只不过引起主人一阵脸红而已——坦白地说，一个肤色乳白、年逾古稀的老太婆脸红起来，并不是不好看的。第四次造访的尝试——可见笔者顽固到何等程度——在修道院大门口就碰了壁：吃了闭门羹。至于笔者是否能够上罗马从修道会的档案和人事登记表中查到更多的情况，则要看他能否挤出时间和筹足旅费，而且——首要的一点——取决于人们是否允许他接触修道会的秘密。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谈一谈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的情况：一位身材矮小、勤勉好学的修女，热中于神秘主义和生物学，冒着钻研粪便学的嫌疑，被指责为宣扬纯生物学观点和神秘唯物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坐在一个古书部的阴暗角落里，享受一个年纪轻轻、当时还看不出有丝毫秃顶和发福迹象的小伙子献给的咖啡和夹肉面包。这样一幅风俗画的绝好题材，是值

得被弗美尔①一流的荷兰大师采用的，只不过为了正确反映当时国内外的政治气氛，画面上少不得需要深红的底色、鲜血斑斑的云彩，因为冲锋队一直在某个地方行进，一九三八年，战争的危险比之次年真正爆发时还要严重。不管人们对拉埃尔对消化问题的这种热情感到玄而又玄，也不管人们认为她对内分泌的钻研（此举甚至发展到驱使她热烈渴望了解那种叫做精液的物质的具体成分）多么荒诞不经——有一点却不能不归功于她：正是她，根据私下所做的（未经许可的）小便试验积累的经验，给这个年轻的古书商出了个主意，使他得以逃脱德国国防军的兵役义务；她一面喝着他的咖啡（她甚至常常让咖啡溅在那些珍贵的书籍上——她对任何版本的书籍都不怎么爱惜），一面仔细地讲给他听：喝哪些东西，吃哪些东西，服用什么酊剂和片剂，就能在入伍体格检查化验小便时，得到不是勉勉强强的而是过得硬的"不合格"。凭着她的知识和从书本上看到的东西，她给他的小便制订了一个"分阶段计划"（B. H. T. 引述拉埃尔的原话），即使他在军医院里住上一天、两天或三天，也不论对他的小便怎样反复进行化验，结果都能含有足够数量的蛋白。这种主意，只能使所有政治上失意的人感到慰藉。可惜 B. H. T. 胆量太小，不敢把这个"分阶段计划"的全部细节转教给有兵役义务的青年，作为一名"公职人员"，他担心会使自己与上级机关之间发生麻烦。

如果允许拉埃尔到一所专收男生的寄宿学校去，同样给小伙子们效效劳，象她平常照料女孩子那样，也看看男孩子们的那些排泄物，哪怕只干一个星期，想必也会使她十二万分高兴的

---

① 弗美尔（Jan Vermeer van Delft，1632—1675），荷兰画家，擅长风俗画。

(笔者臆测)。由于当时有关男女消化差异的著述为数甚少，她只能依靠揣测，形成一种偏见；她认为几乎所有男人都是"大便干燥的人"。要是她的这种欲望被罗马或其他有关方面发觉，那就毫无疑问会被立即革出教门和撤职的。

每天早晨，她还以观察便桶的同样热情，观察受她监护的女孩子们的眼睛，吩咐她们洗眼睛，为她们准备几种不同型号的洗眼杯和一罐矿泉水。她一看就能发现任何炎症或砂眼的微小迹象。每当她向女孩子们讲解眼睛的知识时，她总是欣喜若狂，远比讲解消化过程来得带劲：视网膜大约有卷烟纸那样厚薄，却由三种细胞层组成，即感觉细胞、双极细胞和神经节细胞。单是第一层——只有卷烟纸三分之一左右厚薄——就有大约六百万个锥体细胞和一亿个杆细胞，而且它们在网膜表层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她谆谆告诫女孩子们说：眼睛是她们无与伦比的最宝贵的东西，视网膜还仅仅只是眼睛大约十四层组织中的一层，它本身又分为七至八层，每层之间都有空隙，互不相联。当她进而滔滔不绝地阐述绒膜、视乳头、神经节和睫状肌时，女孩子们就在唧唧哝哝嘀咕她的另一个绰号了：绒膜修女或修女绒膜。

要知道，拉埃尔平日是难得有机会和时间给女孩子们讲解什么东西的，因为她们的日程排得很死，而且在多数女孩子的眼里，她的职权至多不过是管手纸而已。当然，她也要给她们谈谈汗、脓、月经以及——花相当多的时间谈唾沫。不用说，她坚决反对过分用力刷牙，反正对于那些在起床后不久起劲刷上一通的，她只是在违心的情况下，并且也只是在家长们的强烈抗议之后才加以容忍的。她不但要观察女孩子们的眼睛，也要察看她们的皮肤，但不幸由于家长们几次告状，说她趁机无耻地进行抚摸，而此校方禁止她察看她们的胸脯和腹部，只准她看看胳膊和

膀子。后来，她还进一步向女孩子们解释道：其实，只要有了一些经验，看一看自己的粪便，不过是肯定一下自己起床时已经感觉到的东西，即健康状况；而一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以后，就不必再去看了，只有遇到对自己的状况没有把握时，才需要看一下，加以核实(玛格丽特和 B. H. T. 谈)。

后来莱尼日益频繁地托病请假，她常常甚至可以躲在拉埃尔的小房间里抽支香烟。拉埃尔告诉她，象她这样年龄的姑娘和妇女，一般每天抽烟不宜超过三至五支，长大后顶多抽七八支，无论如何要控制在十支以内。时至今日，四十八岁的莱尼还一直遵守这一条规矩。知道了这一点，谁还会否认教育的价值呢？此外，如今她业已开始在一张一点五米见方的土黄色包装纸上(她目前的经济条件，无力置备这样大的白色图画纸)，实现一个以前她没有时间去实现的梦寐以求的心愿：如实地画出一层视网膜横剖面图。她确实下定决心，要把六百万锥体细膜和一亿杆细胞统统画出来——全部使用她儿子留下来的儿童水彩颜料，此外偶尔还买些廉价的颜料以补不足。试想，她一天最多只能画五百个杆细胞或锥体细胞，每年大约画二十万个，按这种速度计算，还足足够她忙上五年，这样我们也许就会理膀，她是为了画杆细康和锥体细康而放弃扎花工作的。她把自己这幅画定名为"童贞女拉埃尔·玛丽亚左眼视网膜局部图"。

莱尼喜欢一边作画一边唱歌，要是知道了这一点，有谁还会感到奇怪呢？她用一些词儿，随心所欲地套上舒柏特和民歌的曲谱，或套上从"家里"(汉斯语)的唱片中听熟了的调儿，信口而出地唱着，致使一位席尔滕施泰因情不自禁地为之"感动、倾注

和钦佩”(席尔滕施泰因语)。显然，莱尼会唱的歌要比她的钢琴节目来得丰富。笔者拥有一盘录音磁带，那是格蕾特·黑尔岑给他录制的，每当他听这盘录音，他就很难控制自己，禁不住眼泪滚滚而下(笔者)。莱尼唱得相当轻，声调爽朗、有力，只是由于羞怯才压低了嗓门。她唱着，宛似一个身陷地牢的囚徒发出的歌声。下面就是她唱的内容:

晶莹明镜映伊形，
迷离恍惚非己身;
形容渐槁无颜色，
镜前人怕镜中人。

甘愿不贞又清贫，
纵乐慰我无辜身;
上帝的阳光上帝的地，
作恶人间罚在冥……

这是最崇高的巨川，生来自由的莱因河的声音——可是，哪里有一个人，为了终生自由和宿愿得偿，能象莱因河这样来自福地仙境呢?

当战争在第一个春天没有带来任何和平希望时，战士就作出自己的结论，英勇地战死沙场。

君心唯我最知音，
我心宁静悟太空;
人间的语言我不懂……

径向花丛求爱情……

她经常唱最后一段，在录音带中可以听到四种唱法，其中的一种甚至节奏性很强，颇有披头士[①]音乐的味道。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人们通常视之为圣洁的诗文，莱尼是颇不放在眼睛里的，她会随心所欲地东拉一行，西扯半句，凑在一起信口唱出来，在曲调方面是如此，在歌调方面也是如此[②]：

脱羁而出的巨川来因——啊，仁慈的主！
径向花丛求爱情——啊，仁慈的主！
砸碎那暴君的枷锁——啊，仁慈的主！
甘愿不贞又清贫——啊，仁慈的主！
少女时代的我即与天空神交——啊，仁慈的主！
它把男性的爱施之于我，热烈而美好——啊，仁慈的主！
祖先的墓碑日久天长——啊，仁慈的主！
我终于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倾吐出我心灵的秘密——啊，仁慈的主……

由此可见，莱尼不仅忙，她还忙得独出心裁呢！

寄宿学校时代的莱尼，每当遇到发生妇女生理现象时，都要

① 亦名硬壳虫音乐。

② 以下各句均系名家作品或著名歌曲中的现成句子，莱尼随心所欲，信手拈来凑在一起，套上现成曲调唱出来，借以抒发她的感情，笔者在每句后加上"啊，仁慈的主"，实际上有"作孽啊"，喻莱尼不把这些"人们通常视之为圣洁"的诗文放在眼里，加以作践之意。

大吃一惊，而拉埃尔向她讲解男女同房的所有细节，则完全用不着作任何不适当的比喻，莱尼也好，拉埃尔也好，谁都不会露出丝毫脸红的迹象；只不过这种讲解必须背着人进行，因为这当然超出了拉埃尔的职权范围。也许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莱尼一年半以后在课堂上听到教师公开宣讲"草莓掼奶油"时，会气得满脸通红。拉埃尔甚至不忌讳使用"古典建筑艺术"这一概念来描绘大便的形状(B. H. T. 语)。

除拉埃尔外，莱尼在进入寄宿学校后的头一个月，还结识了另一位毕生的挚友，即玛格丽特·蔡斯特。玛格丽特在当时就背上了"破鞋"的名声，她是一对极其虔诚的夫妇膝下难以驯服的女儿，正象所有过去教过她的老师对她无可奈何一样，这对夫妇也"拿她没有办法"。玛格丽特永远是一个乐观的人，人称"快乐的小鸡"。她个子矮小，一头黑发，同莱尼相比，她显然多言饶舌。正是拉埃尔在对玛格丽特的皮肤(肩膀和胳膊)一连观察了十四天之后，得出结论说：她同男人有关系。由于这一点的唯一证人就是玛格丽特自己，因此不能轻易相信，但据笔者本人的印象，玛格丽特的话是绝对可信的。玛格丽特声称，拉埃尔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不光凭她"那十拿九稳的化学直觉"，而且也是凭她对这种皮肤的物理性能的观察。后来，拉埃尔在同玛格丽特促膝谈心时说，她的皮肤"满布着被人抚摸和让人抚摸过的印子"，玛格丽特一听，顿时——必须替玛说一句引以为荣的话——飞红了脸，这样红脸，并不是她一生中的头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她还承认，她在夜间溜出修道院——她不能透露是如何溜出修道院的——，与乡下的小伙子，而不是与已婚男人幽会。她讨厌已婚的男人，说他们身上有一种难闻的气味，这是她跟一个男人接触的经验之谈，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声称对她无可奈何的

老师。“噢，” 玛用干巴巴的来因腔补充说：“他对付我可有办法哪！”她承认，最好是找小伙子，同年龄的小伙子，已婚男人嘛，有股臭味，而且——她主动补充说——小伙子们有股高兴劲，真是妙极了，有的甚至快活得叫出声来，于是她也跟着一道叫，要知道，“光让”小伙子“叫”，那也是没劲的。使他们快活，她，玛格丽特也感到快活。这里有一点必须指出，我们第一次看到拉埃尔泪如泉涌：“拉埃尔当时哭得可厉害哪，我见了简直吓坏了。我今天已经是四十八岁的人了，害了一身梅毒躺在这里，今天我才明白，她为什么哭得那样厉害”（玛格丽特在隔离病院谈）。拉埃尔流够了眼泪——据玛格丽特介绍，拉一定哭了好长时间——，若有所思地凝视了她一会，然后非常和气地对她说：“是啊，你是个光图快活的姑娘①。”“这是明话暗说，我那时当然不懂什么意思”（玛格丽特语）。她不得不——十分严肃地——答应拉埃尔，保证不把莱尼引上同样的道路，也不向莱尼透露溜出寄宿学校的门道，因为据拉埃尔说，虽然莱尼能够使别人非常快活，但她毕竟不是一个光图快活的姑娘。对此，玛格丽特起了誓，并信守了自己的誓言，“再说，莱尼也并不存在这种危险，她当时就已经是一个有主见的人。”此外，拉埃尔也说得对，怪只怪玛的皮肤，特别是她胸脯的皮肤使人动情，人们一见就想入非非，欲火难禁，至于那些小伙子们同她都干了哪些事情，简直完全令人难以置信。当拉埃尔问她是同一个人，还是同好几个人胡搞时，玛格丽特在二十分钟之内第二次红了脸，又以她那平埃无味的来因腔说：“一次总是只同一个人。”这又使拉埃尔哭了起来，她喃喃说：玛格丽特搞这种事不好，很不好，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果然，玛在寄宿学校没有待上多久；她同乡下小伙子们（大都是现

① 有“妓女”的意思，可玛格丽特当时还不懂它是什么意思。

任教堂执事)胡搞之事全给人家知道了，引起小伙子们的父母和神甫不满，也引起女学生家长的不满。人们进行了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玛格丽特和所有小伙子都拒不承认，这样一来，玛格丽特不得不在入学后的当年年底就离开寄宿学校。对于莱尼来说，从此有了一个毕生的挚友，即使日后遇到种种困难，乃至于生死关头的时刻也忠实可靠的朋友。

一年之后，莱尼丝毫不感到难过，而是怀着好奇心犹未满足的心理，踏上了就业之路：在她父亲的办事处当一名练习生(正式职称是办事员)，经父亲一再催促，参加了纳粹少女组织，她穿着这个组织的制服甚至(他娘的!)还很好看哩！莱尼——这一点非提不可——对参加这个组织的晚会活动可一点也不感兴趣。为了避免引起误会，还得补充说明一点：对于纳粹主义的政治内容，莱尼毫无认识；她只是不喜欢那种褐色制服，尤其是讨厌冲锋队，只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她对粪学的兴趣以及拉埃尔修女传给她的粪学知识，就会知道或至少感到，她为什么对这种褐色如此反感了。她终于再也不去参加她本来就不热中于参加的晚会活动，一则是因为打从一九三九年九月起，她已经作为一名"军工"要员在父亲的营造厂里工作，二则是晚会上过分虔诚的宗教气氛，使她感到沉闷异常。她所属的那个小组，被一个有胆识的年轻的女天主教徒所"控制"，这个少女企图对"事业"搞渗透，在她确信由她领导的十二个女孩子忠实可靠——可惜并非个个如此——以后，她就把晚会活动内容全部改为唱玛利亚赞美诗和做念珠祷告等。不难想象，莱尼既不反对唱赞美诗，也不反对做念珠祷告等等，她只是由于——这时她还不到十七

岁——在修女学校好不容易熬过了两年半教规森严的生活，对这一套兴趣不大，感到无聊；晚会活动变成了宗教活动，她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觉得无聊而已。当然，那位年轻女士——名叫格蕾特尔·玛赖克——的渗透企图是包不住的，终于被一个名叫保拉·施密茨的女孩子告发，莱尼还被作为证人受到审讯，但由于事先经过格蕾特尔·玛赖克的父亲做工作，她表现得很坚定，不动声色，矢口否认唱过赞美诗（十二名女孩中有十名否认），这就使格蕾特尔·玛赖克摆脱了一大苦恼，但还是被（秘密警察）关押审讯了两个月，这已经叫她"够受了"——别的她也没有说什么（综合多次同范·多恩谈话的内容）。

这时已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天。莱尼进入了她一生中最爱说话的时期，这段时期长达三个季度。人们众口一词赞她漂亮，经过有关部门特别批准，她领到了一张驾驶执照，高高兴兴地开着汽车四处兜风，打网球，陪父亲参加会议和外出公干。这时候的莱尼，在等待一个男人，"一个她心爱的人，无条件以身相许的人"，为了这个人，她已经"想出种种大胆的亲昵动作——让他在我身上得到快活，我也在他身上得到快活"（玛格丽特引莱尼原话）。莱尼从不放弃一次跳舞的机会，就在这个夏天，每到傍晚，她喜欢坐在平台上，喝着冰咖啡，忸怩作态，俨然一副"贵妇人"的气派。她有一些在这一时期拍的照片，真叫人吃惊：她一直还有可能博得"全市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的称号，甚至是全地区的，也许甚至是全省的，乃至于居以德意志帝国之名而为人们所熟知的那个政治—历史—地理上的不伦不类的结构物之冠哩。她完全可以在神话剧中扮演女神（也能扮演从良的妓

女①)，做护肤香脂的广告女郎，甚至有可能拍电影。她的眼睛颜色变得越来越深了，几乎全黑了；一头浓密的金发，正象本书第一章开始时所描写的那样披在肩上。甚至秘密警察对她进行的简短审讯和格雷特尔·玛赖克被拘禁两个月，也没有动摇她的生活信心。

尽管她从拉埃尔嘴里听到过男女生理上的差别，但仍感到犹未满足，因此她如饥似渴地多方寻找这方面的材料。她反复查阅百科词典，结果几乎是一无所得，翻遍了父母亲的藏书，也同样一无所得，她有时利用星期天下午去看拉埃尔，和拉埃尔在修道院的大花园里长时间散步，恳求她讲解清楚。经过一番犹豫，拉埃尔让步了，开始一五一十告诉她在两年前自己还向她留了一手的其他细节：男性生殖器官的构造，为什么会勃起和如何勃起，以及种种后果和快乐；正象过去一样，她们俩谁也没有露出丝毫脸红的迹象。莱尼很想见识见识有关这方面的图片，但拉埃尔拒绝了她的要求，因为她认为，这种图片看不得。结果，莱尼只好装着另一个人的声音(其实毫无必要)，打电话找一家书店老板探问，经这个老板推荐，她跑到“市卫生博物馆”，在性生活部分，她看到的主要是各种性病的介绍：从普通淋病、软下疳，直到箝闭包茎和各期梅毒，一切都是按原形原色制作的石膏模型。她就靠这些东西了解了这个邪恶世界，并且感到气愤。这倒不是说她假装正经，她之所以气愤，是因为这个博物馆，把性生活和性病混为一谈。这种悲观主义的自然主义，就象那位宗教课教师的象征主义手法一样使她生气。在她看来，卫生博物馆的一套，实际上就是“草莓掼奶油”，只是花样翻新而已

① 原文为Magdalena，按《圣经》记载，又可译抹大拉的玛利亚。

（玛格丽特谈，她又一次红脸，并拒绝对莱尼的话作出解释）。写到这里，可能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莱尼在追求一个完美无瑕的、健康的世界。否！莱尼那唯物主义的具体肉欲观，已经发展到如此强烈的地步，以致愈来愈难于拒绝众多的男性争相与她亲近的企图，终于应允父亲办事处一个博得她好感的年轻建筑师的追求，同他进行一次幽会。这年夏天一个周末的夜晚，他们俩相会于来因河畔的一家豪华旅馆，在平台上双双起舞，她，金发披散，他，一头金发；她芳龄十七，他二十有三，一对健康的人儿——这一切，听起来象有一个幸福的结局，至少象一个幸福的夜晚。然而结果还是一场空：跳了两次舞以后，莱尼就付清一间刚刚定下还没有使用过的单人房间的租金，收拾起她只是匆匆忙忙地从箱子里拿出的晨服（即浴衣）和梳妆盒，离开了旅馆，一气奔到玛格丽特家里，告诉玛说：当她跳第一次舞时，就发现"那小子的手不会体贴人"。一次来去匆匆的爱情马上就烟消云散了。

不言而喻，到现在为止，或多或少耐着性子的读者一定会变得不耐烦了，他们会问：真见鬼，这位莱尼难道是一个完人吗？答曰：差不多。另一些读者——从不同的意识形态出发——则会提出问题：真见鬼，这个莱尼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肮脏货呀？答曰：非也。她只不过是在等待一个尚未出现的"意中人"。她继续受到男人们的纠缠，人家约她幽会和外出度周末，对此，她并不讨厌，只是感到不胜其烦，甚至有时听到人家用常常是不堪入耳的粗话悄悄向她表示想同她睡觉这种最最令人难堪的愿望，她也不发火，只是摇摇头而已。她喜欢穿漂亮衣服，喜欢游

泳、划船、打网球，每天夜里睡得安安稳稳，而且，“你要是看着她津津有味地享受早餐的那副样子，定会感到开心。暧，真是的，她津津有味地吃那两只新鲜的小面包、两片黑面包、一只煮得嫩嫩的鸡蛋、少许蜂蜜以及有时加上一片火腿——当然还有热腾腾的咖啡，加上热牛奶和糖——，你要是有机会看看，才有意思哩，因为那简直是一种乐趣——她吃得多么香，这是每天的一种乐趣”（玛尔雅·范·多恩语）。

除了这些以外，她还喜欢上电影院，“为的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暗处哭一会儿”（玛尔雅·范·多恩语）。例如，她去看《无拘无束的手》这部影片，就湿透了两条手绢，弄得玛尔雅错认为她在电影院里伤风了呢。对于象《摧残女人的魔王拉斯普丁》这样的影片，她是无动于衷的，《洛伊滕的赞歌》或《热血》也是如此。“看完这类片子”（玛尔雅·范·多恩语）“她的手绢非但不湿，而且象刚刚熨过那样平整干净。”可是《法内岛的少女》却又使她流泪，但不如《无拘无束的手》。

这一期间，莱尼对一向很少见面的哥哥有了了解；哥哥比她大两岁，八岁起就上寄宿学校念书，一连念了十一年。他的大部分假期都用于学习进修：他到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奥地利、西班牙等国，这是因为父母亲很想把他培养成象他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的这种人：“一个受过真正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另外，玛尔雅·范·多恩还说，年轻的海因恩希·格鲁伊滕的母亲觉得她“自己所处的环境太俗气了”，而且由于她自己在法国受过修女的教育熏陶，一生中对外界有着某种“往往是过分的敏感”，因此可以设想，她也力图使儿子和她自己一样。就所能掌握的材

料来看，她的这种愿望的确是实现了。在此，我们需要花点时间，介绍这个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情况。他一生中有十二年之久可说是集年轻歌德、年轻温克尔曼① 和诺瓦利斯② 三者为一体，象是精灵，甚至象一个神仙远离家庭，只是偶尔——十一年内约四次——回家露露面。关于他，莱尼长到这么大所了解的仅仅是：他"讨人喜欢，异常讨人喜欢，善良。"应该承认，这种说法不大能说明问题，听起来也有点过于神化。关于他的情况，连玛尔雅·范·多恩所知道的也不比莱尼多（"学识渊博，非常文雅，但从不骄傲，一点不骄傲。"）；由于莱尼守口如瓶，玛尔雅·范·多恩又了解不多，因此，唯一的非教会方面的女证人就要数玛格丽特了。不过玛格丽特也只有在一九三九年上格鲁伊滕家作客喝咖啡时，正式见过他两次面。另外一次会见，则是非正式的，那是在一九四〇年一个凉气砭人肌肤的四月之夜，是海因里希作为反坦克兵奉命开拔去为上文提到的德意志帝国征服丹麦的前夕。笔者不得不声明，当他现在描写他向一个年近半百、身患性病的妇女了解这个海因里希的经过情况时，确实感到缩手缩脚。玛格丽特的所有陈述，都是按一盘录音带的内容打下来，未加任何窜改。一开始，玛格丽特欣喜若狂，她（那已经大为破相）的脸上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稚气，毫不转弯抹角地马上说："是的，我爱他，我爱过他。"笔者问他是否也爱她，她摇摇头，不是完全否定，面是表示吃不准，反正——笔者完全可以担保——决没有难过的神情。"您要知道，他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一双明亮的

① 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德国艺术史家，所作希腊艺术的理论著述给歌德影响很大。

② 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主张恢复中世纪封建制度和教权主义。

眼睛——唉，叫我怎么说呢？文雅大方，是啊，的确是文雅大方。他自己意识不到他有那么大的魅力，为了他，我甚至真的甘心情愿去出卖自己的肉体，真的，为的是赚钱供他念书，或者学别的什么。我知道，他除了埋头书本和研究教堂建筑外，还研究费美诗，听音乐，学拉丁文和希腊文，钻研一切有关建筑学的知识。总之，他象莱尼，眼睛黑黑的，我爱上了他。我曾经两次在他们家喝咖啡时见到他，那是三九年八月。四〇年四月七日，他打电话给我——那时我已经同逮到手的那个阔佬结了婚——，他打电话给我，我就立即上弗伦斯堡[①]去找他。我到达时，他被禁止外出，我待在外面可冷啦；我是八日到达那里的。他们住在一所学校里，行装都整理好了，只等夜里开拔，或者是乘飞机去，或者是乘船去，我不知道。不准外出。谁也不曾发觉我到了他那里，后来也一直没人知道，莱尼和莱尼父母等也都不知道。虽然不准出来，可他还是出来了，是从校园中爬女厕所的墙头出来的。那个地方一无旅馆，二无私人出租房间，只有一家酒吧间，我们进去了，一个姑娘把她自己的房间借给我们。我花掉了我所有的两百马克和一只镶有红宝石的戒指，他也花掉了他所有的一百二十马克和一只金烟盒。他爱我，我爱他——即使待在那么一个肮脏得叫人作呕的野鸡窝里，我们也不在乎，一点也不在乎。真的（为了核实玛格丽特是否的确说了两次“不在乎”，笔者放了两遍录音。细听结果：确系两次）。是啊，过后不久他就死了。多么可惜，多么可惜的浪费啊！”当问到她怎么会突然想到用“浪费”这个令人感到意外的字眼时，玛格丽特是这样回答的

---

① 弗伦斯堡，德国北部城市，靠近丹麦，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后文第三章一处谈到弗伦斯堡时提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即此之故。

(按录音带打字成文)："您想，他有一肚子学问，长得那么漂亮，那么富有男子气概——才二十岁，我们还可以多少次相亲相爱，相亲相爱多少次啊，不只是待在那种野鸡窝里，天气转暖后，也可以到外面去——所有这些都白白地断送掉了，这就是我指的浪费。"

由于玛格丽特、莱尼和玛尔雅·范·多恩三人对海因里希·格鲁伊滕一致顶礼膜拜，视若神明，因此笔者也去搜集一些比较客观的材料。这些材料全部来源于两位有着羊皮纸皮肤的耶稣会长老。他们两人年纪都在七十开外，两人都嘴衔烟斗，坐在两处同样烟雾腾腾的编辑室里审稿，虽然是两家不同的杂志，但题材却完全一样(是左倾还是右倾，则不得而知)。两人之中，一个是法国人，另一个是德国人(也可能是瑞士人)，前者是金发中银丝缕缕，后者是由黑发转为白发斑斑；两人都聪慧、厚道、滑稽幽默，富有人情味。当问及他们笔者想要了解的人时，两位都同样破口而出："哦，您是说那个海因里希·格鲁伊滕啊！"(两人所说，从语法到句子结构，甚至语气，都完全一致，因为那位法国人也是说德语)，两人放下烟斗，身子往后一靠，将眼前的稿纸推开，摇了摇头，接着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吐出一声深沉的叹息，开始讲话——直到这时，才结束了两人的完全相同，开始出现两人之间的局部相同。由于一位先生住在罗马，另一位住在弗赖堡[1]附近，笔者不得不用长途电话约定访问的时间，这样，不免要花费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老实说，如果撇开这种访问的

[1] 弗赖堡，西德巴登-符腾堡一专区，专区首府也叫弗赖堡。

“人性价值”不谈，花这笔钱归根结蒂是不值得的；不花这么多钱同样也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两位先生所提供的情况，只不过是加强对已故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顶礼膜拜而已。那位法国人说：“他是那么具有德国人风度，那么具有德国人风度，那样高尚。”另一位说：“他是那样高尚，那样高尚，那么具有德国人风度。”为简便计，我们下面提到这两位先生时，分别用J.（耶稣会长老）甲和J.乙表示。J.甲：“象他那样聪明和有天赋的学生，我们在二十五年中再也没有见到过第二个。”J.乙：“我们在二十五年中，再也没有见到另一个象他那样有天赋和聪明的学生。”J.甲：“他是又一个克莱斯特。”J.乙：“他是又一个荷尔德林。”J.甲：“我们从来不曾打算劝他当牧师。”J.乙：“我们从来不曾打算劝他参加修道会。”J.甲：“那样做也是一种浪费。”J.乙：“连最虔诚的修道会人士也反对那样做。”当问到海因里希在校的学业成绩时，J.甲说：“嘛！他的学科全都是一分，体操课也不例外，而且不是平平常常的一分；如果要为他选择职业，到时候所有教师个个都会感到为难。”J.乙说：“嘿！他的成绩单上门门都是一分，最后还打了一个总评语：优秀。但往后让他干哪一行合适呢？这使我们个个都感到为难。”J.甲：“当外交家、部长、建筑师或法学家都行！无论如何可以当个诗人。”J.乙：“可以当个了不起的教师，了不起的艺术家，当个——无论如何总可以当个诗人。”J.甲：“只有一行他肯定不合适，对他来说也太可惜了：当兵。”J.乙：“他只是不适合当兵，这他不行。”J.甲：“可他偏偏干了这一行。”J.乙：“可他们却让他去干这一行。”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海因里希在一九三九年四月至八月底期间取得了一张人们所说的那种高中毕业证书，他没有多少机会施展自己的学识，也许本来就无意于此吧。他同自己的表兄一道，参加了一个被称为“国家劳动服役局”①的机构，打从一九三九年五月起，每月两次在星期六十三点至星期日二十二点休假。在规定让他享受的三十五小时内，坐火车共花去八小时，其余二十七小时，用来同妹妹和表兄一起参加舞会，打打网球，在家吃几顿饭，睡四五小时觉，同父亲吵上两三小时嘴，因为父亲想要竭尽全力，并且也一定会竭尽全力，让他逃避面临的、德国人通称为义务兵役这一关，而海因里希却不同意。父子意见相左的确凿证据是，他们关起房门进行激烈争吵：格鲁伊滕太太待在一旁低声呜咽，莱尼则被关在房门外，唯一可靠的只有玛尔雅·范·多恩清楚地听到海因里希说的一句话：“肮脏，肮脏，再肮脏我也干，我偏要干！”由于玛格丽特断言在仲夏八月两个星期天的下午跟海因里希一起喝过咖啡，而莱尼（破例地开了一次口）又说海首次回家度假是在五月底，因此可以确有把握地算出：海因里希总共回过七次家，总共待了约一百八十九小时——包括二十四小时左右睡觉——，其中同父亲吵架约十四小时。海因里希是否能算是命运的宠儿，还需请读者自己加以判断。不管怎么说：他同玛格丽特喝过两次咖啡，几个月之后，还同她度过一个甜蜜之夜。遗憾的是，除了“肮脏，肮脏，再肮脏我也干，我偏要干！”之外，苦无可靠证据了解他的其他言论。难道这位拉丁文、希腊文、修辞学和艺术史等各科成绩全都

① 希特勒上台后为了加紧准备侵略战争建立的机构，规定适龄青年（后扩大到六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和五十岁以上的妇女）一律参加修路、构筑工事等劳役，后文中也称“服义务劳役”。

优秀的人，没有写过信么？经过笔者殷切恳求，喝了笔者无数杯咖啡，收下了笔者几包无过滤嘴的弗吉尼亚牌香烟之后，玛尔雅·范·多恩（她六十八岁开始吸烟，觉得“这玩意儿真不坏”）从莱尼家难得打开的五斗橱抽屉里偷偷取出三封信，笔者把它们匆匆拍下来，又请她放回了原处。

第一封信注明的日期是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即波兰战事结束后的第二天，信上既无抬头，也没有问候语，是用拉丁文写的，字体清秀，非常可人意，真应当用来写出更好的东西。信中写道：“对于敌人，除了为达到军事目的要求不得已外，不应打击过严，达是基本原则。

“禁止：

一、使用毒气和有毒武器。

二、暗杀。

三、杀伤俘虏。

四、不给予宽大。

五、使用造成不必要痛苦的弹药或武器，如达姆弹。

六、滥用敌方休战旗（包括国旗）、军徽、军原和红十字会标志（但需警惕以此为幌子！）。

七、任意毁坏或夺走敌方财物。

八、胁迫敌国公民与其本国作战（例如法国外籍军团中的德国人）。”

第二封信的日期为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信中说：“一

个遵守纪律的士兵，在上级面前也表现大方、热诚、殷勤、谨慎。所谓大方，体现在态度自然，头脑机敏，乐于完成任务。所谓热诚、殷勤和谨慎，可参考下列例子：某长官来到营房叫某一士兵时，如该士兵不在，则不是仅仅回答一声‘不在’了事，而是立即替长官去将那名士兵找来。见到长官有东西掉在地上，下级就要帮长官拾起来（如系列队，则需先行‘报告’，经同意后方可出列）。下级看到上级想吸烟，就替上级擦火柴。上级离开营房时，下级主动开门，俟上级走后再把门轻轻关上。上级穿大衣和佩武装带、上下车马，殷勤和谨慎的士兵会主动上前帮助。过分殷勤和过分听话概非士兵的应有作风（流于谄媚阿谀），士兵不应给人留下此种印象，也不得怀有给上级请客送礼等错误想法。”

第三封信的日期是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四日。“盥洗时应赤膊。士兵一律使用冷水。肥皂的消耗量是衡量清洁的标准。每天应洗：手（反复勤洗！）、脸、脖子、耳、胸部和腋窝。指甲用指甲洁净器（不用小刀）去除指甲污垢。尽量留短发，梳分头。头发蓬乱有违士兵风纪（参看图片）。（信中未见附图片。——笔者）如有必要，士兵应每天刮脸。凡站岗、参加检阅、应召见上级以及其他特殊活动，一律必须刮脸。

“每次盥洗毕应随即擦干（擦至皮肤发红为止），以免受凉，遇冷空气致使皮肤变皱。面巾和手巾要分开。”

莱尼很少谈她的哥哥，对于哥哥，她了解得太少了，过去和现在她都只知道提这么两点：一是她“怕他，因为他的学问多得

吓人”，二是她“感到惊奇，因为他可爱得令人发疯，令人发疯”（玛尔雅·范·多恩作证）。

玛尔雅·范·多恩自己承认，见到莱尼的哥哥，她总是感到拘束，虽然他对她也“非常亲切”。他甚至还帮她到地下室里搬煤和土豆，帮她洗东西等等，对此他毫不计较。“真的——他这个人有点，告诉您——他这个人有点——嗯，就是有点，哦，也许是——是啊，有点很可贵的地方——这一点他甚至象莱尼”。对于这个“甚至”，本来是应该由她作出详细说明的，但笔者没有强人所难。

“高贵”，“德意志风度”，“可爱得令人发疯，令人发疯”，“非常亲切”——这些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回答不得不说是：否。这只是一个肤浅的印象，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形象，如果没有与玛格丽特在弗伦斯堡酒吧间阁楼里度过的甜蜜之夜，没有那唯一证明属实的一句话（“肮脏……”），如果没有上述三封信以及最后的下场：还不到二十一岁，与表兄一道死去，罪名是开小差和叛国（私通丹麦人）以及“企图盗卖国防军作战物资”（一门反坦克炮），总之，如果没有这一切，那么，有关他的情况，也就不会比两位口衔烟斗、皮肤宛似羊皮纸、脸色儿近枯槁的耶稣会长老的回忆，比“一朵花，一朵至今还在玛格丽特心头开放的花”以及那可怕的一九四〇——一九四一丧忌之年多多少了。尽管玛格丽特还说了一段有关他的十分重要的话（录音）：“我叫他逃走，叫他干脆和我一起逃走——我们差一点真的走了，即使我迫不得已出卖肉体也心甘——但他不愿丢下他的表兄，他如果自顾自走了，他的表兄也就完了。再说，我们又能走到什么地方去呢？那所有的沙发家具、该死的红灯、绒布面、粉红色的玩意儿和乱七八糟的照片等等，真叫人反感恶心。他没有哭——为什么呢？唉，

我心头的花儿啊，一直还在开放，哪怕他七十岁，八十岁，我还会一直热恋着他的。可他们尽给他灌输什么东西呢？西方世界。他装了一肚皮的西方世界，死去了——各各他、阿克罗波利斯、卡皮托（发出狂笑）——外加一个班贝格骑士。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青年，却葬身在这么一堆无聊的东西里。多么无聊啊！”

如果有人看到墙上的照片，向莱尼问起她的哥哥时，她总是相当冷淡，态度幽雅，出人意外地简单回答一句："他已经在丹麦国土上安息了三十年了。"

玛格丽特的秘密当然始终没有泄露，无论那两位耶稣会长老，还是莱尼或玛尔雅·范·多恩，都不知道这一情节。笔者只是考虑，让玛格丽特自己找个适当机会把她的秘密告诉莱尼，因为如果莱尼知道，哥哥死前曾和十八岁的玛格丽特度过一个甜蜜的夜晚，她可能会得到一些安慰的。莱尼可能会露出微笑，而微笑对她有益无害。此外，除了前述三封信可以作为写诗的单期习作的实例外，笔者没有掌握能说明海因里希有生花妙笔之才的证据。

第 三 章

为了彻底弄清事情的背景，现在需要比较详细地谈谈一位有关人物，不过笔者一时还感到颇费踌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虽则有不少此人的照片，有大量的人证，比莱尼的人证还要多，可是，正因为人证多，或者说，尽管有这么多人证，反而倒产生了一个模模不清的形象。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莱尼的父亲，胡贝特·格鲁伊滕，他于一九四九年四十九岁时去世。除了他的至亲好友和经常生活在一起的人——如玛尔雅·范·多恩、老霍伊泽、洛特·霍伊泽、莱尼、莱尼的公婆和小叔子——以外，可以找得到的人证还有二十二人。这些人曾经在各种各样的生活境遇中与他相识，大部分同他共过事：他也曾在他们中的一人手下工作过，其余大多数都是他的下属。二十二人中，有十八人属于建筑业，四人担任公职：建筑师和律师，一个退职的狱吏。由于这些人除一人外都作为下属——技术员、绘图员、静力学专家、计划员——与他共过事，如今已是四十五至八十岁的人了，所以看来最好还是听听他们的意见。这里，笔者先列举一些有关格鲁伊滕的具体材料：胡贝特·格鲁伊滕，一八九九年生，是个科班出身的泥瓦匠，参加过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表现平常，没精打采。"老霍伊泽语），战后短期升任工头，一九一九年同"门第高于他"的莱尼的母亲、一位职位相当高的官方建筑师（土木工程专员）的女儿海伦妮·巴尔克尔结婚。她给他带来的嫁妆，

有一包早已分文不值的土耳其铁路股票，不过还有一幢坐落地段好、结实坚固的出租房屋，也就是后来莱尼出生的那幢房子。此外，是她发现了“他的才能”(老霍伊泽语)，敦促他去学习三年，当上了建筑工程师。可是，老格鲁伊滕却极不高兴听到别人说他念过三年大学；他的妻子则不然，偏偏喜欢谈论丈夫的“这段大学时期”，说它虽然“艰苦，但却美好”，这使老格鲁伊滕感到难堪，显然，他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他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当了一个吃香的营造主任，也承包较大的工程(并非没有他岳父的臂助)。一九二九年，他开办了一家营造厂，直到一九三三年几乎一直都在破产的边缘上挣扎，一九三三年起才开始大展宏图，一九四三年初达到飞黄腾达的顶峰，接着是一交摔下来，坐了两年牢，当苦工，直至战争结束。一九四五年他回到家里，这时的他，雄心抱负业已消失殆尽，只是组织了一个人数寥寥无几的泥瓦匠队，就这样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去世之前，“日子一直过得不错”(莱尼语)。此外他还“收过废钢”(莱尼语)。

要是向那些非亲属的证人问及格鲁伊滕的事业心的可能动机，那么，他们中的某些人就会对这种事业心表示怀疑，而另一些人则把它说成是“他的天生特他”；持怀疑论者十二人，力主“天生特性”论者十人。不过，要说他当建筑师有丝毫天才，那是大伙都不同意的，连霍伊泽这把年纪的老人也不同意，哪怕是说他有“普普通通的建筑匠”的才能，也不同意。但看来有一点大伙都没有争议：他非常善于组织和调度，就是当他的企业发展到拥有近万名职工时，他也能“掌握全局、调度有方”(霍伊泽语)。

值得注意的是：这二十二名非亲属的证人中，有五人（两名"怀疑"论者，三名"天生特性"论者）异口同声地称他为"冥思苦想者"。当进一步问到他们何以会想出这个令人感到意外的字眼时，三个人只是简单地回答一句："可不是，他正是个冥思苦想者——冥思苦想者就是冥思苦想者嘛。"只有两个人，倒算是对值究竟可能在想些什么这个问题多少作了些补充说明。已退休的土木工程高级专员海因肯，他现住在农村，种种花、养养蜂（奇怪的是，虽然并未问他，可值老是说自己讨厌鸡——每说两句话就要插一句"我讨厌鸡"），他把格鲁伊滕的冥思苦想，说成是"地地道道的为了自觉存在[1]而冥思苦想——这就是我的看法：一个为了自觉存在而冥思苦想的人，总是同任何一种阻挡他前进的精神发生冲突。"另一个名叫克恩，五十上下，他是一位整天从早忙到晚的静力学家，现在联邦政府供职。他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嗯，当年我们大伙都认为他是生龙活虎般的人，他也确实是这么一个人，对比之下，我本人却萎靡不振到极点（这是克恩自己的确切招认，笔者并未问及）。我对他当然又尊敬又钦佩，特别是象他那样普普通通出身的人，居然很有办法与达官贵人打交道，懂得如何巧妙地与他们周旋。只是每当我不得不到他那儿去时——我也必须常常去找他——，总发现他老是坐在写字台前，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前面出神，正在冥思苦想着什么。不错，可以说的的确确是在冥思苦想，他不是在想自己的生意经。他引起我深思：我们这些萎靡不振的人，对待生龙活虎般的人常常是多么不公正啊。"

[1] 原文为 existenziell，指源出丹麦的一种资产阶级哲学思潮"自觉存在论"，主张"人必须完全自觉个人在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中的不合理的存在，才能解脱"。

当笔者问及老翟伊泽对“冥思苦想者”一词有何看法时，他惊讶地把头一抬说：“我从来没有想到用这个词，不过，现在经您这么一提，我要说，这个词用得不仅有些道理，而且恰到好处。我毕竟是胡贝特的教父，他又是我的表弟；在战后年代(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笔者)，我曾经帮过他点小忙，而后来他却极其慷慨大方地帮助了我。他创办营造厂那年，我已经三十开外了，可他还是立即把我请了去，叫我当主任会计，成了他的代理人，后来还是他的股东——唔，他难得笑，这是事实，他不只是有点象赌棍，而且很象赌棍。后来灾难临了头，我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干那种事，也许可以从冥思苦想者一词中找到解答吧。只是(不怀好意地笑)后来他和我儿媳妇洛特干出那种事来，肯定不会是冥思苦想的结果。”

至今健在的二十二个昔日同事中，没有一个否认格鲁伊滕慷慨大方，一致反映“他为人持重，头脑冷静，但却可亲”。

格鲁伊滕在一九三二年濒临破产时曾经讲过一句话，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笔者先后访问两个证人，都证实有这么回事。具体时间大概是在布吕宁①倒台后的数星期。据玛尔雅·范·多恩介绍，这句话的全文是：“我闻到了混凝土的气味，孩子们，我闻到了几十亿吨水泥的气味，碉堡和兵营的气味。”而据翟伊泽的回忆，却是这么说的：“我闻到了地堡和兵营的气味，孩子们，至少可以住两百万军队的兵营的气味。只要我们能熬过眼前这半年，我们就能成功。”

鉴于有关老格鲁伊滕的情况非常丰富，碍难在此就所有提

① 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 1885—1970)，一九三〇年起任德国总理，一九三一年起兼外交部长，一九三二年五月下台。

供情况的人一一加以列举。好在笔者决不吝惜任何精力，即使是对仅仅在幕后起过重要作用的次要人物，他也努力去获得比较客观的材料。

对于玛尔雅·范·多恩所提供的老格鲁伊滕的情况，有必要提醒人们谨慎小心，因为她和他岁数差不多，老家又是同一个村子，所以不能排除她曾经爱过他，至少是喜欢过他，因此抱有一定的先入之见。不管怎么说，她是在十九岁那一年，来到新婚不久的格鲁伊滕家当使女的；半年前，格鲁伊滕在一次建筑师舞会——海伦妮的父亲也应邀参加了——上，使刚满十七岁的海伦妮·巴尔克尔对自己一见倾心；至于他自己是否同样钟情于她，那就难以查考了。至于新婚燕尔的格鲁伊滕在自己家里雇佣一个十九岁的农家姑娘——每个人都说她具有虎生生、火辣辣的青春活力——这种做法是否合适也许值得怀疑。无可怀疑的是，玛尔雅谈到莱尼的母亲时几乎没有一句好话，相反，她对莱尼的父亲则不然，简直无异于象站在长明灯前，蜡烛光里，电灯或霓虹灯下瞻仰慈悲的耶稣或圣约瑟①，对他怀着永恒的崇敬心情。范·多恩的某些话甚至不免使人认为：她曾经打算同胡贝特·格鲁伊滕私通。例如她说，从一九二七年起，格鲁伊滕夫妇的关系就已经"岌岌可危"，可她却甘心情愿把他妻子无法再给他或不愿意再给他的一切都奉献给他；这确实是一个相当明显的暗示，再加上她随即又不好意思地低声补充一句，"我当时毕竟还是个年轻的女人嘛"，那末事情就再清楚不过了。当直

① 圣约瑟为圣母玛利亚的丈夫，耶稣的父亲。

截了当地问这位范·多恩，她的暗示是否指作为夫妻关系的核心一环即同床共枕已告结束，这时，她就以其令人惊讶的坦率方式回答说："不错，我就是这个意思"。接着，她那至今仍然富于表情的棕色眼睛虽然不会说话，但却明白无误地告诉笔者，她不是仅仅作为这个家庭生活的旁观者，而且也是作为床上用品的管理者掌握这一点的。当笔者进一步问她，是否认为格鲁伊滕"在别处什么地方寻找过安慰"时，她就斩钉截铁地断然否定，并补充说——笔者几乎可以断言，这时他听到了一阵抑制着的呜咽声——："他象修道士一样过日子，象修道士一样，虽然他并不是个修道士。"

看一看胡贝特·格鲁伊滕生前的照片——婴儿时期的照片姑且不谈，需要认真看的第一张是小学毕业照——，他在一九一三年还是个个子瘦长的孩子，金黄色的头发，大鼻子，看上去有点"倔犟"劲，黑黑的眼睛；不象和他一起照相的、有如刚入伍的新兵似的其他同学那样呆板。看了这张照片，人们马上就会相信那种由教师、牧师和家长说得有些神乎其神的一致猜测："啊，这孩子长大了一定会有所作为。"究竟有什么作为呢？第二张照片是他学徒刚满师时照的，摄于一九一七年，时年十八岁；从这张照片上可以找到后来称他为"冥思苦想者"的心理依据。格鲁伊滕是个严肃的小伙子，这是一眼就可看出的，他那显而易见的善良，只是在表面上与他明显的果断和刚毅不协调。由于他总是拍正面照——但莱尼的小叔，即前文业已提到的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一九四九年用蹩脚的方镜照相机给他拍摄的最后几张照片例外——，所以，他鼻子的长度与他整个脸盘其余部分的比

例，就始终难以看出或核实，甚至连一九四一年用自然主义手法给他画肖像的某著名肖像画家（把油彩涂在亚麻布上，可真不赖，即使色彩不很鲜明——这幅画像笔者在某君私人藏画中看到了，只是主人翻出来时心情颇不愉快，而且略教一观，便予收起），也不曾利用这一机会，至少给格鲁伊滕画一幅半面侧身像，因此只能作出推测：如果卸去他身上穿的那些摩登玩意儿，他的样子也许会象希罗尼米斯·包西① 作品中的人物的。

有关床上用品的秘密，玛尔雅只是作了暗示，至于厨房秘密，她就完全用不着转弯抹角了："她不喜欢调味香料加得太多，而他却不论什么菜都要加足香料——这就引起麻烦，因为我做菜时老是不得不分开加香料：给她的一份加得淡些，给他的一份加得重些；后来变得这样：等到菜上了桌，他还要亲手再加香料；他小时候，村里的人就都知道他的怪脾气，给他一根腌黄瓜简直比给他一块蛋糕还要使他高兴。"

再下面一张值得一提的照片，是他们俩在瑞士洛桑拍摄的蜜月旅行照。显然，照片上的格鲁伊滕太太——她名海伦妮，娘家姓巴尔克尔——长得确实美貌动人，温柔妩媚，和蔼可亲。可以看出，她学过钢琴，会弹舒曼和肖邦的作品，法语说得相当流利，能编结，会刺绣等等。这一切，所有知情人，甚至连玛尔雅也

① 希罗尼米斯·包西(Hieronymus Bosch，约1450—1516)，尼德兰画家，尼德兰画派代表之一。

都不否认。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明：看来，她有可能是一个被埋没了的知识分子，也许甚至是一个潜在的左派知识分子；当然，正如人们教诲她的那样，她从未"碰过"左拉的作品，而且也可以设想，婚后八年当女儿莱尼就她（莱尼）的排泄物向她寻根究底时，她一定会多么吃惊。也许对她来说，左拉和粪便是同一码事。她大概不是当大夫的材料，可是，要让她去获得艺术史博士学位，那是肯定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应当说句公道话：倘使能向她提供一些她所不具备的条件，多给点分析性的知识，少灌输一些伤感性的东西，多来点理智性的东西，少来点风花雪月，这样，她恐怕就不会具有受到寄宿学校生活所影响的那种软绵绵、娇滴滴性格，也许她确实能成为一个高明的大夫。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假若那些无聊的作品哪怕是作为补充读物落到了她的手里——，她不但有可能成为乔埃斯[①]的读者，更有可能成为普鲁斯特[②]的读者。她反正阅读恩里卡·冯·汉德尔-玛策蒂[③]、玛丽·冯·埃布纳-埃申巴赫[④]的作品，并且大量阅读时至今日已变成珍贵古籍的天主教画报周刊。当年，这种周刊是这类期刊中时髦而又时髦的东西，类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〇年前后的《公众》周刊。不仅如此，在她十六岁那年，父母亲还给她订了一份《高原》杂志，这就说明，她手边不仅有进步的读物，而且还有最最进步的读物；也许她是通过阅读《高原》杂志熟

---

① 乔埃斯(James Joyce, 1882—1941)，英国颓废派作家。
②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法国怀疑派作家。
③ 汉德尔-玛策蒂(Enrica von Handel-Mazetti, 1871—1955)，奥地利女作家。
④ 埃布纳-埃申巴赫(Marie von Ebner-Eschenbach, 1830—1916)，奥地利女作家。

悉了爱尔兰的今昔的，诸如皮尔斯[1]、康诺利[2]，甚至象拉金[3]和切斯特顿[4]这些名字，她也并不感到陌生。她的胞姊伊蕾妮·施魏格尔特至今还健在，七十五岁，住在一家专门为有钱人家的妇妪办的养老院里，"从容不迫地等待着自己的死亡"（施魏格尔特太太自述）。据她介绍，莱尼的母亲还是年轻姑娘的时候，就已经是"威廉·巴特勒·夏芝作品德文译本的最早读者之一了，如果不说是最最早的读者的话。毫无疑问——正如我知道的那样，因为我曾经送过她这种书——她读过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夏芝散文集，当然还读过切斯特顿的作品。"这里，笔者并非有意利用一个人文学修养水平的高低对一个人进行褒贬，只不过是借以点明一九二七年前后即已显示出愁云惨雾的背景而已。只要仔细看看一九一九年拍摄的这张蜜月旅行照，就能确信一点：不论莱尼的母亲情欲不遂到何种程度——也决不至于是一个被打入冷宫，长年无缘得到皇帝临幸的妃子。她的性欲并不怎么强烈，荷尔蒙也说不上丰富，而他却是个性欲旺盛的人。看来完全有可能，他们两人——不容怀疑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在性爱方面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就冒里冒失地结成了姻缘；格鲁伊滕很可能在最初几夜搞得虽然并不怎么粗野，但也许有些失之急躁。

至于谈到他接触书本一事，笔者绝不想偏听一位幸存的企业竞争者的判断作为依据。此君有"建筑界巨擘"之称，他说了这样一些话："要说格鲁伊滕这个人与书本嘛，大概他的总帐簿就是一本书吧，他只对这本书感兴趣。"的确，据查证，胡贝特·

---

[1] 皮尔斯(Patrick Henry Pearse, 1879—1916)，爱尔兰诗人。
[2] 康诺利(Cyril Vernon Connelly, 1903—)，英国作家。
[3] 拉金(Philip Larkin, 1922—)，英国作家。
[4] 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1874—1936)，英国作家。

格鲁伊滕读过的书确实寥寥无几，在他学土木工程的时候，迫不得已读过几本专业书，有人证明他还看过一本通俗的拿破仑传记。除此以外，玛尔雅和霍伊泽两人一致肯定说："看看报，后来听听收音机，他也就感到满足了。"

笔者在玛尔雅·范·多恩处曾经听到过一句话，始终感到难以解释和弄不明白，因此这句话一直记在他的笔记本上未能勾去，几乎使笔者完全失去信心；直到有机会找到了施魏格尔特老太太之后，他才弄清它的含义，这就是玛尔雅责备格鲁伊滕太太"对她的 Finnen[①] 完全发了狂"。由于这里所说的 Finnen 一词与同形异义词的皮肤病风马牛不相干（玛尔雅："皮肤病？不对，她的皮肤好端端的，连个斑疤也没有，我指的是真正的 Finnen"），在笔者所听到的种种介绍中，也没有发现她与芬兰有任何瓜葛，哪怕连一丝一毫的关系也没有，那么，玛尔雅这句话肯定是指"Fenier"[②] 无疑了，因为格鲁伊滕太太对爱尔兰的偏爱，后来达到了浪漫主义的、部分甚至是感伤主义的地步。夏芝无论如何过去是，并且始终是她所喜爱的诗人。

由于格鲁伊滕和妻子之间向来不写什么信，而我们知道的又仅仅是范·多恩有关这方面所陈述的一些疑问重重的话，因此，只能凭借当年在洛桑湖畔林荫道上散步时所拍摄的这张蜜月旅行照作出肤浅的分析，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对夫妇看来在爱情上，甚至在性生活方面并不合拍。的确如此。从这张早期

① 德语芬兰人与皮肤病（痤疮）均为 Finne，Finnen是复数。

② 芬尼亚运动（指十九世纪五十一六十年代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反英运动）成员。

照片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并为往后拍摄的许多照片所证明：莱尼更象父亲，海因里希更象母亲，尽管莱尼在吃菜时加香料以及酷爱新鲜小面包等方面更象母亲，特别是在对诗歌和音乐的爱好上，甚至可以有凭有据地说她完全象母亲。至于有人要问，假使玛尔雅和格鲁伊滕果真结合，他们会养出什么样的孩子来，对这样一个问题，作出不利的回答倒比有利的回答容易：他们决不可能养出象羊皮纸皮肤修女和耶稣会长老在事隔数十年之后，还能一下子就想得起来的那种孩子。

不管他们夫妇俩有过什么龃龉或芥蒂，最了解格鲁伊滕家庭生活的人，甚至心怀嫉妒的范·多里也担保：他对妻子从不粗野、无礼，甚至也从不有失温柔，妻子对他也“十分敬重”。看来这倒是确确实实的。

那位施魏格尔特老太太，虽然也是巴尔克尔家的闺女，但却从未碰过夏芝或切斯特顿的作品。她坦率地承认，自从妹妹和妹夫结婚之后，她就“不大愿意”同他们往来：她宁可看到自己的妹妹同一位诗人、画家、雕塑家，或至少同一个建筑师结婚。她没有正面说格鲁伊滕太粗俗，而是从反面说他“不够文雅”。当笔者征询她对莱尼的看法时，她仅仅说了“嗯啊”两个字，即使再三催请，要求她多谈一些莱尼的情况，她仍然还是回答一声“嗯啊”。相反，对海因里希，她却毫不犹豫地说好话，似乎他才不愧是给巴尔克尔家添光彩的人，就连海因里希对她儿子艾哈德的死“实际上负有责任，他于这种事决非出自本心”，也未能使她减少对海因里希的好感；她认为海“过激，太过激了，但有才能，几乎是天才”。笔者感到有一种与此不调和的印象：她对自己儿子

早死并不特别感到悲痛，只是作了几声“时乖运蹇”之类的叹息。更有甚者，在谈到儿子和海因里希的事情时，她竟然说出一句令人惊诧不已，而且需要从多方面核实和作出历史性纠正的话来，这句话是：“他们两个看起来好象是在朗热马尔克[①]牺牲的。”试想没头没脑提起朗热马尔克，莫名其妙地抛出一个朗热马尔克神话，试想一九一四年和一九四〇年的区别，再想一想约有四五十个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无需一一加以澄清，那么，读者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笔者与施魏格尔特太太告别时虽然彬彬有礼，却很冷淡——尽管不是永别。后来，笔者从证人霍伊泽处得知，原来有着这么一段公案：施老太太那个一直不为人所知的丈夫就是在朗热马尔克之役身负重伤的，在战地医院里待了三年，“他全身都是枪洞洞”（霍伊泽语）。一九一九年，他同义务护理他的伊蕾妮·巴尔克尔结婚，婚后养了个儿子，就是艾哈德。可是施魏格尔特先生——“吗啡瘾大，日见消瘦，到后来，脸上差不多连打个巴掌的肉也没有了”（霍伊泽语）——终于在一九二三年二十七岁时去世，当时他还是个未卒业的大学生。因此，怪不得有人会想，这位异常高贵的不苟言笑的施魏格尔特太太，私下里准是希望她的丈夫在朗热马尔克就阵亡的。她原来是地产经纪人，靠这一行买卖赚钱为生。

自从一九三三年起，格鲁伊滕的企业否极泰来，开始时稳步上升，一九三五年起急剧上升，一九三七年起扶摇直上。据他旧

① 朗热马尔克，比利时西部小地名，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德军在此发动进攻，由于指挥失误，伤亡惨重。

日的同事和一些专家说，他是靠构筑西线工事“大发其财”的；但照霍伊泽的说法，他从一九三五年起，“就以重金收买了当时可以收买到的最优秀的要塞碉堡专家”，尽管这些人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闲饭，到以后“才派上用场”。“我们经常靠借进巨额贷款经营业务，这些贷款数额之大，直到今天还使我头晕目眩。”格鲁伊滕干脆把全部家当都押在他称之为一切政治家的“马奇诺综合工事”上；“即使马奇诺神话有一天破灭了，他修的综合工事（据霍伊泽引述格鲁伊滕的原话）仍将继续发挥作用，并将永远发挥作用。只有俄国人没有这种综合工事，因为他们的边界线太长，修不起，这一点对他们究竟是祸是福，日后还会见分晓。反正希特勒有这种综合工事，尽管他宣传打运动战，实际上也是打的运动战，可他本人就拥有碉堡和要塞综合工事，这你会看得到的”（一九四〇年初占领法国和丹麦之前讲的话）。

不管怎么说，格记营造厂一九三六年的规模，就已经相当于一九三二年的六倍了，一九三八年又是一九三六年的六倍，一九四〇年更增为一九三八年的两倍，而“到了一九四三年，就根本无法再计算增长的比例了”（霍伊泽语）。

所有的人都承认老格鲁伊滕有一个特点，尽管他们用了两个不同的字眼来形容：一部分人说他“胆大”，另一部分人称他“无畏”，少数两三个人说他“狂妄”。专家们今天还确证，无疑他在早期招聘、并从别人企业中挖到了最优秀的碉堡专家，后来甚至还不顾一切地雇佣曾经参加过马奇诺防线工程的法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清楚地知道：在通货膨胀的年头，光是动脑筋从职工工资上打算盘，那是荒谬的”（一位同样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军工生产的前高级官员语）。他提供的待遇优厚，在上述那个时期，他是四十一岁。穿上“用贵重但又并不特别显眼的料子”

(洛特·霍伊泽语)定做的衣服，使一个"仪表堂堂的男人，成了一位仪表堂堂的绅士"。他对自己成为新贵毫不感到羞愧，他甚至对一位同事(维尔纳·冯·霍夫高，出身世代名门望族的建筑师)说，"所谓发财，一上来都是新的，您也是如此，您府上当年发财的时候，也是从无到有嘛"。在这一时期，上面划出一段市区专供暴发户们大兴土木，可格鲁伊滕拒绝修建一幢别墅(他一直把别墅念成爆破音的"瞥墅"，尽管别人不知教了他多少次，他至死都未改)。

谁要是把格鲁伊滕的成就看成是痴人有痴福，那就未免想得太简单了；他有一种别人既学不会也无法继承的本领：知人之明。他的所有同事，建筑师、技术员、商人，都钦佩他，大多数人都尊敬他。他对自己儿子的培养和教育精心地作了安排，同时，在培养和教育的过程中仔细地进行观察和督促，他经常到学校里去看孩子，很少把孩子接回家，因为他(照霍伊泽令人惊讶而又有根有据的话说)不愿让生意经玷污孩子。"他想让孩子成为一名学者，但不是当什么教授，而是当个我们为他修建了别墅的那种人。"(据霍伊泽说，指的是一个相当著名的罗曼语言学家，此人的藏书、见识和"对人开诚布公的态度"，必定都使格鲁伊滕深感敬佩。)他焦急不安地说，他儿子十五岁的时候，"西班牙语还没有学得象我所希望的那么好。"——

他从来不把莱尼看成是"笨鹅"。莱尼参加初领圣体时发脾气那件事也绝没有使他生气，反而哈哈大笑(据了解，这在他的一生中实属罕见)，他的评语是："这孩子非常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洛特·霍伊泽语)。

当妻子的脸色日益苍白，有点愁眉锁眼，甚至变得有点假慈假悲的时候，他却进入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他从未有过，而且直至去世时也不会有的一样东西就是：自卑感。他也许有过梦想——关于他儿子的事肯定有过梦想，甚至完全可以肯定，他曾对儿子掌握的西班牙语水平抱有很大的希望。照玛尔雅·范·多恩的话说，他和妻子之间不再有夫妇关系之后过了十三年，他仍然没有欺骗她，无论如何没有同别的女人胡搞过。有时他迫不得已参加“绅士晚会”，这种晚会往往直闹到凌晨两三点钟，这时难免有人提出找个把“热情奔放的塞加西亚[①]女郎”来，可他出人意外地对淫言秽语公开表示厌恶。格鲁伊滕对下流话和“塞加西亚女郎”问题所持的审慎态度遭到某些人的嘲笑，对此他却毫不介意（维尔纳·冯·霍夫高曾经有一年之久时常陪同他参加这样的绅士晚会）。

越来越不耐烦的读者一定会问，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啊？他的私生活可谓是清心寡欲，一心从战备中、从已爆发的战争中赚钱，他的企业营业额（霍伊泽语）由一九三五年全年一百万左右上升到一九四三年的每月一百万；而就在一九三九年每季度营业额必定已达一百万时，他却千方百计不让自己的儿子卷进他本人赖以发财致富的买卖，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啊？

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当儿子在遍游西方世界三座名

① 外高加索库班河流域的一种民族。

山并在远达四小时火车旅程的某沼泽地从事排水工程后归来时父子之间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甚至苦恼的事情，尽管在此期间，迫于父亲的强烈愿望——父亲为此而付给一位西班牙耶稣会长老一笔优厚的特别酬金——，儿子已能读懂塞万提斯的原著了。一九三九年六月至九月间，儿子回家探亲七次，九月底至一九四〇年四月初，回家大约五次，他拒绝了父亲公开提供的"一臂之助"（均引用老霍伊泽和洛特的话），就父亲来说，让他"换一个适当的环境"或者让他永远离开部队，改行当重要军工生产人员，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这个儿子又是什么人啊：早餐桌上，父亲问起他的部队生活和种种情况，他并不答话，而是从兜里掏出一本书来：赖贝尔特原著，少校阿尔门迪格博士改编，《陆军训练教程——供反坦克炮射手专用》。他打开这本书，朗读了其中一篇几乎长达五页的论文，这是他平日写信给父亲时还未曾提到过的——"敬礼守则"，详尽地阐述了行军礼的种种规定：行进中的、躺着的、站着的、坐着的、骑马的、坐在汽车上的，以及谁对谁该如何敬礼等等。我的天！要知道，这里说的不是闲居终日，无所事事，专门等着儿子回来探望自己的那种父亲，而是一个已经拥有政府提供的一架飞机（莱尼大大享受了乘飞机的乐趣！），不仅异常忙碌，而且过分忙于处理极端重要事情的父亲，他只能尽力拨冗，甚至以破绽百出的借口（牙痛求医等等）谢绝与部长们（！）的约会，抽时间赶回来与自己的爱子见上一面——可是儿子却对他朗读这种由赖贝尔特原著、某个阿尔门迪格博士改编的敬礼守则！而他原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在罗马或佛罗伦萨的艺术学院，万不得已至少在考古学院当个院长的啊。

显然，象这样坐在一起"喝咖啡"、吃早饭和午饭，"对所有在

座者不仅引起不快，而且越来越折磨人，越来越令人头痛，最后使人感到可怕”（洛特·霍伊泽语）。洛特·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当时二十六岁，是前文中已多次引用其话的那位代理人兼主任会计奥托·霍伊泽的儿媳。她给格鲁伊滕当秘书，她的丈夫威廉·霍伊泽也曾有一段时间在格记营造厂当制图员。由于洛特在一九三九年这几个关键性的月份里在格鲁伊滕身边工作，有时还和他们一家，包括回家度假的儿子坐在一起“喝咖啡”，所以，她对格鲁伊滕本人——她称他是一个“简直迷人的、不过当时已经在违法乱纪的人”——的看法，也许只能在这里顺便提一提。老霍伊泽乐得让自己的儿媳妇同格鲁伊滕“谈情说爱，当然只是柏拉图式的”，“她和他年龄相差不到十四岁，正配他的胃口”。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奇怪的是，这种说法出自莱尼之口，由不大可靠的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地予以证实）：洛特“对父亲当时大概就已算得上是一种诱惑了，我的意里并不是指勾引”。总之，如上所述，洛特把老格鲁伊滕有时从柏林或慕尼黑、甚至从华沙飞回来和全家坐在一起喝咖啡，说成是“实在可怕”，“简直受不了”。玛尔雅·范·多恩把喝咖啡和吃午饭说成是“可怕，简直可怕”，而莱尼的评论只是一连三个“糟，糟，糟”。

甚至象玛尔雅·范·多恩这样偏见很深的证人也证实，儿子回家度假，对格鲁伊滕太太简直是“要她的命，她受不了发生的一切”。洛特·霍伊泽明确谈到，这是用“杀人不见血的办法谋害父亲”，并且断言，儿子让父亲听上述赖贝尔特书中的一套，是有其致人死命的政治企图的，“之所以触及了格鲁伊滕的痛处，正是因为他卷入了政治，他甚至知道，而且早就了解高级政治秘密；例如，早在占领来因省① 之前很久，他就知道在该地修建了

兵营，知道修建大型地下工事的计划，正因为如此，他不愿在家里听到有人谈政治。”

莱尼倒并没有怎么深切地经历为期三个季度的这一痛苦阶段，可能不象其他旁观者那样关心这方面的事情。她在这一期间——大约在一九三九年七月——答应了一个男人的要求，不，应该说是：假使这个男人向她提出要求的话，那她是会答应的。她虽然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意中人，可她也明白，只有当他提出要求之后，她才能知道他是不是意中人。这个人就是她的表兄艾哈德·施魏格尔特，也就是当年在朗热马尔克身负重伤的那个人和声称看来他是在朗热马尔克阵亡的那位女士的儿子。由于艾哈德“生性极端神经过敏”（艾母语），致使他高中毕业时在无情的考试障壁面前遭到失败，甚至连国家劳役局这样一个铁面无情的部门，也暂时将他打发回家。为了谋求一个他所“厌恶的”（玛尔雅·范·多恩引证艾哈德原话）小学教师的位置，他起先曾私下里准备参加优秀生考试，但后来没想到还是应征参加了那个严酷无情的机构。在这里，他与表弟海因里希相遇。海因里希事事都护着他，并乘回家探亲的机会邀他来家里作客，相当公开地帮他同妹妹莱尼牵线。他给他们买好电影票，“叫他们别呆在家里”（玛尔雅·范·多恩语），同他们约定看完电影后碰头，“但到时候他却不去”（同上）。就这样，艾哈德在格鲁伊滕家度过了不仅是他的大部分假期，不，而是他的

---

① 凡尔赛和约规定来因地区为非军事区，一九三六年三月初，希特勒悍然下令德军进占来因地区。

全部假期；对于自己的母亲，他倒是难得偶尔去探望片刻，因此，做母亲的至今还抱怨不已。她气冲冲地驳斥那种说她儿子和莱尼之间可能存在着“真心诚意的”爱情关系的讲法。“不，不，再说一遍，不——这个嗯啊姑娘——不可能。”不过，有一点却是肯定无疑的，即艾哈德从第一次休假——一九三九年五月左右——起，可以说就拜倒在莱尼脚下，这是无可置辩的事实，有力而可靠的证人可以为此作证，特别是洛特·霍伊泽。她爽爽快快地说：“艾哈德肯定要比后来遇到的好，无论如何要比一九四一年那个好。也许比不上一九四三年那个。”洛特承认自己曾多次设法引莱尼和艾哈德到她自己的家里去，让他们单独留在那儿，“好叫他们俩终于成就好事。嘿，小伙子当时二十二岁，身体棒棒的，非常讨人喜欢。莱尼当时十七岁才出头，已经是——我坦率地对您说吧——情窦初开了。她是一个女人，一个了不起的女人，那时候就已经是了，只是您怎么也想象不出艾哈德那股羞怯劲。”

为了不再引起误解，或者说，由于已经引起了误解，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洛特·霍伊泽的情况。她生于一九一三年，身高一米六四，体重六十公斤，褐色的头发已略呈灰白，有些火爆性子，尽管未受过专门训练，却能言善辩，可称是个十分爽直的人，比玛格丽特还要爽直。由于她在艾哈德登门造府时期，同格鲁伊滕接触频繁，日常生活在一起，所以看来她是个比范·多恩远为可靠的证人，后者在所有涉及莱尼的问题上总是倾向于对她顶礼膜拜。当问起洛特关于她自己和老格鲁伊滕的暧昧关系时，她也坦率地说：“嗯，当时我们两个本来是可以进一步发展

关系的，我承认这一点，他在当时就可以做到四五年才做到的那一步的；我几乎反对他所做的一切，但是我也理解他所做的一切，您懂得我的意思吧。他的妻子胆小怕事，也被军工建筑生意吓坏了，简直叫她胆战心惊，不知如何是好；要是她是个个性活跃、不过分沉湎于幻想的女人，她也许早就把自己的儿子藏在西班牙的什么地方了，要不藏在一个修道院里，或者藏在她原可以去游览一番的芬尼亚运动成员的那个国家①里；而且，人们当然也可以使我的丈夫和艾哈德躲过德国这段历史的。但是请别误会：海伦妮·格鲁伊滕不仅模样儿可爱，而且心地善良，人又聪明，不过她呀，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吧，她却不能顺应历史潮流，经不住风云变幻，不论对政治，对丈夫的买卖，或是对海因里希这孩子存心自己毁掉自己，都是如此。别人对您说的确实是事实（没有透露玛格丽特的名字。——笔者）。他装了一肚皮的西方世界——可到头来又有什么实打实的东西呢？一个屁，要是您问我的话。他这个人哪，正是一头钻进这一大堆胡说八道的东西中出不来的，那都是些什么啊，尽是谈班贝格骑士，很少提到农民战争。一九二七年我十四岁，还是个调皮淘气的孩子，那时，我在夜大学就听过关于农民战争社会政治背景的讲座，一面听一面拚命记笔记——我当然知道，班贝格骑士和农民战争毫无关系——不过请您剪掉他的鬈发，刮去他的胡子——那他会是什么样子呢，还会剩下什么呢：只不过是一幅值不了几个钱的俗不可耐的圣约瑟画像罢了。这就是说：儿子过于幻想当班贝格骑士，而母亲则受《神秘的玫瑰》②的影响太深——她曾给我

---

① 指爱尔兰。

② 夏芝的一本论文集。

看过这本书，这本书确实写得好极了。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毫无疑问，大概只需要注射几针荷尔蒙。至于海因里希这小伙子，的确是女人见了个个爱的，远近的女人看到他，没有一个不是眉开眼笑的；不过只有几个聪明的同性恋爱者和聪明的女人才会从他的身上闻出诗人的味道。当然，他所干的事情完全是自杀，这是再明白不过的，可他为什么要把艾哈德也拉进去呢——我想也许是艾哈德甘心情愿同他一起干吧。大家都弄不懂，这两个班贝格骑士竟会想到一起去死，这个目的他们是达到了：他们被枪毙了。您知道，海因里希在被枪决之前喊了句什么：'日他娘的德国！'哼，这就是一种也许称得上绝无仅有的教养和教育的结果。不过话也可以这样说：既然他已经进了该死的国防军，那么这种结果也许反而是件好事，因为就在一九四〇年四月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之间，死亡的可能性可多着哩。他老子的门路很多，设法把案卷弄到了手，是一位将军给他弄来的，但他自已从未看过一眼，只是请我把重要的内容讲给他听：两个小伙子随随便便就打算把好端端一门高射炮卖给丹麦人，这就是说，他们不是为的钱，只是象征性地换它三五个马克，算是卖破铜烂铁而已。您知道，这个斯文怕羞的艾哈德在审讯时说了些什么？他说：我们是为一个崇高的职业，为贩卖武器而死的。"

笔者觉得有必要再次拜访五十五岁的维尔纳·冯·霍夫高，这位先生"在联邦国防军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作为建筑师用我的经验正式替联邦国防军效劳——之后"，在他那座祖遗之业的水榭的侧屋里，开了一家小小的建筑事务所，"它只是为和

平目的即建造民用住房服务”。要知道，冯·霍夫高（他没有主动声明自己萎靡不振，不过也许是没有想到吧）是一个温文尔雅、头发灰白的人，尚未结婚，据笔者浅见，他挂牌开“建筑事务所”，只不过是用来装装门面，借以杜绝旁人物议，这样他就可以一连几个小时观赏府邸池塘里的天鹅，看看佃户们里里外外忙些什么，在田间（确切地说：在萝卜田里）散散步，只有每当有一架星式战斗机从他头顶上飞过时，他才抬起头来，恶狠狠地朝天空瞪上一眼。他避免与他那住在府中的亲兄弟交往，“面为他盗用我的名义，并且背着我在我当时领导的部门里搞了几笔交易”。冯·霍夫高略为发胖、多愁善感的脸上显出痛苦的样子，但不是肉体上的痛苦，面是一种抽象的精神上的痛苦。笔者感到，他在借酒浇愁，他大量地喝一种烈性酒：陈雪利酒。不管怎么说，笔者发现垃圾堆里的雪利酒空瓶多得惊人，面且令人不安地看见他那“制面柜”里还备有大量存货。有必要到农村酒店去走访几次，至少粗略地了解一下冯·霍夫高以“我的嘴巴给封住了”为由拒绝回答提出的问题。

下面是笔者三次走访酒店，同霍夫高森的近十个村民谈话的归纳：老乡们毫不含糊地同情萎靡不振的维尔纳；尊敬他那精力显然极其充沛的兄弟阿诺尔德；谈到阿诺尔德，他们几乎肃然起敬。显然——据老乡们说——阿诺尔德在他兄弟领导的联邦国防军机场修建规划处里，仗着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银行家、国防委员会各小组院外活动集团成员的支持，甚至对国防部长施加压力，终于通过重重阻碍，选定“闻名数百年的霍夫高森森林”及其周围的大片农田，用来修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机场。这是一笔——照老乡们的话说——“五千万，四千万，至少也有三千万的交易”，面这笔交易，是“在他领导的部门里，违背他的

意愿，凭借国防委员会的同意成交的”（村民、农场主伯恩哈德·黑克尔语）。

冯·霍夫高在介绍神秘的海因里希—艾哈德事件之前，先犹豫了一会，然后说：“我得永远感激格鲁伊滕，因为他让我当他的私人助手，从而使我年轻时不必参加这个德国国防军，等于是救了我，后来他时运不佳，我总算有机会报答了他的恩德。看来您非常关心这件事，因此，我愿意向您透露。霍伊泽太太其实没有看到全部案卷，也不了解整个问题。她看到的只是法院审理的案卷，即使这些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以及行刑队少尉写的报告。由于这件案子实在复杂，所以我还得花点功夫详详细细、原原本本介绍一番。情况是这样的：格鲁伊滕的儿子拒绝父亲对他的保护，但做父亲的却不管儿子愿不愿意，存心要保他，并设法——这在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把他和他的表兄先调到卢卑克某军需部去暂避一时，那是在占领丹麦以后两天左右。可是他——我指老格鲁伊滕先生——没有估计到儿子脾气固执，儿子虽然同表兄一起到了卢卑克，但当他看到自己调换到军需部门时，又立即折返丹麦，不过既不是奉命开拔，也不是接到了调令——说得轻一点，这是擅离部队，说得重一点，就是开小差。单单这一点倒还可以补救，根本无法补救的是：两个青年人会图把一门反坦克炮卖给一个丹麦人，尽管这个丹麦人没有买下来——买也等于是自杀，白白送命——，这仍是一种犯罪行为，谁也保不了——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瞒您说，我老实承认，虽然我是格鲁伊滕的私人助手，要想搞到案卷也有困难，尽管我们那时正在丹麦承包修建大型工程，认识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等我有机会看到案卷的时候，我就把它——我是说——加以滕理、加工或——随您怎么说都行——

修改，自己另编一份，交给了格鲁伊滕的女秘书霍伊泽太太；要知道，原件中写明有许多'肮脏的交易'之类的字眼——而我却不愿把这些加在他的头上。"

洛特·霍伊泽一想到放弃自己原来坐落在市中心并带有屋顶花园的漂亮小公馆，最多只是痛苦地叹口气罢了，而谈起"这件事"来，她就不仅叹气，而且一支接一支抽烟，不断摸摸自己光滑而又剪得短短的花白头发，频频地呷饮杯中的咖啡。"是啊，是啊，他们死啦，这是千真万确的。不管是因为开小差也好，或是因为企图盗卖大炮也好——反正他们是死啦，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愿意死。我总感到，这里未免加上了许多文学性的夸张，而我可以想象：把他们拉出去时，他们是相当吃惊而又害怕的，然后是推到墙根前，接着就是一声'瞄准——放！'。艾哈德至少已经有了莱尼，而海因里希呢，他本来可以搞到任何一个女人的。这两个孩子干的事，恰恰是在丹麦，当时我们在那儿刚开始我们承包的规模十分巨大的工程，他们在那儿干的事情，我是相当清楚的。我们不妨叫它 Symbolllik① 吧，请注意，我用了三个'l'。这和几天以后在亚眠②牺牲的我的丈夫的情况不同，我丈夫是宁愿活的，而且不只是象征性地活，他也不愿象征性地死。他害怕，他有许多长处，在教会寄宿学校里一直念到十六岁，想当个牧师，但他们却把他的长处统统给毁了，等他终于看

① Symbolik 一词解释象征性，这里作者故意把该词写成 Symbolllik，寓意讽刺。

② 亚眠(Amiens)，法国北部城市。

到，他所学的一切全都是乱弹琴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他高中毕不了业，从此产生了一种很坏的自卑感，这是他们对他谆谆教诲的结果。后来，我们在自由青年联盟①里认识了，一道唱《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这类歌曲，连这支歌的最后一段我们都会唱——'同志们拿起枪来，勇敢地投入决战。光荣属于共产主义，未来权力属于它'——可是不用说，谁也不曾开导我们：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的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一八九七年的那种共产主义了——，而我的威廉呢，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想到要去拿起枪杆子的人，从来不会，可是为了这些白痴他不得不拿起了枪，给他们干这种乱弹琴的事，白白送了命——公司里甚至有人说，是他的亲老子串通格鲁伊滕，把威廉从免服兵役的职工名单上勾掉了。有人甚至还叽叽喳喳谈到乌里亚②女人的故事，可我哪能干这种事呢，叫我干我也难下手啊——象威廉这样一个忠实的人，你怎么能背弃他，即使在他死了以后，我也没有马上背弃他。至于老格鲁伊滕嘛，不错，早在那时他就可以和我进一步发展关系的。至于我为什么对他这样着迷，就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就因为这个粗眉大眼、骨架子高大的农家孩子，居然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一不是建筑商，二不是建筑师，而是个战略家。一句话，使我对他着迷的，一是他那高大瘦长的身材，二是他的战略天才。即使对金融业务'一窍不通'，他也同样有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银行家的，您懂得我的意思吧。他在办公室墙

① 自由青年联盟，全称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一九一三年建立的德国青年组织，主张青年"自决，自己管理自己"等。

② 乌里亚，《圣经·旧约全书》中大卫王手下的将领，大卫王为了占有他的妻子拔示巴，派乌里亚去送一封信，信中要收信人杀害乌。这里的乌里亚女人喻洛特。

上挂了一幅欧洲地图，插上大头针，有些地方还插上小旗，只要朝地图看上一眼，他就对形势一清二楚了——对于小事情他从来不去过问。当然，他有一种非常灵验的策略，这是他直接从拿破仑那儿抄袭来的——我想，他生平读过的唯一一本书，就是相当枯燥乏味的拿破仑传记了——，这种策略说来也平淡无奇，也许称不上是策略，甚至还夹杂着几分真正的江湖义气：一九二九年他开始经营业务，当时有点自命不凡，雇了四十个工人、工头等——尽管遇上经济危机，他还是成功地把局面维持下来，没解雇一个人。他不怕对银行要花招，不怕空头支票满天飞，甚至还接受高利贷——就这样，他在一九三三年还雇佣了大约四十个人。这些人压根儿不许别人说他的坏话，甚至连其中的共产党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他也不许别人说他们的坏话，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甚至遇到政治麻烦，他也帮他们的忙，您可以想象，他们在三三年以后的几年中，一个个都象拿破仑手下的军曹那样飞黄腾达起来。整个工程项目，他都放手交给他们去干，他了解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叫得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也知道他们老婆孩子的名字，见到他们就问长问短——譬如，连谁家的孩子读书留级等等，他也全都知道。他上工地，看到哪里人手紧张，他就马上抄起一把铁锹或锄头，有急需时也去开卡车——哪里真正活儿紧，他就在哪里帮上一手。其他方面就用不着多说了。还有一个秘密：他从来不把钱放在心上。他当然需要钱维持门面：添置衣服、买汽车、换房子，搞一些酒会之类社交活动，但赚到手的大笔钱也都又用来投资。这还不够，他甚至还借债哩。有一次他对我说：'洛特，债多不愁是千真万确的。'说到他的妻子，不错，是她发现了'他有些本事'——可是他的这种本事以及这种本事做出来的事情，却简直把她吓坏了。她原是想使他出人头

地，积一份大家业的，而不是想同一个总参谋长结婚。要是您不嫌我用词古怪，也许您甚至理解的话：他是个抽象主义者，而她却是个现实主义者，尽管表面上看来正好相反。天啊，我觉得他所干的事情是犯罪：为他们修碉堡、机场和大本营，要是今天我去荷兰或丹麦，准能看见我们当年在海边上修的碉堡，我定会感到恶心的——不过：那个年头本是强权时代，争权夺势的时代，他是个有权势的人，但他对权势本身却并不放在心上，正如他不把金钱放在心上一样。他最起劲的是赌博，的确，他是个赌徒——但又根本赌不过人家，他们有个儿子，可这个儿子掉进泥坑里却不愿别人把他拉出来。”

笔者想提醒洛特回到谈话的第二个题目——莱尼与艾哈德的关系——上来，起初没有成功。她又点起一支烟，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别急嘛，我还没讲完哩。说来说去，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两人，我们早在那个时候就很合得来，甚至有点情切切，甜蜜蜜，或者不管用什么形容词都行，反正对四十岁的男子汉来说，成天有个二十七岁的女人待在一起，是相当动心的。当然他送过鲜花，还吻过两次手臂，尤其叫人激动的是：有一回在汉堡一家旅馆里，他甚至陪我跳了半宵舞哩，这和他是毫不相称的。您难道还没有注意，‘大人物’向来都是蹩脚的舞伴么？嗯，同其他男人在一起，我是个相当严肃的女人，因为究竟不能和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相比。我这个人，有一种非常倒霉的性格，很长时期都改不了：对一个人死不变心。见他娘的鬼，与其说是光荣，不如说是耻辱，他们让我的丈夫威廉听信胡说八道的一套，一条命送在亚眠，每天夜里，等到孩子们睡着了，我就这么冷冷清清地一个人独守空床，您想想，这是什么滋味啊？直到一九四五年，始终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敢碰我——其实，这何尝是我的本

心，因为我根本不把守节当一回事。到了一九四五年，已经五年过去了，我们两人，他和我，终于才双双住到了一起。好了，现在再来谈谈莱尼和艾哈德吧：我已经对您说过，艾哈德这个人羞怯异常——再说，莱尼也怕臊得厉害，这都是您想象不到的。他对她一见钟情，在他的眼睛里，她就好象是佛罗伦萨金发女郎①又神秘地复活了，甚至连莱尼那一口硬梆梆的来因方言、又不会用生动有趣的字眼，他都不觉得扫兴。以他的学识衡量，莱尼可以说是十足的无知，他也觉得无所谓。她脑子里过去和现在有那么一点有关分泌方面的神乎其神的东西，即使她和盘托出，我敢肯定，他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好的。嗯，我们——我指海因里希、玛格丽特和我——一直想尽办法成全他们两人。您得想想，那会儿时间可并不多：一九三九年五月至一九四〇年四月，他在这儿总共待过八次左右。当然，我与海因里希并没有明确提出他们的事，只是眨眨眼心照不宣而已，因为我们看到他们俩如胶似漆。真美啊，我再说一遍，看到他们双双对对，大家心里真是乐滋滋的，他们没有在一起睡过觉，这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给他们买好电影票，全是些胡说八道的电影，如《海上英雄》、《小心敌探》之类的白痴片。我甚至让他们去看《俾斯麦》这种电影，因为我想：嗨，电影一连要放三个钟头，电影院里又黑又暖和，犹如待在娘胎里一样，他们肯定会手捏着手，恐怕还会想到（苦笑！——笔者）接一个吻，要是真到了这一步——事情就会继续发展下去——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显然没有任何进展。他陪她去参观博物馆，向她讲解如何鉴别包西油画的真伪，他还试图把她从老是乱弹舒柏特的作品引导到对莫扎特的爱好上来，

① 原文 Bionda 为意大利语（金发女郎）。

他也给她看诗，大概是里尔克[1]的，我已记不清楚。后来，他做了一桩收到效果的事：他写诗咏她，并且寄给她。咳，莱尼真是个迷人的姑娘——依我看，她现在还是这样迷人——连我也有点爱上她了：要是您能看到她和艾哈德怎样翩翩起舞，该多好啊，当我们——我丈夫、我、海因里希、玛格丽特——和他们俩一同外出时，大家衷心希望他们能找到一张现成的床，好在床上尽情地欢乐一番——，后来他写诗送给她。您怎么也想不到，尽管诗句——我不得不说——写得相当大胆，她还是拿给我看了；他相当露骨地描写她的胸脯，称她的胸脯为'一朵硕大雪白的沉默之花'，还说他要'剥去这朵花的叶片'。他还写了一首确实不错的妒忌诗，也许甚至达到出版水平哩：'我妒忌，妒忌你喝的咖啡，妒忌你涂在面包上的黄油，我妒忌你的牙刷和你睡的床。'我说啊，这确实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好了，不过纸啊，纸啊……"

笔者问洛特，莱尼和艾哈德之间是否可能瞒着她，瞒着海因里希和其他人发生了肉体关系，这时，她出人意外地红起脸来(笔者承认，多方奔走调查虽然颇称辛苦，但一见脸红的洛特，就使他感到其乐无穷)说："不，这我知道得相当清楚，因为事过一年多以后，她和这个阿洛伊斯·普法伊费尔私奔，紧接着又愚蠢地同他正式结婚；阿洛伊斯后来得意洋洋地对弟弟海因里希说，他'发现莱尼还是个黄花闺女'哩——这是海因里希傻乎乎地讲给我听的。"洛特的脸不红了。当进一步问她，这个阿洛伊斯·普法伊费尔说不定是向弟弟海因里希吹牛，就象那种捡到别人

[1] 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奥地利诗人，作品充满颓废情调，追求形式的美和诗句的音乐性。

的战利品夸耀自己如何有功的牛皮大王一样。这时洛特第一次显得无把握地说："他爱吹牛，这倒是的的确确的——您倒是提醒了我。不过，"她摇了摇头说，"不，我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虽然她和艾哈德有的是机会——不，不，"令人奇怪的是，她的脸再次红了起来。"艾哈德死后，莱尼的一举一动不象是寡妇，但愿您能懂得我的意思——她的表现，说得明确点，象个柏拉图式精神恋爱者的寡妇。"笔者感到，这话是再清楚不过的了，笔者钦佩她的直爽，不过仍然不完全相信——尽管他很遗憾，他这么晚才发现证人洛特·霍伊泽的口才。笔者始终不解的是，莱尼为何不先不后，偏偏在她一生中这个时期变得健谈，甚至几乎是十分爱说话。洛特·霍伊祥一面若有所思地朝笔者望望，一面更为慎重而平静地、不再象刚才那样滔滔不绝地说："显然，她是爱上了艾哈德，她满怀希望地爱上了他，您可以想想这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我还觉得是她打算采取主动呢。哦，对了，我还可以给您谈一点或透露一个情况：有一次，我曾亲眼看到莱尼疏通抽水马桶，这姑娘简直使我目瞪口呆。那是一九四〇年某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们在玛格丽特的家里玩，喝酒跳舞——我的威廉也在场——，突然，我们发现抽水马桶塞住了，真叫人恶心啊。不知是谁把什么东西扔在里面——后来发现是一个很大的烂苹是把排水管给堵住了。这时候，男人们都来设法排除故障：先是海因里希——他用一根通条插进去捅了一阵，根本不解决问题。接着是艾哈德，他采用的办法按说也不能算不高明，他从洗衣间找来一根水管，毫不在乎地把一头塞进令人作呕的液体中，嘴巴凑在另一头拚命对着管子吹气，想利用物理方法产生的压力冲掉污物，也不行。我的丈夫威廉，由于他过去当过装修工，后来又先后当过技术员和绘图员，表现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而我和玛

格丽特则站在旁边恶心得直摇头。您知道最后是谁解决问题的？是莱尼。她直截了当地把手伸进去掏，用的是右手，我还记得她那漂亮白嫩的胳膊下半截全弄得黄腻腻的，污秽不堪。她掏出烂苹果，一把丢进了废物桶——这样，讨厌的液体就畅通无阻，咯咯咯地统统流下去了。莱尼去洗了手——当然是彻底洗了又洗，她干脆用香水擦手和胳膊，她还——现在我又想起来了——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当时象闪电一般使我心里一震：'我们的诗人都曾经是最勇敢的厕所清洁工。'我这是举个例子说明：真的事到临头的话，莱尼是会挺身而出的，所以我认为，到头来她也会一把将这个艾哈德抓住：他肯定是不会反对的。此外我还想起一点：我们之中，谁也没有看见过这个玛格丽特的丈夫。"

由于洛特·霍伊泽的说法同玛格丽特的说法不完全一致，所以还需再找玛格丽特核实一下：她是否确实有几次在自己家里同洛特所说的那些人跳过舞？是否有可能早在所谓"弗伦斯堡之夜"以前，就已经同海因里希发生了肉体关系？玛格丽特喝了一大口威士忌，温柔而又忧郁地说："关于后一个问题，我可以断然否定，我对自己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也没有理由不承认。我当时只是犯了个错误，不该把我的丈夫介绍给海因里希。施勒默尔难得有机会待在家里，我从来不知道他究竟是个军火商，还是个间谍，不过他有的是钱。他所要求于我的，只不过是：每当他给我拍电报，我就得'为他准备好'。他年纪比我大，当时三十五岁左右，人很好，仪表堂堂，是个所谓处世有方的人——他们两人很投机。海因里希是追求女人的好手，但说不上是奸夫——当时他还不是这种人。我一直是个荡妇，可他还不是奸

夫，正因为这样，他和我丈夫见面之后，由于他不好意思，所以我们两人没有得手。但另外一个问题——这只有洛特才能给您谈——倒确有其事：我见过他不止两次，也同他以及其他几个人在我家里跳过舞。不过我们见面的次数，肯定总共不超过四次。”

最后，笔者问起艾哈德和莱尼，玛格丽特微微一笑说：“他们两个的事情呀，我根本不想去刨根究底，在当时我也不想刨根究底。管我什么事呢？了解得再详细，肯定也与我毫不相干，与我毫不相干。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我根本不想去知道：他们有没有接过吻，有没有至少双双手捏着手地亲热亲热，有没有同床共枕，我是说，就在我的房子里，或是在洛特家里或格鲁伊滕家里同床共枕过——我觉得，他们俩要是搞到一起，肯定是妙不可言的。还有，他歌颂她并寄给她的那些诗，真是妙极了，嗯，莱尼直乐得把它拿给别人看呢。在这几个月里，莱尼破天荒第一次变得话多了，之后又完全照旧沉默寡言。有什么必要刨根究底，究竟是艾哈德还是这个愚蠢的阿洛伊斯头一个同她睡觉呢？这又有什么意思呢？您就别去管它了。她爱上了他，情切切，热乎乎，即使那阵子没上手，只要他再有一次休假，也就会上手的，这我可以向您打保票。事情的结局如何，您是知道的：在丹麦一所公墓的墙边，呜呼哀哉了。完了。您还是去问莱尼吧！”

去问莱尼吧！谈何容易，莱尼不让人提问，即使问她，她也不会回答的。老霍伊泽已经下了结论：艾哈德这桩公案，是一出“动人的，但结局却是痛苦的罗曼史，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莱尼经常跑修道院，这是有案可查的，因此拉埃尔定然有所了解，但无奈此人早已不在人世，而那位 B. H. T. 君，对有关艾哈德的

情况，不用说是一无所知。至于普法伊费尔一家，则是后来才与莱尼攀上亲的，可以肯定，莱尼决不会向他们透露她心目中的任何“好事”。“好事”原是玛尔雅·范·多恩给艾哈德公案取的名称，笔者只好叹息一声，仍去向她讨教。

根据范·多恩介绍有关格鲁伊滕太太的情况，笔者曾经过于轻率地对她产生几分成见，需要加以纠正。事实证明，只要不涉及格鲁伊滕夫妇，范·多恩介绍情况可以说是认真的，几乎是细致入微的。“啊，”她坐在乡下老家屋前的紫菀、天竹葵和秋海棠丛中，一边给鸽群喂食，一边抚摸着一条养了多年的蜷毛狗说，“您可千万别去触动莱尼一生中的这件好事情，那简直是一部《天方夜谭》，他们俩真是一部《天方夜谭》：双双明打明相爱，难舍难分。我曾好几次看见他们坐在起居室里——就是莱尼现在租给葡萄牙人住的那一间屋子——，莱尼翻箱倒柜，将家藏的上好细瓷杯拿出来，沏上茶——一向来嘴不沾茶的莱尼，竟肯陪着他一道喝茶哩。他倒没有怎么谈当兵的苦经，但明显表示出厌烦和反感，莱尼用手按他的胳膊，安慰他，可以看出，不说别的，单是这种接触，也会叫他心情荡漾，按捺不住的。按说他完全可以占有她，这种机会有的是，因为她就站着——恕我说句粗话——她已经躺好在床上等他了，而且我可以说，是莱尼有些熬不住了，她熬不住了——生理上也熬不住了；不过没有发火，也没有生他的气——如果他能多有点时间和她待在一起，哪怕能有两天或三天，肯定事情就会两样的。我自已是个老姑娘，一辈子没嫁人，没有和男人一起过日子的体会，可我是一直注意观察他们的，请问您，如果一个男人回来休假，口袋里装着一张回程车票，脑子里念念不忘多少车次，念念不忘几月几号几点钟以前要赶回营房，念念不忘前线指挥部，那会是什么滋味啊。我这个老处女，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是黄毛丫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经是懂事的女人，作为两次大战中的过来人，我可以告诉您：休假，对夫妻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开心事。谁都知道，男人回来休假，男女双双要干什么——常言道，久别似新婚，就是这个道理——可人们是不大懂得体贴别人的，总喜欢放风嚼舌，我们村子的人反正都是这样，城里也一样——洛特的丈夫威廉，每次休假回来都被弄得满脸通红，正因为他是懂得体贴别人的人。再说，您以为我会不知道，过去我父亲打仗时每次休假回来，都是指望干什么吗——至于艾哈德，他正需要有一点时间去占有莱尼——你叫他怎么办，时间老是那样匆促，不管三七二十一干了再说吗？他可不能那样干。他写的诗再明白不过了，确实情见乎辞：'你是沃土，是我未来的归宿'——还要怎样写才更清楚呢？不，他是没有时间，时间不够。您想，他和莱尼单独待在一起的时间大概总共才二十个钟点——他本来就不是那种急性子嘛。莱尼并没有见怪他，只是感到伤心，她已经准备好了呀。我对您说吧，连她母亲也知道她准备好了，并且同意她的事情。我的确看见她给莱尼张罗，叫莱尼穿上她那件最漂亮的橘黄色大圆领袒胸衫，戴一对就象刚摘下来的樱桃似的珊瑚耳环，脚上穿一双时髦的镂空高跟皮鞋，周身擦得香喷喷的——她将莱尼打扮成了个漂漂亮亮的新娘子。连她也知道，并且同意——哎，不幸的是时间仓促，只是没时间——只要再有一天，莱尼就成了艾哈德太太，而不是——嗯啊。莱尼苦罗。"

为了弄清问题，笔者免不了再次上养老院去访问施魏格尔特太太。女门房打电话进去通报，回答是"她有请"，口气不算太

勉强，但显然不怎么热情；她自己手中端着茶杯，却不向客人敬一杯，同意"再谈谈几个问题"。是的，她儿子曾经领这个"嗯啊姑娘"来看过她一次——她非常重视措辞，用领来看她而不说给她介绍，因为她早就认识这个姑娘，对她所受过的教育情况也有所了解，用不着再介绍——，当然罗，"他们两个逢场作戏是有的"，要说存心长期结合，象她妹妹同这个姑娘父亲那样结为夫妇，她上次已经声明过，那是决不会的。她还主动谈到，有一次，这姑娘也曾一个人来看她，并且——应该承认——规规矩矩地坐在她对面喝了茶，唯一的话题是——是的，听起来奇怪，但事实的确如此——石楠。姑娘问她：石楠什么时候开花——是不是现在开花？"当时是三月底左右，老实告诉您，我感到好象是在和一个白痴谈话哩；这是在一九四〇年战争年头里，居然来找我打听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石楠是不是三月底开花；这姑娘对大西洋石楠和山地石楠的区别一点也不了解，也不懂得这两种石楠需要不同的土壤条件。"最后——施太太说——好在也没有出什么事情——显然她认为，儿子死在德国国防军行刑队之手比起他有可能与莱尼缔结姻缘还要好哩。

必须承认，这位施老太太以极其含蓄的方式澄清了某些内幕情况。例如，是她揭开了令人费解的"Finnen"之谜，或者说至少是有助于弄清这个问题——试想，莱尼竟肯于一九四〇年三月底纡尊降贵来看艾哈德的母亲，和她谈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石楠，外加范·多恩还说莱尼已经作好了准备，洛特·霍伊泽认为莱尼甚至还打算采取主动；再回想一下莱尼仲夏之夜躺在长满石楠的原野上仰钟星空之灵的那段经历，那么就可以——即使主观地——下结论说，她曾经打算去北方会见艾哈德，与艾在石楠丛中了却心愿的。即使人们根据植物生长和气

象方面的具体情况，客观地断定这种打算将受挫于潮湿和低温的天气，但也并不排除证据确凿的一点：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反正就笔者所知，有些人确实是在孟春三月相会于干燥而温暖的石楠丛中的，虽然时间很短。

经过多次反复追问，玛格丽特终于吐露真情，承认莱尼曾经向她讨教：如果想和一个男人相会，该怎么办才好。玛格而特告诉她，可以就在她父母屋里行事，那儿相当宽敞，有七个房间，有时相当安静——说这话时红脸的倒是玛格丽特，而不是莱尼——，莱尼一听，连连摇头。接着，玛格丽特又提出，可以借用她自己的这个房间，只要闩上房门，杜绝不速之客就行了，莱尼听了仍然摇头。玛格丽特变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干脆上旅馆去开房间，莱尼却又提出她同那个年轻建筑师的那次失败的冒险（事情过去还为时不久）。这时，莱尼谈出了自己的想法，玛格丽特吞吞吐吐地陈述说，这是“莱尼迄今为止最秘密的心里话”，她的想法是，“这件事情”不可能也不允许“在床上”做，而是要到外面去。“到野外去，到野外去。按老一套双双上床，我才不希罕哪。”莱尼承认，作为可能的夫妻生活，有时是少不了床铺的，只是和艾哈德，她不愿意头一回就上床。她打算到弗伦斯堡去，后来又决定推迟到五月起程——因此，她与艾哈德的相会，由于战争的风云变幻而卒成画饼①。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没有人真正知道。

① 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法西斯希特勒军队进攻丹麦和挪威。

一九四〇年四月至一九四一年六月这一年多时间内，无论亲属或非亲属证人都一致反映莱尼显得凄凉忧郁：她不仅心情沉闷，而且又变得不爱讲话，甚至胃口也大减。开汽车兜风的劲头暂时没有了，乘飞机的兴致——她曾陪父亲和洛特·霍伊泽三次飞柏林——也不见了。只是每星期一次开着汽车，跑上不多几公里路去看修女拉埃尔，到了拉埃尔那里，往往一坐就是半天。有关她们两人谈话的内容，没有谁知道，连 B. H. T. 也不知道。打从一九四一年五月起，拉埃尔再也不曾进过 B.H.T.的图书馆古书部，而他也——显然是由于懒惰成性或脑子迟钝的原故——没有想到去看看拉埃尔。莱尼这个十八岁半的大姑娘，在一九四〇年夏、秋、冬三季，出入修道院的大果园，成日里只是穿黑衣服，她那外分泌的唯一产品就是一样复杂的东西：眼泪。由于刚隔几个星期，洛特丈夫威廉·霍伊泽的噩耗也接踵而来，因此，以泪洗面的人的队伍进一步扩大，增加了老霍伊泽和他太太(当时她尚未去世)，增加了洛特和她的五岁儿子维尔纳；至于这时尚在娘胎里的小儿子库特是否也曾同声一哭，则因无从稽考，笔者未便轻下断语。

由于笔者自愧学识浅薄，难以解答有关眼泪的诸般奥妙，况且纵然冥思苦索，也将无补于事，不如干脆求教于案头现有的工具书，查明眼泪的产生及其化学和物理成分。某家颇有问题的公司一九六六年版的七卷本百科词典，就眼泪一条作了如下解释：

“眼泪(拉丁语为 lacrimae)，由泪腺分泌产生的液体，其功

能为：滋润眼结膜囊，防止眼睛干燥，经常排除进入眼睛的微小异物。它(大概指液体。——笔者)先流入内眦，经泪管而进入鼻腔。在受到刺激(发炎、异物侵入)或心情激动的情况下，眼泪增多(形成哭)。”在同一本工具书中，可以看到词条哭的释义：“哭，与—→笑同属危象[1]，即悲伤、感动、愤怒或幸福的表现形式，从心理学(重点非笔者所加)上讲是一种精神解放的企图，同时受神经系统和中枢脑干作用而分泌出眼泪，产生抽泣或周身连续震动。哭的种类分强制性哭和自发性啼泣痉挛，后者包括心情抑郁、神经错乱抑郁病，以及多发性硬化症。”

由于这一段简明扼要的解释可能使人感到兴趣，不免会哑然失笑，或许他们也想看到有关这一生理反射(“笑”)的解释，这里不妨也将有关的事项抄录下来，以免读者去购置百科词典，必要时也可免除其查阅词典之劳。

“笑，人类学上(所有重点均非笔者所加，下同)用以表达情感的方式之一，危象出现时基于精神状态而引起的身体上的反应(—→哭)。哲学上分智者的笑、如来佛祖的慈笑和蒙娜丽莎[2]泰然自若的微笑。心理学上则按面部表情象征快乐、滑稽、幽默，分别反映为天真的笑、呆笑、乐呵呵的笑、大笑、苦笑、狞笑、媚笑和皮笑肉不笑八种，各显示不同的心情和性格特征。病态学上有神经不正常和精神病使然笑之分：笑痴、强笑(面部线条歪扭)、歇斯底里笑、笑痉挛。作为社会现象，笑有传染性(属于无意识动作)。”

由于本文不得不进入或多或少感情冲动的、不可避免地也

---

[1] 危象，医学用语，亦称极期。

[2] 蒙娜丽莎，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后期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代表作之一，画面是佛罗伦萨一个微微含笑的少妇半身像。

是悲剧性的阶段，因此，理宜将有关概念一并加以引述，应当指出，本词典没有收“幸福”这一词条，有关地方仅仅提到“幸福升起”这个矿工用语。“至福”在词典中倒能找到，释义是“世人出于本性追求的、完全和永生的幸福，按照基督教教义解释，真正的至福唯有永享极乐超度”。

“极乐指毫无烦恼和心境释然的、无尽期的完满幸福，一切宗教均以极乐为世界历史祈求的精神目标。天主教教义认为，首先有上帝全能存在的极乐，其次有世人(和天使)共享上帝与他们同在的恩宠平安广被万方的极乐，这种极乐始于现世生活中信仰基督教义(虔诚)，终于永享极乐超度(包括复活和世界末日论的改革整个现实)。福音派认为，极乐在于和上帝的意旨完全和谐一致：人类的命运安宁和拯救。”

由于对泪和哭、笑和福已作了相当详尽的解释，这些解释作为工具随时可以查阅，因此本书无需再进一步描写人物的种种心情，只是偶尔指出词典中这些词的定义；为简便计，今后概以缩写字母 T.、W.、L. 和 G.，分别代替上述四个词①。考虑到 T.、L. 和 W. 全系危象出现时的产物，因此也许理当借此机会，向所有一生中没有危象、不受危象影响和危象当头而无所畏惧的人，不曾流过一滴 T.、从未在人前人后 W. 过，以及能按照规定忍住任何一种 L. 的人，致以由衷祝贺。眼结膜囊向来清闲无事的人有福了，他们经历千难万险而始终不掉眼泪，从来不曾动用过泪管，同样，能牢牢控制自己的中枢脑干的人也有福了，他们始终能泰然自若，除有时作智者之笑外，从不大笑或微笑。彻头彻

① 德文眼泪为 Tränen，简写为 T.；哭为 Weinen，简写为 W.；笑为 Lachen，简写为 L.；幸福为 Glück，简写为 G.。

尾始终泰然自若的如来佛祖和蒙娜丽莎万岁!

由于痛苦同属人之常情,自然不可遗漏,不过这里无需抄录词典释义全文,只摘引其中关键性的一句就可以了:"对S.① 的敏感程度因人而异,特别是因为继肉体S.之后还出现心灵上的S.,二者一道构成主观S.。"

考虑到莱尼和有关人物除S.外还有种种烦恼,因此,这里还需要迅速引述词典释义中有关烦恼的关键一句,借以丰富我们的知识:"荣华富贵之心越重和生性越敏感的人,烦恼也越多。"由于笑和烦恼两词第一个字母均为L.②,为了说明人物的心借,特以缩写词L.1代笑,L.2代烦恼。

有一点可以肯定:格鲁伊滕一家和霍伊泽一家的所有成员,包括与两家关系同样密切的玛尔雅·范·多恩在内,他们所珍惜的东西受到了相当沉重的打击。莱尼的情况颇为不抄:她日渐消瘦,局外人背后叫她"泪不干";她那美丽的头发虽未脱落,但已逐渐失去光泽,连玛尔雅——虽然她也一直含着T.努力施展那有口皆碑的烹汤术,天天给莱尼调换菜汤花样,买来最最新鲜的小面包——也无法使莱尼胃口变好。玛尔雅向笔者出示了莱尼父亲手下一个职员当年偕偷给莱尼拍的、后来为她所收藏的照片,可以看出,莱尼的确容颇大变,S.和L.2使她脸色苍白,W.和T.使她精疲力尽,更看不出有丝毫L.1容。莫非洛特·霍伊泽否认莱尼是寡妇之说,果真不完全对么?莫非莱尼事实

① 德语痛苦为 Schmerz。
② 德语烦恼为 Leiden。

上是洛特未曾识破的寡妇，而不只是柏拉图式精神恋爱观的信徒么？无论如何，莱尼的主观S.肯定是沉重的，其他人的主观S.也显然不轻。从这时起，她父亲不再只是一味冥思苦想了，他变得心情忧郁，而且（据所有接近他的人反映）“神思恍惚”。由于老霍伊泽同样萎靡不振，洛特（她自己介绍）也“早已不是从前的洛特了”，格鲁伊滕太太不用说更是足不出卧房，“有时喝几勺汤，吃半片烤面包”（范·多恩语），半死不活地过一天算一天；而这个时期内格记营造厂的业务居然不仅照常兴旺，而且还越做越大，因此，看来老霍伊泽的解释是有几分可信的：“胡贝特的买卖根底好，样样安排得井井有条。他所雇佣的会计师、计划和建筑工程人员，个个忠心耿耿，因此业务照常开展；至少在胡贝特和我完全没上班的这一年中，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时候是老班底撑世面——这种人员已经有几百个，企业由他们掌管！”

我们遇到了老格鲁伊滕一生中暧昧不清的一段时间，而作为这段时间所找的旁证又偏偏是洛特·霍伊泽，实在令人感到为难，她的陈述又长又出人意料地枯燥无味。因此，只好弃繁从简，作一概括性的归纳。

用比较时髦的话说，她在一九四〇年四月至一九四一年六月左右这一年多时间里，成了他的“长期陪伴”。反之，可能他也是她的长期陪伴，因为他们俩都需要寻找安慰，不过最后显然两人都未能如愿以偿。

他们四出旅行，一个是怀有身孕的寡妇，一个是心情忧郁的男人；他弄到了有关儿子和外甥凶死的档案材料也不肯亲自过

目，而是叫洛特和霍夫高择其要者讲给他听；他时而喃喃自语咕噜几声“日他娘的德国”，表面上忙于从一个工地跑到另一个工地，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实际上却不曾翻过任何施工图纸、书籍、文件，不曾看过任何一处工程。他乘坐火车或汽车，有时也乘飞机，带着忧郁的神情，逗弄一下当时五岁的维尔纳·霍伊泽。今天，维尔纳已三十五岁了，住一幢漂亮的房子，而且是私产，家具摆设趋时，他对安迪·瓦尔霍尔①崇拜得五体投地，并且怪自己没有及早购买这个画家的大作，恨不得要“咬自己的屁股”。他还是流行艺术迷，又是性感狂兼赛马场老板；当年他们三人在斯赫维宁根、梅尔莱班和布伦②海滩上长时间散步的情景，他至今还历历在目，也记得“格鲁伊滕大爷”如何与别人握手，洛特如何泪满衣襟，还有那建筑工地、丁字形钢梁和“穿得稀奇古怪”的工人（想必指服劳役的囚犯。——笔者）等等。有时候，和洛特形影不离的格鲁伊滕，也会留在自己家里待上几个星期，坐在妻子的床边，代替莱尼尽尽人事：给妻子念儿首爱尔兰作家写的童话、传说和诗歌——但同莱尼一样白费力气，格鲁伊滕太太听了只是有气无力地摇摇头，报以一丝微笑而已。这当儿的老霍伊泽，看来已更快地克服了自己的S.，到九月里已经不再流T.了，又“上班工作”，三天两头还出其不意地听到这种问题：“怎么，买卖还没有倒掉吗？”没有倒，甚至生意还越来越好：有老班底通力合作，牢靠着哩。

---

① 安迪·瓦尔霍尔（Andy Warhol，1927— ），美国流行艺术（pop art）画家。

② 斯赫维宁根为荷兰海牙附近的海水浴场。梅尔莱班和布伦均为法国北部海滨地名，前者系松姆河入海处。

这位格鲁伊滕才四十一岁，就已一蹶不振了吗？在周围群众并未因他们的子弟大量死去而万念俱灰的情况下，他能与众不同，对儿子之死于心不甘么？如果说他这个人一向不看书，那么现在开始看书了吗？对，他开始看一本书。不知他从哪个角落里找出来一本一九一三年版的祈祷书，那还是他当年初领圣体时得到的礼物，“从宗教中寻求安慰”（“他从来没信过宗教”——老霍伊泽语）。读了此书之后，他采取的唯一行动是送钱给别人，按洛特和她公公的一致说法是“成堆地”送，按范·多恩的说法是“成包地”送（“他也送给我成包的钞票，我用来赎回了父母典给别人的一座小田庄和一些地”）——他也上教堂，但顶多进去待“一两分钟”（洛特语）就出来了。他“看上去象七十岁的人，对比之下，当时三十九岁的妻子，倒象只有六十岁”（范·多恩语）。他吻妻子，有时也吻吻莱尼，但从来不吻洛特。

这个人是否未老先衰呢？他当年的家庭医生，现年八十高龄的温德伦大夫，住在自己那所古色古香的私寓里，那里还留下一些当年开业行医的白橱白凳，正在悉心撰写文章，以揭露作为偶像崇拜的现代药物狂。他早已不再听信医生必须保守秘密的神话了，据他声称，格鲁伊滕那时候“的确完全健康，他的肝、心、肾、血、尿，样样完全正常。这家伙几乎不抽烟，也许一天才抽一支雪茄，一星期才喝一瓶葡萄酒。病吗？没有，没有一丝病征——告诉您，他对自己，对自己做的事情，都清清楚楚。要说他有时看上去象七十岁的人，那也不说明什么问题——当然他心灵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致命打击，但生理方面并无影响。他从《圣经》中记得的唯一的一句话是：‘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真使人感到不安”。

这个时候的莱尼，仍然密切注意观察自己的排泄物吗？大概不至于了。她去看拉埃尔的次数有了增加，甚至把这些事讲给玛格丽特听。玛格丽特作证说："我当时想，真有这种怪事吗？我怎么也不相信。于是，有一天我陪她一起去看看，果然不假。肠卜僧已经免去本兼各职，连'看厕所修女'的资格也被取消。只有不举行正式的唱诗和礼拜仪式时才准许她进教堂。她也不是住在原来那间小房间里了，而是蹲在过去堆扫帚、拖把、洗涤剂、去污粉和抹布的一个小阁楼里。您猜她向我和莱尼讨什么来着？香烟！我那个时候不抽烟，可莱尼给了她几支。她马上就给自己点了一支，大口大口地抽起来，抽了一截就将烟头剪断——我曾经见过不少人一支烟分几次抽，可哪有她这样干净利落啊，就象犯人或住院的病人躲在厕所里抽烟一样，小心翼翼地用剪刀将烟头剪下，轻轻拨开余烬，哪怕有半根烟丝都挑出来，统统装进一只空火柴盒里。她嘴里一边还喃喃不停地说：'天主降临了，天主降临了，他来了。'既不是神经失常，也不是挖苦讽刺，而是一本正经说的——她并不疯疯癫癫，只是有点邋遢，好象舍不得用肥皂似的。后来我就没有再去过，说句老实话，我害怕了——那阵子我自己情绪已经很不好了，因为小伙子死了，他表兄也死了；遇到施勒默尔不在家时，我就到军人饭店里去鬼混，不管谁看上我，我都跟着跑。我这个人完了，才十九岁就完了——可这个修女的样子我实在不忍看，她被关在那间阁楼里，就象一只等着被人家敲死的老鼠，看不下去啊。她越来越干瘪了，一面咬着莱尼带来的面包，一面连连不停地对我说：'玛格丽特啊，别这样下去了，千万别这样下去了。'我问她：'你说什么呀？'她回答：'我说你现在干的事情。'我已经完全受不住了，再也没有勇气去看她——莱尼还经常去，有好几年之久。拉

埃尔那次还说了一句话，我听了很奇怪，她说：'他们为什么不干脆把我弄死，倒要将我藏起来呢？'她总是对莱尼说：'天哪，你应该活着，你应该活着，懂吗？'——莱尼哭了，她是真心爱拉埃尔的。哼，后来人们知道了（"知道什么？"），原来拉埃尔是犹太人，修道会一直未将她的情况据实申报，而是干脆将她藏起来，造成一种印象，好象'人已调走，下落不明'。可是藏起来却又让她饿肚子，据说是因为没有她的食品配给票，其实他们有果园，还养了猪，一个个都吃得肥头大耳。唉，我哪儿还能忍心看啊，她就象一只干瘪瘦小的老鼠缩在阁楼里。再说，莱尼之所以能被放进去看她，一是因为莱尼态度非常强硬，二是因为他们知道她头脑简单。她当时认为，那个修女只不过是在受处分。直到最后，莱尼始终不懂得一个犹太人——不论是男是女——是什么人。而且，即便懂得，也明知有危险，她还是会说：'嗯，那又怎么样？'并且照去不误，这我可以肯定的。莱尼敢作敢为——今天仍然敢作敢为。您想想多可怕啊，那修女口口声声'天主降临，天主降临'，说着眼睛还直瞪着门，真好象天主正在走进来——我吓坏了，可莱尼一点不怕，反而朝门口看着，充满期望——要是天主真进来的话，她也不会感到奇怪的。这已是四一年年初的事了，我那时已经进军医院工作，她来看过我，还对我说：'你干那种事已经不好——现在再吸这个就更糟了，你吸了多久了？'我回答说：'两星期。'她说：'那还来得及。'我说：'不行，已经上瘾了。'不用说，这是指的吗啡——您大概不知道，至少没有料到吧？"

唯一一个看来始终不需要任何安慰的人，是施魏格尔特太

太。这段时间，她经常进出格鲁伊滕的家，看望业已卧床不起的妹妹，同时极力向她开导："命运压不垮一个人，只会使人坚强起来，"象妹夫格鲁伊滕那样"被压垮了"，显然只怪他自己是孬种。眼见亲妹妹一病不起，仍然忍心教训她："要想想自豪的芬尼亚运动成员。"她还大谈特谈朗热马尔克，进而并问起莱尼何以公然郁郁不乐。当她听到范·多恩——在这种场合下，能够出面介绍始末的人，自然只有范·多恩了——解释，莱尼可能是在悼念她的儿子艾哈德时，她感到不啻是受了奇耻大辱。岂有此理！这个"石楠姑娘"（完全是"嗯啊姑娘"的另一代号。——笔者）竟如此"自命不凡"，胆敢悼念自己的儿子，要知道：连她自己都不曾为儿子伤心哪。听了这个"令人愤慨的消息"，她一气之下，立即打道回府，临行时说了一句："真是太过分了——石楠！"

这一年，电影院当然照常营业，莱尼有时候仍去看电影。她看了《海上英雄》、《狂欢之夜》，还再一次看了《俾斯麦》。

这几部片子中，是否会有一部多少给了她一些安慰，或者说，哪怕是让她稍微宽宽心，笔者对此表示怀疑。

当年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战士之妻勇面娇》、《我们去天使的国度》，是否使她感到慰藉？永远是一个谜。

格鲁伊滕一家三口，父亲，母亲，女儿，有时老是守在窗户遮掩严实的房间恩，躺在床上，即使有空袭警报也足不出房门，"整天，甚至整星期啥事也不做，只是盯着天花板出神"（范·多恩语）。

这个时候，霍伊泽阖家大小——奥托老两口、洛特、洛特子维尔纳——搬到格鲁伊滕家里来住。这当儿，发生了一件虽然

可以料到，甚至可以准确地事先计算出来，但仍不失为奇迹，而且会使久病之人霍然痊愈的事情：洛特的孩子，就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子夜时分的一片炸弹声中，呱呱堕地了。是个男孩，六磅半重，由于他出世略早于预产期，助产妇没有准备，正在“别处忙”（后来知道，那家养了个闺女），一向精明恃强的洛特，出乎意外地表现得软弱和慌了手脚，就象范·多恩那样。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又发生了一个奇迹：久病不起的格鲁伊滕太太竟走下床来，斩钉截铁，但语气温和地向莱尼发号施令；在洛特即将分娩的时候，烧好热水，将剪刀消好毒，准备好暖和和的包婴儿用的被毯布片，磨了咖啡，备好白兰地。那天夜里又冷又黑，是一年中最黑的一夜，这个瘦得“几乎皮包骨”（范·多恩语）的格鲁伊滕太太，穿一件天蓝色浴衣，反复仔细检查了放在五斗柜上的一应器械，给洛特前额擦上科隆香水，按住她的双手，毫不拘谨地扳开她的大腿，按照规定使她呈半蹲姿势，一点也不怕地将婴儿接了出来，用双氧水洗净产妇下身，剪断脐带，把孩子放进莱尼用棉褥垫得“暖暖和和”的一只洗衣筐里。尽管炸弹就在不远的什么地方开花，她始终从容不迫，毫不乱套。防空监视哨上一个叫霍斯特的几次三番跑进来，命令熄灯，叫大家都进地下室，但都给她干净利落几句话打发走了。这件事情的所有目击者（洛特、范·多恩、老霍伊泽）异口同声说，她“那副神气，真象个宪兵哩”。

莫非果然是埋没了她当大夫的天才么？不管怎么说，是她亲手给产妇作了“子宫消毒”（老霍伊泽引用格鲁伊滕太太的话），是她查看了胞衣，她同莱尼陪洛特一起喝咖啡和白兰地。出乎意料之外的，倒是平日精力充沛的范·多恩，竟然“在这件事情中屁大的作用也没有起”（洛特语），反而找一些破绽百出的借

口，大部分时间泡在厨房里，侍候格鲁伊滕和霍伊泽两个男人喝咖啡，而且开口闭口不离“我们”（“我们会干的，我们会干好的，我们不会胆怯的，嘿，我们……”——她轻微地批评格鲁伊滕太太：“但愿她顶得住，天啊，我只怕她吃不消哩。”），她远离现场——洛特的卧房，直到紧要关头过去以后才又露面。当格鲁伊滕太太举目四望，似乎不相信自己居然还能对付这种局面时，她才牵着小维尔纳走进洛特的卧室，曼声细语地对孩子说：“来，我们来看看小弟弟好吗？”老格鲁伊滕对老霍伊泽说：“我早就知道，而且早就说过，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嘛。”仿佛唯恐别人不相信似的。

几天后，一件事情闹得有些紧张：洛特抱着小毛头来见格鲁伊滕太太，一定要认她做教母；她想给孩子取名库特（“这是威廉生前的意思，生男取名库特，生女取名海伦妮。”），但又不肯让孩子受洗，并且对教会出言不逊，“特别是那些人”（此话始终未查明指哪些人，十拿九稳是指罗马天主教会，因其他教会洛特并不熟悉。——笔者）。对于洛特的这种态度，格鲁伊滕太太没有生气，只是“十分伤心”，答应当教母，并且郑重其事地考虑，要送给孩子一份正经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能保持长久的礼物，作为婴儿镇摇篮之宝。结果，她决定拿出父母去世后传给她的一块靠近郊区的地皮，并按规定延请公证人到场，办好过户手续。老格鲁伊滕也许了愿：“我呢，我就给孩子在那块地皮上盖幢房子。”他肯定是想说到做到的，但结果未能做到。

深切悲痛的阶段看来已经过去了。原来只顾消极悲伤的老格鲁伊滕，变得积极起来了：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六日凌晨，他的

办事处中了两枚炸弹，消息传来，他“象打了一场胜仗似地高兴，甚至可以说是幸灾乐祸哩”(老霍伊泽语)。由于不是燃烧弹，爆炸时也未引起火灾，因此，没有实现他那“一把火烧它娘的个精光”的希望：经过一个星期的清理——莱尼也不太热情地参加了——，发现所有卷宗材料几乎均完好无损，再过四星期，办事处完全恢复了原有面貌。从此，格鲁伊滕再也不进办事处的大门了。出乎他周围所有人的意料，一反常态，“连他年轻时也从来不曾有过——他变得喜欢交际了”（洛特·霍伊泽语)。洛特还说：“他变得十分和气，这是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这段时间里，他都一定要大家到他家喝咖啡，莱尼是非到不可的，还有我婆婆和孩子。五点过后，我们都退席，他和我公公留下来，听我公公详细汇报‘买卖’的情况，包括帐目、各项往来、计划、施工进度等等——他向我公公了解了全部资产情况，再和律师以及官方法学家长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准备将迄今由他一人经营的这爿营造厂改组成一家建筑公司。拟定了一份‘元老名单’。他非常狡猾，懂得自己四十二岁——何况身体还非常健康——还逃不了兵役义务，打算给自己弄个经理级别的顾问职位，以免应征入伍。听了他的主顾们——都是相当重要的大亨，其中也有几个将军，看来对他都很不错——出谋献策，他给自己安了个‘规划处长’的头衔。我当了人事处长，我公公主管财务——莱尼那时正好十八岁半，让她当主任，她不干，只好作罢。看来他事事都考虑到了，唯独忘记了一点：没有划出部分资金归到莱尼名下。直到后来出了事，我们才终于懂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只不过这样一来，莱尼母女就苦了。唔，他是个好人——还有一点更使人想不到的变化：他谈自己的儿子；几乎已经一年，他不曾提、也不让别人提他儿子的名字，现在

他倒自己谈起儿子来了。他不是傻瓜似地讲什么命中注定之类的胡话，而是说，他认为海因里希死得‘主动’，不是‘被动’，这是好事。我弄不懂他是什么意思，因为事过一年多再谈儿子之死，我已经感到太不聪明，甚至感到有些傻——或者说：如果他们两个不是为这个而死，我倒会觉得他们傻呢。今天我认为，就是‘为这个而死’，也谈不上什么傻不傻。总之，我感到这是憾事一桩。不久，格鲁伊滕终于改组好了‘机构一新’的建筑公司，六月举行了建厂十二周年庆祝会，他想在会上宣布有关各项决定。那天是六月十五日，庆祝会正巧就在两次轰炸的空档里举行——好象他料事如神似的，我们则什么都没有料到。”

莱尼又弹钢琴了，弹得认真，而且“脸蛋突然显得倔强固执”（老翟伊泽语），前文业已介绍的那位席尔滕施泰因，当他沉思地倚窗而立（均系此人自述），“并非完全不感兴趣，但多少有些乏味”地听着莱尼弹奏的时候，“突然聚精会神地听起来，接着，在六月的一个晚上，听到了我所听到过的最令人惊奇的演奏。钢琴陡然之间显出铮铮之声，夹杂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情调，这是我过去从未听见过的。作为一个有时说话不留情面的老人，请想我说句可能使您意想不到的话：我破天荒第一次听到象这样弹舒柏特的作品，我也说不出是什么人在弹，是个男人还是女人——这个人不光是会弹，而且出神入化——，非专业人员能有这种功夫，的确是凤毛麟角。不，这何尝是在弹钢琴，简直——简直是音乐本身在显示它固有的感染力啊；我老是身不由己地几乎每天晚上六点到八点之间倚窗而立，等着谛听邻宅的琴声。不久以后，我应征入伍了，离家多年——等到我一九五二年回来

时，旧居已经租给别人——，啊，我离家十一年，在俄国人手下当俘虏，我的音乐水平早已远远不如从前了——当然苦头倒也没有吃——，只是尽弹一些庸俗低级的东西，舞蹈音乐，流行歌曲等等。您想，一个'令人敬畏的音乐演奏评论家'，每天要弹上大约六次《莉莉·玛琳》，那是什么滋味啊？——，归国四年后，大概是五六年吧，我才终于又住进了自己的旧居——我已经爱上了这儿绿树成荫的院子，还有高高的天花板——，过了十五年，我又听到了什么——中速 a 小调奏鸣曲和 G 大调奏鸣曲小快板，那么清新，那么严谨，那么浑厚，是我从来未听到过的，一九四一年也未听见过。突然之间，我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过去了，简直是世界水平啊。”

第 四 章

接下来的一幕，不妨冠之以这样的题名：莱尼的蠢举，莱尼品行不端，或：莱尼究竟出了什么事？

一九四一年六月中旬，格记营造厂举行建厂十二周年庆祝盛会，格鲁伊滕也邀请“所有当时回国度假的公司职工”参加。谁都料想不到，“再说，从请帖本身也看不出”（老霍伊泽语），“谁会想到，连该厂过去的职工也竟然会认为自己受到了邀请。而且，所谓‘过去的职工’这一称呼，用在这么一个人身上也有些名不副实，因为这个人只是一九三六年来我们厂里见习劳动了六个星期。哼！他就是不愿意当学徒，认为这种称呼太‘低级’了，硬要一上来就当‘见习生’①，可他又不肯学习，倒是反过来指手划脚，想教我们怎样造房子——我们把他又给撵走了，不久他就当兵去了。小伙子人倒不算太坏，就是喜欢异想天开，但又不象艾哈德那样高明——只不过是个想入非非者，自命不凡，不知天高地厚，这种脾气我们可不喜欢。他想否定水泥的功能，‘重新揭示’什么石头的‘万能’——好吧，说不定这种想法确实有些道理，但我们根本派不了他的用场，特别是因为他的一双手既不愿意，而且也不会拿石块。他妈的，我在建筑业干了近六十年了，就

① 指为了学一点手艺而不取报酬地在工矿企业劳动的见习生。这种人员不属于该单位的职工，但地位比学徒高。

说他来我们厂里见习的那阵子，我也已经干了快四十年了。所谓‘石头万能’，嘿，我也不会一无所知；我见过几百个泥水匠和徒工怎么样同石头打交道——您应该去看看，一个真正的泥水匠是怎样得心应手地摆弄石头啊！唉，——可他这个人呀，一双手就是不会和石头打交道，而且他对石头也没有感情——光会夸夸其谈。我倒不是说他有什么坏心肠，只是喜欢想入非非，我们甚至也知道这些想法是从哪儿来的。”

这次庆祝活动还有一个意外的不幸情况：莱尼根本不想去参加。她对跳舞已不感兴趣，她“这时是个非常严肃和十分文静的姑娘，同自己的母亲相处得很好，跟她学法语，还学点英语，对弹钢琴简直入了迷”（范·多恩语）。再说，她“对在当地工作的公司职工清清楚楚，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重新逗起她的舞兴”（洛特·霍伊泽语）。结果，莱尼只是在父母的请求下应付差使地前去参加这次庆祝会的。

遗憾的是，这里不得不谈谈这位被霍伊泽描绘得一文不值的阿洛伊斯·普法伊费尔、他的父母兄弟以及他的背景，尽管他只扮演一个有个性的重要配角。阿洛伊斯的父亲威廉·普法伊费尔，是老格普伊滕的“同窗和战友”，他们是同村人。格普伊滕结婚之前，他们之间还保持着一种不太密切的友谊，待到得普伊滕对威廉·普法伊费尔开始“讨厌得简直无法忍受”（霍伊泽语）时，就连这点友谊也告吹了。他们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共同参加过一次战役（已查明为利斯河[1]之役）。从前线回乡后，

[1] 利斯河，在比利时西部。

当年才二十岁的普法伊费尔，“居然开始”（霍伊泽语，下同）“瘸子似地拐着一条右腿走路了。当然罗，有人存心想捞取一笔救济金，我是不反对的。可这个人哪，实在做得太过分了，老是说他的‘要害部位’吃了一块‘绿豆大的炮弹弹片’。这条癞皮狗呀，竟然一跛一拐，瘸了整整三年，四处求医，跑救济处，最后终于给了他救济金，还送他上大学，当了教师。够了，够了。谁也不想冤枉一个人。也许他那时——叫我怎么讲呢？——，反正现在真是个跛子，可是从来也没人找到过这块弹片——问题不一定在于这块弹片，也不是否定有弹片的可能——，不错，他领到了救济金，当上了教师，等等。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每当普法伊费尔瘸着腿出现的时候，胡贝特就感到十分不安。事情越来越不象话了，他有时甚至还谈到要截肢，在这以后，他的腿真的不能动弹了——但是，即使是最精密的爱克司光，也没有照出，没有发现和证实有这块‘绿豆大的炮弹弹片’啊。正因为谁也没有见过这块弹片，所以有一天胡贝特对普法伊费尔说：‘既然至今还没有人看见过这块弹片，你怎么知道它有绿豆大呢？’我不能不说，这个论点一下子问得他目瞪口呆——从此，普法伊费尔也就一下子面子全丢光了。但他由此形成了一种绿豆弹片的世界观，而吕塞米希小学的学童就一再听到关于这块弹片和‘利斯河’的故事，这样过了十年，二十年。后来，胡贝特又一次确切地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经常听到老家乡下的人对他的议论，我们是同村人，都有许多亲戚在那里——，胡贝特说：‘即使他腿上真有那么一块弹片，那也是一条我所见过的最骗人的腿——他现在拐着这条腿东跑西跑，可当时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打仗呀，我自己也在场嘛——我们那时在第三或第四梯队，后来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战斗——当然罗，要说炮弹之类的玩意儿是有的，但

是——嗯，我们都知道打仗是胡闹，不过，也并不完全象这个人所描绘的那样糟糕，根本不是那样，我们总共才在火线上待了一天半时间——可总不能靠这一点吃一辈子呀。’这时(霍伊泽叹气)，这时威廉的儿子阿洛伊斯参加舞会来了。”

为了掌握一些有关阿洛伊斯的具体材料，有必要上吕塞米希村去走访一些人。笔者访问了两位年龄与阿洛伊斯相仿的旅店老板和他们的妻子，他们都还记得起他；但走访一位神甫，却收获不大：神甫只是查阅教区登记册后才知道，普法伊费尔家“从一七五六年起定居吕塞米希”，不过，到了威廉·普法伊费尔一代，终于还是在一九四〇年“迁走了”。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他那几乎是痛苦的政治经历，而是因为我们简直吃不消他这个人”(吕塞米希旅店老板齐默尔曼语，此君现年五十四岁，为人诚实可信)，这样一来，他们在吕塞米希就几乎湮没无闻了。遗憾的是，仅有的一些证人：范·多恩、霍伊泽全家和莱尼(玛格丽特对普法伊费尔家一无所知)大都怀有某种偏见；各持己见的双方所提供的材料，在具体事实上完全相符，只是解释互有出入。反阿派方面的所有证人说，阿洛伊斯——他这一点与莱尼的遭遇相似——十四岁时不得不中学缀学。普法伊费尔家的人则声称，阿是“某些阴谋诡计的受害者”。不过双方都承认，他是个“美男子”，即使人们在提到这一点时带有种种嘲讽的口吻。莱尼房间的墙上没有挂他的照片，而普法伊费尔家则挂有近十张之多。应该提出，如果说美男子这种称号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它倒是合乎阿洛伊斯的实际情况的。他有一对淡蓝色的眼睛和一头深色的、几乎是乌黑的头发，联系到最庸俗的人种学理论，人

们对阿洛伊斯的乌黑头发议论纷纷；阿的父母以及就已知的或传闻的有关所有祖先（下面所述材料全系由阿洛伊斯的双亲提供)的头发颜色而言，他们全都是金发。普法伊费尔家和托尔策姆家(普法伊费尔太太娘家)所有可以稽考的祖先，都出生在吕塞米希—韦尔彭—托尔策姆之间的三角地带（这个地区方圆二十七公里），走访调查不用长途跋涉，阿洛伊斯两个早年夭折的姐妹贝尔塔和克特的头发——象现在还活着的弟弟海因里希一样——虽然不是金黄色，但至少也是淡黄色的。关于普氏门中子孙头发或黑或金的种种颠三倒四的议论，一定是当时人们每天吃早饭时的头号话题；人们甚至准备采取诬蔑普氏祖先的令人厌恶的手段来解释阿洛伊斯的头发。为了查证普氏门中的女系祖先，人们曾经在上面提到的这个三角地带(由于地区范围不大，可见所花精力和时间都不会太多)翻遍了教区花名册和户籍簿(官方簿册存韦尔彭县城)，因为：莫名其妙地凭空出现一个黑发子孙，可能与女系祖先有关——谁能担保她们的生活不偶尔放荡越轨呢。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在谈到普家家史时，一本正经地说："我记得，有人终于在一九三六年那年，在托尔策姆教堂的受洗人花名册上查到了一个妇女。我哥哥那使人感到奇怪的黑头发，可能就是从她那里传下来的：这是一个有名无姓的玛丽亚，不过据记载，她的父母都是'流浪汉'。"

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同妻子黑蒂·伊尔姆斯，住在属于教会公产的职员新村，房子是一家一户独住的小楼。他有两个儿子：威廉与卡尔，不久就将购置一辆小汽车。海因里希的一条小腿已截肢。他还算客气，只是说话有点火气，据他说原因是"购物的烦恼"。

如今这个三角地带黑发之辈绝非罕见，就笔者亲眼所见，在

一般场合下，目光所及之处，以黑发者居多。无奈确有一种同族之中世代相传的说法，所谓“有名的普法伊费尔头发”之说，合族俱引以为荣；一位长着“普法伊费尔头发”的女子，总是被认为天生丽质、有福气，无论如何都是美丽的。笔者按照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所提供的线索，在吕塞米希—韦尔彭—托尔策姆这个三角地带进行调查，发现不少与格鲁伊滕家及其祖先有关的横的血缘关系①（不是指与几代人之前即已迁居城市的巴尔克尔家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莱尼由于某些横的血缘关系偶然沾上了这种普法伊费尔头发的光荣，并不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要讲句公道话：阿洛伊斯的头发的确——按所谓理发师的审美观——是极其漂亮的：浓密、乌黑的天生鬈发。他有鬈发这一条，又引起了好事者的种种风言风语，须知：据说标准的普氏头发——如莱尼！——乃是光泽不鬈云云。

可以有根有据地说，简直打从这个阿洛伊斯呱呱堕地的第一天起，就招来了种种难以胜计的煞有介事和小题大作之举。按照普家的传统，他们很快就把非做不可的事索性装成出于好心而为；把阿洛伊斯看成是“我们的吉卜赛人”，不过到一九三三年就不这样说了；从那年起，他就一变而为“地道的西部种”②了。笔者认为，关于阿洛伊斯绝非克勒特人之说，倒是言之成理，因为克勒特人虽然大多为淡色眼睛和黑色头发，但阿洛伊斯完全——下面将会看到——缺乏克勒特人所具有的敏感性和想象

---

① 指属于同一宗族的后代之间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

② 指欧洲南部及西南部沿地中海一带的民族。

力，如果一定要给他划个种族，那他只够得上是：不很地道的日耳曼人。还在他牙牙学语之前，他就被父母高高地举在头上，走东串西地抱给别人看，有几个月、也许有几年之久被叫作"可爱的小宝贝"。已经荒诞不经地设想他将来如何大有作为，特别是在艺术方面，他被寄予种种厚望：雕塑家、画家、建筑师（著书立说则是直到后来才列入普家的设想范围。——笔者）。不论他干什么，都要渲染几分。由于他当然还是一个"逗人喜欢的教堂执事"（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他的教派①），所以，他的伯母婶婶、姑表姐妹都把他看成是"修道士画家"，也许甚至是"擅长丹青的修道院院长"。现已查明（由吕塞米希旅店老板科默尔现年六十二岁的妻子及其婆婆、现年八十一岁的科默尔老太太证实，这位老太太的好记忆力备受全村称赞），阿洛伊斯在吕塞米希当教堂执事的几年，即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三年之间，上教堂做礼拜的人数一直增加。"哎呀呀！我们当然在星期天，甚至常常不是星期天也去做做修练（老太太的所谓修练究竟指什么具体内容，至今尚未查明。——笔者）。有机会看一看这个小调皮，的确挺有意思！"（科默尔老太语）。笔者对普法伊费尔先生和他太太玛丽安·托尔策姆进行了多次来访。只要看看他们夫妇的家境的确比儿子海因里希"高一档"就不难明白：一幢比较宽敞的标准式小楼房，汽车也早就有了。老普法伊费尔现已退休，照样还是瘸着一条腿。由于他们夫妇非常乐意介绍情况，因此，不难从他们嘴里打听到一些阿洛伊斯的生平事迹；阿语伊斯的所有遗作，象圣人的宝物一样全都珍藏在一个玻璃橱里：现存的十四幅画

① 西俗信教的人，均按某一教派的习惯给小孩起名字，所以看小孩的名字，就可猜出他是属于哪一教派。

中，大约有两、三幅水平真不错，都是吕塞米希村四周风景的着色铅笔画。吕塞米希地区一马平川，特别平坦——甚至在平原上也免不了有的坎坷不平之处（由于溪流汇集而形成的低洼地），方圆为六至八米的，在这里已经算是罕见的了。看来是这里的景色，经常诱使阿洛伊斯挥笔作画；由于这里天地总是连成一片（肥沃的土地），所以阿——当然看不出究系有意抑或无意——曾探索荷兰绘画艺术表现画面明暗的手法的诀窍，作了一些尝试，并有两、三幅画十分酷肖：他别出心裁地借用托尔策姆一家糖厂作为光源，在画面上把这家糖厂搬到吕塞米希附近，并将太阳若隐若现地藏在工厂冒出的白烟里。普法伊费尔夫妇声称，这样的画有好几百幅。这种说法无从稽考，只好姑妄听之。其次是有几件阿洛伊斯闲时制作的小玩意儿：一只摆仙人掌的底座、一只首饰盒、一个供父亲搁板烟斗用的小摆设和一盏大灯（细木工锯制品）。说得客气些，看到这些东西，给人留下的是哭笑不得的感觉。此外还有大约六张引人注目的体育奖状：田径、游泳——还有一张吕塞米希足球俱乐部的奖状。至于阿洛伊斯在韦尔彭才学了六个星期就半途而废的（泥水匠）手艺，普法伊费尔太太则称之为“实习”，而“这次实习之所以失败，完全咎在那个不了解他的创造性的师傅态度过分粗暴”。总之：人们显然认为阿洛伊斯“前程无量”，而他本人也是这样看的。

普家玻璃橱里还陈列着几十首阿洛伊斯写的诗，笔者宁可不提，因为其中没有一首，没有一行——即使降低要求——能赶上艾哈德·施魏格尔特的名诗的表达能力。当泥水匠实习中断之后，“阿洛伊斯以他天才的活力投身于”（老普法伊费尔语）一种可能使他本来就脆弱的性格演成厄运的职业：演员。他在业余舞台上几次成功的演出（他在《弗兰德斯的狮子》① 一剧中扮

演主角)，给普法伊费尔家玻璃橱留下了三张剪报，他在这几张报纸上获得“无与伦比的赞扬”。不过普氏夫妇直到今天还不曾发觉，给这三家地方报纸写文章吹捧儿子的，实际上是同一个评论员，只是他将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次序颠倒，缩写成三个笔名而已；除开一些细小的差别(例如，头一次用“无与伦比的”，第二次用“全面的”，第三次用“无可争议的”)以外，文章的内容完全相同。三个缩写笔名是：B.·H.·B.、B.·B.·H.和H.·B.·B.。不用说，阿洛伊斯献身舞台的努力也是由于旁人不理解他的“直觉”，同时也是由于人们嫉妒他的“漂亮”(普法伊费尔太太语)而失败了。

几本镶有金边而略已发黄的铅印散文集，可算是普家最引以为荣的珍贵遗物了，它们被陈列在玻璃橱的最上面一格。普法伊费尔太太把它们介绍给笔者说：“您瞧，是铅印的，真是生花妙笔，这能赚多少钞票啊。”(最崇高的理想主义加赤裸裸的实利主义，乃是普家的典型作风。——笔者)

I 出　　发!

战争至今已历八月，可我们还没有打过一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被用来进行艰苦的训练。现在，终于春回大地，几个星期以来，我们就在等待元首的命令。

战争在波兰进行，我们却只好守卫在莱因河畔，不用我们参战就占领了挪威和丹麦。已经有人说，我们只要呆在国内，就算

① 根据十九世纪弗兰德斯作家康西安斯(Hendrik Conscience，1812—1883)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描写十四世纪初比利时布鲁日市民起义反抗法国骑士的故事。

是打过仗了。

我们驻扎在艾费尔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五月九日十六时三十分，下达了向西进军的命令。准备战斗！传令兵往来如梭，战马备鞍，部队整装待发，向驻地居民道谢告别，女孩子们哭红了眼睛——德国迎着落日向西进军，法兰西啊，你要小心！

全营在傍晚开拔。一路上，前前后后全是密密麻麻的步兵。一眼看不到尽头的摩托化部队，循公路左侧从我们身边急驶而过。我们连夜行军。

天将破晓，空气在大队德国飞机的轰鸣声中抖动。机群从我们头上呼啸掠空而过，给西边的邻邦送去了早晨的问候。摩托化部队一直还未过完。——"德军拂晓越过荷、比、卢三国边界，眼下正继续向西挺进。"——一个从我们身边驶过的摩托兵，向行进中的队伍高声报告这条号外。顿时群情激昂。我们向不断从头顶上飞过去的英勇的空军战友挥手致意。

II 一九四〇年的马斯河[1]

马斯河已不是河了，而是一条喷吐着烈焰的火龙。两岸的高地变成了火焰山。

这里是理想的防御地带，每一个天然屏障都受到利用。大自然的不足之处，由技术加以弥补。岩壁前、岩石缝里和绝壁深处，到处满布机枪阵地。就岩壁挖凿出来一处处仅能容身的掩体，四周砌上墙，用水泥加固，上面高耸着厚达五十米的千年巨石，浑然一体。

---

① 马斯河，莱茵河左岸支流，流经法国、比利时、荷兰三国。

III 一九四〇年的埃纳河[1]

一百二十架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马达隆隆作响，奏着钢铁的乐曲，从埃纳河上空呼啸掠过。

但是没有一只铁鸟找到目标。

老天保佑，把魏刚[2]防线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

起来，默默无闻的步兵战士！今天，该是你用自己的行动，显示你那训练有素的本领的时候了。你渴望荣立战功的欲望，必将摧毁铁壁铜墙。

如果你接到命令飞渡谢曼德达姆高地[3]，你就得想一想前人在这里洒下的鲜血！

想一想吧，成千上万的人曾在你之前走过这条路！

你，一九四〇年的士兵，应当走完这条路。

你可曾看到了纪念碑上的铭文："这里是艾兰脱河[4]，遭受过野蛮人的蹂躏破坏。"多么罪恶的信念蒙住了敌人的眼睛。今天，他们又再次把你——一位为自己生存权利而斗争的战士——看成是野蛮人。

六月九日凌晨，我们师准备出击。一个兄弟团的战友担负

---

① 埃纳河，法国北部瓦兹河的支流。

② 魏刚(Maxime Weygand,1867—1965)，法国将军，一九三〇年任法国参谋长。一九四〇年五月被任命为最高军事指挥官，维希政府投敌后任伪国防部长。

③ 谢曼德达姆高地(德语 Chemin des Dames，意译为"夫人之道")，法国埃纳省境内山梁间的一条通道，长三十公里，位于埃纳河与艾兰脱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里曾进行过激战。

④ 艾兰脱河，法国北部瓦兹河的支流，长六十三公里，一九一八年这里是鏖战地区。

我们这个地段的主攻任务。我们被指定为师的后备力量。

准备战斗！出击！

凌晨四时，战士们一个个迷迷糊糊睡眼惺忪地爬出帐篷。沉寂的大地，顿时沸腾开了。

IV 英　雄

这位英雄的故事，是德国军官大无畏的勇敢与忘我献身精神的典范。有人说，一个军官应当具有身先士卒的勇气。每个军人，当他上阵杀敌时，就已和死神结下不解之缘。他从心底撇弃惧怕，集中全力，有如待发之矢。他的感官突然变得异常敏锐，他完全听凭喜怒无常的命运的摆布，凭直觉感到，幸运和上天的怜悯唯独加恩于勇敢的人。勇士们的榜样带动着胆怯的人一起前进，只要一个人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他的榜样，就能使他周围的人们心头燃起勇敢的火炬。京特尔上校就是这样的英雄。

V

敌人打得既顽强又狡猾，即使陷入包围，也是顽抗到底，几乎从不投降。我们遇到了塞内加尔黑人，他们是打丛林战的老乎，在这里大有用武之地。他们利用树根、天然或人造树叶编成屏障伪装，十分巧妙，并且总是在吸引进攻者的林间小径或小块空旷的地方挖下掩体，就在你的身边开枪，几乎是百发百中，而且往往一枪就能致人死命。隐蔽在树后打冷枪的人，大都是难以发现的。他们往往先让进攻者从身旁走过去，再从背后一枪

将他撂倒。这些人不除掉，我方后续人员、通讯兵、指挥部工作人员和炮兵就大吃其苦头。即使长时间将他们分割包围，让他们饿得半死，几天之后，他们仍然毙伤一些零星的士兵。他们或俯卧在地，或倚在树后，或蜷缩成一团贴在树干上，并且大多身披伪装网，暗中窥测目标，伺机扑向猎物。一旦等你真正发现一个这样的野蛮人，他往往早已觉察到了，立即从上面翻滚下来，一眨眼就钻进了丛林深处，无影无踪了。

VI

继续前进，我们不得停留，尤其不得在此停留。我们行进在山谷中，没有任何掩护。谁知道，也许敌人就在高地两旁的一侧——只有继续前进！说来也怪，没有任何人阻扰我们前进。这里的村庄，已给那些望风而逃的法国人破坏了，被他们洗劫一空。

“再过去一段路，就可以看到谢曼德达姆了”，走在我旁边的一位伙伴悄悄地告诉我——他的父亲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这里该是艾兰脱河谷了，他当时干给养员，就是在这里负伤的。”

一条宽广的公路穿过艾兰脱河谷，直通谢曼德达姆高地上的宽阔山脊。公路左右两侧的土地，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没有一块不曾多次挨过炮弹的轰击，到处都是弹坑，看不到一株长着象样树干的较大的树。一九一七年，这里根本就没有树木了，全被打得精光。后来，树根重又长出新芽，由一棵棵残株长成为一丛丛灌木。

VII

我们的眼睛紧紧盯着表。再一次进行了校正和测量，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注意，接着，一声枪响划破了四周的寂静。出击！德国的大炮从森林边缘和灌木丛后面开火了。浓烟在埃纳河彼岸的斜坡上冉冉升起。整个埃纳河谷硝烟弥漫，有时我们的能见度有限。在炮火最猛烈的时候，工兵运来了浮袋，把步兵送过河。一场抢渡埃纳河和运河的艰苦战斗打响了。尽管敌人拼死抵抗，我部在十二点左右就登上了对岸的高地。这时，我们这个观测所再也无法继续观测了。先头部队的观测兵和两个报务员上午已跟步兵出发了。下午，观测所和炮兵阵地也奉命推进。骄阳似火。不久我们就到达埃纳河。新的观测所将设在一六三号高地。

笔者对如何写散文实在过于囿于成见，碍难对此发表评论。

把所有关于阿洛伊斯的不客观介绍压缩成一个可能符合实际情况的要点，再加上所有客观的介绍，不难断定，阿洛伊斯也许有可能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体育教师，兼授图画课。然而，实际上他在一生晋身图进几经挫折之后的真正落脚点，读者早已知道：他参了军。

众所周知，一个人如果不靠自已奋发有为，即使投笔从戎，也是混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不得已而当个军士，则更是如此。当军士，这是摆在这位"完全中学三年级读不下去，又不得不回头再去念国民学校"[1]（老霍伊泽语）的阿洛伊斯面前的唯一出路。

这里必须讲句公道话，阿洛伊斯十七岁时首先自愿服义务劳役，接着又去当兵，开始有所醒悟。他在给父母亲的信中（全都放在玻璃橱里，人人都能看到）这样写道："我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即使环境对我采取敌视态度，我也不想完全归咎于环境。爸爸、妈妈，我恳求你们，不要一看到我开始干哪一行，就指望我已经成为这一行的大人物。"这些话说得的确不错，而且是针对普法伊费尔太太的看法而言的：当阿洛伊斯第一次穿着军装回家休假时，她就俨然是在迎接衣锦荣归的"驻意大利武官，或诸如此类的人物"了。

如果在评论他的时候稍许示以同情，真正采取几分公正的态度，并且考虑到他受到的教育多么恶劣，那么，他毕竟不是一个很坏的人，而且他离家越远，也就变得越好，因为出了家门，就没有人再把他看成是未来的红衣主教或海军上将了。无论如何，当兵一年半他就当上了候补军士，而且即使考虑到，即将来临的战争加速了一个人的升迁发迹，但能够做到这一点，毕竟值得令人佩服。进军法国时，他又正式升任军士，旋即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以"新晋升的"军士身分，参加了格普伊滕营造厂的庆祝大会。

关于莱尼在这次晚会上又舞兴大发，缺乏可靠材料，只有一些流言蜚语和街谈巷议，而且两者源出不同的动机：有善意，有

① 当年德国的学制分两种：一为九年制国民学校，相当于小学和初中。学生毕业后只能当工人；另一种是学生在小学读完四年后，进入完全中学读九年，毕业后可直升大学。这里指阿洛伊斯成绩差，无法继续念完全中学，只好再回头念国民学校。

恶意，有嫉妒，也有单纯出于喜欢背后议论旁人的恶习。如果设想，舞会从晚上八时至次日凌晨四时，大约放了二十四至三十支乐曲，莱尼与阿洛伊斯在午夜过后就离开了客厅，那么——将流言蜚语和街谈巷议缩减到恰当的平均数值——，莱尼可能跳了十二次；但是，在假定的这十二次起舞中，莱尼并不是大部分或几乎全部，而是一无例外地全都是同阿洛伊斯跳的。她甚至不肯赏父亲和老霍伊泽的光，同他们跳上一次——的确，她只是同阿洛伊斯一人跳。

普法伊费尔家的玻璃橱里还陈列着一枚勋章、一条军功绶带和几张照片。从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出，阿洛伊斯当年属于英姿飒爽、生气勃勃一流的俊小伙子，在战争时期，这种小伙子不仅适合用来装饰画报的封面，而且也能为画报撰写一些上面引用过的那种散文；甚至和平时期也能有此种妙用。根据洛特、玛格丽特、玛尔雅三人所知道的有关他的全部情况（既有直接由她们提供的，也有经过莱尼的三言两语介绍而压缩过的），再加上老霍伊泽夫妇的口述材料，人们想象中的阿洛伊斯，定然是这样一个青年：他在一口气行军三十公里之后，依然精神焕发，胸前横挂着一支子弹上膛、打开保险的机枪，解开钮扣的军上装上摆动着第一枚勋章，走在他率领的队伍前面，大踏步开进一个确信已被占领的法国村庄。他带领部下经过仔细搜索，确信村里既无在背后打黑枪的游击队，又无任何妖婆女巫之后，他就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换上干净内衣和袜子，接着，心甘情愿摸黑再步行十二公里（按说还不够聪明，应该事先设法在村里找一辆可能留下来的自行车——也许是慑于那块虚伪的标语牌："抢劫者格杀勿论"，所以未敢动手）。他依然是兴致勃勃地独自上路，只是因为他曾听说，就在十二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上有女人。经过进一

步考察，原来是一些人老珠黄的神女，是一九四〇年德国首次性浪潮的牺牲品；她们喝得烂醉如泥，忙于应付本行工作，累得精疲力尽。经值班卫生员向我们这位配角透露了一些详细统计数字，叫他向这些年老色衰的可怜女人投以“毫无兴致的一眼”之后，他就折转身来，又走了十二公里路，败兴而归(这时他才想起，即使行前多花点时间找一辆藏起来的自行车，也是值得的)；他深深感到有愧他的堂堂大名①，懊恼不止。在总共走了五十四公里之后，赶紧好好睡上一小觉，等到醒来时，可能天已破晓，再援笔从事“创作”，继续进军，占领其他法国村庄。

莱尼就是陪这样一个人跳了约十二支舞曲（“你奈何他不得：他跳得实在出色！”洛特·霍伊泽语)，子夜一时许，被他诱出客厅，跟他双双钻进了距离不远的、现已改建成公园的一条要塞壕沟。

围绕这桩公案，当然发生了许许多多猜测、论证、争辩和分析。想不到这位被视为“冷若冰霜”的莱尼，偏偏“跟这么一个人”溜了出去(洛特·霍伊泽语)，真是一件丑事，几乎是耸人听闻的。正象估计他们的跳舞次数一样，如果也就这桩公案的群众意见和反应作个平均估计的话，那么得出的结论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知情人、当事人和旁观者，都把阿洛伊斯勾引莱尼归之于物质动机。大多数人甚至认为，与阿洛伊斯想当军官的夙愿不无关系：他想——人们这样认为——勾引莱尼，是为了搞钱(洛特语)。但普法伊费尔一家(包括几个婶婶伯母，不包括海因里

① 阿洛伊斯(Alois)一词出自拉丁文，原意为“无所不知者”。

希)则认为，是莱尼勾引了阿洛伊斯。也许这两种揣测都不符合实际情况。不论阿洛伊斯平时为人如何，为私利而在金钱上动脑筋倒是不至于的，这一点是他不同于他父母的地方，可谓难得。可以认为，他是被这个豆蔻年华而且经过初恋折磨更加显得美丽的莱尼迷住了；对法国妓院里那种乏人而寡欢的冒险活动，他已感到厌倦，莱尼如此"娇艳欲滴"(笔者)，简直使他心醉神迷。

至于莱尼，那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她完全"忘其所以"了(笔者)；她接受了到当年的要塞壕沟里去散步的邀请，反正那是在一个夏夜，再假定阿洛伊斯肯定变得温柔多情，甚至有可能一个劲地强求，那么，充其量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这是莱尼品德方面的失足，倒不如说是自觉存在论导致的一次失身。

这条要塞壕沟——仍旧是个公园——至今还在，加以到这个地方去看看又不太费事，所以笔者作了一次实地考察：这里已经过改建，宛如一座植物园，那儿有一块五十平方米左右的地方，种上了石楠(大西洋石楠)。但是，公园管理处"无法找到一九四一年种植的花草树木平面图"。

关于此后三天的情况，据传莱尼只讲过这么一句话："说不出的难为情"。她对玛格丽特、洛特和玛尔雅三人都是这样说的。从获得的其他材料可以得出结论，阿洛伊斯不是一个体贴入微的情侣，更不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情侣。第二天大清早，他把莱尼带到一个名声不雅的费尔南①·普法伊费尔婶婶家里。原来这个

婶婶的父亲偏爱法国，而且拥护分离主义②——当然，这是普家所否认的——，因此才给她起了这个名字。她只住一个房间，还是在一幢一八九五年盖的老式房子里，不但没有浴室，也没有自来水——反正房间里没有，只有穿堂里有。这位费尔南·普法伊费尔一直还是、或者说得确切些：现在又——因为她曾经一度日子过得不错——住在一幢老式房子里的一个房间（这次的房子建于一九〇二年）。她"当然记得很清楚，他们两个那天一清早来找我的情况，而且——我告诉您——瞧他们那副样子，根本不象一对情意绵绵的鸳鸯，倒不如说是两只狼狈不堪的落汤鸡。唉，他们在干了热爱大自然的朋友所干的那种事情以后，按说他至少应该带她到一家舒适的旅馆去——到旅馆里可以洗个澡，换换衣服，还可以收拾打扮一番。可这个傻小子一点也不懂处世之道。"费尔南·普法伊费尔太太（或小姐）本人给笔者倒确实留下一个印象：她很懂"处世之道"。她有着被誉为美丽的普法伊费尔家头发，虽然年纪已不轻，约有五十五六岁，经济条件又不大宽裕，但她也拿出一瓶价钱最高的酸味雪利酒。尽管普家的人，包括海因里希，都不理睬费尔南，"因为她多次——而且始终没有成功——想尽办法要开酒店，当老板"，但这并不妨碍笔者对她的信任。最后她说："您想想，这么一个可爱的姑娘面临一种什么情况——就蹲在我那唯一的一间房间里。难道叫我出去，好让他们俩——怎么说咧——继续寻欢作乐，或者犯罪作孽么？要不，叫我呆在房间里看着他们么？对他们来说，这比最便宜的下等客栈还糟，客栈里至少总还有洗脸盆和毛巾嘛，而且可以关

① 此系法国人的名字。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某些政治势力在法国与比利时支持下，主张莱因地区脱离德国，成立莱因共和国。

起门来。”傍晚时分，阿洛伊斯终于表示，决心“无视陈腐的资产阶级道德观，手携手，无所畏惧地去禀报双亲”（费尔南·普法伊费尔语）。对此，莱尼没有讲话，只是作了一个“鄙视的表情”，以示她对这番表白的反感。事实上很难断定，阿洛伊斯究竟是有点头脑热昏，搬出了他当年演《弗兰德斯的狮子》时的台词呢，还是由于“事情正大光明”（因此他令人难堪地当着莱尼的面把全部经过告诉了这位婶婶）而突然产生了一种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显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完全是瞎吹牛，或者说是个牛皮大王，而且不难想象，这位追求尘世间实利主义、心肠慈悲的莱尼，听到这种高调会怎样紧皱眉头。信不信由你，反正这个可疑的婶母这样说：她觉得莱尼似乎不大高兴同阿在床上或在石楠丛中再过一夜了，就在阿又钻到楼梯角落里去上厕所时，莱尼从口袋里掏出他的那张长期休假证明，失望地打小鼻子里哼了一声。这位婶母反映的这个情况，有一点肯定错了：莱尼的鼻子并不小，而是长得很美、非常端正。

由于阿洛伊斯丝毫没有表示想要拐走莱尼或类似活动的意图，所以他们在“我这里闷声不响地坐了一整天，并把我的咖啡统统喝光”之后，终于别无其他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见自己的父母。这时天已经很晚了。糟糕的是，他们首先到普法伊费尔家去，打从老普法伊费尔“调到城里”起，他们一家就住在很远的郊区。老普法伊费尔尽量掩饰自己内心的胜利喜悦，结结巴巴地从喉咙管里挤出来一句责备儿子的话：“你怎能对我老朋友的闺女做出这种事啊！”普法伊费尔太太则只是泛泛地讲了一句：“这可不应该”。当年十五岁的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还能清楚

地记得，他们那天晚上喝了咖啡和白兰地(普法伊费尔太太说："我们可花了一票哪。")，并且仔细筹划了婚事。莱尼坐在旁边一言不发，而且谁也没有征求她的意见，最后她在别人继续筹划时竟然呼呼入睡了。他们规划得很细致，甚至谈到了住宅的大小和摆设。("没有五个房间，他是决不会同意女儿过门的——他就应该给她这些房子嘛"，"桃花心木家具也不能少。""也许到头来他会给自己，至少会给他女儿盖一幢房子的。")后来，天快亮时(全系根据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所述)，莱尼"公然存心挑逗似地，装出一副臭婊子的派头，她一连抽了两支香烟，还深深地一口吸进嘴里，再从鼻孔里喷出来，嘴唇涂得红红的。"接着，他们在附近打了一个电话，叫来一辆出租汽车(这次是普法伊费尔先生说："我们可花了一票哪。")(花了多少？——笔者)，大家乘车到格鲁伊滕家去。"时间还很早，才七点半钟左右"就到了——由于莱尼仍然坚持一言不发，因此从到达格鲁伊滕家起，我们就只好以女证人范·多里的陈述为准了——：格鲁伊滕太太夜里睡得很少(因为遇上空袭警报和她的教子库特初次感冒)，这时还躺在床上用早餐("吃的是咖啡、烤面包片和橙子酱。您瞧，一九四一年要搞到橙子酱可不容易哪！——可是他全给妻子搞到了")。

"噢，莱尼回来了，'在第三天又复活了'——这是我当时对她的印象。她一进屋，就跑到她母亲跟前，拥抱了她，然后钻进自己的房间，请我把早餐给她送去，而她——您想想看——坐下来弹起钢琴来了。格鲁伊滕太太——我只好听之任之——'抬起身子'——你懂得我的意思吧——不慌不忙地梳洗起来，围上她的披肩——一件异常漂亮的老式披肩，巴尔克尔家世世代代把它传给最小的女儿——，通身上下收拾停当后，这才走进普法

伊费尔夫妇等候的起居间，客客气气地问道：'请问，您两位有何贵干？'这么一来，首先就招来了一场由于用您这个称呼而引起的争执：'哎呀呀，我说海伦妮，你怎么突然见外，称我们您呢？'格鲁伊滕太太说：'我记不起什么时候对二位称呼过你啊！'老普法伊费尔太太紧接着说：'我们为我们的儿子向您闺女求婚来啦。'格鲁伊滕太太一听，只是打鼻子里'哼'了一声，再也没有说别的；她去打电话，打到丈夫的公司里，请人找一下她丈夫在什么地方，找到了，就立即叫他回家。"

接着，显然演出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一场既深为可悲又令人喷饭的尴尬戏，一般小资产阶级家庭为儿女亲事忙时，这种场面是司空见惯的。象"名誉"这个词，竟出现了五六十次之多(范·多恩断言她可以保证不错，因为她当场在门板背后划了杠杠，记下了次数)。"唉，如果不是为了莱尼的事，我可能会感到滑稽可笑的，因为当他们看到，格鲁伊滕太太不想用答应这门亲事的办法来挽回女儿的名誉时，就反咬一口，提出了他们儿子的名誉问题——他们说成似乎被人诱奸失身的不是别人，倒是他们的儿子，还坚持认为，只有答应婚事，才能挽回他们这个当候补军官的儿子的名誉——其实，他根本不是候补军官，后来也没有当成。到后来，越说越可笑了，他们开始大吹特吹起阿洛伊斯的身体来了：头发漂亮，身高一米八十五，肌肉如何发达。"

幸亏这位叫人提心吊胆等候的老格鲁伊滕很快就回来了，他("进门时他象个疯子似的咆哮如雷")"显得无比温和、文静、几乎是客客气气的，这才使当然都很怕他的普法伊费尔夫妇感到如释重负"。他立即打断了诸如"名誉"之类的话(老普法伊费尔夫妇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自己也要名誉啊")，若有所思地仔细打量着阿洛伊斯，笑眯眯地吻了妻子的前额，并询问阿洛伊斯所

在师和团的情况。“他显得越来越深思”，过了一会，把莱尼从房间里叫出来，“一点也不责备她”，只是严肃地问了她一句：“姑娘，你看怎么办，结婚还是不结婚？”这时，“莱尼可能第一次仔仔细细地、沉思而怜惜地看了看阿洛伊斯，而且似乎又有一种预感（莱尼长到这么大有过一次预感吗？——笔者），她毕竟已跟他发生过关系了，何况还是自愿的，想到这里，她终于答道：‘结婚。’”

接着，格鲁伊滕“声音中流露出几分同情心”（范·多恩语），看着阿洛伊斯说，“好，那就这样办！”还说了一句：“你们那个师已经不驻在亚眠了，调到了施奈德米尔[1]。”

老格鲁伊滕甚至表示愿意帮阿洛伊斯弄到一张结婚许可证，因为“时间紧迫”。下而这一点当然是容易在事后查明核实的：他已经知道，一九四〇年年底起就在频繁地调动部队，在决定女儿婚事的前夜，又从他的老朋友谈话中获悉，不久即将进攻苏联；他担任“规划处长”这一新职后，“知道不少情况”（老霍伊泽语）。对于洛特和奥托·霍伊泽当天后来提出反对这门亲事的种种意见，他用一句话就全给顶了回去：“唉！算了，算了……”

有一点仍然有待于证实，即阿洛伊斯在收到批准他结婚电报的同时，还接到通知，命令他“立即中止休假，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九日到施奈德米尔向师部报到”。

接下来是赶到户籍管理所办理结婚登记，上教堂举行婚礼，毋庸一一赘述。值得一提的也许是：莱尼拒绝穿白礼服；阿洛伊斯神经质地勉强吃完了喜酒；莱尼显然并不因这次正式的燕尔

[1] 施奈德米尔，在奥得河以东，现属波兰。

新婚之夜落空而感到悲伤，她甚至还送他去火车站，在月台上接受他的亲吻。正如莱尼后来——一九四四年一次特别厉害的空袭时——在玛格丽特的地下室向她透露：阿洛伊斯就在临出发前的一个钟头，还在格鲁伊滕家过去的烫衣间里，郑重其事地向莱尼指出夫妇之间应尽的义务，逼着她"体面地和名正言顺地"同他睡了一觉。从此，阿"对我来说，他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掉了"（玛格丽特引述莱尼的原话）。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傍晚，就收到了阿在攻占格罗德诺[1]时"阵亡"的通知。

关于这一点只有一个重要情节，即莱尼不肯服丧和哀悼，她把阿的一张照片贴在墙上，贴在艾哈德和海因里希照片的旁边，算是尽了人事，但到了一九四二年底，就又把这张照片摘了下来。

光阴荏苒，转眼之间，两年半平静的时光悄悄流逝了，莱尼度过了十九岁、二十岁，终于到了二十一岁。尽管玛格丽特和洛特不时向她提供机会，但她从此再也没有跳过舞。她有时上电影院（根据仍经常给她买电影票的洛特·霍伊泽所述），去看《少年们》、《为德国而纵马奔驰》和《至高无上》。她看过《克律格大叔》和《天狗》——但这些影片中，没有一部能使她哪怕是掉一滴眼泪。她弹钢琴，无微不至地照顾旧病复发的母亲，经常驾着小汽车在附近兜风。她上拉埃尔那里去得更勤了，每次都给拉带上一暖瓶咖啡，一早餐盒夹肉面包和香烟。由于战时经济越

---

[1] 苏联城市名，在白俄罗斯西陲，靠近波兰。

来越紧，莱尼在公司里的职位变得更加有名无实了。一九四二年初，人们对公司财产进行过一次严格清查，从那时起，她的汽车就有被没收的危险。知情人破天荒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莱尼这个人居然会有所求告：她求父亲把“这件东西（指她的鹰牌小汽车）留给”她。父亲告诉她，汽车之事已经不能完全由他作主了，莱尼一听，求得更加迫切，一直缠住父亲不放，最后他终于“想尽一切办法，再给她设法延长了半年期限”（洛特·霍伊泽语）。

行文及此，笔者甘冒多言饶舌之嫌，试图就书中人物的命运作一番假设，莱尼可能、必然、理当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

第一：迄今对莱尼关系重大的三个年轻人中，唯独阿洛伊斯经历战争未死。

由于阿洛伊斯的合适职业显然是军人，也许他不只是打到莫斯科城下，而且还一直冲过莫斯科，由少尉升上尉，可能——假定中途未被苏联俘虏——战争结束时已晋升少校；然后平平安安离开俘虏营，胸前挂满勋章，趋于大势或迫于暴力失去了他那几分天真性格；回国以后，可能与宁愿见到一个低声下气、而不是凯旋归来的女斯的老格鲁伊滕一道，干上两年——回国晚则干一年——小工；肯定他很早就会重返部队，即现在的联邦国防军，今天已五十有二，肯定会当上将军。这样一个阿洛伊斯，是否能与莱尼重续旧情，同她过夫妻生活，甚至的的确确同床共枕呢？笔者断言：不可能。由于莱尼很不习惯于假说，当然增加了我们推断的困难。有人也许认为，莱尼是不会接受后文中有待记述的另一次更加旖旎缱绻的爱情的，如果……——笔者断

言：她不会不接受的，即使……

可以肯定，五十二岁的阿洛伊斯仍然会是一个美男子，由于有普法伊费尔家的头发，可保无秃顶之虞，在缺乏人手的情况下，他完全有资格自荐于波恩大教堂或科隆大教堂，当一名教堂执事。否则，把那些纯熟地挥动弥撒宝书、毕恭毕敬地手捧圣水壶和小酒壶的英俊漂亮的将军，都放到哪里去呢？把他们都放到哪里去呢？我们姑且假定，虽然莱尼对他并不贞节，但仍"留在他身边"，而且不时曲尽妇道，有了三四个"可爱的"孩子，阿洛伊斯屈将军之尊就教堂执事之职，那么，她会出席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假科隆格雷恩教堂举行的、由红衣主教弗林斯主祭的联邦国防军首次（不是末次）祈祷盛典吗？笔者断言：不会的。笔者在此次会上未见莱尼，只看见阿，甚至还看见他们"可爱的"孩子，但未见有莱尼。除此以外，笔者还看见阿有时给画报客串封面男郎，或者看见他与堂堂仪表的南宁和魏德曼[①]先生一道，出席东方集团国家使节举行的招待会。他——笔者——看见阿出任驻华盛顿，甚至驻马德里武官——但根本未见莱尼，更未见到她与漂亮的南、魏两位先生为伍。读者可能寻思，笔者到处都见到阿，但看不见莱尼——甚至看到她的孩子，却见不到她自己，莫非是自己视力不佳吧。笔者视力诚然不佳，但为什么能清清楚楚看见阿洛伊斯，而一次也不见莱尼呢？由于在太空中某处肯定有一个载有一台大如巴伐利亚州的巨型电子计算机的、还未被人发现的陌生的飞行器，它不断发出假设的履历资料，因此我们必须等待，直到这个玩意儿终于被人发现为止。完全可以肯定的

---

① 南宁，西德记者、出版商，创办《明星》画报，现任该刊主编；魏德曼，亦为西德新闻界人物。

是，倘使莱尼出于自愿或迫不得已仍然与阿结合，她会愁得玉体发福，不会象今天这样轻于标准体重三百克，而是超过标准体重十公斤。那样一来，又需要有一台大如北来因-威斯特法伦州、专门测定内分泌的巨型电子计算机，以便测出使莱尼这样一个人遽然发福的种种内因和外因。有人看见莱尼荣任武官夫人，在西贡、华盛顿或马德里跳舞，打阿球吗？答曰：也许是个玉体发福的莱尼，而不是我们相识的那一位。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人们尚未发现这个遨游天外的工具，唯独它能测出任何一滴不曾哭出来的T. 以及各种S.、G.、W.、L.1和L.2，并将它们一一换算成超过或不足标准体重的数据。要将任何一点无根无据的东西强加给莱尼，真有说不出的难处，不过，既然已经有了这种电子计算机，难道科学还会忍心看着我们发愁么（百科词典就不曾这样叫我们为难咧）？

如果说，笔者用雪亮的眼睛看到阿洛伊斯假设的前程，那么他根本看不见有莱尼，他甚至——坦白言之——从来看见她在任何方面而尽夫妻的本份。

可惜呀，可惜，遨游天外的工具至今尚不知在何方，唯有它可以回答一个神秘莫测的问题：只要你说出自己超过或不足标准体重多少，它就能告诉你：你的胃、肠、中枢脑干、肝、肾和胰腺里，是否含有过多或过少的T.、W.、L.1、G.、S.和L.2，因而使你行动反常和胡思乱想，以致体重不合标准。谁能回答：莱尼体重几何，如果：

第二：艾哈德一个人活下来。

第三：艾哈德和海因里希两人活下来，

第四：艾哈德、海因里希和阿洛伊斯三人都活下来，

第五：艾哈德与阿活下来，

第六：海因里希与阿活下来。

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即：如果艾哈德一个人活下来，那个尚未被人发现的翱翔天外的工具，将为莱尼的体重欢呼（电子计算机也会欢呼），为莱尼内分泌完全正常而欢呼。不过——最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莱尼在上述第一至第六的任何一种情况下来到佩记花场，如果发生纠葛，她又该怎样去消弭纷争呢？

无论如何有理由认为，设想莱尼会同阿洛伊斯白头偕老，是站不住脚的，反之，她那显然计划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作石楠丛中相会，肯定是会有好的下场的。还可以肯定，即使莱尼成了有夫之妇，也绝不会妨碍莱尼的行动，要是来的是一个"意中人"的话。就有关艾哈德的材料分析，完全可以设想莱尼是一位高级中学教师（主课德语）的太太，一位晚刊编辑的太太（或女伴），一家先锋派期刊发行人的夫人（而这里必须说明，她也会通过艾哈德的指教，知道后来靠另一个人指教才知道的那位德语作家：格奥尔格·特拉克尔）。无疑，艾哈德会始终爱她的，至于她是否也始终爱艾——则因事情至今已相隔二十多年，笔者碍难打保票；但是，好在艾决不会象阿那样坚持要求某种权利，因此，无疑他也终生可望得到莱尼的怜爱，尽管莱尼不一定会与他白头偕老。此外，笔者（他感到出乎意外）也未见海因里希，不论任何地方，不论设想任何职业，都未见有他的身影——正象两位耶稣会长老也难得看见他一样。

这里还要——有鉴于词典上的某些解释——提出一个问题：人世间究竟何物更珍贵？有谁告诉我们，同样一种东西，谁视之若珍宝，谁视之为草芥？对此，所有词典，包括誉满书坛的

词典，一概绝口不提。可以稽考的是：对有一种人来说，两个半马克要比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生命远为宝贵；更有一种人，为了一片血肠的得失，竟毫不在乎地拿自己老婆孩子的宝贵东西——天伦之乐，看到父亲终于面露笑容——去冒险。至于人们一向谆谆教诲我们的所谓G.，究竟又怎样呢？见他娘的鬼：有的人只要能捡到三四个香烟屁股，凑合着卷成一支烟过过瘾，或者从垃圾桶里拾来一只味美思空瓶，仰起脖子嘬上几滴残汁，就自以为G.近在眼前了。而另一种人，为了满足——无论如何是按照西方国家快速偷情法的做法——十分钟左右之欢乐，说穿了：为了同自己当时所思慕的对象匆匆睡上一觉，而需要一架私人的喷气式座机，不让教规和法律名正言顺赋予自己G.的那个人发觉，利用早餐和下午喝咖啡之间的几个钟头，径飞罗马或斯德哥尔摩或阿卡普尔科[1]（那就需要到次日早餐时分方能返回）——与自己思慕的他或她来一次男—男、女—女或男—女交欢。

最后在这里必须指出，还有许多带有多种电子计算机的飞碟尚未被人们发现呢。

试问，什么地方在记录人们心灵上经受的S.，记录人们肉体上经受的S.？什么地方如同做心电图那样记载我们眼结膜囊的活动情况呢？当我们夜深人静背着人黯然W.的时候，谁能计算我们流下了多少T.呢？一句话，谁来管我们的L.1、L.2呢？好家伙，难道所有这些难题，都得由笔者一一加以解答吗？如果说，我们的科学能将贵重的仪器送上太空，收集月球表面的尘土或取回几块光秃秃的石头，但却发现不了可以解释人世间所珍

① 阿卡普尔科，墨西哥西海岸地名。

惜的东西的相对性的飞碟，甚至无法测出它们的方位，那么，我们的科学究竟还有什么用处？例如，何以有的女人同别人睡上片刻，作为酬劳，就有权得到两所别墅、六辆汽车、外加现款一百五十万，而——这有统计数字可资证明——在一个花街柳巷传统成风的古老而神圣的城市中，当我们的莱尼七、八岁大的那种年头，少女们为了一杯价值十八芬尼的咖啡（连同小费二十芬尼，准确地说是十九点八芬尼——可是有哪一家造币厂想到要去传造每十个成五个才顶那微不足道的一芬尼的硬币呢）和一支价值两点五芬尼的香烟，总共也就是为了二十二点五芬尼，就可以委身于人，甚至还得满足额外的亲热要求呢？

可以想象，测定人世间百物贵贱的电子计算机的指针永远是极其不稳定的，因为它所要指明的数值差异委实太大了——完全同样的效劳，有的代价是二十二点五芬尼，有的则是大约两百万马克。

以人世间不可缺少的火柴为例：一个身系囹圄的囚犯，晚上抽烟用的不是一根、半根，而是四分之一根火柴，而另一些人——而且还是不吸烟者！——却拥有大似两个拳头的气体打火机，毫无意义地不切实用地放在写字台上当摆设，两相比较，其差别还不令人吃惊么？

这是什么世道？公理何在呢？

喏，这里只是点一下，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多着哪。

有关莱尼探望拉埃尔的情况，人们知道的不多，因为住在这所修道院里的修女对揭开莱尼与拉埃尔的亲密关系一事态度消极；玛格丽特上次介绍情况时隐隐约约提到过的那种暗害拉埃

尔的计划，还有进一步揭发的必要。在这里，也应考虑一个知情者，即花匠阿尔弗雷德·朔伊肯斯，此人对笔者相当坦率，为此而吃了苦头。朔伊肯斯一九四一年丢掉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当时还不满二十五岁，分派来修道院当花匠兼助理门房，定然相当了解莱尼探望拉埃尔的情况。笔者前后只找到他谈过两次，第二次谈话后，他就被调到下来因一所修道院去了，当笔者正要设法去下来因探访他时，他又被调走了。一个约莫四十五岁、十分厉害的名叫萨皮恩蒂阿的修女，相当明确地向笔者表示：对于修道会的人事政策，她无提供情况之义务。由于朔伊肯斯的失踪，时间上与笔者四访切契莉阿修女——打算专谈拉埃尔的情况——吃闭门羹相距颇近，因此笔者猜测此中定有文章，后来他也知道原因何在：修道会企图制造对拉埃尔的崇拜，甚至准备宣传致福成圣之说——这样，"密探"（这是给笔者戴的帽子）和莱尼自然都属于不受欢迎的人了。只要朔伊肯斯还长着嘴巴和嘴巴上没贴封条——因为人们想不到他会谈什么——他总是愿意谈的。他供认，四二年年中以前，他经常私自放莱尼进院看拉埃尔，每星期两次，间或甚至三次，每次进院都是经过他自己住的门房，"到了院内，她就熟门熟路，不用别人带了"。洛特对这个"奇怪和神秘的修女"一向不以为然，谈不出任何情况，而玛格丽特显然只听莱尼说过拉埃尔之死："她已经只剩一把骨头了，是活活饿死的，虽然最后我经常给她送去吃的东西。后来她死了，他们将她草草埋在园子里，没有立墓碑或标记；那次我一进修道院，就感到她人已经不在了，朔伊肯斯对我说：'晚了，小姐，已经晚了——难道您想用十个指头刨地三尺么？'于是，我去找修道院长，一定要她说明拉埃尔的去向，她回答说拉埃尔出门去了，我又问上哪里去了，这时修道院长就紧张起来，说：'我说，孩子，

您怎么这样不明事理啊?'啦",玛格丽特讲完莱尼的原话后,继续说道,"幸好我只跟莱尼去看过一次,以后再也没去第二回。拉埃尔死后,我也劝阻住莱尼没有去告状,告状是要闯祸的——对莱尼、对修道院、对大家,都不会有好结果。'天主降临了'这句话我已经领教过了——当我闭上眼睛想,他真的从门口走进来的时候——"(说到这儿,玛格丽特甚至在胸前划起十字来)。

"我当然(此系最后一次访问朔伊肯斯时所述,当时他还挺健谈)心里念叨,这个女人究竟是什么来头啊,不仅人漂亮,而且还有一辆漂亮汽车哪,我想,准是党的大人物的太太或女朋友——那年头谁能自己有汽车呀——,不是党,就是工业界。

"事情自然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我私下放她进园子的,每次进出都经过我这间门房,但结果还是叫人发现了,因为有人在修女住的那间阁楼里发现了香烟屁股,而且闻出了香烟味。有一次,防空监视哨跟我们吵了起来,他硬说看见一个窗口有亮光——这只可能是她们俩在阁楼里擦火柴抽烟——当时四下一片漆黑,几公里外都看得见。一气之下,小个子被关进了地下室。(小个子?)对,就是那个小个子老修女,我只见过她一次,就是将她搬到地下室去的那一次——她拿了一张做祈祷用的椅子和一张床,耶稣受难像她不肯要,她说了:'这不是耶稣,这不是耶稣。'您说怪不怪。搬到地下室以后,这个漂亮的金发女郎还是三天两头来,她非常固执,并且再三跟我讲,求我帮她把小个子弄走。她想直截了当,把她带走。唉,怪只怪我干了蠢事,不该接受了她送的东西——香烟、黄油和咖啡——,老是放她进院,后来也放她进地下室。待在地下室里,至少外人发现不了她们抽烟,

因为地下室的窗子低于小教堂。有一天，小个子死了，我们将她埋在园中那个小墓地里。(有棺材和十字架吗？教士到场吗？)棺材是有的，没竖十字架，教士也没有在场。我只是还听修道院长说过一句话：'现在她至少不会再为该死的香烟票叫我们怄气了。'"

朔伊肯斯所述到这里为止。此人并不怎么讨人喜欢，但他的饶舌，倒确实引起人们的一线希望——不过终成泡影。要知道：饶舌之徒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大论，除非其中能有"吐露真情"之处，否则是一钱不值的。朔伊肯斯正要开始吐露真情——但立即就横遭暴力干预，与笔者隔离，甚至连笔者感到双方都持好感的、和蔼可亲的切契莉阿修女，也一言不发了。

毫无疑问，四一年末四二年初的莱尼，变得空前沉默寡言和守口如瓶。她瞧不起普法伊费尔一家，而且公然形之于色，一看见他们进来，她就离开屋子。普法伊费尔夫妇带着甜食来看她，即使精明老练如范·多恩，也是在事过六星期之后，才弄清楚他们用心何在：老两口不单是想监视寡居的莱尼——也是指望普氏家门后嗣有人。直到阿洛伊斯的死讯传来六星期之后，这时，老普法伊费尔"引以自豪的悲哀达到一个新阶段：连他的另一条腿也开始装模作样地瘸着走路了——至于究竟是左腿还是右腿没有毛病，我无可奉告，不过怎么说他也得保持一条腿没毛病，才能瘸着另一条腿走路，对吗？总而言之，他们经常带着自己家里做的烘得半生不熟的令人作呕的蛋糕来看她。由于谁也不理睬他们，包括格鲁伊滕太太、莱尼、洛特和老霍伊泽，都不爱理他们，特别是洛特向来看不惯他们一家子，因此，他们只好到

我这间厨房里来坐坐。不瞒您说，对于他们提出莱尼有无‘变化’的问题，我始终只理解为打听她是否真正守寡，是否另有新欢之类；我怎么也没料到，兜了半天圈子，最后竟发现他们有心想看看莱尼的日常换洗衣服。哦，他们是要看这个，等我明白他们的用意何在时，我狠狠捉弄了他们一顿；我说：是啊，莱尼的变化可大哪。他们一听，就象鸭子似的，颈脖子伸得长长的，盯着我连声问什么变化。我泰然自若地说：莱尼心灵上起了变化。他们听了，头又缩了回去。过了八个星期，这个托尔策姆佬——您知道，我们之间素来以你相称，因为都是一个村子的嘛——竟然不避任何忌讳，当人暴众对莱尼动手动脚了。这时，我实在看不入眼了，我说：‘别这样吧，我可以给你们打保票，莱尼肚皮里没有什么小崽子。’他们准是想，倘使能珠胎暗结，搞个小普法伊费尔到家里来，该多好啊——滑稽的倒是，胡贝特也同样想要了解，不过没有这样笨拙，而是在女儿跟前唉声叹气，装成一副伤心难过的样子，说他很想抱个外孙，即使是那个人种下的也好——瞧，后来他果然抱了个外孙，而且还是跟他的姓哩。”

写到这里，笔者感到十分为难，因为他有心请教词典，看看将通常所谓的“无罪”一词加之于莱尼，是否妥当，不料大失所望：词典对于“有罪”一条多少作了解释，从“知罪”到“认罪”各条的释义也颇详尽；至于“劝善剧”一词则连笔划都含糊不清，唯一释义明确的只有“教学村”；再后一条是“学校”，各种学校罗列了一大堆，却绝口不提“舒伦堡”氏；有关“教育权利”一条，词典作了非常冗长的解释，几乎为所有 T.、W.、L.1、G.、S. 和 L.2 各条解释总和的三倍，但又根本不得要领，看了使人如坠五里雾中。

翻遍词典，未见有"无罪"① 一词。哎呀，这究竟是什么世道？难道对于德国人来说，教育权利竟比笑和哭、痛苦和烦恼以及幸福等全部加在一起，还来得重要么？"无罪"一词未予收入，真是岂有此理；没有词典，是很难正确掌握这个词的含义的。莫非科学到底还是忍心看着我们发愁么？难道可以说，莱尼所作所为，全都是无罪的，根本无需加上引号？要知道，如果不使用这个字眼，笔者温情脉脉寄予关切的莱尼，是无法得到人们谅解的啊。至于说到她并非没有醒悟的可能，则无需多久——再过一年左右——到她满二十一岁的时候，便可见分晓了。

这个少妇究竟是何许人也？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这个"金发美女"开着一辆漂亮汽车四处兜风，还买通一些饶舌的花匠（他们很有可能在漆黑的修道院花园里变得咄咄逼人），给一个显然注定要活活饿死的、受人轻视的修女送咖啡、面包和香烟；当对方一回紧张地盯着房门口说"天主降临了，天主降临了"，二回对着耶稣受难像说"这不是耶稣"的时候，她都毫无惧色。旁的人个个都在战场上英勇捐躯，她却在翩翩起舞，敌机在狂轰滥炸，她却去看电影，跟一个——说得客气些——并不特别迷人的小伙子勾搭上了，结了婚，上办事处去上班，弹弹钢琴，拒绝被升为主任；当越来越多的人死去时，她继续跑电影院，去看《伟大的国王》和《天狗》之类的片子。她在这两个战争年头里所说的可以原话引述的片言只语，我们已经略知一二。当然，还从其他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但那些人的话可靠吗？例如，据了解，她

① 以上笔者所说的几个词条，按德文字母排列顺序是："有罪"(Schuld)、"知罪"(Schuldanerkenntnis)、"认罪"(Schuldversprechen)、"劝善剧"(Schul-drama)、"教学村"(Schuldörfer)、"训练"(Schulen)、"舒伦堡"(Schulenburg —— 系指几个名叫舒伦堡的军人和学者)、"教育权利"(Schulrecht)，"无罪"为 Unschuld。

有时独自一人坐在自己房间里，瞪着她的身分证连连摇头——身分证上贴有相片，证明她叫海伦妮·玛丽亚·普法伊费尔，父姓格鲁伊滕，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七日生。玛尔雅也证实，莱尼的头发又显得特别光泽美丽了，还说莱尼（自然不只她一个）埋怨战争，战前则埋怨星期日，因为星期日吃不到新鲜小面包。

她似乎不曾注意她的父亲变得出奇地兴高采烈。这一期间，他"雍容华贵，仪表堂堂"（洛特·霍伊泽语），白天大部分时间待在他的市内办事处，"商谈业务"，成了名副其实的"规划处长"，不再是老板，甚至连股东也不是，只是支领一笔相当可观的"固定薪金加车马费"而已。

莱尼听到旁人言及公公回忆往事时只是嗤之以鼻——并不讲话，全都只是通过皱眉和撅嘴来表示——公公在二十三年前之所以投笔从戎，不只是想要戴战士光荣的十字奖章，而且还想捞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挂挂；他还曾经找自己的朋友，即经常在市内办事处、有时当然也与将军们一起洽商业务的格鲁伊滕"一再请托"，求他帮助他弄到他梦寐以求的这种荣耀。而且始终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找到害得他一直"瘸腿"的那块"绿豆大"的弹片。莱尼有没有注意，普法伊费尔一家叫她申请烈属优抚金，是做好圈套坑害她？她有没有注意，她在申请书上签了字，打从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起——当然要补发以前的部分——她的银行帐户每月就增加六十六个马克呢？普家这样做，只是为了在近三十年之久的漫长岁月里对她恶意报复，怂恿那个平时倒也讨人喜欢，不是瘸一条腿而是确实失去一条腿的儿子海因里希有一天去找莱尼算帐，说她靠普法伊费尔这个姓，至少捞了四五万马克，因为近三十年来，她一直有这笔由于她的职业变动而曾多次提高的烈属优抚金"外快"——并且生自己的气，怪自己竟

走得这么远；加上也许(纯系笔者个人看法，无旁证)醋意大发，因为打从见到嫂嫂莱尼的第一天起，他就暗地里爱上了她——海因里希还当人暴众（当着汉斯·黑尔岑和格蕾特·黑尔岑两人的面），冲莱尼大吼大叫："你究竟凭什么挣了那五万马克？就同他在野草蓬里睡了一次，第二次——哼，人人都知道这件事——他就得向你苦苦哀求；这个可怜虫，一个星期后就死了，倒给你留下了个好名声，而你——面你——而，面你——"莱尼朝他一瞪眼，他顿时就哑口无言了。

莱尼"劈头盖脸挨了这么一顿"，骂她同别人睡了两觉就捞到大约五万马克，会感到自己象个娼妓么，而她——而她——面她——

莱尼不仅不想去建筑公司上班，事实上几乎是再也不跨公司的门坎了，她老实告诉洛特·霍伊泽："看到这大堆大堆崭新的钞票"就恶心。她尽力设法保住自己的汽车，以免再次被没收，她只是开车在"就近一带转转"，而且现在日益频繁地带母亲一道出去，"她们母女双双上莱因河畔的漂亮咖啡馆和饭馆，一坐几个钟头，说说笑笑，看看过往的船只，吸吸香烟"。这一时期格鲁伊滕一家最引人瞩目的一点，就是"他们显得莫名其妙地兴高采烈，这种情绪久而久之会使人得神经病"（洛特·霍伊泽语）。这时候，格鲁伊滕太太的病已得到确诊，很少有痊愈之望了：她患的是多发性硬化症，越来越快地进入后期。每次乘汽车外出，要靠莱尼背上背下；她再也不看书了，连夏芝的作品也不碰了，有时"手里拿串念珠数数"（范·多恩语），但不提要"教会方面的安慰"。

格鲁伊滕一家这个时期——四二年初至四三年初——的生活，据所有当事人一致公认，是“最阔绰的”。“丝毫不懂得‘常将有日思无日’，我用这句俗话形容，也许您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我今天对待莱尼虽不严格，但也不过于将就。他们一家，当时欧洲黑市上但凡能买到的东西，可以说应有尽有——后来，就闹出了这件可怕的事情，我至今还想不通，为什么胡贝特要那样做。他完全犯不着干那种事，实在犯不着干那种事啊。”（玛尔雅·范·多恩语）

这件事的暴露完全出于偶然，其起因纯粹是一桩荒谬绝伦的文学事件。格鲁伊滕后来声称，他是开了一家“地地道道的笔记簿公司”，也就是说，他把全部资料都装在一只皮夹子和一本笔记簿里，经常带在身边；公司通讯处则是他的市内办事处。这件事情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牵连任何人，连他的朋友主任会计霍伊泽也不知情。干这种事情完全是冒险，是下大赌注的赌博，但就格鲁伊滕来看，事实说明他根本不考虑赌注，而是为赌博而赌博。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直到今天，也许只有莱尼和他妻子“明白”，再有就是——明白的程度当然不同——洛特·霍伊泽，她大部分是明白的，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干这种“带自杀性的事，这可是地地道道的自杀——他拿钱干什么啊？他把成包、成堆、成捆的钞票白白送掉了！这真是荒唐，虚无主义——脱离实际，神经病”。

为了“作案”，格鲁伊滕特地在大约六十公里外的一个小城市里，开了一家“施莱姆父子公司”。他搞到了假证件，伪造签字的假定单（“空白单据他随时都可以弄到手，签字更是从来不当

一回事，早在一九二九年到三三年的经济危机年代，他甚至常常冒充他老婆的笔迹在汇票上签字，还说：‘她将来会明白的，为什么现在要让她紧张呢。’”老霍伊泽语）。

这场赌博、这件事前后历时八九个月，并以“死魂灵丑闻”闻名于整个建筑业。这件大丑闻就是一次“抽象的笔记簿游戏”（洛特·霍伊泽语）：有大量现款现购的，但通过黑市转手挪作他用的水泥，也有整班子支付工资但完全不存在的“外籍工人”，建筑师、工程主任、工头，甚至工地食堂、女厨子等等，统统都只存在于格鲁伊滕的笔记簿里；连进货单据、甚至这些单据上的签字也毫不缺少；银行户头、帐目往来，也一概齐全，“一桩完全正正当当，或者更恰当地说，看起来正正当当的事情”（朔尔斯多夫博士后来出席法庭作证时语）。

这位朔尔斯多夫虽然当时才三十一岁，就被所有——包括最严格的——兵役体格检查委员会一致认为：身体条件不适合当兵。他丝毫也没有弄虚作假（“尽管我也有胆量弄虚作假，但我用不着那样做”），诚然，他并无任何生理缺陷，只是由于他生来异常斯文，过分敏感和神经质，因此人们不想因为他而担风险——这可是不无道理的，试想，直到一九六五年，还有身为体格检查委员会成员的德国大夫，看到其实并不怎么文弱的德国小伙子，就“恨不得”大笔一挥，给他们开“斯大林格勒疗法”处方。为了“确保不出麻烦”，朔尔斯多夫的一个“有权有势”的老同学，给朔在那个小城市的财政局谋了一份差事。谁也料想不到，朔上任不久，很快就熟悉了这项素来陌生的工作，以致过了一年，竟成了“不仅不可缺少，而且根本无从另觅高明的干员”了

(朔的前上司、财政局长克赖普夫博士语，此人现已退休，在某前列腺疗养院休养)。克赖普夫还说："他虽然是语言学家，但不仅会算帐，甚至能洞察复杂的财会工作，抓住买卖交易中的漏洞——这可是与他的原有天分对不上号的。"克所说的"原有天分"，系指斯拉夫语言文学，这是朔直到今天仍然醉心研究的行当，特别是专攻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而且，"虽然有人许给我一大堆好处，请我去当翻译，我还是情愿在财政局干这一工作——我犯得着把军士们或者将军们的德语译成俄语吗？难道叫我牺牲自己心目中的神圣事业，用俄语去帮他们叽哩咕噜审讯逼供，充当急功近利的工具么？嘿，别想！"

朔尔斯多夫在一次并非有心的例行查帐工作中看到了"施莱姆父子公司"的表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也挑不出任何毛病，只是偶然翻了翻所附的工资表，一眼看去，他顿时"愣住了，告诉您，我可火了，我看到表上的那些名字不仅非常熟悉，而且一向就是我的命根子哪"。这里必须公平合理地补充一点：可能朔尔斯多夫是存心怀有几分报复的思想，倒并不是针对格鲁伊滕，而是针对整个建筑行业。最初他是由一位有势力的朋友推荐，到一家建筑公司当工资员的，不料别人发现了他有计数和数字天才，对他赞不绝口，请他另找门路高就，一连几处均是如此，原因很简单：没有任何一家建筑公司真正乐意让别人仔细研究——想不到一位语言学家竟有这种兴致——它的帐册。天真率直得几乎无法形容的朔尔斯多夫曾以为，这些公司真的想要他详细了解和掌握它们的各种手法，其实这正是它们所忌讳的。人们雇佣一个不通世故、疯疯癫癫的语言学家当工资员，原是"出于恻隐之心，给他一碗饭吃，不忍叫他去挨炮子"(弗拉克斯建筑公司老板弗拉克斯语，该公司今天仍生意兴隆)，可没料到"这小子

竟比财政局的哪一个官员都来得仔细。这对我们太危险了”。

朔尔斯多夫这个人，可以准确说出拉思科里尼柯夫[①]上大学时住的寝室面积为几点几平方，从宿舍到院子的楼梯有多少级——现在，他陡然一下看到，拉思科里尼柯夫竟然当了建筑工人，在丹麦某地给施莱姆父子公司搅拌水泥，在公司食堂里吃饭。接着，虽然尚未产生怀疑，但已经“沉不住气了”：他又看到工资表上有斯维德里盖洛夫、拉苏米欣，最后还发现有乞乞科夫[②]、梭巴开维支[③]——后来，大约在第二十三名又看到戈尔巴乔夫[④]，这时他脸色发白了；再往下看，更气得他浑身发抖：居然还有普希金、果戈理，连莱蒙托夫也成了工资少得可怜的战争奴隶；甚至连托尔斯泰的大名也未能幸免。这里我们想交代一下：这位朔博士丝毫不是关心所谓“德国军工企业的纯洁性”，这些“他是毫不在乎的”；他在财务工作上如此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完全只是（这是笔者的解释，他曾多次找朔长谈，不久前还谈过，也许以后还要多次谈）他过去研究俄罗斯文学的那种认真态度的变种；他就是用这样严格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去熟悉和爱上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全部人物，并给他们一一作注释的啊。“例如，我发现这份名单中没有契诃夫和他所有的主人公——，也没有屠格涅夫；我当时一看就知道这份名单是谁开的：除了我的大学同学亨格斯博士外，不会是旁人，此人吊儿郎当，自由散漫，可是对屠格涅夫崇拜得五体投地，并且是个契诃夫迷，虽然我认为这两个作家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而且说句老实话，我在上大学时就低估了契诃夫，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就朔尔斯多夫来看，

---

①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罪与罚》的主人公。

②③ 乞乞科夫与梭巴开维支，均系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人物。

④ 戈尔巴乔夫为苏联当代作家。

没有证据说明他有过告密的行为，包括这次事件："告密我可不干，虽然我最恨为人不正派，也瞧不起弄虚作假，可我没有密告任何人。我只是把当事人找来，叫他们说明情况，补造报表，改正错误，补交税款——由于我们这个部门由我经手的补交来的税款数我最多，因此我备受克赖普夫的青睐。别的不说，要说告密——我可知道，那等于是把人往死里送，即使是对骗子手和不正派的人，我也做不出这种事啊。您想想，偷几件绒线衫的人，抓住就被判处死罪。不过——话说回来，这一次我确实连肺也气炸了，真是岂有此理：莱蒙托夫被拉到丹麦，给德国建筑公司当奴隶！普希金、托尔斯泰、拉苏米欣和乞乞科夫——都在搅拌水泥，喝清水大麦汤。冈察洛夫[1]和他的奥勃洛摩夫一道，都变成了抡大锹干粗活的人！"

朔尔斯多夫不久即将以高级政务参议身分退休，他一直还在悉心钻研俄罗斯文学，包括俄罗斯现代文学，甚至还曾不失时机，赶在老格鲁伊滕去世之前，向他负荆请罪，并慨然答应教会他的外孙、莱尼的儿子莱夫掌握很棒的俄语，以弥补当年的过失。而且，如果说莱尼的房间里今天不时还饰有一束束鲜花（她一直还爱花，虽然她与花打过近二十七年的交道，就象别人与豌豆打交道一样），那也都是朔博士的馈赠！朔目前正在埋头研究间赫玛杜琳娜[2]的诗。"我当然没有去告密，我只是写了一封信给亨格斯，大意是：'请立即大驾光临，事情十万火急，非笔墨所能形容。'"他一再催促，想办法找亨格斯，一次，二次始终没有找到——"由于我自己也受到例行的检查，于是，由我经手追查的

[1] 冈察洛夫（1812—1891），俄国作家，奥勃洛摩夫是他的代表作同名长篇小说的主人公。

[2] 阿赫玛杜琳娜为苏联当代女诗人。

这个问题就包不住了，人们立即着手对‘施莱姆父子公司’进行调查。这样——这样，人就落进了老虎口啦。”

这个案子的主要证人就是朔尔斯多夫，由于老格鲁伊滕痛痛快快地认罪，审讯总共只进行了两天就结束了。他在法庭上面不改色，只是在叫他交代“名单炮制者”（“您想想，竟用上了‘名单炮制者’这种字眼”——朔语）时，他才着了慌：这个“炮制者”尽管朔尔斯多夫完全清楚是谁，但也不曾说出来。第二天开庭审讯，大约有三个钟头是由一个从柏林调来的精通斯拉夫语的专家，当庭鉴定格鲁伊滕的学识水平，因为他一口咬定，这些名字是自己从书上看来的——鉴定结果，他根本就没有看过任何一本俄国作品；“要说确实看过一本德文著作的话，那也不是《我的奋斗》（朔语）”，这样一来，问题就转到了“亨格斯的身上”——倒不是格鲁伊滕供出了他，而是朔尔斯多夫这时已找到了他。“他事实上以特派员的头衔为国防军工作，正在忙于从俄国俘虏嘴里搞军事情报。这个人作为契诃夫专家，本来是有机会名闻天下的。”

亨格斯确实是自动报到的，他身穿特务长制服出庭，“看上去不太合身，也难怪，他刚穿了四个星期嘛”（朔语）。他承认，格鲁伊滕曾经找他，要他提供一份俄国人名单；只是有一点他没有说：提供每一个名字他获得十马克的酬金。事前他同格鲁伊滕的辩护律师就这一点进行了商谈，向他说明：“这一点现在我是根本不能提的——懂吗？”因此，格鲁伊滕和他的律师都绝口不提这一令人难堪的细节。但亨、朔两人在法院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继续干仗时，前者向后者承认了这一点。原来朔尔斯多夫同亨格斯在法庭上干了一仗，怒冲冲地对着亨格斯吼道：“所有的人，一个个都被你出卖了，唯独没有你的屠格涅夫和你的契诃

夫。”这一场“俄罗斯纠纷”，最后被检察官打断。

这一插曲的教益不言自明：建筑公司老板要伪造工资表，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而具有文学修养的财政局职员则证明是有用处的，是于国家有好处的。

这件案子中只有一个人有罪：格鲁伊滕。由于他一切全都招认，但又不承认动机在于牟利，从而就使他的处境更加困难。他拒不交代作案的动机，当问到是否蓄意进行破坏活动时，他又矢口否认。事后，人们就此多次问及莱尼，她都是含含糊糊地回答两个字：“报复”（报复什么呢？——笔者）。只是靠“非常有势力的朋友出而，以他对德国军工建筑有过无可争辩的功劳为由”（老霍伊泽语）再三说项，打通关节，格鲁伊滕才免于一死，被判处无期徒刑，家财全部没收。莱尼先后两次被传出庭，但被证明无罪获释，霍伊泽、洛特以及格鲁伊滕的所有朋友同事，均一一过堂后释放。唯一未被没收的财产，就是莱尼出生而一向召租的那幢房子，而且完全是多亏那位“平时一向铁面无情的检察官”帮忙，他提出莱尼“是不幸的烈属，经查明无罪”，还喋喋不休地再次“搬出”阿洛伊斯的英雄事迹（洛特·霍伊泽语）。甚至莱尼参加过纳粹少女组织活动的经历，也被列为她思想可靠的证据。“法官先生，剥夺这个已失去一子一婿、病入膏肓的母亲（指格鲁伊滕太太）和这个作风正派而勇敢的德国少妇的财产是不合宜的，因为这份财产并非是被告带来的，而是被告妻子的嫁妆。”

格鲁伊滕太太未能经历这场丑闻。由于她卧床不起，无法出庭，法院派人临床进行了几次讯问。“这已经叫她够受了”

（范·多恩语），“她对离开这个尘世并不显得怎么难过——归根到底，她的确是一个正直勇敢的女人。她倒是很想和胡贝特最后再见上一面的，奈何已经办不到了。我们不声不响地将她安葬了，当然是按照教会的仪式。”

至此，莱尼已经二十一岁了。当然，她不再有汽车了。父亲去向暂时不明，她认为自己应该辞去公司的职务。所有这一切，对她究竟是没有触动，还是触动很大呢？这位开漂亮汽车的金发美女，在战争的第三年显得比较清闲，只是弹弹钢琴，给卧病在床的母亲朗诵爱尔兰童话故事，探望一个奄奄一息的修女；她，可以说是第二次守寡，但看不出有悲伤之情。现在，又失去了母亲，父亲也吃了官司，去处不明，她究竟怎么办呢？这个时期她讲过的原话，我们知道的不多。所有与她一起生活、接近她的人，对她的表现一致感到意外。洛特说，莱尼“不知什么原因显得心情轻松了”，范·多恩说“她似乎无挂无碍了”，老霍伊泽的说法则是——“她不知什么原因又象过去一样快快活活”。两种说法中谈到的“不知什么原因”，当然不能说明问题，但也多少有助于人们揣测推断莱尼之所以沉默寡言的隐衷。玛格丽特则是这样说的：“看不出她垂头丧气，相反我倒感到她继续或者说重又活跃起来了。对她来说，更糟糕的不是父亲的丑闻和母亲病故，而是修女拉埃尔的神秘消失。”有案可查的是：莱尼从此有服公役的义务了，在一位置身幕后、“门路很多”、但不愿披露姓名而笔者却心中有数的恩主的干预下——进入了一家花圈工场。

第五章

后世的人也许会问，何以时至一九四二年和四三年，连花圈也成了重要军事物资。答复是：丧葬大事也应一如既往，尽量办得光彩体面一点嘛。当然，要说这个时候花圈吃香，那它当然还赶不上香烟，但无疑是一种供不应求的热门货，而且还是进行心理战的重要物资。单是官方对花圈的需要量就大得惊人：献给空袭中一命呜呼的人，献给躺在军医院里断气的士兵，此外由于"当然有时也有寿终正寝的常规死者"（前花场老板，莱尼旧日的领导、现居家养老、靠地产为生的瓦尔特·佩尔策语）以及由于"经常有党、经济、军各界要人获得各种等级的国葬"。因此"从最简单的普通品种，直到完全用玫瑰花扎成的高级大花圈"（瓦尔特·佩尔策语）一概属于重要军事物资。这里不是对国家经办丧事进行充分评价的合适场合，但就科学的历史观点而言，事实上丧事的确多得难以胜计，公私各界需要的花圈供应奇紧，佩尔策的花圈工场一举厕身重要军工企业单位。随着战事的进展，也就是说打仗的时间越久（请特别注意进展和持久之间的关系），花圈当然也越来越供不应求。

倘使"有人"心怀成见，认为扎花圈这行手艺属于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那么，单是看在莱尼的分上，也有必要严加驳斥。试想，从头至尾扎成一批批各种规格的花圈多么不容易啊；扎花圈架子就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技巧，花圈式样不同，选用的枝叶也

就不一样；再说，单是扎架子用的树枝树叶就有九大类，扎图案用的就有二十四种，外加还有束把式、管套式（都属于插花的范畴）和罗马式之分，前者四十二种，后者二十九种，因此，花圈上用的枝叶总计有一百一十二种，虽然它们派不同的用场，有时也可以通用，但仍可粗分为五类不同用途——和一整套复杂的编扎技巧，尽管这种那种枝叶既可用于扎花圈图案，又可用于扎花束（这又可分为束把式和管套式两种），或用于扎罗马式花圈，但在这方面基本的一条规则就是：要懂得什么材料用在什么地方和怎样用法。试问那些将扎花圈看成是不足为奇的行当的先生们，懂得在什么情况下用赤枞树叶打底或作图案吗？懂得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要用侧柏、冰岛苔藓、假叶树、川黄连和铁杉吗？懂得需要几分功夫，才能使花圈上的枝叶扎得永远紧凑结实，不致脱落出来吗？这样一想，大家就会理解，过去一直坐惯写字间、工作轻松又无定规的莱尼，改行吃这碗饭决不是轻而易举的，掌握这门手艺并不容易，简直可以说她是进了一家工艺品厂哩。

说到这里，还得交代几句也许是多余的话：在一切都强调日耳曼化的时候，“罗马式花圈”曾经一度被人们嗤之以鼻；但是，待到轴心成立和墨索里尼相当不客气地表示反对诋毁罗马式花圈的时候，这方面的争论就中断了。此后，“罗马化”这个动词可以到处通用，直到四三年七月中旬意大利背盟倒戈，才终于被取缔（引用一名地位颇高的纳粹头目的评述：“在这个国家里，此后不复再言罗马，连编花圈和扎花也不得再提罗马式了”）——每个细心的读者一看就会明白，处在政局激化的多事之秋，扎花圈

也并不是毫无危险的行当。况且，罗马式花圈原是脱胎于罗马建筑正面的浮雕花冠，甚至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也有理由予以严格取缔：人们把它说成是“丧门星”的征兆，而所有其他的花圈形式则象征“兴隆昌盛”。瓦尔特·佩尔策是那个时候莱尼身世的重要见证人，尽管他名声不好，却能令人疑信参半地提出证明：他在四三年末四四年初，被手工业同业工会中的“眼红者和竞争者”告密，以“仍然崇尚罗马”的罪名记录在案而险遭“杀身之祸”（佩尔策语）。“他妈的，当时这有可能掉脑袋的呀”（佩尔策语）。不言而喻，一九四五年以后，每当人们对佩尔策声名狼藉的历史议论纷纷时，他就极力“不仅以这一点”证明自己“政治上受过迫害”，而且——多么遗憾，必须指出是靠莱尼帮忙——居然还得逞了。“因为那确实是她——莱尼，我指普法伊费尔——一手发明的花圈：用石楠扎成的花圈，又挺括，又漂亮，看上去真象抛了一层退光漆，而且——我可以对您说——受到了公众的欢迎。这与崇尚罗马根本无关，是普法伊费尔的创造发明，可这几几乎要了我的命，因为有人说那是仿照罗马式翻的花样。”

如今佩尔策已经年届古稀，居家养老，靠自己的不动产为生，在事过二十六年之后的今天，依然给人以心有余悸的印象，并且不得不暂停抽他的雪茄，因为他看来咳嗽又要发作了。“想当年我为她出力，把一切都包起来，的确性命交关，比崇尚罗马的嫌疑还要危险。”

曾经长时期与莱尼亲密共事，每天在一起干活的十个人中，至今还有五个可以设法找到，其中包括佩尔策本人和他的园艺师傅格龙奇。如果把佩尔策和格龙奇两人名副其实地称之为莱尼的上级，那么，和她地位大致相等一道干活的其余八个人中，迄今仍有三个在世。

佩尔策住的房子，虽然他自己只承认是一所平房，但人们却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华丽的别墅（他倒没有把“别墅”念成“瞥墅”）。这是一栋奶黄色的缸砖建筑，外面看上去象是一栋平房（地下室很宽敞，有一个豪华的酒吧，一间布置宛如花圈陈列馆的活动室，一套供客人居住的套间和一个应有尽有的酒窖）；除了奶黄色（缸砖）外，所有百页窗、房门、汽车间的门、窗棂子，几乎一概都是黑色，无怪乎叫人感到仿佛是到了殡仪馆。佩尔策和一个女人就住在这样一栋房子里，那个女人名埃娃，娘家姓普鲁姆特尔，年纪约有六十五六，显得相当忧郁，几经辛酸苦痛，她那原来很漂亮的脸庞，已经变得很难看了。

阿尔贝特·格龙奇现年八十岁，一直还蛰居在“我那个实际上位于陵园正中央的壳壳里”（格龙奇自述），那是一个两间半房间大小的瓦房，出门就可以钻进他的两间花房，非常方便。当日陵园扩建时，格龙奇没有象佩尔策那样趁机捞便宜（还得补充一句，他也不想捞便宜），而是死死保住“我当年送给他的花房地皮不放，那是我干的蠢事”（佩尔策语）。“的确，一旦他什么时候完……，什么时候阿腿……，嘿，我是说什么时候他去世，园林和陵园管理所就会松一口气。”

陵园不仅吞掉了佩记花场的好几公顷土地，而且早已将其他花场和石匠作坊并为已有了。格龙奇就住在这所陵园的正中央，过着差不多是自给自足的生活：享受残废保险补助金自不待言（“我曾一直给他付保险费。”佩尔策语。），住房不要钱，自己种烟叶和蔬菜，加上他一向是素食主义者，食品供应问题不大；穿衣服几乎不存在问题——他至今还在穿老格鲁伊滕一九三七年

定做的一条裤子，那是莱尼一九四四年送给他的。据他自己说，他一门心思经营"季节性的盆花买卖"（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天供应绣球花，母亲节[1]卖仙客来和勿忘草，圣诞节出售小盆枞树，上面饰有飘带和蜡烛，专供扫墓的顾客购买——"他们扫墓时都供奉一些什么东西，简直不可思议"）。

据笔者所获得的印象，如果园林管理所真正寄希望于格龙奇归天，那还得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守着住房和花房，杜门不出的人"（市园林工人语），而是在"铃声一响关门之后，把这所扩建了的大陵园，当作是私人花园，而这所陵园关门的时间通常都很早。我纵情散步，到处溜达，找个长凳坐下来抽一袋烟。高兴时，我也会找一座无人祭扫或无主的坟墓，给它整理整理，添上一点苔藓或枞树枝，有时还摆上一朵鲜花。而且说实话，除了几个偷盗有色金属的梁上君子外，我还从未碰到过什么人。当然，间或也曾遇到过那么几个神经病，他们不相信一个人死了就完了，偏要趁夜阑人静之际，从墙头上翻进来，守在坟头号哭，呼天叫地——不过这种情况我在五十年中只遇见过两三次——，遇到这种情况，我自然赶紧回避。其次是每十年左右，也许会遇上一对那种胆大包天和百无禁忌的情侣，他们知道，人世间再也找不到一角能如此安静幽会的好地方——遇上这种情况，我当然也赶紧回避。现在，我已不知不觉地完全忘记了在陵园之外还有天地了——不过我告诉您，这儿的冬天也很美，每当下雪的时候，我穿得暖和和的，足登毡靴，嘴含烟斗，外出踏雪夜游——此时四周静悄悄的，到处都笼罩着一片宁静的气氛。自然，住在这个地方有一件

---

[1] 德国习俗以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

事情麻烦，那就是找女朋友，每当我想把她们带进我的小窝窝时，没有一个肯进去：告诉您，简直没办法——越是没有办法，她们越是淫荡，即使有钱也无济于事。”

话题一转到莱尼，格龙奇显得有些尴尬。“是啊，当然罗，普法伊费尔——我记得她！我怎么会忘记她呢！莱尼嘛，不用说；所有男人都追求过她，可以说个个都追求过她，包括小瓦尔特（指现年七十岁的佩尔策。——笔者）这个滑头；不过谁也不敢冒昧行事。她是不好接近的，我倒不是说她一本正经，我年龄最大——那时我已五十五岁——，就更挂不上号了。至于其他几个，大概只有那个克雷姆普——我们叫他‘路倒尸黑里贝特’——曾经试过，结果叫她冷冰冰给碰了一鼻子灰，才终于死心。至于小瓦尔特在她身上动了哪些脑筋，我说不上——但他肯定没有得到她的青睐。除开这几个以外，其余的都是妇女，不用说这种情况是战争造成的，这些妇女有拥护和反对两派，可说是平分秋色——不是针对莱尼，而是针对后来大家才知道就是她意中人的那个俄国佬而言。您想，整个事情前前后后几乎经历了一年半时间，而我们中间谁也没发现什么动静，他们两个乎法确实高明，小心谨慎。不过那样搞也是够危险的：两个脑袋，一个是必掉无疑，另一个也等于提在手里。一想到这姑娘冒的风险，我他妈还感到十分后怕，浑身起鸡皮疙瘩。您问技术吗？她的技术水平吗？嗯，也许我有偏见，因为我喜欢她，真喜欢她，有时候，就象一个没有女儿想要女儿的人那样喜欢她，或者——不管怎么说我到底比她大三十三岁呀——又象喜欢一个永远求之不得的恋人一样。喏，她简直是天生心灵手巧——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当时我们只有两个科班出身的园艺师傅，如果您把瓦尔特也算上，则有三个；不过瓦尔特脑子里只有他的帐簿和他的

钱。另外两个是：年轻时参加过青年运动、有学问的赫尔特霍内，她是女子中学毕业，念过大学，后来才改学园艺，是个富于浪漫色彩的人，对土壤和手工活之类想入非非——不过她还有两下子；再一个就是我。除此以外，没有一个科班出身，霍伊特、克雷姆普、舍尔夫、克雷默尔、万夫特和策芬，都已是不怎么年轻漂亮的娘们，反正没有一个能使你主动地想到同她钻进泥炭灰和材料堆中去打滚。是啊，普法伊费尔进场才干了两天，我就看出，让她扎花圈架子是大材小用，那是粗人干的力气活。花圈架子组有霍伊特、舍尔夫和克雷姆普三个，就交给他们一张清单、一堆材料，上面载明花圈尺寸大小；所需枝叶材料根据货源供应情况有所变化，到后来，几乎只剩下栎树、山毛榉和松树叶子了；至于大小，则多半为普通尺寸。间或也有用于隆重葬礼的品种，我们规定，以缩写字母 B_1、B_2、B_3 作为供应一等要员、二等要员、三等要员花圈的货号；我们的内部帐目也相应采用 H_1、H_2、H_3，以表示一级英雄、二级英雄、三级英雄。后来这事传开来，路倒尸克雷姆普大闹了一场，他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感到也是对他自己的大不敬，因为他是一个二级英雄：锯掉了一条大腿，得过几枚勋章和奖章。一句话，我一眼就看出，莱尼摆在花圈架子组不恰当，就将她调到花饰组，让她和克雷默尔、万夫特一道干活。告诉您，她可真是个天生的花饰大师，要是您高兴，也可叫她插花能手。您真该亲眼见识见识她与月桂樱叶和杜鹃花打交道的本领，即使是最贵重的材料，也可以放心大胆交给她：保险万无一失，丝毫也不会糟蹋——多少人一生一世都学不会的事，她一学就会；装饰花圈的要领，应当是着重突出架子左上方四分之一的部位，这样整个花圈看上去就清新悦目，几乎可以说显得乐观兴旺；如果您着重装饰右边，就会给人以悲观衰败的印象。此外，

她也决不会把几何学图案和花草树木的形状混在一起，那是绝对不会的。她是个毫不含糊的人，要么扎成几何学图案，要么扎成树叶花草的天然形状，而这往往在一个花圈还未扎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了。至于说到我不得不一再坚决纠正她的一点，是她偏爱扎纯几何学图案的花样，平行四边形、三角形；而且有一次做一个一等要员花圈时，她确实象变戏法似的，手指动动，就用延命菊巧妙地扎了一只六角星，当然纯粹是出于玩弄几何图案，肯定不是有意要扎这种东西①，而且她大概直到今天还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那么紧张，对她十分恼火：您想想，要是那只花圈未经检查上了柩车，多危险啊。况且，人们比较喜欢的是仿照花草树木天然形状编出的花样，而这一套莱尼是能够信手拈来的：在花圈上扎个小篮儿呀，甚至编只小鸟儿呀——尽管已不全是花草树木，但也是生物嘛——，要是扎一等要员花圈时刚好赶上玫瑰花上市，小瓦尔特也送来大批玫瑰，间或甚至是含苞待放的名贵品种；这时，莱尼就变成了巧夺天工的艺术家了：她会扎出整幅整幅的风俗画来。老实说，那么好看的风俗画——一个小巧的公园，还有天鹅在湖中戏水哩——，只用一次就丢掉，多可惜啊。嗨，要是发什么扎花圈奖的话，所有的奖保险都会由她一个人夺得。而——反正对小瓦尔特来说——最要紧的一条就是：她用少量材料装饰出来的花圈，比有的人花上许多材料做出来的花圈要漂亮得多。她还懂得省工省料。最后，做好的花圈经过赫尔特霍内和策芬两人组成的收货组，送到我这里——所有花圈出场前最后都要经过我的手。赫尔特霍内负责检查架子和花饰，必要时加以修修补补；策芬大家叫她飘带大娘，专管

① 由两个等边三角形叠套成六角星。象征犹太人。

装上市里供应我们的飘带，——做这项工作当然得非常认真仔细，以免张冠李戴。例如，顾客订购花圈讲好是写‘汉斯千古，亨里埃特敬挽’，取花圈时飘带上写的却是‘献给我永远难忘的奥托，你的埃米莉’，如此等等——由于花圈订货多，弄不好就可能出毛病。最后用一辆破三轮卡车把花圈送往教堂、军医院、国防军后勤机关、党务部门或殡仪馆——这份差事，小瓦尔特是从来不肯让别人代劳的，因为借此机会他可以美美地到外面逛逛，捞点外快，顺便休息休息。”

莱尼从来没有在别人跟前埋怨过自己的工作；洛特、范·多恩、玛格丽特也好，还是老霍伊泽、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也好，都不曾听到她诉过苦，因此只能说明这门活计的确使她开心。看来她唯一的苦恼，是她的两只手和十个指头相当劳累；她父母的手套存货都已用罄，后来她就找所有亲戚讨“旧手套”。

可能她在暗中思念去世的母亲，惦记父亲，艾哈德和海因里希可能也是她经常想念的对象，也许甚至还想念死去的阿洛伊斯。说到这一年，人们一致反映她“非常和气与文静”。

就连佩尔策也说她“沉默寡言，真是三拳打不出个闷屁！不过讨人喜欢，又和气又讨人喜欢，她是我这个时期最得力的帮手，如果不算格龙奇和赫尔特霍内的话；格龙奇年纪已经大了，只是送送货，赫尔特霍内又为人过于古板，学究气十足，有时反而给你出馊主意。普法伊费尔不仅脑子灵活，而且植物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她本能地知道，用仙客来扎花圈当然可以而且必须不同于带硬梗的玫瑰或牡丹。不瞒您说，每当遇到用红玫瑰扎花圈时，就等于我在财政上蒙受一笔损失——因为红玫瑰

可以偷出去，拿到黑市上去卖高价；那些对女人大献殷勤的男人，都把玫瑰花当成唯一能送给情人的礼物——特别是在青年军官带着女朋友开房间的那些饭店里，玫瑰花尤其吃香。那里的看门人常打电话给我，有时他们不光是给钱，而且拿热门货向我换一把长把玫瑰。拿咖啡、香烟、黄油、甚至衣料——我是指毛料——换，按说那年头也实在是作孽，几乎所有的花都孝敬了死人，活人几乎一点也没有份儿。”

就在佩尔策为玫瑰花而担心的这个时期，莱尼几乎成了住房调整工作的受害者：当局认为，一栋大小七间外带厨房浴室的住宅，总共住七口人（老霍伊泽夫妇、洛特带上库特和维尔纳、莱尼、范·多恩）未免太少了。截至这一时期为止，该市已经有过五百五十多次空袭警报，挨过一百三十次空袭。结果霍伊泽一家大小五口获准居住三大间，莱尼和玛尔雅·范·多恩“想尽办法打通关节才获准各人保留一间”（玛·范·多恩语）。可以设想，这是多亏那位不希望披露姓名的地方当局大人物出的力，尽管他很谦虚，不承认是他“帮了忙”。这样，还剩下两间房间可以“调整”。“后来，一枚烈性炸弹将使人害怕的普法伊费尔这一家撵出了他们的兔子窝（洛特·霍伊泽语），死乞活赖硬要‘同我们的好媳妇一起住’。尝到了炸弹的滋味，就象他的那条瘸腿一样，使老普法伊费尔感到乐滋滋的。他竟然恬不知耻地说：‘现在我也将自己正正派派挣得的一份小康家业献给祖国了’（洛特·霍伊泽语）。当然，我们大家全都吓了一跳，但不久玛格丽特就从她的大亨（??——笔者）处了解到，老普法伊费尔即将和他教的那班学生一起被疏散下乡，于是我们就让步了，确实他们来住了三个星期，然后，尽管他一跛一拐，但还是不得不下乡去了，带走了讨厌的老太婆，只有讨人喜欢的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留下

来，住在我们一起。他已自愿报名入伍，只等命令下来就走，当时正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刚结束不久”(洛特·霍伊泽语)。

笔者在了解有关莱尼在花场工作期间的主要对头的可靠材料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他翻遍了户口簿和部队官兵花名册等材料，结果一无所获。这时，他才想到还是去找阵亡将士陵墓管理所，经查问后得到了如下答复：查黑里贝特·克雷姆普，二十五岁，一九四五年三月初于来因河附近阵亡，埋在法兰克福—科隆公路附近。了解了克雷姆普葬身之地，再去找死者父母的住址，就不是那么困难了，尽管与老两口的谈话极其令人不快。他们证实，死者曾在佩记花场工作过，在那里，他“也象在自己生活和工作过的所有其他地方一样，为人规规矩矩，清清白白。后来当祖国情况危急时，他再也坐不住了，不顾自己只剩一条腿，于三月中旬自愿报名加入国民冲锋队，并按照他生前的夙愿，光荣喋血沙场。”看来，老克雷姆普夫妇认为儿子之死完全正常，希望听到笔者能讲上几句赞扬的话，讵料笔者碍难启口，而且在看到他们出示的烈士遗照时，反应也不很热情，因此他认为最好是赶快——就象造访施魏格尔特太太那次一样——告辞开路。照片上是一个不讨人(笔者)欢喜的人：大嘴巴，低额头，一头浓而卷曲的金发和圆圆的眼睛。

为了搞到三位还在人世的了解莱尼战时花场工作情况的女证人的地址，只需直接找户籍管理所查问，付一笔相当便宜的手续费，就得到了满足。第一位是当时负责花圈收货组的莉安

内·赫尔特霍内太太，现年七十岁，拥有四爿花店的女老板。她的寓所位于几乎还带有农村风光的郊区，那是一栋非常漂亮的小平房，四个房间，外带厨房、前厅和两间浴室，里里外外，色调和谐，式样悦目，布置陈设挑不出任何缺点。由于她的藏书可说汗牛充栋，她至少在室内布置上可以省不少心。她沉着冷静，但不失和气，一头银发梳得齐齐整整。佩尔策曾经出示过一张一九四四年花场职工节日摄影留念照，恐怕谁也认不出，照片上那个围着头巾、板起面孔、略显矮胖的小个子女人，就是这位端庄稳重地出现在笔者面前的温柔的老来俏。她的耳环是用细银丝编的，样子象小篮子，里面各有一颗圆滚滚的活动珊瑚球儿，再加上两只一直还炯炯有神的褐色眼珠儿不断地转动，使得她的整个脑袋恰如一只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耳环在跳动，耳环里的珊瑚球在跳动，脑袋在转动，两只眼珠在跳动。她的打扮，她脖子和手腕子上微皱的皮肤看来保养得不错，但这决不是赫太太有意隐瞒年龄。有香茗和花色小点心招待，还有盛在一只银匣（勉强可容八支）里的香烟，桌上燃着一支蜡烛，火柴放在一个磁套里，磁套上有一幅手绘黄道十二宫星象图，作碧蓝色，只有正中央的人马座标成粉红色，衬托得十分显眼；不用说，赫太太无疑是应人马宫临凡了。窗帘是深玫瑰色的，一套淡褐色的核桃木家具，配上白色的地毯。陈列着书籍的壁橱的墙头挂着手工精细、着色的来因风光铜版画，每幅大小至多四乘六公分，精巧细致，晶莹发亮，共计六幅或七幅（笔者在此不能保证极端准确）：临博伊尔瞰波恩，从多伊茨看科隆，由来因河右岸乌尔登巴赫和鲍姆贝格之间眺望仓斯，上温特，博帕尔德，雷斯；此外笔者回想起曾看到过桑银，只是这个地方在画家的笔下移到了更加靠近来面河的地方，与实际地理位置有些出入——所以说，一定

是有七幅。"不错，不错"，赫太太一边说，一边把银质烟匣递给笔者。这时，他感到似乎女主人露出了但愿他敬谢不敏的神色（他不得不使她失望，并且也的确发觉她略微蹙了蹙额）。"您看对了，不过这些画都是来因河左岸风光（她的细致入微的理解、感觉和解释能力，确实大大超过笔者！）。我从前是分离主义者，现在还是分离主义者，而且公开承认，毫不隐瞒。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在埃吉丁贝格①负伤，我不是参加光荣派，而是参加不光荣派，但我始终认为自己一派是光荣的。我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个地方不属于普鲁士，从来不曾属于普鲁士，也不属于任何一个由普鲁士建立的所谓国家。我今天仍然是分离主义者，倒不是主张建立法国的来因省，是主张建立德意志的来因省。以来因河作为来因省的疆界，当然包括阿尔萨斯和洛林，与当然是共和政体的而不是沙文主义的法国为邻。唔，我在二三年逃往法国，在法国治好伤，当时被迫改名换姓，二四年带着假证件回到德国。后来，到了三三年，我还是用赫尔特霍内这个名字，没有恢复原名埃莉·马克思，这样做也更好些，因为我不想再次流亡国外。您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爱这个地方，爱这个地方的人民；他们只不过是生不逢时罢了。当然，您也许会给我大谈黑格尔的哲理，您只管谈好了（笔者根本未作此想！——笔者），也许您会说，根本不可能是生不逢时。三三年后，我感到最好是放弃我那间业务不错的园林建筑师事务所，我干脆让事务所破产关门，这是最简单最不引人注目的办法，虽然也费了很大的力气，因为我的事务所业务一直很好。之后，又遇上了麻烦危险的家世证明问题，不过，我在法国当然一直还有朋友，就请他们帮忙

---

① 埃吉丁贝格，波恩东南，来因河右岸小地名。

在那边搞了一份。原来，这个莉安内·赫尔特霍内本是个妓女，二四年死于巴黎一家妓院，他们就将死者申报为萨尔路易[1]的埃莉·马克思。我请巴黎一位在大使馆有熟人的律师伪造了家世证明，尽管做得天衣无缝，有一天，我还是收到奥斯纳布吕克[2]附近乡下寄来的一封信，一个署名艾哈德·赫尔特霍内的人给他的莉安内写道：'一切事情都不怪你，见信后盼即速回乡，我一定和你好好过日子'。我们又等了一些时候，直到家世证明全都办妥，才让这个莉安内·赫尔特霍内死在巴黎，实际上却以园艺师傅身分在德国继续活下去。事情果然成功了，相当保险，但还谈不上百分之百保险，因此，我感到万全之计，莫过于投靠到佩尔策这样一个纳粹分子手下安身。"

这儿的茶又香又浓，比在修女处喝的要浓三倍，还有美味可口的花色点心，只是笔者对烟匣伸手过于频繁，现在已经是第三次了，尽管大不过一颗核桃壳的烟灰缸，可容量却已接近饱和，放不下第三支烟的烟灰和烟头了。赫尔特霍内太太无疑为人聪明，生活有节制，但由于笔者没有反对、也不想反对她的分离主义观点，所以，虽然他抽烟喝茶（已经三杯了！）漫无节制，看来她的好感并未稍减。

"您可以想象，我当时多么紧张，虽然客观上讲或多或少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个莉安内的亲属从未找上门来，但是，在佩尔策那里有可能遭到严格的审查，人事审查，外加还有那个该死的纳粹克雷姆普、万夫特和德意志国家党[3]的策芬，后者和我同在

---

① 萨尔路易，萨尔南部城市名。

② 奥斯纳布吕克，德国西北部城市名。

③ 全称为德意志国家人民党，一九一八年建立的保皇党，一九二八年转而支持法西斯纳粹，为希特勒上台效劳。

一张台子上干活。佩尔策这个人向来鼻子尖，准是估计到了，发现我心里有冷病，因为当他开始明目张胆地在花圈上大肆弄虚作假时，我就担心，生怕自己的问题没有出，倒是受他的牵连陷入危险，因此我告诉他想辞职不干。他一听，斜愣着眼睛瞅着我说：'你想不干？您办得到吗？'我可以肯定，他并未抓到什么具体把柄，但嗅出了一点味儿——我慌了，不再提辞职了。他当然发现我真的慌了，知道不会事出无因，而且每次提到我的名字时，他口气都格外来得重，似乎这个名字是冒名顶替的。此外，他当然也知道克雷默尔的男人是共产党，死在集中营里，他还打听到有关普法伊费尔的事情，掌握了许多他自己和我们大家本来都不知道的情况。至于普法伊费尔这个小妞和那个博里斯·利沃维奇情投意合，是相当明显和够危险的，不过我不相信她会有胆量干这种事。除开这些以外，还有一点也证明佩尔策有眼光：四五年他很快就懂得英语管花叫'flower'；只有花圈没有吃准，他把花圈叫成了'circle'，有一段时间，美国人一直只当他说的是秘密帮会①哩。"

谈到这里，略为停顿了一下。这时笔者好不容易，才将第三支香烟的烟头塞进那只银质核桃壳，同时，深表关切地指出，在她那按说并无美中不足之处的摆书籍的壁橱中，普鲁斯特②、司汤达③、托尔斯泰以及卡夫卡等著作的封面，显得都很旧了，倒不是脏，也没有油污汗渍，只是旧了，就象一件人们经常换洗缝补的心爱的衣服一样。

---

① 德语花圈为Kranz，该词也有圈圈、环之意，在这一释义上相当于英语circle，但后者另有党派、帮会、集团（圈子）之意。

②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

③ 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法国小说家，《红与黑》的作者。

"是呀，是呀，我喜欢看书，这些书已经看过好多遍了，普鲁斯特的作品我在二九年就看过本杰明[1]的译本——现在还是谈莱尼吧：她当然是个漂亮的姑娘，尽管她现在年近半百了，我还是叫她姑娘；只是有一点，她对别人不怎么热乎，战争期间也好，战后也好，都不怎么热乎；倒不是说她冷若冰霜，而是说文静和沉默寡言；为人和气，但沉默寡言，性子执拗。我当时是头一个得到'女士'这一雅号的人，莱尼来了以后，大家就叫我们为'两位女士'，但不出半年，人们不再叫她'女士'了，又变成只有我这一个'女士'了。真怪——我后来才弄明白为什么莱尼那么奇特，几乎叫人捉摸不透——她是无产阶级，是的，我始终认为，她对待金钱，对待时势之类的态度，都象无产阶级。按说她本来是可以混出点名堂来的，但她无意于此；这既不是她缺乏责任感，也不是没有能力担当重任，甚至还有足够的事实证明她办事胸有成竹，她和博里斯·利沃维奇相好差不多有一年半之久，我们中间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想到会有这种事情，他们俩或者他都没有被别人抓住过。您不知道，万夫特、舍尔夫和那个路倒尸克雷姆普一直是瞪大眼睛盯住他们两个不放的，以致有时我捏着一把汗，我想，如果他们俩真要搞出什么花样来，那就唯有靠上帝保佑了。只是在开始的时候是有危险的，他们——由于实际原因——根本不可能搞什么花样，我有时自然会怀疑她是否——如果她……——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因为她相当天真。我已讲过：一不懂得该如何挣钱，二不想想自己有多大家底。我们都是靠各人的工资和如班加点之类的补贴过活，每星期可挣二十五至四十个马克；后来，佩尔策又发给我们所谓'窍门奖'，每做

[1] 本杰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德国文学评论家。

一个花圈额外补贴二十芬尼，由大家均分，这样每人一个星期也可以摊到几个马克。但是莱尼呢，单单喝咖啡，一个星期至少就得花掉两个星期的工资，就算她还有几个房租收入吧，也不能这样花钱啊。有时我心里想，而且今天还在想：这个姑娘真是少见，真说不准究竟是城府很深呢，还是浑浑噩噩。尽管听起来有矛盾，我还是认为她是两者兼而有之，既是城府很深，又是浑浑噩噩。不过有一点，她从来不是水性杨花的女人，不是那种女人，不是的。

"我在四五年没有得到赔偿金，因为无法证明我当年转入地下时的身分究竟是分离主义者还是犹太人。转入地下的分离主义者自然得不到赔偿，说是犹太人吧，您也无法证明当时您是有意破产，借以避免别人注意。我所得到的，只有一张经营花场和花店的执照，而且是靠法国军队里的一位朋友帮忙才弄到的。四五年年底，我就将当时带着孩子、手头相当拮据的莱尼请到我的花店来工作。至七〇年为止，她在我的店里待了二个四年。曾经有过不止十次或二个次，而是三十多次，我让她去负责经管一个分店，还提出要送给她一部分股金；照理她完全可以穿得漂漂亮亮，坐在前面店堂里接待顾客，可她情愿系上围裙，蹲在店堂后面冷冰冰的小房间里编花圈和扎花束。没有向上爬的欲望，不想高升。有时我想她是个幻想家，神经有点不正常，但非常叫人喜欢。而且还相当娇气，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无产阶级的习气：您知道，她自己是个工人，每周工资顶多五个马克，可即使在战争期间，她也把她过去娘家的女佣人留在身边——您猜她每天叫女佣人烘什么东西给她吃啊？几只新鲜的小面包，新鲜得滴油。不瞒您说，有时候我一看见就口水直淌，不顾'女士'之尊，竟打算脱口而出：'乖乖，让我咬一口吧，求求你让我咬一口吧'。

可以肯定，她会让我咬的，只要我开口。同样，既然她现在境况不佳，她也完全可以尽管放心找我借钱。不过，除开这些以外，您知道她还有什么特点吗？骄傲。象她那种骄傲，简直只有童话故事中的公主才比得上。至于说到她扎花圈的本领，人们的夸奖未免过火了一些；当然，她心灵手巧，但按照我的口味，她装饰的花圈金银丝用料太多，过于精雕细刻，象刺绣，而不象好看的粗织。她可以当一名了不起的金银首饰匠，但与鲜花打交道，也许您料想不到，有时倒需要粗糙和泼辣，这是她从来也做不到的，她装饰花圈时不拘一格，但缺乏果断。不过考虑到她完全是半路出家，学得这么快就已经是了不起了，本身就很了不起。”

由于茶壶不再端起，银烟盒也再未打开递上来，笔者感到（事实证明判断正确）谈话已告结束。他感到赫尔特霍内太太对凑成莱尼的完整形象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赫太太还让他参观了她的小画室。近来她在画室中又致力于园林建筑艺术的研究，给未来的城市设计了她称之为“塞密拉密斯”① 的“空中花园”。不过在笔者看来，就一位如此崇拜普鲁斯特的读者而言，这样一个名词是想象力比较贫乏的标志。告别时，笔者感到此次访问已经结束，但今后仍有机会再次登门，因为尽管赫太太的脸上露出了倦容，但仍流露出十分和蔼可亲的神态。

访问玛尔加·万夫特和埃尔泽·克雷默尔两位女士时，笔

① 塞密拉密斯(Semiramis)，相传为公元前亚述古国女王，宫中采用多层立体布置造有空中花园（亦译“悬苑”），属新巴比伦文化，希腊人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者发现部分情况相同：她们俩都享受残废保险补助金，一个七十岁，一个六十九岁，都已白发苍苍；住的都是一间半大小的房租低廉的公寓房子，烧炉子取暖，家具还是五十年代初期的产品；两位都给人以"勉强糊口"和老态龙钟的印象。可是——这儿开始了两人的不同之处——，一个（万夫特）养的是肉头鹦鹉，一个（克雷默尔）养的是虎皮鹦鹉。进一步细心观察，则不同之处更为明显，万夫特一本正经，几乎是道貌岸然，嘴巴很小，说起话来好象是在连连不停地吐樱桃核，由于嘴巴小，因而显得异常吃力；她表示不愿"多谈这个小滑头的事情。我当时明明知道，明明料到，但没有追根究底，弄个水落石出，直到今天我还懊悔莫及，恨不得打自己的耳光。我真想看到她剃光头示众才高兴哩，抽一顿鞭子，对她也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的子弟在前方打仗，她自己的男人也阵亡了，她却同一个俄国佬相好。再说，她的老子又是大奸商——这样一个人，才干了三个月就当上花饰组的头头，把我的位置挤掉。有什么好讲的呢，不过是个破鞋罢了，真不要脸，总是凭她的姿色，弄得男人们个个疯疯癫癫；格龙奇就象只馋嘴公猫围着她转，佩尔策则把她当成自己发泄兽欲的另一个预备对象；就连好端端一个工人，一向规规矩矩的克雷姆普，也被她弄得神魂颠倒，变得叫人十分讨厌。她还要装腔作势，好象是个太太似的，实际上不过是个破落的暴发户。嘿，在她没来以前，场显工作多么有条有理。从她来了起，总是有一种紧张空气，但从来也没有爆发过——要是打一架倒也不错，可以消除紧张空气。她要弄在女子寄宿学校学来的那套逢迎拍马的拙劣手法，个个都中了她的圈套。不，自从她来了以后，我是孤立的，相当孤立。她那套请客喝咖啡的把戏，哼，我才不上钩哩，我们管她这一手叫'没安好心'，完全是一个臭女人、暗娼、十足的破烂货。"

当然，万夫特谈起来不如笔者笔下写的这样流畅，而是象挤牙膏似的，一段一段，一点一点，从她的嘴巴里挤出来，她不愿再多谈，可是还是再谈了，说老格龙奇是“不走桃花运的淫棍或色鬼，随您怎么叫都可以”，佩尔策则是“我见到过的最坏的无赖和投机分子，我在党内帮他讲过话，保过他。我作为党信得过的人（指秘密警察吗？——笔者），人们的确常常征求我的意见。可是战后呢？连抚恤金也给我取消了，说什么我男人不是在战争中阵亡，而是死于三二年至三三年期间的街头格斗。瓦尔特·佩尔策先生分明和我男人一样干过冲锋队，结果却啥事也没有，太太平平。靠这个小娼妇和犹太女士两人帮忙，居然给他蒙混过关，相反我倒被关进去，蹲在里面。够了，您别再提这些人了。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天理良心啊，我早已看透了。”

就在同一天，笔者走访了克雷默尔太太。有关莱尼的情况，她谈得不多，只说莱尼是个“讨人喜欢的可怜虫——既讨人喜欢，又可怜和糊里糊涂。而这个俄国佬啊，老实说我当时就非常怀疑，今天也仍然怀疑，他要不是秘密警察的坐探才怪哩。会讲德文，会献殷勤，为什么偏偏派他到花场来，而不到抢险队去清除炸弹和抢修铁路呢？不错，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但我不敢与他多谈话，至少不谈和工作无关的事。”

克雷默尔太太是个已完全失去当年风韵的金发女人，曾经无疑是蓝湛湛的眼睛，现在几乎毫无光泽了；脸上的肌肉已因失去弹性而往下坠，相貌不凶，只是有些忧郁，愁眉不展，但说不上是悲伤；她端来了咖啡，不过自己一杯都没有喝。她的嘴巴很大，说话轻松流畅，语气有些平淡，不太注意抑扬顿挫。她拿出一片

纸头卷烟，其手指之灵巧，不仅使人感到惊讶，而且妙不可言地反映出她的动作无比熟练：一团有些润湿的黄澄澄的烟丝，在她手中飞快地转动着，一眨眼就好了，根本不必动剪刀就卷得齐齐整整。"是啊，我很早就学会了这个活儿，也许是我一生中头一件学会的事，一九一六年给我在炮台上的父亲卷，后来给我坐牢的丈夫卷，接着我自己也坐了半年牢；在失业时期当然就不用说了，随后又是在战争期间卷——卷烟这门手艺我始终没有丢掉"。说到这里，她给自己点燃了一支，这时，突然可以使人感觉到，嘴边叼着刚卷好的香烟的她，一度是青春年少和美丽动人的。不用说她也请客人抽一支，没有很多的做作，只是将一支香烟放在桌子上，朝客人跟前一推，用手指了指。"不，不，我再也不想干了，不想干了。我二九年就不想干了；我本来就精力不济，现在更不行了。战争时期，我身边只有一个儿子埃里希，我一直只是巴望战争能赶在他成年以前结束；没想到战争还未结束，他就长大了，学钳工还未满师，他们就把他拉走了。孩子文静老实，不声不响。就在他临走前，我生平头一次给他谈了政治，冒着险，对他说：'跑过去，一上前线就跑。''跑过去？'他象平时那样地皱着眉头问，于是我给他解释跑过去是什么意思。他两只眼珠骨都骨都朝我直转，我心里发毛了，担心他什么时候会说漏嘴。后来，他即使想跑，大概也来不及了。四四年十二月，他们将他送到比利时边境去修工事，而我直到四五年年底才得知他死了。孩子才十七岁啊，孩子一向态度严肃，郁郁不乐。您要知道，他是个私生子，父母都是共产党。在学校里和在街上，别人都这么议论他。他的父亲死于四二年，祖父母本身是穷光蛋。再说佩尔策吧，我在二三年就认识这个人。您知道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吗？您一定猜不着。是在共产党内。他曾经看过

一部法西斯的宣传电影，这部电影原是想吓唬人的，他倒非常欣赏。他把革命误解为打砸抢，完全弄错了，后来退出了战斗同盟，参加自由团，接着，二九年就参加了冲锋队。有一段时期他也开过妓院。这个人什么都会，当然也会园艺，做黑市买卖，您怎么说都行。又是个色鬼。您想想，当年花圈工场的职工都是些什么人：三个死硬的纳粹分子：克雷姆普、万夫特和舍尔夫；两个中间派：弗里达·策芬和黑尔加·霍伊特；我是个不起作用的共产党；女士是共和派犹太人；莱尼政治上虽无派别，但由于她父亲出的乱子而受到打击，而且不论如何还是军人的遗孀。此外就是这个俄国佬，佩尔策对他的确相当巴结奉承——战争结束后他能出什么事呢？太太平平，啥事也未出。三三年以前，他一直对我以‘你’相称，每次见到我就问：‘我说埃尔泽呀，你看谁会胜利，是你们还是我们？’三三年至四五年期间，他对我改称‘您’；美国人来了还不到五天，他就又弄到了营业执照，跑来找我，重新叫我埃尔泽，还说什么我现在保险要当市议员了。不，不，不——对我来说，事情已经太迟了；要是赶在孩子离家时战争结束，那还差不多。现在，我再也不想干了，早就不想干了。莱尼在四四年年底私下来看过我一次，就坐在这里，抽了一支香烟，有点不安地一个劲冲着我微笑，象是有什么话要讲。我甚至有八九分把握，知道她会讲什么，但我不想知道。一个人不应当多管闲事。我也不想知道什么，可是她坐在这里既不吭声，又心神不定地微笑，我终于忍不住，对她说：‘噢，看来你是有喜了，怀这种私生子的滋味，我是有体会的。’后来战争结束了，什么抵抗呀，年金呀，赔偿呀，简直闹得不可开交；还有那么一些人斯威立起一个共产党，我知道，这些人对我的维利之死是居心有愧的。您知道我把他们叫什么吗？教堂里的执事。嗨，这个糊涂虫莱

尼，这个讨人喜欢的可怜虫，这时居然上了他们的钩，以'英勇的红军战士遗属'身分，给他们充当竞选的金发女郎。她还打算给自己孩子取名莱夫·博里索维奇·格鲁伊滕——后来，肯定是所有亲戚朋友个个极力加以劝阻，她才改变主意，但这样一搞，她的名声比战争期间更臭了。事隔多年，还有人骂她是'金发苏联娼妓'——这个讨人喜欢的可怜虫啊，她从来没过过轻松日子，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第 六 章

为了使读者不去胡乱猜测，及早消除不切实际的指望，现在事不宜迟，必须把本书第一部分的男主人公在此作一介绍。有些人——不仅埃尔泽·克雷默尔太太——，甚至迄今所有的人，依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个名叫博里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的苏联人会得天独厚，在一九四三年被许可进了一家德国花圈工场干活。由于莱尼不爱说话，即使涉及博里斯的事也是如此，不过有时候也喜欢说一些，所以——这是在洛特、玛格丽特和玛尔雅一起敦促了三年之后——，她到底还是讲出了能够提供有关博里斯·利沃维奇情况的两个人的名字。第一个人与博里斯相识只有很短时间，但同他命运的关联却十分密切。此人以其拥有的权力以及必要时甚至不惜作出牺牲的决心，介入他的命运，使他成为天之骄子。这是一位有工业界作靠山、职位显赫的大人物，他要求无论如何不可说出他的名字，也不容许笔者泄露丝毫秘密，不然他就会大吃苦头的；加以笔者还一口答应过莱尼严加保密，当然是口头的，笔者自成说话算话，不可食言。可惜的是，这位大人物很晚很晚，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发现莱尼的线索，因为他在这一年才获悉博里斯是一个双倍的幸运儿：他不仅被许可进入佩尔策的花圈工场干活，同时又成了莱尼的意中人。博里斯几乎蒙受过种种嫌疑：有人说他是德国人安插在工场里监视佩尔策及其手下男女职工的坐探，此外，当然

也有人说他是苏联间谍。他打进来是想刺探战时德国花圈工场的秘密呢，还是向上级汇报有关德国工人的种种思想情况？不管怎么样，有一点则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他完全是一个幸运儿，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当他在一九四三年年终登场时，约莫——这是我们的估计——身长一米七十六至一米七十八，瘦长个子，金发，体重至多不会超过五十四公斤，戴一副红军军用镍镜。他进入莱尼生活的时候，年方二十三岁，德语说得很流利，只是带有波罗的海地方口音，俄语讲得象俄罗斯人一样。他在一九四一年两国还未开战的时候到过德国，一年半以后，他作为苏联战俘又回到这个奇特的（使一些人感到神秘和不可思议的）国度。他的父亲原系俄国工人，后提升为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职员。博里斯的脑子里装了几首特拉克尔的诗，甚至还有荷尔德林的一些作品，当然都是德文的，他取得过公路建筑工程学士的学位，战时任工程兵少尉。这里还得交代一下，博里斯之所以得天独厚，自有其种种缘由，与笔者毫无关系。是谁早就有了一个当外交官的父亲和一位地位很高的军火工业大人物作自己的得力靠山呢？为何本书男主人公不是德国人呢？为何不是艾哈德，不是海因里希，不是阿洛伊斯，不是老格鲁伊滕，不是老霍伊泽，不是小霍伊泽，甚至不是引人瞩目的佩尔策，也不是非常和蔼可亲的朔尔斯多夫呢？这位朔尔斯多夫将会为一个被关进监牢、甚至有生命危险的人感到抱恨终生，只是由于他，朔尔斯多夫，是一个如此狂热的斯拉夫语言学家，他不能忍受在花名册上列有一个想象中在丹麦修建虚构的掩蔽所的虚构的莱蒙托夫。朔尔斯多夫扪心自问：难道一个人，就只一个人，而且还是象老格鲁伊滕那样讨人喜欢的人，由于一个虚构的拉思科思尼柯夫拉运虚构的水泥袋，在虚构的工地食堂吃虚构的清水大麦

汤，就得几几乎送掉老命吗？

是呀，这要怪莱尼。她不愿意本书以德国英雄作为男主人公。对这一事实——如同莱尼的许多事一样——只好接受下来。何况这位博里斯还是个规矩人，甚至还有相当的教养，受过学校教育。无论如何他是筑路工程学士，尽管他没学过一句拉丁语，可是由于他对他的特拉克尔那么熟悉，因此对“De profundis”① 这两个拉丁词也十分熟悉。虽然他所受的学校教育远远无法与难能可贵的德国中学毕业相比，但平心而论，同等学历还是有的。如果我们承认他在年轻时甚至念过黑格尔的德文原著（他不是从黑格尔到荷尔德林，而是从荷尔德林到黑格尔），那末，即使在教养方面要求苛刻的读者恐怕也得承认，他并不比莱尼差得很远，无论如何，做她的情人，还是配得上的，而且——事实将证明——是值得的。

据博里斯过去同一个集中营的难友普约特尔·佩特罗维奇·博加科夫介绍的可信情况，直到最后一刻，博里斯本人对落到自己头上的幸运还莫名其妙，完全摸不着头脑。博加科夫现年六十六岁，患有关节炎，手指蜷曲得厉害，经常得靠别人喂饭，甚至有时抽一支烟也得由别人送到他嘴里。此人在战后不愿返回苏联。他公开承认自己“肯定懊悔过一千次，也肯定悔不该懊悔过一千次”。关于前战俘回国后的遭遇时有所闻，使他猜疑满腹。战后，他受美国人雇佣当看守，后来成了麦卡锡主义的牺

① “De profundis”是哀悼经（忏悔经咏第六段）开始的两个字，意为“地狱之底”，多用于葬礼和安魂弥撒。

牲品，又到英国人手下混饭吃，穿上一套染成蓝色的英国军装，仍旧当看守。虽然他曾多次申请加入德国国籍，但仍是无国籍侨民。现在，他住在教会举办的慈善事业的一座养老院里，和一个身材高大、名叫贝伦科的乌克兰籍小学教师同屋；后者蓄着浓密的小胡子，打从老婆过世后一直唉声叹气，长吁短叹，伤心不止，成天跑教堂，上公墓，到处奔走觅购腌黄瓜，原来这是他侨居德国二十六年以来终于发现的"大众化廉价食品，并非什么山珍海味"。博加科夫的另一位同房，是一个自称害"思乡病"的年老体衰的列宁格勒人基特金，此人瘦骨嶙峋，沉默寡言，没人知道他的父名。据他自己说，"他怎么也摆脱不了乡思"。这三个老人之间，经常由于旧日的恩怨而恶语相伤。只要贝伦科冲博加科夫叫一声"你这个不信上帝的家伙"，博加科夫就反唇相讥，叫贝伦科"法西斯分子"；要是基特金骂他们两个"空谈家"，那么，贝伦科就会骂基特金"老自由派"，博加科夫则以"反动分子"回敬。由于贝伦科在六个月前老婆死后才搬来与他们两人同住，因此算是"新房客"。博加科夫不愿当着两个同房的面，谈博里斯的情况和他在集中营的情况，笔者只好一直等到贝伦科上公墓、去教堂或"觅购黄瓜"，以及基特金出门散步，当然是去"买香烟"之后，才言及正题。博加科夫德国话讲得流利，而且达意，只有多次用到值得争论的"实惠"一词时，才令人有些费解。由于"几十年来一直值他娘的夜班，不管天气多么冷，后来甚至还得扛一支大枪"，他的手指的确弯曲得不象样子，因此，一开始，笔者和博先花了一些时间，研究如何帮助博解决抽烟的困难。"我靠别人给我点香烟，还可以说是实惠吧，可每抽一口都得靠别人帮忙，那可不行——我现在有时高兴一天要抽五六支，有烟的话，一天甚至抽十支哩。"最后，笔者（他在这里不得不破例地突出一

下自己)灵机一动，向负责这一层的女护士借来一只输液用的架子，装上一根铅丝和三只晒衣夹，在这位(外加非常可爱的)护士的帮助下，搞出了一套博加科夫高兴地称之为“实惠的吸烟架”的装置；我们将铅丝拗成一个圈圈，用两只晒衣夹吊在架子上，另一只夹子固定在相当于博加科夫嘴巴高度的地方，夹住一只吸香烟用的尖头烟嘴，这样，博加科夫只要把嘴巴凑上去吸就行了，只要那个“法西斯黄瓜迷或生就一副GPU① 面孔的乡思迷”把香烟给他点着，插进烟嘴，他就可以吞云吐雾了。笔者由于设计了“实惠的吸烟架”，博得了博加科夫的某些好感，从而使他谈得更加起劲，这是无可否认的，此外，笔者还通过送香烟帮助，使他每月区区二十五马克零花钱能多派上一点用场，这样做不仅仅是——他信誓旦旦地保证——出于自私自利的原因。现在，请看用连续完整的记录形式整理的、博加科夫由于喘息和吸烟时而中断的陈述：

“我们当时的处境自然说不上绝对实惠，但相对地说当然是实惠的。至于博里斯·利沃维奇，确实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能够到我们那个集中营来，就已经是吉星高照了。他肯定猜到是有人在暗中为他出力，至于这人是谁，他直到后来才知道；按说他是应该心中有数的。那时候，我们在最严密的监督下，拆救着火的房屋或救火，抢修被炸坏的公路铁路，即使这样，还是被认为是一种荣誉——谁要是敢冒险乘机往自已兜里藏东西，哪怕是一根普普通通的钉子，而一根钉子对于囚犯来说简直是件宝物啊，那就可能被抓住，肯定是死路一条——，我们当时干的就是这种活。而这个蒙在鼓里的小伙子，每天早晨由一个好心

① GPU(格别乌)，苏联的国家政治保安部，是克格勃(KGB)的前身。

肠的德国哨兵押送，去那所大有实惠可占的花场。白天他在花场干轻活，后来甚至要到半夜里才回来，甚至还——这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当时我为小伙子一颗专图实惠的脑袋瓜担心，就象为我的亲生儿子担心一样——交上了一个姑娘，同她相好哩！这件事情虽然没有引起我们对他怀疑，却使我们羡慕不已，而这两种情绪尽管并不令人感到实惠，但在俘虏中间还是大量存在的。记得革命胜利后我在维帖布斯克[1]念书时，我们班里有个同学，每天早晨都坐真正是雇来的马车上学——博里斯给我们的感觉就象当年那个同学差不多。后来，他从花场带回来面包，甚至还有黄油，有时还有报纸，但总是带来战事消息——甚至完全出人意外地带来只有资本家才穿得起的质地良好的衣服。这时他的处境略有好转，但还谈不上实惠，因为我们中间有个当上战俘代表的维克托·根里肖维奇，不相信博里斯所得到的许多实惠是资产阶级所谓的运道，他认为这不合历史逻辑。可怕的是，最后他终于获悉他说对了。至于他是怎么知道的，那谁也说不上。反正过了七个月他就知道了：一九四一年，博里斯就在柏林父亲的寓所认识了父亲的这位朋友（此人姓名从略，因笔者保证不予泄露）。战争爆发后，博里斯的父亲调至情报机关工作，是苏联打入德国的间谍的联系人之一，手中掌握了许多暗线和秘密联络点，他利用其中一条渠道通知这位先生儿子被俘之事，请他帮忙。按照现在的说法，他是滥用职权，里通外国，勾结一个最黑心的德国大资本家，为自己儿子谋实惠。您就别问我维克托·根里肖维奇是怎样打听到这些情况的吧！也许这些狗娘养的当时就有了通讯卫星。此外，他还打听到博里斯始终不知道的一

---

① 苏联白俄罗斯城市。

点：他的父亲就为这件事被捕，不知押到什么地方，砰、砰、砰，一命呜呼了。您说，维克托·根里肖维奇怀疑，只有历史的逻辑而没有我那位虔诚的黄瓜迷朋友贝伦科当然称之为天意的资产阶级运道，究竟对不对呢？就博里斯的父亲来说，下场是毫无实惠可言；就博里斯本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因为维克托·根里肖维奇还了解到更多的内情：关于这位先生，他甚至还知道，此人反对同苏联打仗，主张希特勒和苏联缔结永恒的、坚强的、牢不可破的同盟，苏联外交机构撤退时，他甚至还敢于将博里斯、博的父母和妹妹吕迪娅送上火车，同他们一一热情拥抱，并在告别时想同博里斯的父亲拜把子。这些顶呱呱的衣服，是否就是这位先生自己拿出来的？博里斯能够上这个奇怪的花场扎花圈，给法西斯分子的花圈飘带设计题辞，他与此人有没有直接联系？不，不，不，博里斯与他并无联系，只与花圈工人有接触。那么——为了在他娘的这些实惠下至少能搞出点名堂——工人们的情绪又如何呢？德国工人的情绪如何呢？三个人明确支持，两个人保持中立，两个人可能反对，虽然无法公开表示！这可又与维克托·根里肖维奇的情报对不上号，根据他的情报，德国工人一九四四年正处在一次暴动的前夕。嘿，您要知道，小伙子的处境真复杂，他为了自己这些实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不合历史逻辑的，他确实搞到了对象，后来甚至能够多次同这个绝色的姑娘卿卿我我，共效于飞，要是这件事走漏风声的话，天啊，那就够他受了！他一口咬定，送给他的东西——后来越来越多，有衣服、咖啡、茶叶、香烟、黄油——不知是谁给他藏在一个泥炭堆里，到时候由他自己去取。至于消息，据他说，则是他的头头即花场和花圈工场老板他偷告诉他的。这个维克托·根里肖维奇虽然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可并不是见

财不动心的人：他收下了送给他的一件真正的开士米羊毛背心、香烟和一样无价之宝：一张欧洲小地图，那是从袖珍日历上扯下来，巧妙地折成象一块糖一样大小——这可是一份十分珍贵的礼物。有了它，我们终于具体知道我们的人打到了什么地方，下一步要向什么地方进攻了。维克托将羊毛背心贴肉穿在自己那件破鱼网似的汗衫里面，加以羊毛背心又是深灰色，看上去象是一块脏抹布。因为这件羊毛背心，甚至可能使某个德国看守兵见财起心！从此以后，就由博里斯提供有关战局变化以及苏联和盟国军队进军的可靠消息，他也就受到维克托·根里肖维奇的青睐，因为后者正迫不及待地需要这种消息，好给我们鼓劲打气。但是，由于他受到维克托的青睐，他自然就失去了其他人的信任——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凡是了解战俘辩证法的人，个个懂得这个道理。"

从普约特尔·佩特罗维奇·博加科夫嘴里了解到这许多情况，是先后五次相机行事的结果；笔者得购买一只盐水瓶架送给博加科夫，因为借来的那只时常得还给人家派原来的用场；笔者甚至还奉送电影票和音乐会入场券，以便支开贝伦科和基特金，让他们去看《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日瓦戈医生》彩色电影，欣赏姆蒂斯拉夫·罗斯特洛波维奇① 指挥的音乐会。

现在，笔者感到该是前去打扰那位职位显赫的先生的时候了。关于这位先生，也许补充说明一点就够了：处于一九〇〇年

① 姆蒂斯拉夫·罗斯特洛波维奇（1927— ），苏联著名大提琴家、乐队指挥。1974年离苏，迁居西方。

至一九七〇年期间任何历史时期的任何德国人，以及处于相同历史时期的任何俄国干部和苏联干部，一听到他的名字都会肃然起敬；甚而在今天，一提到他的姓名，克里姆林宫的所有大门，也许甚至还有通向毛的书斋的小门，随时都会洞开，如果说后者还未打开的话。笔者答应了莱尼自己也曾答应的一点：无论如何决不说出这个姓名，即使严刑逼供，三拷六问，也决不说出。

为了迎合先生心意，也为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恰如其分地、谦逊地恳请先生惠允今后再进行一些介绍请况的谈话，笔者不得不乘坐三刻钟左右火车，取道东北北方向——未便多说，以免泄露天机；同时，还得掏腰包给他的太太买上一束鲜花，给这位先生买上一部皮面精装《欧根·奥涅金》。喝过几杯香茗（其质量优于修女们奉献的香茗，但不如赫尔特霍内太太家的茶），寒暄几句天气和文学，也提到莱尼困难的经济请况（女主人颇感纳闷地问："这是在谈谁呀？"——先生不客气地答道："唉，你又不是不知道，就是那个战时与博里斯·利沃维奇来往的女人嘛"——，笔者请测，女主人看来是以为什么风流艳事呢）。接着，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天气、文学、无法再谈而又始终谈不到莱尼身上的时刻，这位先生只好相当不客气地明确说："米策[1]，你出去吧，让我们单独谈一谈"。这一来，米策更加认定笔者是充当拉皮条的角色，带着不加掩饰的怏怏不乐的神色离开了客厅。

这位先生年约六十五六岁，白发，幽雅，说不上不客气，但显得很严肃。客厅大概有一座六百名学生的学校礼堂一半大小，客厅前是一个花园，园中有英国式的草坪，德国树，最小的一棵大约有一百六十年的历史，还有月季花坛。而所有这一切，包括

---

[1] 米策为玛丽的爱称。

主人的脸色，乃至于墙头毕加索、夏加尔、瓦尔霍尔、劳申贝格、瓦尔德米勒、佩希施泰因、普尔曼等画家①的作品，都笼罩在某种——作者斗胆断言！——痛苦的气氛之中。即使在先生府上这里也有T.、W.、L.2和S.！为什么竟无L.1的痕迹呢？

"您是想了解这位博加科夫先生——我还要给他办点事情哩，您别忘了把他的名字和地址告诉我的秘书——对您谈的情况是否属实吧。唔，我只能说大致不差。博加科夫先生提供的情况确实不错——博里斯那个战俘营的战俘代表，究竟从什么地方了解到的情况，他可能是从什么地方了解到的呢（耸耸肩膀）。我是三三年至四一年期间在柏林结识博里斯的父亲的，我同他成了要好朋友。对他对我，这都不是没有危险的事。无论从世界政局或整个历史着眼，我都始终主张苏德两国结盟修好，我认为，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真正的亲密的同盟，甚至可以将民主德国从地图上抹掉。苏联看重的是我们，我们。自然，不过这究竟能否实现，那就很难说了。当年啊，我在柏林被认为是红色的——确实也是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我之所以批评今天联邦政府的东方政策，也只是因为我认为它太软弱，太缺乏力量了。至于博加科夫先生介绍的情况嘛，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在我的柏林办事处确实收到一封信，里面是一张条子，只写一句话：'莱夫嘱代为转告，博已被德军俘虏。'条子不知是谁送来的，这一点当然也无关紧要，是送到错下门房里的。您可以想象，接到条子后我情绪多么激动。我非常喜欢这个既聪明伶俐、

---

① 夏加尔（1887— ），俄国超写实主义画家，定居巴黎。劳申贝格（1925— ），美国流行画派画家。瓦尔德米勒（Waldmüller，1793—1865），奥地利印象派画家。佩希施泰因（Pechstein，1881—1955），德国表现派画家。普尔曼（Purrmann，1880—1966），德国静物写生和风景画家。

又沉着冷静的小伙子，我曾多次——也许有十几次——在他父亲的寓所见过他。我送给他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集、一部荷尔德林全集，还介绍他看卡夫卡的作品——不是我讲大话，我也许是《乡村医生》这本小说的首批读者之一，说不定还是第一个读者哩，这本小说是我十四岁念中学时，请母亲送给我作为一九二〇年圣诞节礼物的。哦，我接到条子，知道这个我一向觉得非常沉静和未见过世面的小伙子当了苏联俘虏，待在德国。您以为（说到这里，尽管笔者并未对先生露出兴师问罪的目光，先生的口气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变得咄咄逼人起来），您以为我不知道集中营里的情况吗？您以为我是瞎子聋子和麻木不仁的人吗？（这些话笔者从来没讲过。）您以为（声音变得几乎恶狠狠的了！）我认为这一切都正确吗？哼，现在（声音由弱变为最弱）机会终于来了，可以有所作为了。可这个小伙子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时候我们不是有几十万、几百万苏联战俘么？他是不是在被俘时就已经给人家打死了或打伤了呢？您有本事（嗓门再度拉开，变得咄咄逼人），到这么多战俘中间去找一个博里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试试看！我找到了他，但不瞒您说（边说边对毫无恶意的笔者气势汹汹地挥舞着手），我是靠OKH和OKW（陆军总司令部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笔者）的朋友找到他的。他待在什么地方呢？倒不是在集中营，而是在一个类似集中营的地方做采石工。您知道什么叫采石工吗？（由于笔者的的确确干过三星期采石工，他感到这一问，弦外之音是认为他对采石工一无所知；讲得客气些，至少是主观武断的，而且根本不给他回嘴的机会。）所谓采石工，就是死因。再说，您试试看从纳粹的苏联战俘集中营里去营救一个人？（这种责备口气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不用说笔者没有试过去营救任何一个人，

他也根本没有这种可能从什么地方营救一个什么人。不过有几次，他倒确实也曾放着俘虏不抓，或者故意让他们跑掉。)不容易啊，连我也花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才算给这个小伙子帮了点忙。第一步是，他脱离了死亡率百分之百的可怕的集中营，转到可怕程度小一点的、平均一个半俘虏中死一个的集中营。接着，再转到另一个平均两个半俘虏中死一个的集中营，待在这里仍然令人担心。第三步又换了一个地方，死亡率是平均三个半人中死一个，担心程度又小了一些——这样，他已经算是进了一座远远处于平均死亡率以下的集中营了，不过还是又换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情况勉强可以算是正常，平均五点八个战俘中才死一个。而我托人将他弄到这里，是因为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老同学埃里希·冯·卡姆在这所老营(老集中营。——笔者)里当少校长官，他在斯大林格勒城下丢了一条胳膊、一条腿和一只眼睛；博里斯最后就到了他这里。也许您会想，这事埃里希·冯·卡姆一个人就能说了算吧？(笔者根本什么也没想，他唯一渴望的是了解事实经过。)不，没有党的大头头插手是不成的，其中一个就敲了竹杠——给他的情人送了一个煤气灶，还有五百多公升汽油票和三百支法国香烟，如果您要详细了解的话(这正是笔者所要了解的)。而且，这个党的头头最后还得疏通另一个党棍，即那个佩尔策，对他稍作关照，叫他照顾博里斯——此外还有每天负责派人押送博里斯去花场的警备队头头，他叫胡贝蒂上校，为人拘谨守旧，有人性，但小心谨慎，因为党卫队曾有几次设下圈套，存心要找他的岔子，说他'滥施人道'。我们不得不开了一张证明给胡贝蒂上校，证明博里斯在花场的活动事关战争，非常重要，或'具有重要情报价值'。就这样，我们侥幸成功了，或者说运道好，如果您愿意(笔者不愿意——笔者)，也可说是天

机巧合。这个佩尔策早先参加过共产党，还雇佣了一名从前的女同党，她的男人——或者是姘头，我相信，反正是露水夫妻——带了非常重要的情报资料逃到法国去了。于是，象行家的说法那样，博里斯是正式奉命前去监视这个女人的，博里斯也好，佩尔策也好，这个女共党也好，谁都不知道这一点，而我又是从'东方外籍军队'处的一个熟人那里获得了批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自己的活动也必须保密，否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党卫队会注意上博里斯的。您想想（笔者又没想什么。——笔者），给这样一个小伙子真正帮点忙，是多么不容易啊。到了七月二十日①以后，风声更紧了，那个党的头头竹杠敲得更凶了——真是千钧一发。这时候谁还会去关心苏联工程兵少尉博里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的死活呢？"

承蒙教诲，粗知为人作嫁之难——即使是地位如此显赫的先生为一个苏联战俘做点事情也颇不容易——以后，笔者再次走访博加科夫，并且少不得捎上一些腌黄瓜和彩色影片《瑞安的女儿》的两张入场券。如今，博加科夫已配备一个吸水烟用的橡皮管，把橡皮管套在烟嘴上，这样就能"实惠地"吞云吐雾，由于他甚至可以用他那只完全畸形的手抓住橡皮管（"这样，我就用不着老是噘起嘴巴去够烟嘴了。"），所以话就变得滔滔不绝，即使是有关博里斯的秘事，讳莫如深的秘事也无所顾忌了。

"嗯，"博加科夫说，"为了提醒他看到他的命运的实惠不合历史逻辑，根本用不着严厉的维克托·根里肖维奇阁下劳神。最

---

① 指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谋刺希特勒未遂。

使小伙子不安的，是这只明显感觉得到但又看不见的手，这只手把他从一个集中营换到另一个集中营，最后来到了这家花场。除了其他优点外，花场还有一个好处：整天生炉子，温暖如春，处在四三年末四四年初的冬天，这可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实惠。而当他终于听到我私下告诉他，是谁把他弄到那里去时，他一点也没有安下心来，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怀疑这个可爱的姑娘，以为她是那位先生收买安插在花场里的。还有一件事，使异乎寻常的敏感小伙子十分紧张：就在他那个非常实惠的工作场所附近，枪声天天不断。这里我并不是想，丝毫也不想说小伙子不知好歹，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他很高兴，但事实的确如此：不停的枪声弄得他神经紧张。”

这里必须交代一下：四三年末四四年初，德国各行各业死人的埋葬，不仅使所需要的陵园看守、扎花圈工人、牧师和神甫、口若悬河的市长、地方党组织头头、团指挥官、教师、战友、企业负责人等有关人员的数字纪录不断刷新，还有从警备营调来专司鸣放礼炮的士兵也不得不连续不断地朝天开枪。根据死者人数多少、死亡的种类、级别、官阶的不同，中央陵园每天早晨七时至下午六时之间，枪声持续不断。（按格龙奇的介绍原话记述如下：）“枪声不绝于耳，陵园就象是一个练兵场，或者说至少象个打靶场。当然，一声礼炮听起来应当象是一声枪响——我自己在一九一七年就以国民军上士身分有时率领过礼炮队——，但是，这种主观想法往往不能实现，那枪声听起来简直象是连珠炮，或是象在试验一种新式机枪。有时还有炸弹爆炸声，四周高射炮咣咣不绝，对杂音敏感的人真不好受。我们有时候打开窗

子，将鼻子伸出去闻闻，的确火药味冲天，虽说打的都只是空炮弹。”

如果这里允许笔者破例稍加评述，那么，他想指出：也许有时也调来一些枪杆子还不曾摸熟的年轻士兵，对于奉命向牧师和神甫，向静默致哀的死者家属、军官和党魁们的头顶上开火，定然使他们感到奇怪，他们有可能紧张起来，对此但愿无人加以责难。可以肯定，在这种场合下也会有人流T.，可以看到许多人W.，流露出 S. 之情，而死者家属中恐怕谁也不会确信自己会长生不老，某些人脸上露出清晰可见的 S.，以及有朝一日自己也有可能在礼炮声中长眠地下，凡此种种，恐怕对士兵们决不会产生沉着镇静的影响。所谓庄严肃穆的丧事，何尝都是如此庄严肃穆，陵园中每天有好几百乃至上千个眼结膜囊在活动，他们的中枢脑干控制失灵，因为其中有的人感到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受到了打击。

博加科夫：“博里斯怀疑那姑娘的时间当然不长，一天，也许两天，等到她捏过他的手，他感到浑身热乎乎的(??)，嗷——您知道，我是说就象那些长期打光棍，得不到女人爱抚的单身汉常有的情况一样——对，对：当那姑娘直截了当地一把捏住他的手的时候，他就是这种情况，地点就在放她送来的花圈的桌子旁边。是的，就是这样的。这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当然这种情况过去他也遇到过几次，但都是在睡梦中，空欢喜一场，而不是活生生的事实。这一次，他被弄得神魂颠倒，满心感到实惠。您不知

道，这小伙子很天真，从小受的是清教徒式的教育，对于所谓两性关系那一套，他是一窍不通的。而现在发现——我可以告诉您，您可得答应我绝对保密(保证做到！——笔者)——决不让这个姑娘知道(笔者肯定，甚至可以让莱尼知道此事，她也不会脸红的，也许还感到高兴哩。——笔者)，小伙子还从来没有和女人交际过哩。(由于看到笔者大惑不解地蹙起眉头，继续说道：)的确，这是我一向用的字眼：和女人交际。他并不想知道怎么去做，因为他毕竟也懂得，那种事是需要一定的身体条件的，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身体条件；如果爱上一个女人并想同她交际，在某种兴奋的情况下想要怎么动作，那是相当清楚明白的。这一点他是有数的，只是——还有一个细节——他娘的，我喜欢这个小伙子，如果您要听的话"(笔者要听。——笔者)，"是他救了我的命，没有他，我早就饿死，冻死，不在人世了……没有他的信任，我也会活不成的。他有话还能跟谁讲呢，活见鬼！我就是他的一切，我就是他的父兄、朋友——当他的确和这个姑娘搞上以后，我每天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担心得眼泪水直流。我提醒他说：'好吧，既然你这么爱她，可以拚着自己的脑袋不要。可是她的脑袋呢？你想想，她有多么大的危险——她可不能借口说是你胁迫她或强奸她，为自己开脱呀，谁也不会信她这种话的。还是放理智些！''理智，'他说。'你要是有机会看到她，也就不会谈什么理智的，而且要是我向她谈理智，她一定会笑我的。她知道我冒多大风险，也知道我懂得她冒多大风险，但她根本不管什么理智不理智。她也不想死，她要活，而且愿意我们有机会就在一起交际'——我得承认这个词儿是他跟我学的。后来我见到了她，对她有了进一步了解，我才认识到，理智的确是一个不合适的字眼。不，另外还有一件事叫小伙子痛苦异常。国内战争时期，他

两三岁的时候，他母亲将他寄养在加里曾[1]乡下一个老朋友家里，这个朋友的祖母是犹太人。后来，这个朋友被枪毙了，就由犹太老奶奶抚养他，他同村里的犹太小孩一起玩，大概过了一两年，这位老奶奶也死了，改由另外一个大娘带着他，从此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详细身世了。有一天，这位大娘发现小博里斯还没有行过割礼，她自然会以为这是死去的那位老奶奶生前疏忽之过，二话不说就给他补了一刀——就是说，给他割了包皮。我想，我简直要急疯了。我问他，我说：博里斯，你知道我不是有成见的人，告诉我：'你是不是犹太人？'他向我发誓：'不，我不是犹太人，如果是犹太人，我不会瞒你的。'的确，他的口音也听不出丝毫犹太人的腔调。然而，这可是个坏消息，因为我们营里排犹主义者多得不得了，他们知道了就会欺负他，甚至会向德国人告密。我问他：'那么，检查身体时你是怎样过关的，我是说，你包皮割了，怎么没给查出来？'——他回答说，他有一个朋友是莫斯科医科大学生，这个朋友相当清楚，割了包皮的人，弄得不好是有杀身之祸的，于是在他参军前又给他缝上一截经过彻底消毒的猫肠子，当时痛得要命，后来倒一直好端端的，直到——直到如今，由于他经常处于这种激动兴奋的状态，这截猫肠子才脱掉了。他问我女人是不是——等等。听他这么说，我又每天夜里急得眼泪直流，浑身冒汗：倒不是因为女人——女人注意什么和是否会发现，我根本不知道——不，我是考虑，维克托·根里肖维奇是个狂热的反犹分子，而且他手下有几个人，单是出于嫉妒和怀疑，就会去向德国人告密，那样一来，再也没有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能够救他了。他所得到的实惠，就会一股脑儿全部

[1] 加里曾，现卢布林以南，喀尔巴阡山以北波兰与苏联交界处一带。

报销。"

再引一段那位大人物的原话："不瞒您说，当我后来听说他有了艳遇时，我是相当生气的。是生气，不错。这可太放肆了。他应该懂得这样搞多么危险，也不难想到，我们这些保他的人——他也知道自己是全靠有人保护的——将会遇到麻烦。只要事情一暴露，整个周密安排一环扣一环的做法，就有可能被彻底揭开。您当然知道，犯这种案子是得不到什么宽恕的。嘿，结果倒平安无事，我只是一想起此事还感到后怕，而且当着普法伊费尔小姐一太太的面，我也毫不隐瞒我对这种不知好歹的行为感到多么吃惊。的确是不知好歹。天啊，就为了一个女人！当然，我不断通过内线了解到他日子过得不错，有时禁不住想在出差时顺便去看看他，但始终没有去成。他简直把我气炸了，因为有几次在电车上他公然向别人挑衅，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不知道，反正的确有人告了他和押送兵的状，卡姆对此进行了调查。——他每天清早在电车上唱歌，多半是一个人小声哼哼，但有时也唱得很响，所以别人听得懂他唱的内容——您知道他唱什么来着？他唱《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的第二段：'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当时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一年，局势那么严重，在挤满了人的电车上，对着下夜班的德国男女工人唱这一套，就是唱一般的歌，不也是发疯吗？——您想想，据说他还——我敢肯定，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唱这只歌的第三段哩：'砸碎那统治我们的枷锁，劳动红旗飘全球。'您看，我戴上红帽子并不冤枉吧。真叫人生气，恼火呀。押送兵挨了处分，卡姆破例直接打电话找

我——平常我们都是通过信使联系——质问我:‘你怎么塞给我这么一个捣乱分子?’后来，事情是解决了，可费了多少手脚啊，又是送人情，又是再次指出‘东方外籍军队’处的调令。但是，不久又闹出了大乱子：有个工人在电车上找博里斯搭讪，凑到他耳朵边上说：‘不要怕，同志，战争已经赢定了。’这句话给押送兵听到了，只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堵住了他的嘴，使他未往上面报告，否则那个工人一条命肯定送掉了。嗨，我所落得的全是麻烦，哪有什么感激啊。”

看来笔者有再次走访瓦尔特·佩尔策先生之必要。这位先生按说完全有资格压倒男主角博里斯。佩尔策现年七十岁，住在树林近旁他那所黄黑两色的平房中。墙头两厢饰有金属压制的黄澄澄的动物图案，一边是乳鹿，一边是骏马。厩棚里系着一匹坐骑，还有两辆轿车，一辆名牌高级的专供他自己使用，另一辆普通牌子的系太太使用。当笔者第二次登门造访（以后还有几次)时，发现此君完全陷于郁郁不乐的苦闷、几乎是悔恨的状态之中。“唉，一个人让自己的儿女学个一技之长，送他们念大学——我儿子是医生，女儿是考古学家，现在在土耳其——，可到头来落得个什么下场呢？他们眼睛里根本就没有父母。什么暴发户呀，老纳粹呀，发战争财呀，投机分子呀——，您看，我都听到了些什么啊。我女儿甚至对我讲第三世界哩，我现在倒要请教请教您：她懂得什么是第一世界吗？懂得她自己出身的那个世界吗？我花了不少时间看书，也不是毫无头脑的人。就说莱尼吧，当年她不肯把她的房子卖给我，因为对我这个人信不过——后来她把房子卖给了霍伊泽，可这个家伙伙同他那精灵

的孙子干了些什么呢？他居然打算对莱尼下逐客令，原因是她把房间转租给外籍工人，早已不按时付房租，或者根本付不起房租了。要是卖给我的话，我会想到把莱尼撵出屋吗？决不会的，不论哪一种政治制度下，我都不会这样做的。我坦白承认，她一来到花圃工场，我就看上她了，我从来不把婚姻看成是什么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情。我隐瞒过这种看法吗？没有。我当过纳粹，参加过共产党，我的买卖趁战争这个机会发了点小财，这些我都隐瞒过吗？没有。我呀——请原谅我出言不逊——能捞就捞它一把，我不否认。可是三三年以后，我伤害过场里场外哪一个人吗？没有。我承认三三年以前自己为人有点心狠。可三三年以后呢？我没有动过谁一根毫毛。凡是给我干过活和和我共过事的人，有谁能抱怨我呢？没有，事实上也没有人抱怨过我。有一个人也许会抱怨，他就是克雷姆普，不过他已经死了。不错，我对他不好，这我承认，这个可恶的狂热分子，几几乎把我的整个花场给毁了，闹得大家无法生产。俄国人进场的第一天，这个白痴就想一切都要按照对待劣等民族的方式行事。事情的起因是：九点钟刚过，大家休息进早餐时，莱尼给这个俄国人送过去一杯咖啡。那是四三年十二月底或四四年一月初的某一天，天气很冷。具体经过得从煮咖啡谈起：当时我们大家最信得过埃尔泽·克雷默尔，一致推选她煮咖啡。您也许会问——克雷姆普这个笨蛋当时倒是该问一问——，一个老共党分子，怎么成了大家最信得过的煮咖啡的人呢。当时每天都是各人自带咖啡粉上班，一人一个口袋，早说咖啡粉本身就等于是一堆炸药，弄不好就要炸锅：有的人只有咖啡代用品，有的人是一比十、一比八的混合咖啡，莱尼的一直是一比三，而我有时则是一比一的奢侈品，有时甚至是百分之百的纯咖啡。这就是说，总共有十个不同的咖

啡粉袋袋，有十把不同的咖啡壶——由于咖啡供应情况这样，对于埃尔泽来说，担任煮咖啡的角色就意味着获得大家的绝对信任，因为，要是她从别人的好咖啡粉袋中偷偷地抓一点放到自己的蹩脚货中去，又有谁会发觉或想到呢？决不会的。这就是共产党所说的团结哪，而纳粹分子克雷姆普、万夫特和舍尔夫都曾利用这一点要过花招。没有人会想到，让万夫特、舍尔夫或者甚至让克雷姆普这个十足的白痴去煮咖啡：他们会乘机掉包的。再说，克雷姆普通常也没有什么好掉包的，这家伙太蠢，十分刻板，通常是喝咖啡代用品。还有，等到咖啡倒出来的时候，那时你一闻气味，马上就能闻出哪把壶里有一点点地道货，而莱尼的那把壶恰恰是味道最香的。只要九点十五分咖啡壶一来，羡慕、怨恨、嫉妒，甚至憎恨和报复思想都一齐上来了，这您能想象吗？您以为四四年初那个时候，警方或者党还有闲工夫一个一个查究——我不知道那叫什么——'破坏战时经济罪'么？他们倒是巴不得大家都能搞到一点咖啡，不管其来路如何。好了——那么，就在俄国人进场的第一天，我们的莱尼干了什么事呢？她给这个俄国人倒了一杯自己的咖啡——请注意，那是一比三的，而克雷姆普喝的是淡而无味的蹩脚货——，她用自己的杯子，从自己的壶里倒了一杯给那个俄国人，送到他最初几天和克雷姆普在花圈架子组一起干活的那张桌子上去。对于莱尼来说，请一个既无杯子又无咖啡的人喝一杯咖啡，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您想，她知道这里面大有政治吗？我当时看到，就连埃尔泽·克雷默尔脸色也发白了——因为克雷默尔意识到这里面大有政治：请一个俄国人喝一比三的咖啡，这种咖啡的香味反正把所有其他的蹩脚的混合品都压倒了。这时候克雷姆普干什么呢？他象平日一样坐在椅子上，那条假腿在墙上挂着，因为他

还不习惯带着假腿干活，所以上班时总是把它解下来——请您想想，墙壁上老是挂着这么一条假腿，这多好看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克雷姆普一把从墙上摘下他的假腿，当的一下，将这个简直不知所措的俄国人捧着的杯子敲掉了。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我想俗话就是这样说的，不过这种所谓死一般的寂静——在文学上，在我现在有时阅读的作品中是这样描写的——还有所不同：舍尔夫和万夫特两个是用沉默表示支持，霍伊特和策芬的沉默是中立，而赫尔特霍内和埃尔泽则是用沉默表示赞同。嗯，我可以告诉您，当时我们大家都惊呆了，除了讨厌的格龙奇，他挨着我站着，靠在办公室门口，一个劲地咧着嘴在笑。这家伙站在一旁看热闹，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不过我倒认为他是个滑头，双料的滑头。我当时有什么反应呢？我坐在办公室门口，张张皇皇，呸的一声朝车间里吐了一口口水。如果说，吐口水可以表态而我的这口口水也成功地表了态的话，那就是不折不扣一颗嬉笑怒骂的痰弹，它的落点，距离克雷姆普比距离莱尼近得多。天哪，这口口水的落点那么巧，叫我怎样说清楚它的重要政治含义呢？再说，你又凭什么证明这口痰是嬉笑怒骂呢？车间里一直还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一种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的气氛，这时莱尼怎么办呢？她怎么办呢？她不动声色，弯下腰去把杯子从地上拾了起来——由于满地泥炭灰，杯子没有摔破——，走到水龙头跟前，将杯子仔细地冲洗——洗得那么仔细，这本身就是一种挑衅——，我相信，打从这个时候起，她的一举一动就都是存心挑衅了。天哪，您当然懂得，这么一只杯子，本来很快就可以洗干净的，仔细冲洗一番也未尝不可，但她那个架势，好象是毕恭毕敬洗圣杯哩。洗好不算，又完全多此一举地用一条干净手绢将

杯子擦干，走到桌子跟前，拿起她的咖啡壶，把壶里剩下的那一杯——那是一把可以装两杯咖啡的小壶——倒出来，神态安详地端给那个俄国人，连眼皮儿也没有朝克雷姆普抬一下。而且，她并不是不声不响地送给他了事。她还说了一声：'请喝吧。'现在，轮到那个俄国人亮相了。他肯定知道，整个这场戏多么富有政治意义——我可以告诉您，这小伙子敏感，非常敏感，很会看风色，有些人真该拜他为师哩。他脸色苍白，戴一副古怪的镍镜，淡淡的金发有点鬈曲，看上去风度翩翩。他怎么办，怎么办呢？这时车间里仍然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同时每个人都感到，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莱尼演完了她的戏——接下去他怎么唱呢？只见他接过咖啡，清楚响亮地回答了一句地道德语：'谢谢，小姐'，就喝起来。他额头上冒出了汗珠，您想，他八成已经好几年没沾过一滴真咖啡或茶了，这一下，好比给饿得有气无力的人打了一针强心针。谢天谢地，这样一来，紧张得叫人头皮发麻的死一般寂静终于结束了。赫尔特霍内轻松地叹了一口气，克雷姆普嘴里在嘀咕什么：'布尔什维克——军人寡妇——给布尔什维克喝咖啡'，格龙奇再次咧开嘴笑，我再次吐了一口口水，这一次十分放肆，几几乎吐到了克雷姆普的假腿上——要是那杯的话，那可真是亵渎圣物了。舍尔夫和万夫特鼻孔里在呼哧呼哧出粗气，其他人则感到心头落下了一块大石头。莱尼呢，她自己没有咖啡好喝了。于是，我的埃尔泽·克雷默尔怎么办呢？她端起她的咖啡，倒给莱尼一杯，一面甚至大声说：'瞧你，干巴巴的面包怎么咽得下去啊'——埃尔泽的咖啡也不赖。她有个兄弟，是个死心塌地的纳粹，在安特卫普担任要职，他一直捎给她咖啡豆。瞧，事情经过就是这样，这就是莱尼的决定性战斗。"

莱尼决定性的这一仗发生在四三年末四四年初，笔者认为非常重要，决定进一步全面收集材料，再次访问了目击当年这一幕的所有幸存者。首先，他认为佩尔策所说的"死一般寂静"，时间未免有过长之嫌。依笔者之见，这是受文艺作品夸张手法的影响，有澄清核实之必要，因为按照他的看法和经验，"死一般寂静"决不可能长于三四十秒。据克雷默尔——何况她根本不否认她的兄弟是纳粹并给他捎咖啡！——估计，这次死一般寂静历时"三至四分钟"。万夫特说："我对这一幕记忆犹新，直到今天我还埋怨自己，那阵子我们大家都坐视不动，等于是赞成所发生的事情——死一般寂静吗？我倩认为是可耻的寂静——要说经过多久？如果您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的话，我看有一两分钟。我们本来是不可以也不应当寂静的。我们的子弟远离家乡，呆在冰天雪地里，一直在打布尔什维克(四四年情况已不同了，已经是布尔什维克在"打我们的子弟"了，笔者谨作历史性更正)，这个家伙却坐在暖和和的屋子里，还享受这个婊子送的一比三的咖啡。"赫尔特霍内说："我当时只觉得一般凉气从脚后跟直透到脑门顶，一点也不骗您。事情过后我还常常琢磨：莱尼究竟明白自己所干的事吗？我佩服她的胆量和理所当然的心理，也佩服她那么沉得住气，竟然有本事在这种死一般的寂静中洗杯子、揩杯子等等。我要说，她这个人是慈悲诚挚生成性，哪管旁人论短长，真不简单啊——至于时间嘛，我可以告诉您，那可是很长很长——说它三五分钟也好，说它只有八十秒钟也好，都无所谓，反正是很长很长。而且我生平头一次对佩尔策有了某些好感，他显然是站在莱尼一边，反对克雷姆普的——吐口水当然显得相当低级庸俗，但在那种情况下，只能用这种办法表态——他的

意思很清楚：他恨不得一口吐在克雷姆普的脸上，但他当然不可能这样做。"

格龙奇："我当时真想大声叫好：那姑娘有种。他妈的，她一上来就打了决定性的一仗——也许不是存心的——，不过她应该知道嘛：她认识这个小伙子才只有一个半小时。他在花圈架子组干活，谁都不理睬他——任何人，包括号称包打听的万夫特大娘，也说不出她同小伙子有什么勾搭。如果您问我，并允许我使用军事术语表达的话，莱尼可以说是早在根本没有发现射击目标之前，就给自己开辟了一个巨大的火力点。对于她的举动，谁都只能解释为纯粹出于一种纯粹天真的慈悲心肠，这种心肠诚然不应当施之于劣等民族，但您知道，就连克雷姆普这样一个家伙也懂得，博里斯同样是一个人，他也有一个鼻子两条腿，甚至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眼镜，而且他比当时在座的那一伙都来得敏感。博里斯完全是多亏莱尼敢作敢为才变成人的，才取得做人的资格的——这次事情就到此为止，尽管以后还发生了许多令人厌恶的事语。至于时间多长嘛，哦，我觉得好象至少有五分钟。"

笔者感到自己应该通过具体试验来确定一下这次死一般寂静经历的时间。由于当年的车间——现为格龙奇私产——还在，不难进行现场测定：莱尼干活的桌子距离博里斯的桌子有四米，从博里斯的桌子到自来水龙头为三米，自来水龙头距莱尼桌子（咖啡壶摆在此处）两米——再回到博里斯的桌子又是四米：总共为十三米。也许这段距离，莱尼表面上虽然神态安详，实际上肯定是匆匆忙忙走过的。遗憾的是打掉杯子一节只能模拟，因

为笔者既没有截过肢；又无假腿可借用。至于洗、措杯子和倒咖啡则无需模拟。他——笔者——一连作了三次试验，以期确有把握，取得人们所谋求的客观平均值。结果是：第一次历时四十五秒，第二次五十八秒，第三次四十二秒。平均值：四十八秒。

这里，笔者禁不住要破例再次率直无隐地谈谈个人看法，值有意将此次事件称为莱尼的出世或再生，作为一次所谓的中心事件。他手头掌握的有关莱尼的材料并不太多，至多可以作出如下概括：也许思想有一点狭隘，集浪漫、性感、实利主义三者于一身，读过一点克莱斯特的作品，会弹钢琴，以及掌握了虽然不失为高深或掌握牢固，但属于无师自通的有关某些分泌过程的知识。如果说她是（由于艾哈德的命运）情欲不遂的怨女，是不幸的寡妇，四分之三的孤儿（母死，父坐牢），尽管可以认为她是缺少教养或全无教养的人——却无人能解释她的上述这些特性及其构成情况，无法解释何以她在我们打算共同称之为“一杯咖啡的时刻”，能那么理所当然。诚然，她热忱关怀拉埃尔，直到拉埃尔葬身修道院花园为止，但拉埃尔是她长到那么大仅次于艾哈德和海因里希的知音——可她为什么送咖啡给博里斯·利沃维奇这样一个人喝呢？她也使他自己陷于异常危险的境地，因为一个苏联战俘理所当然和（表面上）同样天真地接受一个天真的德属女人送来的咖啡，会有什么下场？倘使说，她真如玛格丽特所言，大概连犹太人是什么人都不懂得，那么，难道她真不懂共产党是什么人么？

范·多恩不知道有“一杯咖啡的时刻”这回事（显然莱尼认为没有必要告诉她），她象玛格丽特和洛特一样不了解有关情

况，提出了一个相当简单的解释："您知道，格鲁伊滕家有个老规矩：只要赶上喝咖啡，在场的都能喝上一杯，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不管是讨乞的、要饭的、流浪的，不管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同行，都一视同仁，人人都可以喝上一杯咖啡。只给某人喝，这种事是不会有的。甚至连普法伊费尔一家也有得喝，好就好在这一点。说句公道话，这次事件，不可原谅的倒不是他，而是她。这件事始终使我回想起那种一视同仁理所当然的做法，过去修道院大门口施汤就兴这个规矩，人人都能领上一份；一不问信什么教，二不用先念一声哈利路亚。不，她应该给在场的人都敬上一杯咖啡，不管是不是共产党……我看连那个臭纳粹，她也该敬他一杯。象她这次惠及一人的做法，简直是没有过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她做错的事还很多，为人却慷慨大方，而且对人诚挚善良——但正因为如此，从某一点上——您知道我指什么——来说，她不是他所需要的那种人。"

说到这里，必须断然防止一种印象：似乎四三年底四四年初战局方酣之际，佩记花圈工场中存在亲俄派或亲苏派，或者说哪怕只是有存在的可能。对于莱尼的理所当然，从历史角度出发只能相对地予以评价，联系她个人的具体情况则可以客观地作出判断。试想，别的（少数）德国人，仅仅只是由于对苏联人稍示好感，其情节比莱尼所作所为相差十万八千里，就有坐牢、上绞架或进集中营的危险，那末，不难看出，这并不是什么有意要显示慈悲，而是一种主观和客观上都是相对的慈悲而已，只能与莱尼的身世和具体历史地点联系起来看。即使莱尼其人不怎么浑浑噩噩（这种浑浑噩噩在她和拉埃尔相处中已有表现），她也会

这样做的——后来的事情和举动证明这一结论正确。而且，倘使莱尼不能将她的理所当然的心理具体地——正是具体借助一杯咖啡——表达出来，那她就会笨拙地、也许甚至是不成功地结结巴巴地说出几句表示好感的话来，从而有可能被说成比如同用圣杯敬献咖啡还要坏。可以假定，仔细洗杯子，仔细揩杯子，使她感受到一种肉体上的快乐，她这样做并不是故意的。由于她这个人做事情一向是先行后思（对待阿洛伊斯、艾哈德、海因里希、拉埃尔修女、她的父母、战争，均是如此），思远远在行之后，几乎不可能认为，她这次所干的事情自己后来马上就意识到了。她不仅送咖啡给一个苏联人喝，而且完全可以说是用双手献上，不叫这个苏联人难堪，而是叫一个一条腿的德国人难堪。由此观之，莱尼的出世或再生，不是在于估计历时五十秒左右的死一般寂静的那一段时间内，不是已经结束的、而是连续发展的一个过程。简而言之，莱尼是一个到做事情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做什么的人，一切都讲求实际。不应忘记，这时候的她正好二十一岁半，而且——有必要再次指出——内分泌极为发达，胃口大得惊人，完全不会把任何事物理想化。她具有一种直率的本能，这种本能既不曾得到阿洛伊斯的了解和激发，而艾哈德又不幸无缘加以激发或领教。她与阿洛伊斯双双胶粘融合，润泽恋情，估计历时可能达十八至二十五分钟，这点时间未能充分调动她的本能，因为阿洛伊斯自已也是银样蜡枪头，无力论证一个似乎不合情理的说法：莱尼性感强，正因为她性感还不很强。

其次一件大事是捏手示情，这件事只有两名人证。一是博加科夫，他已对此作了介绍，并描述了引起他潸然泪下的经过。

一是佩尔策，此人应说是唯一在场的亲眼目击者。

佩尔策："打从那次以后，自然她就经常送咖啡给那个俄国人喝。我可以发誓，当她第二天送咖啡给他的时候——这时他已经不在花圈架子组干活，已调到赫尔特霍内的收货组去了——就再也不是什么天真或无意识了，怎么说都可以，因为她走到他身边时，还左右前后仔细瞅了瞅，然后就伸出左手，一把捏住他的右手，他仿佛——虽然时间很短促——他仿佛触电似的，身体猛地从凳子上跳了起来。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可以当天明誓，而她不知道此事给我看见了。我当时正好站在办公室里，从暗处仔细盯住外面明处，因为我存心要看看，送咖啡之事还会怎样发展下去。说实话，我当时那阵子的想法讲出来有些不登大雅之堂，这一点我清楚，不过我们干园艺这一行的，本来就不象某些人认为的那么古板。我当时想：该死的，她居然动手了——小伙子啊，她在动手了，我想，而且我对这个俄国人真的眼红起来，嫉妒他起来。莱尼在男女关系上是个思想开明的人，不顾男方应采取主动这个传统：她主动送上门来，捏了他的手。当然她也很清楚，处在他那种地位，要他采取主动完全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说明了两点：在恋爱上和政治上都胆大妄为，几乎可以说是寡廉鲜耻。"

两个人（莱尼通过玛格丽特，博里斯通过博加科夫）还流传下来一种不约而同的说法，他们俩"一拍即合"。据博加科夫告诉我们，博里斯按男人的方式行事；而据玛格丽特介绍，莱尼向她承认，这一回"比我对你讲过的那次仲夏石楠之夜要有意思得多。"

有关博里斯的业务能力，佩尔策作了如下介绍："不是吹牛，我这个人颇有知人之明。博里斯头一天来，我就看出，这个俄国人非常聪明，具有组织能力。过了三天，他就非正式地当上了格龙奇的副手，负责成品验收。他同赫尔特霍内和策芬两人相处得很好，她们两人实际上归他领导——这一点当然没有给她们明说。他简直就是个艺术家，很快掌握了要领：节省材料。关于花圈飘带上的题辞，肯定是会引起他相当反感的，但他从不感情用事。张开眼就看到'为了元首、人民和祖国'或'一一二冲锋队'字样也好，整天同卐字和鹰形国徽打交道也好，他都处之泰然。后来，我让他在我的办公室里经管飘带柜和飘带登记簿。有一回，我私下问他：'博里斯，您坦白告诉我，您成天看到这些卐字和鹰形国徽之类的东西，心里有何感觉？'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佩尔策先生，但愿我的话不会使您感到难堪——因为您的问题提得这样坦率——：不仅早就料到和知道，而且能够亲眼见到，一个冲锋队的队员到头来也免不了一死，我感到多少有些安慰。至于说到卐字和鹰形国徽嘛，我完全明白我自己现在的特定处境。'他和莱尼都成了我的得力帮手，我想强调指出，如果说我不仅没找过他任何麻烦，而且还给予他各种照顾——对这个姑娘也同样如此——，那这也是为了我自己的买卖。我本来就不是那种不通人情世故的人，也从来没有这样标榜过。——这个小伙子有惊人的理事和组织才能，而且善于和别人相处，就连万夫特和舍尔夫也愿意听他的话，因为他十分精明能干。我告诉您，要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话，他一定会有所成就的。当然，他是工程师，也许还精通数学，但头一个发现架子组——我是指花圈架子组——人手不足，跟不上花饰组生产的，却是他，虽然我已经开了十年店，格龙奇干这一行已将近四十年，我们都没有发现这一

点，连聪明的赫尔特翟内也不曾想到。当然，这也是由于他和赫尔特翟内同在收货组干活——这是我所希望的最好的安排。于是我决定调整人手，策芬回架子组，她嘴里叽里咕噜，有些不高兴，但我增加了补贴。结果是，生产明显地增加百分之十二至十五。我一心要把他留下来，不让他出问题，这您难道还会奇怪吗？何况还有党内的同志——有时直接，有时暗示——向我打招呼，叫我注意别让他出问题，他的来头不小哩。不过，做到这一点可不简单，那个包打听路倒尸克雷姆普，还有那个歇斯底里的万夫特，他们都有可能把花场给毁了。而且，包括莱尼和格龙奇在内，谁也不知道：我让他在我的私人小暖房里划出一块地，六平方米，上足肥料，由他给自己种上烟草、黄瓜和西红柿。”

笔者不得不承认，他在走访还在世的当年军工花圈工场的证人时，选择了阻力最小的途径，而且越是容易接近的对象，访问的次数也越多。鉴于第二次登门造访万夫特时所受冷遇比第一次更甚，于是笔者索性特她的名字从访问名单上一笔勾销了。佩尔策、特龙奇、克雷默尔和赫尔特翟内则由于同样容易接近，也同样健谈——只有最近一次访问克雷默尔时谈得较少——，西此在这四人之间难以选择；在赫尔特翟内府上作客时，她那不同凡响的香茗，那精心布置的摆设，主人保养得体的可人风韵以及时至今日还直言不讳地拥护分离主义，令人流连忘返。唯一使笔者踌躇不安的，只是她那只烟灰缸太小和主人对一支接一支抽烟的明显反感。

“不错，我们这个州（指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笔者）的税收居联邦各州之冠，支援税收较差的州。可是，有谁想到

过邀请税收较差的州——例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巴伐利亚——派人到我们州来看看，让他们不光是伸手要我们的钱，也领教领教我们这儿污染的空气呢？这种空气，正是这个地方发财致富的原因之一啊。其次是喝喝我们这儿吓死人的臭水——巴伐利亚人有的是清澈见底的湖水，荷尔斯泰因人与大海为邻，要是他们来了，跳进来因河洗个澡，结果肯定是少则沾请一身柏油，多则连头发胡须汗毛都拔个精光，那他们该会作何感想呢。再说这个施特劳斯吧，我真弄不懂怎么会给他混到今天这么高的地位。我看他是混上来的，我还要说，此人来路不明，反正是一个意思。您瞧他攻击我们这个州（北来因-威斯特法伦州。——笔者）多起劲啊，唾沫四溅，声嘶力竭，到底为了什么呢？还不就是为了这个州比较先进一点么。应该强迫他带上老婆孩子到杜伊斯堡、多尔马根或韦塞林来住上三年，让他请得钱是从哪儿来的，是怎么来的。他把钱装进腰包，然后还冲着钱破口大骂，无非是因为我们这里有个州政府，这个州政府虽然谈不上叫人为之心醉，但至少从来没有落到基督教民主联盟手里过，更没有半点基督教社会联盟的色彩——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干什么要培养那种'休戚相关'的感情呢？有什么必要呢？难道这个国家是我创建的，难道我曾经赞成过建立这个国家？没有。上面也好，下面也好，中间也好，究竟与我们何干呢？您不妨仔细想想，我们是怎样陷进这个团体而永远出不来的？还不都是由于那些混帐的普鲁士人——我们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是谁在一八一五年出卖了我们①呢？难道是我们自己吗？

① 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普鲁士取得来因兰和威斯特法伦的一部分，这些地方曾经属于拿破仑建立的来因同盟和威斯特法伦王国。

我们提过这种要求，举行过公民投票之类的活动吗？没有，完全没有。真该让施特劳斯在来因河里洗个澡，到杜伊斯堡去呼吸空气——可他却守在他的老家巴伐利亚，享受新鲜空气，而且只要一提到'来因和鲁尔'，他就牢骚满腹，大放厥词。这些来路不明的乡巴佬，我们到底跟他们有什么相干？再说，我们自己就没有阴暗面么？您不妨好好想想这个问题！（笔者保证做到。）不，我今天是而且将永远是个分离主义者。如果人们不同意单是来因兰分出去，也可以搭上一部分威斯特法伦人。他们究竟给了我们什么好处呢？教权主义、假仁假义，也许还有土豆——我不太清楚他们那里种什么，也不想知道——还有那些森林、土地，嘿，我是不在乎的，反正我也没法把森林土地拿回家去，那就随它们去吧。不过，不妨可以要少数一部分威斯特法伦人，再多一个也不要。威斯特法伦人的确是长期光受压，抬不起头来，一直愤愤不平，甚至为了'广播时间分配比例'①之类的小事也叫苦连天。跟他们搞在一起，只会使你增加烦恼。来尼好就好在是地道的来因人。我还得告诉您一点，您一定会感到奇怪：我觉得博里斯比别人更象来因人。只有佩尔策除外，他是这个地方的特产，是一个既为非作歹又心地仁慈的家伙。确实，他没有同任何人过不去，最多只有一个克雷姆普，只要有机会，他就对他不客气；而由于克雷姆普是个纳粹分子，因此，有人会以为，佩尔策不是一个投机分子。他们哪里知道，这种看法恰恰错了：拉拢多数，专整一个克雷姆普，这正是地地道道的投机取巧作风。因为克雷姆普实在不讨人喜欢，连另外两个纳粹分子也不喜欢他。这个家伙恶心地追女人，叫人看了就讨厌。不过，不过，我倒要替

① 指电台安排地方话广播节目时间的分配比例。

他讲句公道话：他是个年轻人，一九四〇年二十岁就丢掉了一条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谁会相信，谁又肯听旁人开导，归根到底一条腿是白丢了呢？——我们可看得清清楚楚，头几个月里，这些小伙子简直象英雄一样受到欢迎，受到女人们的包围。但后来，战争越往下打，一条腿的人越多，就越来越不稀奇了。后来，两条腿的人，到底还是比一条腿或全无腿的人运气好。我条个思想开通的进步的女人，因此我也跟您谈谈这个小伙子的性爱情况以及心理状态。天哪，一个只剩一条腿的人，到了四四年初过的什么日子啊？可以说猪狗不如，领不多几个抚恤金——您可以想象一下，这种人临到和女人上床睡觉的要紧时刻，还得先卸下假腿，这会使人好受吗？对他也好，对对方也好，即使对方是个妓女，也不好受啊。（啊，坐在女主人府上品着她那出色的香茗，而且第三次作客时已经换上了咖啡碟子大一只烟灰缸，笔者是否应把这看作是表示好感？——笔者）对比之下，佩尔策就不同了，他的身体就象铁打金刚一样，您可以把假作为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典型，这种人只有在刑事犯罪分子中才能挑得出来，我是指那种丧尽天良的人。您要知道：丧尽天良的人身体反倒健康。他这个人哪，从不放过一笔买卖。那时候，博里斯每天由看守兵押送，早上送，晚上接，佩尔策还顺便同这些看守兵捎带着做买卖，贩运白兰地、咖啡、香烟——这些兵大约每里斯都轮上跑车押运，去法国或比利时，带回来成箱的白兰地、雪茄烟和咖啡，还有衣料。他们甚至可以向这些家伙定货，就象向一家商店订货一样。他们之中有一个名叫科尔布的，年龄比较大，很会溜须拍马，曾经给我从安特卫普捎过一套天鹅绒衣料。另一个年轻一点，叫博尔迪希，是个快快活活的虚无主义者，这种人在一九四四年初多的是。这小子人很活泼，装了一只

假眼，只有一只手，胸前挂的奖章琳琅满目。这家伙十分厚颜无耻，拿自己失去的一只眼睛、失去的一只手和自己胸前的银质奖章当赌注，加以利用，为自己捞一把。什么元首、人民、祖国，他根本不当一回事，他可不象我，因为尽管我也巴不得不要元首，但毕竟还主张要一个来因祖国，要来因人民。还有，舍尔夫是我们当中姿色仅次于莱尼的一个，博尔迪希经常与舍尔夫钻到后面的花房中去呆上一会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和她一起去'捉只小老鼠'，或'听山雀唱歌'，据说是经佩尔策批准，让她去挑几朵花给他。由于这个，别人给他取了一大堆绰号。这人倒也并不怎么不讨人喜欢，只是有了玩世不恭和虚无主义这两条，就不免令人敬而远之了。他也经常想给克雷姆普打点气，有时塞给他几根香烟之类的东西，拍拍他的肩膀，高呼当时风行的一句口号：'伙计，要利用战争，和平有害无利。'另一个叫科尔布，是个讨厌的家伙，喜欢动手动脚。至于说到佩尔策，按照现在的时髦话，那就是：鉴于丧葬市场的行情，自然出现了一个花圈、飘带、鲜花、棺材等等一应俱全的黑市。当然，供应党政要员花圈、英雄花圈和炸死鬼花圈，他是可以从中稳捞一票的。道理很简单，有谁安葬自己死去的亲友，会连个花圈也不送呢。况且，由于军人平民等死者越来越多，最后不仅一口棺材反复使用多次，而且成了只是虚应故事的点缀品：起初，死者还能享受帆布裹尸，后来改为用麻布缝合，再后则仅仅是草草一卷，连头脚都未包裹严实，就往棺材里塞，随后抽开底棺，让死人掉进空荡荡的土坑。人们让棺材在坑前停放一定时间，甚至还煞有介事地铲点土抛在上面，但是，一俟吊丧的死者家属、礼炮队、市长和党组织头头，总之，一俟佩尔策所说的'送葬的基本队伍'走远了，出了棺线以外，这口装样子的棺材就被抽出来，弄弄干净，棺棺光棺，把

死者的坟墓三锹两铲匆匆忙忙堆好。我说匆匆忙忙，就象犹太人埋死人一样。简直就象在理发店等候理发一样，可以说：下一位，请！不难理解，无法染指棺材租金和一应丧葬活动大笔收入的佩尔策会受到启发，想到花圈也可以反复用上几次，而要将一只花圈这样用上两次、三次、有时甚至五次，必须买通陵园管理人员合作，否则是办不到的。重复使用次数的多少，当然要看花圈架子材料是否结实，要看用的是什么枝叶——此外也可以趁此机会，仔细找找竞争的诀窍和存在的毛病。搞这一手当然要求有组织，要串通一伙人干——并要在一定范围内保密——这一点只有他自己、格龙奇、莱尼、克雷默尔和我这几个人才能做到。不瞒您说：我们都参加了。那时，人们有时看到有些农村花场供应的花圈，其质量达到了真正的战前水平。为了不露马脚，我们取名'零星材料加工组'。只有飘带无法重复使用。佩尔策又千方百计动脑筋，在顾客订货时，说服他们同意飘带上尽量不写明具体上款和落款，这样，飘带重复利用的可能性就提高了。例如'你的父亲，你的母亲'这种落款，在战争期间是经常使用的。即使是捎带个名字的飘带，例如'你的康拉德'或'你的英格里德'，也有一定机会重用，只要将它熨烫平整，把颜色和字迹稍加修整，藏进飘带柜里，等到再有名叫康拉德或英格里德的人悼念某人时，就可以从柜子里取出，以旧顶新了。这一段时期内，佩尔策最喜欢的一句格言和以往任何时期一样：耗子也能撒金蛋蛋。最后，博里斯想出了一个相当有效的主意，由于他对德圈消闲文学有些根底，重新采用了一种老掉牙的飘带题辞格式：'爱哉，痛哉，永志不忘。'从此，这种题辞就成了一种今天称之为畅销货的东西，可以使飘带长期使用，直到旧得实在无法再翻新和熨烫为止。即使是极为罕见的署名，例如'你的古杜拉'，

也都予以保留。”

克雷默尔对上述情节作了如下补充："不错，是这么回事，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们另外加班加点，以免引起别人注意。他总是说，这又不是什么盗墓，东西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随他怎么解释，我反正不在乎。我们得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外快。再说：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让花圈扔在垃圾堆里白白烂掉，有什么好处，对谁有好处呢？不过后来到底还是有人告发，罪名是亵渎陵墓和盗窃死人财物。原来，也有一些人，在葬礼过后三四天再回来看看，竟然发现他们送的花圈已不翼而飞。不过事发之后，他倒又是好汉做事好汉当，一个人全部包下来，没有连累我们，连格龙奇都不拉扯上。我从一个熟人处听说，他非常巧妙地搬出了反对所谓'浪费小钱'这一全民族之大敌作借口。他承认自己做了'某些不规行为'，给一所疗养院捐献了一千马克，就此了事。据一个熟人告诉我，他还——开始时案子没有正式上法院，只是在同业公会里，后来才移到一个党内名誉仲裁法庭处理——，他还振振有词地说：'诸位先生，诸位同志，本人进行战斗的这条战线，是诸位之中多数人不了解的。同样，在诸位之中多数人比我更了解的那些战线上，不是也有未便事事斤斤计较的时候么？'此后有一段时期，他的确偃旗息鼓，没有再干。到了四四年底，举国大乱，就再也没有谁来注意花圈飘带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了。”

第七章

笔者鉴于老格龙奇发出的邀请既热情诚挚，又未加时间限制，因而先后多次登门造访，与主人共同分享人间天上的安静宁谧。时当夏季黄昏，天气很热，围墙之内的陵园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下面引用的格龙奇的谈话，全系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开始，并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结束的四次采访的总结。这四次采访地点各不相同：第一次是坐在一株接骨木树下的长凳上，第二次在一棵夹竹桃下，第三次在一棵栀子树下，末了一次则是坐在金雀花丛里（老格龙奇喜欢变花样，声称还有更多的长凳摆在更多的灌木丛中待用）。宾主一边抽烟，一边喝啤酒，间或凝神侧耳，谛听那远方传来的依稀可辨的大街上的喧嚣声。

第一次采访（接骨木树下）记要："我们的小瓦尔特谈到了发财的机会，说来确实滑稽可笑。这种机会他是从不放过的，早在他十九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个军需连服役时，就是如此。军需连？嗯，是的，他们在战斗结束后负责打扫战场，也就是说收集可供部队使用的种种物资：钢盔呀，各种枪支呀，弹药呀，甚至还有大炮。每一只军用水壶，每一顶丢掉的帽子、皮带等等，就统统都在收集之列——，当然战场上还有横七竖八的死尸，而死尸口袋里多半总会有点东西的：照片呀，信件呀，皮夹子呀——皮夹子里面往往有钱。小瓦尔特的一个同伙告诉过我，他可是天不怕，地不怕，连死人嘴里的金牙也不放过。不管什么

国籍的死人，但有金牙齿都照敲不误——何况当时欧州战场上确实第一次出现了美国人——，于是，我们的小瓦尔特也就第一次在死尸身上施展他自己所说的生财之道的本领。当然，干这种事情是严格禁止的，可是人们——但愿不包括您——往往错误地以为，只要是明令禁止的事情，就不会有人去干。小瓦尔特的长处就在于此：他并不顾忌什么军纪国法，只是注意别叫人抓住。就这样，小伙子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一笔不小的财回来了，当时他十九岁，腰里揣着沉甸甸一包美元、英镑和比法两国法郎，还有一小包黄金。回家后，他又再次施展他的生财之道的本领，把本钱押在不动产上，用在房地产上；尤其是喜欢空地皮——我指的是尚未盖房子、而不是未种植花草的土地——，必要时他也购买已经盖了房子的地皮。那个年头，美元、英镑非常值钱，地皮、特别是靠近市区的地皮非常便宜。他选择尽量靠近交通干值的地段，东购置一块，西购置一块，再到市中心买下几所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小房子。料理停当以后，我们的小瓦尔特就出门去从事和平事业，要是您同意这样说的话：他去帮美国人扒尸迁坟，将美国兵的尸体挖出来，装进锌皮棺材运回美国去。干这一行，就中可以半明半暗地做手脚，因为挖出来的尸体，有的嘴里也有金牙。由于美国人讲究卫生，怕接触死人，出大价钱雇人扒尸迁坟。于是，在美元头寸吃紧的那个年月，又有许多美钞合法和不合法地跑进了我们这条汉子的腰包，他又买下了几小块地皮，很小的几块土地，这一次是在市中心区，那里有许多小食品商和手工业者倒闭。”

夹竹桃下的谈话纪要：“我是十四岁那年开始跟老佩尔策学手艺的，当时瓦尔特才四岁，我们大家，包括他父母，都叫他小瓦尔特，一直叫到今天。老两口是好人，他的母亲虔诚得有些过

分，老是上教堂；父亲是个坚定的非基督教徒，您想想，这在一九〇四年的时候意味什么问题。不用说，他读过尼采的作品，读过斯特凡·盖欧尔格[1]的作品，他倒说不上是个想入非非的人，只是脾气有些古怪，对买卖不怎么特别关心，专搞栽培和试验，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他不仅想搞出兰花[2]，而且想搞出新的花。他从一开始就参加青年运动，也把我拉了进去，直到今天，我还能一字不差地唱《劳动者》这首歌。"（格龙奇唱：）"'是谁开采出黄金？是谁挖出矿石？是谁织成布帛绸缎？是谁种出粮食葡萄？是谁养活富人而自己挨饿受冻？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是谁从早累到晚？是谁创造财富供别人享受？是谁一手推动世界车轮前进而政治上却无权？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

"至于说到我自己，当时我是个十四岁的孩子，从您可以想象得到的最穷的艾费尔穷山村，到海因茨·佩尔策这里来学手艺。他安排我住在花房的一间小屋子里，床铺和桌椅都紧挨着炉子；管吃，还有几个零花钱。那阵子，他自己吃的也不见得比我好，钱也不见得比我多。我们俩都是共产党，但我们既不认识这三个字，也不真正懂得这三个字的意思。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〇年，我应征入伍，去的那个地方当然是冰天雪地的故乡，他们把我送到布罗姆贝格[3]。那时佩尔策的妻子阿都尔海德经常给我寄东西。轮到休假时，我上什么地方去呢。我没有回自己的老家，没有回到那个处在教士统治下的穷山沟，而是上佩尔策这儿来。那个时候小瓦尔特老是跟着我们在园子或花房里钻来

---

[1] 斯特凡·盖欧尔格(Stefan Georg, 1868—1933)，德国诗人，象征派，极力宣扬为艺术而艺术。

[2] 兰花是浪漫主义的象征。

[3] 布罗姆贝格，现波兰的比得哥煦。

钻去玩，小家伙长得很俊，秀气，又懂事，又不懂事。告诉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养成了和他老子完全不同的性格：胆小怕事。当时，三天两头遇上麻烦事情，一是执达员经常登门，二是不能兑现的期票，有时连我们当下手的，也把省吃俭用积攒的几个钱拿出来，凑给老板应付过关。当时开花场并不是什么赚大钱的行当，只是后来花狂征服了整个欧洲，才赚大钱。而海因茨·佩尔策始终一门心思栽培新品种。他说，新的时代需要有一种新花，他指望能研究出一鸣惊人的品种，虽然他象一个发明家一样，神秘地围着他的盆盆钵钵和花坛转了好多年，施肥、剪枝、嫁接，但长出来的尽是些四不象的郁金香或变种玫瑰，难看的杂交品种。嗯，小瓦尔特六岁开始上学时，脑袋瓜里只望到一个'员'字，这是他对执达员的简称。'妈妈，今天员来吗？爸爸，你说今天员又会来吗？'我对您说，他这是害怕，怕成了这副样子。当然，他没有上完中学，连三年级也没念完，就到花场去当学徒了，这是一九一四年的事。老实说，一九一四年不仅是瓦尔特的中学生活的结束，而且一切的一切都完了。这一年我二十四岁，我知道自己所说的话的意思，我是说：德国的社会主义，不管是什么派，都完蛋了，完蛋了。那些白痴，竟会那么容易上他们那个甜言蜜语的混帐皇帝的当！这一点，连海因茨即瓦尔特的父亲也看穿了，他终于下决心割爱，不再搞他那半吊子的试验了。他还象我一样免不了应征入伍——由于生气，可以说是由于恼火，由于伤心，由于愤怒，我们两人都当了中士。我讨厌那些新兵，那些刚入伍的小兔崽子，他们都受过地道的奴化教育，一副奴才相，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叫人讨厌。我憎恨那些家伙，存心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是的，我可厉害哪，把他们一群一群、一队一队地赶出哈克托伊尔营房——这个营房同布罗姆贝格营

房一模一样，毫无二致，你蒙住眼睛也可以找到三连连部——，让他们成群结队进行操练，然后把他们送上前线。当时，我的信夹子里有一张罗莎·卢森堡的小相片。我将它象小圣像一样带在身上，后来象小圣像一样，一直带旧了。我没有参加士兵委员会，没有：一九一四年对我来说意味着德国历史的结束——后来，不用说他们将卢森堡杀害了，是社会民主党那些老爷们指使人杀害了她——，后来，连我们的小瓦尔特也上了战场，攥金牙和捞美钞也许倒是唯一的聪明做法。他母亲阿德尔海德是个和蔼可亲的女人，从前长得很漂亮，但不几年就变得难看了，鼻子又红又尖，嘴边布满了痛苦忧郁的皱纹，我一看到这种神态的女人就难过。我的祖母是这种神态，母亲也是这种神态，这些美丽的脸上只还留下痛苦、忧郁，她们只听那些该死的教士的话，一清早就去做早祷，下午又带上念珠出门，晚上还要去一次——当时我们经营盆栽棕榈之类的出租业务，因此经常得去教堂或墓园礼拜堂，我们就靠阿德尔海德同教堂的关系大沾其光，经常参加团体集会或工商企业的庆祝活动——说实话，我一走到祭坛跟前，就恨不得朝上吐口水，只是看在阿德尔海德的分上才忍住没吐出来。后来，海因茨也开始纵酒了……至于小瓦尔特，我当然是看着他长大的。当时他经常不在家里，先是在外面给美国人扒尸迁坟，以后到义勇团里混了半年，我记得是在西里西亚①，接着在城里待了一段时间，改行拳击，是职业性的，不过没干多长时间。短时间内还当过王八——起初是给请一杯二十个芬尼的咖啡就可以入捞的低级野鸡，后来才给高级一点的妓女拉客。

---

① 西里西亚，指现今波兰西南（奥得河与尼斯河之间）和东德东南一带地区。

之后他确实加入了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过也没干多久。他这个人向来不大爱讲话，眼看自己的不动产收益不多，他也不着急。他从来不栽花种草，因为干这一行一双手长年不干不净，会损伤皮肤——而我们的小瓦尔特一向是很讲究的，一向讲究保养身体：他每天早起跑步，接下来冷热水淋浴，家常早餐有麦芽咖啡和什锦果酱，可他还嫌太差劲，一抬腿钻进了他那些婊子进出的咖啡馆，点上鸡蛋、地道的咖啡和一杯白兰地——这一顿，事后照例由姑娘们的嫖客掏腰包。当然，他还老早就有了汽车，虽然只不过是一辆哈诺马格牌。”

栀子树下谈话记要："他对自己的父母一直不错，的确不错，我相信他是真心爱他们的。他从未顶撞过自己的母亲，连一句挖苦的话也没有说过。可阿德尔海德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了，她终于不是死于悲伤，而是死于暴躁。这个忧郁的女人，真可惜——原来长得漂漂亮亮，如花似玉，一九〇四年我进花场时，她的确是个快快活活的女人，穿戴打扮整整齐齐。到后来，每逢瓦尔特和我们将盆栽棕榈送进教堂，摆到祭坛周围时，说来您也许不相信，他总要冲着祭坛下跪，把手伸进圣水盆里……动作非常利落。后来到了三二年，小瓦尔特进了冲锋队，三三年初，参加搜捕政界闻人①，不过他没有抓过谁，而是专门捞进帐，只要交出金银首饰和现款，他一概手下留情，放他们走——这桩买卖油水肯定相当厚，他很快就有了一辆新汽车、新衣服；同时，犹太人的地皮也便宜得很，于是他东买下一间小铺面，西买下一处宅基，这就是他自己后来承认的'有点辣手'。而且，他摇身一变，

① 指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希特勒制造火烧国会大厦事件，开始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人士。

成了一个非常文雅、衣冠楚楚的绅士，手指甲修得光洁晶莹，钱就更不用说了。三四年，他娶了普鲁姆特尔家的姑娘埃娃。您知道，她是一个有抱负的姑娘，人品不错，只是有点歇斯底里；她的父亲开钱庄，办理分期偿还的贷款业务，后来又开了几家当铺——女儿则爱看里尔克的作品，又喜欢吹笛子。结婚时，她的嫁妆中也有几块地产和一包现钞。三四年后，他当上了名誉突击队中队长，但自己不参与声名狼藉的勾当，也不做伤天害理的事，这一点是不能说他的，只是一个劲地买地产。说来也奇怪，他钱愈多，也就变得愈有人情味，就连在水晶夜①，他的身上也干干净净，一尘未染。那时候，他只是上音乐咖啡馆去坐坐，看看歌剧（当然是包座），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视同心肝宝贝，大的是儿子，取名瓦尔特，小的是女儿，取名埃娃。后来到了三六年，他终于接管老头子经管花场，因为海因茨长期酗酒，果然精力衰竭，抱恨死去——从这时起，我帮小瓦尔特主管业务，我们开办了花圈工场，接受党交下来的花圈定货。他把花场的一部分送给我，这直到今天还是我的私产，应该承认他是慷慨大方的，没有讲过一句刻薄话或小气话。海因茨和可怜的阿德尔海德长眠地下后，佩记花场的生意越来越兴隆。”

金雀花丛谈话记要："有人认为，要说瓦尔特是纳粹，就连纳粹分子听了也会生气的。四四年年中，莱尼和俄国人的事情公开化了，这时，他也变了一个人。他对他们两人的好事非常操心，又是打电话，又是谈话。和过去不同的是，瓦尔特变得喜欢

① 原文为 Kristallnacht，指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夜至十日凌晨法西斯纳粹发动的有计划的大规模迫害犹太人暴行，对犹太人工商企业和住宅疯狂打砸抢，焚烧犹太寺院，捕杀犹太人种。

沉思默想了。他也知道：战争大势已去，如果好好对待一个俄国人和格鲁伊滕姑娘，战争结束之后，他是决不会吃亏的——但是，战争还会打多长时间呢？这可是叫我们大家都坐立不安的问题啊：最后这几个月里，三天两头有人被绞死或枪毙，要想熬过这一关，不管你是老纳粹也好，不是纳粹也好，都无把握——他娘的，美国人花了那么长时间，几乎整整半年，才终于从亚琛[1]打到了来因河。我想，这位心广体胖，沉着稳健，对两个孩子爱如珍宝的小瓦尔特，现在有了某种自己从来没有过的体会了：内心冲突。他住在郊外的别墅里，养了两条喂得光滑流油的狗，带着两个粉装玉琢似的孩子，拥有汽车以及越来越多的地产。老地产他已经卖给别人造住房和兵营，不是卖现款，不，他不太看重现款，而是专干实打实的事。他的办法是抛出老地皮，换进离市里更远的地皮，一进一出，面积就翻了一番或两番。他真是个乐天派，十分注意养身之道，坚持每天早上在街心花园跑步，淋浴，享用丰盛的早餐——现在是在自己的家里用早餐了。遇到非进教堂不可时，他始终（或者说重又）毕恭毕敬地下跪，或者急急忙忙在胸前划十字。但是，眼前的问题是这个莱尼和这个博里斯，他喜欢这两个人，他们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工人，有着有势力的后台，可他却不知道这个后台是什么人——同时，另一方也是有势力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一个人绞死、枪毙或关进集中营。不过请别误会，我这样说，并不是指小瓦尔特有了什么翻然悔悟，象有些人所说的良心发现，也不是由于害怕或好奇，突然之间开始意识到那个奇怪的、直到今天他还无法理解的生词（或新大陆），即人们常说的所谓道德。不是的，不是的。他这

[1] 亚琛，德国西部与荷兰、比利时接壤处城市。

个人，内心深处向来不存在什么冲突，有的只是外界的一再出现的纷扰（因为党内或冲锋队内有时也对他不满，也有使他恼火之事），他在这种情况下发了财。从战地军需连开始，到三三年索取现款首饰放走政界要人等前前后后所作所为中，他时常遇到麻烦。有人告到党内法庭和普通法院，特别是他后来在花圈和飘带的使用上做得太过分的时候，告状的就更多了。麻烦的确不少，但他不管什么麻烦，硬着头皮干，不动声色地一关一关闯过来。他用的方法是，强调说明他的活动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说明他是孜孜不倦地反对当时被称之为'浪费小钱'这种全民族之敌人的。麻烦是不少，但在对他有利的事情上，他的内心深处从来不存在冲突。对他来说，犹太人也好，俄国人也好，都无所谓；共产党也好，社会民主党也好，其他什么党也好，一概不在乎——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一种势力与另一种势力碰到一起了，他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再说，他对博里斯和莱尼还深有好感，甚至——多么巧合呀！——他们俩还是他的摇钱树哪。战争失败与他无关，什么政治，什么'德国人民生死存亡的斗争'，他一概不感兴趣——可要命的是，谁能告诉他，四四年七月距离战争结束还有多长时间呢？他深信，按战争失败的方向改弦更张是不会错的，但究竟应当从哪一天起，究竟能够从哪一天起着手改弦更张呢？"

在这里，总结一下看来是适当的，还有几个问题必须由读者自己回答。这里首先提供一些统计数字和外表情况。谁以为佩尔策是个嘴叼雪茄、有些不修边幅的人，那就错了。他过去（至今仍然）非常整洁，衣裳剪裁合体，领带一直很时髦，虽然佩尔策

年已七十，系上这种时髦领带仍合适得很。他抽的是香烟，过去和现在完全是一派绅士风度，即使前面提到过他吐过一次口水，那也必须补充说明：他只是偶一为之，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见，况且这一次纯系事出有因，起了历史性的画龙点睛的作用，可能还意味着表态。他住在那所自己不承认是别墅的别墅里，身高一米八三，据他儿子——医生，负责给他治病——声称，体重为七十八公斤，有一头浓密的头发，原来是黑色，现已略显花白。这还能说不是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表率么？几时见到他有L.2、落T.和W.的时候呢？虽然似乎他有着一种几乎是绝对泰然自若的自信感，但本书第三章提到的有关L.1的八种形容词中，没有一种适合于用来形容他的L.1。经常可以看到他面带笑容，但更象蒙娜丽莎而不象如来佛祖。倘使人们认定，他是一个不提外在冲突、不知内心冲突为何物、一九四四年四十四岁以前根本不存在内心冲突、把他父亲的花场扩大五倍并笃信"耗子也能撒金蛋蛋"的人，那么，必须看到，他在四十有四壮龄之际，破天荒第一次丧失了绝对泰然自若的自信感，战战兢兢地踏上了新大陆。

如果再看看他的显著特征之一，即信欲旺盛几乎达到不合情理的地步（他用早餐的习惯与莱尼完全相同），人们不难想象，四四年年中起他会踏入什么冲突。如果再看一看他那异乎寻常的充沛精力，人们可以想象，四四年七月后他会陷入何种冲突。笔者现在掌握一份重要的详细情报，足以生动说明佩尔策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的表现。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正当美国人兵临城下的时候，佩尔策写了一封信挂号寄出，书面声明退出党和冲锋队，与这个组织的罪行划清界线，声称自己（笔者处有此信的正式副本可查）"是一个受蒙蔽误入歧途的正直的德国人"。

他一定是在美国人入城的前夕闯进了一所还开门营业的德国邮局，或者至少找到了一个有权开收据的德国邮局职员。就连挂号信的回执也未丢失，尽管上面的一只破老鹰使之大为逊色。无怪乎美国大兵入城时，佩尔策可以如实地宣称，他已经不是纳粹组织的成员了。他还领到了一张执照，开他的花场和花圈工场，因为尽管死人数目从此大大减少，丧葬业务仍在继续进行。“死人总归是有的。”这就是佩尔策对他的这个铁饭碗所作的评语。

但是，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眼下是四四年，他还得熬过几乎整整一年，战争才能结束。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每当别人要求给予照顾（休假、预支、工资补贴、额外给花）时，他总要先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这句话所说次数之多，得到花圈工场所有至今活着和可以找到的证人的证实。“这句话几乎成了他不离口的祈祷文（赫尔特霍内语），那口气简直好象对天明誓，似乎唯恐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不是不近人情的人。而且，他讲这句话有时简直牛头不对马嘴，例如有一次我问他老婆孩子都好吗，他却回答：‘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另一次，有谁——我记不起是哪一个——问他那天是星期几，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二，他也答上一句：‘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大家都学着他讲这句口头禅逗乐，甚至连博里斯也不例外——当然不敢过于放肆——，每当我送花圈去叫他给飘带写字时，他也学着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瓦尔特·佩尔策的变化，单从心理角度分析，就够有意思的了。”

克雷默尔给佩尔策这句祈祷文似的口头禅的作证，充分说明了它次数之多和奥妙之深：“他讲的次数实在太多了，听的人根本不当一回事，就好象进了教堂念‘上帝与我们同在’或‘主啊放免我们的罪’一样。到后来，他还采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

‘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一是‘难道我是不近人情的人吗?’”

格龙奇(这是后来一次短促访问，惜乎不曾愉快地坐在接骨木树之类的绿荫丛中交谈)作证：“对的，是这么回事。‘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和‘难道我是不近人情的人吗?’——有时，他甚至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这样唠叨。这种话我们经常听到，左耳进，右耳出，根本不放在心上，因为这在他那里几乎成了理所当然的，就象人要呼吸一样。我说呀(格龙奇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八成是肚皮里那些金牙在作祟，叫他感到有点不好受了哩，还有那些不干不净的花圈、飘带、鲜花和地皮——他一直继续吃进地皮，战争时期也未罢乎。此外，您有便时不妨想想，两把，三把，也许是四大把不同国籍的金牙，起初怎样变成一块并不怎么吸引人的地皮，可是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这块地皮上却盖起了联邦国防军的办公大楼，小瓦尔特坐收一笔为数可观的租金哩——”

更有甚者，我们业已查明再次在瑞士出现的那位前魏玛共和国政界闻人的行踪，不过只是他的遗孀。这个年迈体弱的女士，住在巴塞尔的一家饭店里，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的遭遇。“就我们来说，最主要的一点是，多亏他手下留情，的确多亏了他。是他救了我们的命——不过您也得想想，在那种年月，能够救人一命的人，本身决不是等闲之辈。人们往往只看到做好事一面，而想略了另外一面：戈林不是在后来声称，他也曾救过几个犹太人的命吗?因此您不要忘记：什么人才有本事救别人的命呢?一条人命取决于那样一种慈悲，可见独裁统治又专横到了什么地步呢?事情真相是这样：我们当时待在巴特格德斯贝格朋友家的一所别墅里，三三年二月的某一天，他们破门而入，这个人——

他叫佩尔策吗？可能就是，我始终不知道他的姓名——象强盗一样，狠心地叫我交出全部首饰、现款，甚至还要我们开一张支票，不是作为贿赂，不是的，您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我的摩托车就停在后花园门口，我把它卖给你们，并且指点你们一条生路：你们乘摩托车进艾费尔山，绕过萨尔布吕肯到边界上，到了那里，再找个人帮忙把你们送过去，千万别往比利时或卢森堡那边走。我可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说，‘当然，问题在于我这部摩托车你们认为是否值这么多钱，你们会不会开。这是一部青达普牌。’幸好我丈夫年轻时是摩托车迷，但那也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您就别问我们是怎样取道阿尔特纳尔，经过普吕姆到特里尔的，我是坐在后座上——嗯，我们在特里尔幸好找到了党内同志，他们——不是亲自出马，是通过第三者——把我们送到了萨尔地区——不错，我们亏了他才没有死——但我们的性命也捏在他的手里。好了，请您别再向我提这件事了，您请便吧。我根本不想知道这位先生的姓名。”

佩尔策本人几乎毫不否认所有这些事情，只是作了与别人不同的解释。由于他特别健谈，也迫切要求谈，所以只要他愿意，笔者可以随时打电话找他，登门拜访，与他叙谈。必须再次提请读者切勿忘记一点：佩尔策给人的印象，毫无暧昧、肮脏或可疑之处，而是堂堂正正派派：人们完全会把他当成一位银行经理，一位董事长。如果有人介绍他是一位已退休的部长，人们甚至还会对他已经退休感到大惑不解，因为他压根儿就不象七十岁的人，而是象六十四岁① 的人；说他六十一岁，也不会没有人相信的。

谈到他在军需连的活动时，他既不回避，也不否认，也不承认，而是作了一通颇富哲理性的解释："告诉您，如果说我这个人一生一世，直到今天还对什么事情痛恨的话，那就是毫无意义的花销，我是强调：毫无意义——花销本身是好事，只要值得和事出有因的话：例如解囊相助呀，慷慨馈赠呀，或者诸如此类，可如果是毫无意义的花销，那是会使我恼火的。象美国人那样处理他们的死人，我认为就属于'毫无意义的花销'——比方说吧，有那么一个名叫吉米的，一九一九年死在贝恩卡斯特尔的军医院，本来已经就地埋葬了，到了二二年或二三年，再又将他刨出来运往威斯康星州，得花掉多少运费和人力物力啊？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必要，将夹在死尸骨头中的每颗金牙，每只结婚戒指，每根护身金链统统一道运走呢？而且，您以为，我们几年以前在利斯河畔和康布雷[2]战役后从皮夹子里抄到的东西，您以为，即使我们放着不拿，那些美金会送到比连部或营部更上一级的地方去吗？再者：一辆摩托车的时价，取决于具体历史形势和这种历史形势下摩托车需要者袋袋里的钱包嘛。

"天理良心，难道说我没有用行动证明过我也能慷慨大方吗？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计较过个人得失吗？您能判断，从四四年年中起，我的处境有多么危险吗？为了成全这两个年轻人得到短暂的幸福，我自愿地有意置公民义务于不顾。我看见她怎样握他的手，后来又发现他们几次三番钻进后面那间花房中去，在里面待上三四分钟——花房里堆放着泥炭、干草、石

---

① 德国男子退休年限为六十五岁，此处指人们认为他还不到退休年龄。

② 康布雷，法国北部地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九一七年曾于此进行激战，首次使用坦克。

楠和各种扎花圈的材料——别人显然真没有注意到的事情，象空袭时他们俩常常一躲就是一两个钟头，您以为也会瞒过我的眼睛吗？而且，我不仅违背了作为公民的义务，也违背了作为一个男人本能的情欲，因为我坦白承认——我从来不掩饰我有性爱之趣——，我自己早就看上了莱尼，的的确确看上了她。直到今天，您尽可以对她讲，今天我仍然对她感兴趣。是啊，我们这种扛过大枪和吃园艺饭的人，有时候很粗野，想当年，象今天这样描写得含蓄、复杂和隐晦曲折的把戏，我们明打明称之为'肉搏'——为了让您知道我这个人生性坦率，我重复自己当年的讲法和想法。我真想同莱尼捉对儿'肉搏'哩。不只是作为公民，不只是作为领导，不只是作为党员，单是作为一个男人，我也付出了牺牲哪。虽然，从原则上说，我反对领导和女工相好、胡搞，或者肉搏——随您用什么字眼都一样——，可是轮到我自己时，我就不管这一套了，我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心血来潮我就下手。有几次，我同女孩子们发生了麻烦，年轻的也好，年纪大一点的也好，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有个叫阿德勒·克雷滕的，她爱上了我，被我把肚皮搞大了，硬要和我结婚，叫我同老婆离婚等等。可我这个人向来坚决反对离婚，认为这不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于是，我给阿德勒在霍亨索伦大街专门开了一爿花店，好好抚养孩子。现在，阿尔贝特早已是实科学校[1]的正式教师了，阿德勒则是一个贤慧的女人，生活过得很好。当年耽于幻想的她——象我们这一行的说法，她是一个眼光远大、热爱自然

---

[1] 大致相当我国的十年制中小学，学生上四年小学后，再在实科学校学习六年。有的实科学校包括四年小学阶段，有的只有六年中学阶段。实科学校介乎主要学校(Hauptschule)和完全中学(Gymnasium)之间，以前也称"中间学校"。

的园艺师傅——如今变成了脚踏实地、业务上精明能干的女人。为了博里斯和莱尼两人的事情，我从四四年年初起就害怕得虚汗直淌。请您找旁人打听打听，随便找哪一个都行，看看有谁会说我是个不近人情的人。”

果然不错，没有一个有关人物能令人信服地断言佩尔策是个不近人情的人。只是这里需要指出，并立此存照：佩尔策当时的害怕和虚汗直淌，都是杞人忧天。他未免操之过急，以致白白担了六个月的虚惊。对此，还希读者暂勿忙于追究，后文自会交代清楚。佩尔策的那间玻璃办公室（还可以参观，格龙奇今天用来作发货部，里面堆放着包扎妥当待运的盆花和供圣诞节陵园中用的枞树）坐落在整个花场的正中央：按准确的结构布局来看，玻璃办公室东、北、南三面，各与一间花房相连，坐在办公室里，佩尔策可以一清二楚地登记三间花房中的花花草草（后来改由博里斯登记），登记好以后，一部分送花饰组供扎花圈用，一部分送格龙奇——那时候我们还供应少量鲜花，供扫墓的顾客定购，由他专门负责接待。再有一部分则供应流动花贩。办公室西面——与其他三面宽度相同——是花圈间，花圈间有两扇门通南北两间花房。这样，佩尔策坐在办公室里，自然能看清外面的任何一点动静。至于实际上映入他的眼帘的，则是博里斯和莱尼时而一前一后上那间男女合用的厕所，或者是到南面一间或北面一间花房里去拿材料。佩记花场的防空设施，当地防空监视哨冯·登·德里施再三指出，简直是“犯罪”；勉强合乎规定的距离最近的一个防空洞，设在二百五十米左右外的市陵园管理所办公楼里。另一条规定是，犹太人、苏联人和波兰人一律不得

进入这个防空洞。极力主张按这条规定执行的，不难设想当然是克雷姆普、万夫特和舍尔夫三人了。可是，万一英国炸弹或美国炸弹凌空呼啸而降时，一个苏联人往哪儿躲呢？因为炸弹虽然不是存心要炸苏联人，可它们究竟没长眼睛呀。当然，一个苏联人挨炸弹根本没啥了不起。按照克雷姆普的说法是："少掉一个，有何不可呢？"（克雷默尔可以作证）不过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当德国人的生命在防空洞中受到（即使只是假设的）保护的时候，又由谁来看住这个苏联人呢？难道能够让他一个人待在外面，好乘机达到人人都懂得的、尽管并非人人都能享受的自由吗？到底还是佩尔策厉害：他干脆拒绝钻防空洞，理由是——连市防空部门也私下认为言之成理——"这种洞洞顶个屁用，只不过是一口棺材"，遇上空袭，他留在自己办公室里，保证不让这个苏联人"轻易"溜之大吉。"我毕竟当过兵，明白我的责任。"至于一生一世从未进过防空洞或地下室的莱尼（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她也与佩尔策见解相同），则表示"情愿干脆上墓地去等警报解除"。后来结果是，"各人自己随便找个什么地方躲一下了事，连这位可笑的冯·登·德里施提抗议也无济于事，他打报告向上面告状，也让小瓦尔特运动一个好朋友干脆中途给扣了下来"（格龙奇语）。"陵园管理所的这个防空洞完全是一只骗人的、活活闷死人的大板箱，不过是间普通地下室，浇了一层几厘米厚的水泥，装装样子罢了，落个燃烧弹也能一穿到底。"因此，空袭警报嗷嗷一叫，花场就乱成一团：活儿不得不停下来，苏联人不得随便乱动，其他人则"四处"逃命。只有佩尔策留在办公室坐镇，看住博里斯，间或抬头瞅上一眼挂钟，为白白逝去的生产时间叫苦，因为吃亏的是他。加以冯·登·德里施经常批评佩尔策的办公室百叶窗露光，违反灯火管制条例，他"后来索性把灯关

掉——于是，空间一片漆黑”（格龙奇语）。

那么，在一片漆黑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在四四年年初佩尔策虚汗直淌的时候，博里斯和莱尼已经开始“肉搏”了吗？

玛格丽特是莱尼私生活的唯一知情人，根据她的介绍，可以将博里斯和莱尼的爱情关系，作如下颇为详尽的概括：莱尼自从首次握手示情以后，经常晚上来看玛格丽特，后来甚至在她那里住，并且又变得“健谈”了——就象博里斯在博加科夫面前变得“极为健谈”一样。诚然，博里斯向博加科夫透露的秘情，不如莱尼告诉玛格丽特的那样详尽，但只要不存心钻牛角尖，应该说两者是完全吻合的。反正迄今干事情一向讲求实际的佩尔策，如果说在四四年年初就“虚汗直淌”的话，那么他一定是非常不实事求是的。要知道，直到四四年二月左右，即握手六星期后，他们才说出关键的一句话啊！有一天，莱尼在厕所门口急急忙忙凑到博里斯的耳边说了一句：“我爱你”，他赶忙悄悄回答：“我也爱”。对于他这句省略句的语法错误，我们必须原谅。因为按照德语语法，他应当说：我也爱你，也许是赶在匆忙兴奋的劲头上，忘记了这个及物动词还要求有个宾语。不管怎么说，莱尼反正听懂了意思，这就行了，虽然“这个当口上正好外面该死的礼炮声震天价响”（玛格丽特重复莱尼的原话）。初吻大概在二月中旬，这一吻吻得两人心醉魂迷。第一次“同房”（莱尼用的字眼，由玛格丽特证实）或第一次“交际”（博加科夫用的字眼），据查证直到三月十八日那天，趁白天躲警报的机会才得以实现。这天的空袭从十四点零二分开始，一直到十五点十八分，敌机只投了一枚炸弹。

说到这里，必须消除一种虽然易于置信但毕竟毫无事实根

据的猜测，即莱尼笃信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观。莱尼具有来因姑娘的那种少有的直率性格(她本来就是来因人，而且是经赫尔特霍内太太“证实”的来因人，这可不简单)，只要她喜欢一个人，或者只是感到找到了自己意中人，她就愿意立即投入他的怀抱，乃至于“柔情蜜意，极尽风流”，根本用不着教会或国家发给什么执照。现在，他们俩不仅相亲相爱，“如胶似漆”(博加科夫语)，而且博里斯发现莱尼欲火如焚，他向博加科夫透露说，“她是主动的，主动的——而且有一种——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亲近劲”。可以肯定，他们双方都渴望同房或彼此“交际”，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只是迫于环境，需要谨慎小心，就象是一对情侣，从相反的方向各自越过宽一公里的布雷区，向对方跑去，以便找到一处三至四米见方的无雷地带，方能双双“摆平”或捉对儿肉搏。

赫尔特霍内太太说：“这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速度快似火箭，只是保存自己，或者更主要的是保存对方的强烈愿望，才使他们不至于草率从事。原则上我是反对‘搞关系’的，但鉴于具体历史政治条件，我同意两人情况特殊。而且我还违背自己的道德观，希望他们找一家旅馆，至少到公园里去，哪怕是寻个门楼角落之类的地方也好——唉，战争期间，确实连放垃圾桶的墙角落，也成了幽会的好地方——那时候，我得补充说明一下，我认为搞关系是不光彩的事，今天我开通得多了。”

玛格丽特说：“莱尼对我说：‘告诉你，我一张开眼就看到警告牌：小心，生命危险！’此外，您还得明白，两个人是很少有机会谈心的。莱尼深深知道，短时期内她还得采取主动，不顾一切清规戒律，这已经是胆大包天了。对这些清规戒律，连我在当时也

不敢违背。我从来不主动找男人搭讪，因为两个人谈话不可能纯粹是谈情说爱，必然要涉及双方的各种情况，打听某些事情。两个人要想背着别人哪怕是在一起待上半分钟，也很不容易办到。后来，莱尼索性在厕所和泥炭堆的中间，挂上一块麻布片作帘子，当然不完全钉死，而是在上面别一根敲弯的钉子，必要时用它可以将帘子挂上，这样就隔出了一个小房间，以后他俩有俩，可以在里面摸摸脸蛋，亲亲嘴。尤其大胆的是，她竟敢贴到他的耳朵边上叫'我的心肝'哩。要谈的事情才多哪！家世、心情、集中营的情况、政治、战争、伙食，无所不谈。当然，她与他也有业务上或工作上的联系，要把扎好的花圈送到他那里去，每送一趟，大概需要半分钟时两，借这个机会，他们大概可以咬上十秒钟耳朵。有时俩，他们俩也要一起到佩尔策的办公室里去有事，例如，登记用花数字呀，盘点飘带柜存货呀，这些都是无俩事前约好的。在这种场合下，又可以多谈上一分钟话。他们想必是利用省略语打哑谜，但这需要事先约定好内容才能心照不宣。俩如，博里斯说个'两'字，莱尼就知道是指这一天集中营里死了两个人。自然，在那种事实上纯属多余、但对情侣来说却少不了的问题上，象'你还爱我么？'之类的情话，他们也要花去不少时间，而且也只能打哑谜。比方，博里斯说：'一直还——象我么？'莱尼就知道，这是问'你还象我爱你一样一直爱我么？'，她就可以脱口而出'是，是，是'——这几个字当然花不了很多时间。不用说，有时候她也得破费几支香烟，讨好那个一条腿的纳粹分子——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但这样做必须小心又小心，免得使他产生误解：这既不是对他有意思，也不是收买他，只不过是同事之间惯常的客气而已。由于她给这个纳粹分子送了四五支烟——大概在四星期内——，她也就可以公开给博里斯

递上一支了。遇到这种时候，佩尔策往往会招呼大家，'孩子们，到外面去休息休息，呼吸新鲜空气，抽抽烟'，这样，博里斯也可以出去，在室外大大方方抽上一支——他们俩有时就可以大大方方交谈两三分钟，当然，这些话别人是听不懂的。有时候，那个纳粹分子或那个讨厌的女人借口生病不来上班，有时候他们两人同时缺勤，特别是遇到三四个人同时生病请假和佩尔策外出有事，那可是天赐良机，这时博里斯登记飘带帐，莱尼登记用花帐，他们就可以堂堂皇皇地在办公室泡上二十分钟或者十分钟，可以好好地谈一谈，谈自己的父母，谈身世，莱尼谈阿洛伊斯，等等。这样，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相信，他们已经象莱尼自己说的那样同过房了，而这时候的莱尼，连他姓什么都还不知道哩。'干吗'，她对我说，'干吗非得去问那个，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谈呢。而且我告诉他，我姓格鲁伊滕，而不是身分证上写的普法伊费尔。'为了能给他正确地介绍战局变化，莱尼可说是狠下了一番功夫钻研，她把我们收听英国广播得到的消息，一一记入一本地图册。而且我告诉您，她很熟悉情况：四四年一月初，战线还在克里沃罗格附近，三月底在卡缅涅茨-波多尔斯基[1]打了一场围歼战，到了四四年四月中旬，俄国人已经兵临伦贝格了。她还了解，西线的美国人已经到达阿弗朗什、圣洛和冈[2]。十一月里，她早已身怀有孕了，一直对美国人——她这样说——'毫无进展'而感到恼火，他们从蒙绍[3]到来西河竟要花那么长时间。'总共不过八九十公里的路'，她说，'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呢？'我们原来算定，至迟十二月或一月可以迎来解放，但实际上却拖

① 卡缅涅茨-波多尔斯基，乌克兰西部，德涅斯特河北岸城市名。
② 阿弗朗什、圣洛、冈，均为法国西部地名。
③ 蒙绍，德国西陲城市名，靠比利时边境。

下去了，她弄不懂是什么原因。接着是阿登高地[1]攻势惨败，许特根森林[2]战役长期相持。我向她解释或试图向她解释道：德国人看到美国人已经打进了德国大门，现在还能不红着眼拚命！加以天寒地冻，美国人当然进展不快。我们俩争论得很激烈，直到今天我还没忘。您知道，她已有孕在身，我们得找个男人，找个靠得住的男人，好让莱尼养下孩子申报户口时能有个父亲。只有实在万不得已，她才肯登记：'生父不明'。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本来已经够多了，没想到博里斯还要无事找事——我今天还认为是无事找事——添麻烦，弄得我们莫名其妙地瞎忙了好一阵：有一天，他悄悄地对着她的耳朵讲了一个名字：Georg Trakl[3]。我和莱尼简直摸不着头脑，吃不准他是什么意思：他是提议以这个人作为孩子的父亲报户口吗？那么这是什么人，家住何处呢？莱尼将 Trakl 听成了 Trackel，又因为她会几句英语，她甚至还以为是 Truckel 或 Truckl。直到今天，我还不明白，博里斯当时四四年九月讲这个名字究竟用意何在。反正我们俩都认为事关重大，非同小可。莱尼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定要赶在当天晚上解开这个谜，因此我四处打电话找人问，打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结果一无所获：我的熟人谁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已经夜深了，她还赶回家去，找霍伊泽一家反复打听，仍无结果，弄得相当尴尬。第二天，她只好忍痛牺牲宝贵的咬耳朵的十秒钟，再去问博里斯，究竟那个名字是什么人。他的回答是：'诗人，德文

---

[1] 阿登高地为比利时南部法、卢、德交界一带地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希特勒在此发动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企图作困兽斗，先胜后负。

[2] 许特根森林，亚琛东南比德交界一带。

[3] 即前文多次提到的奥地利诗人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由于Trakl 和Trackel 以及英语 Truckel、Truckl 译音均为特拉克尔，故此处以下有关地方均保留原文，以便看出区别。

的，奥地利，死了。'莱尼一听，急急忙忙赶到就近的一家公共图书馆，三笔两划填了一张借书单：Trackel, Georg——这引起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女图书管理员板起面孔表示不赞成，并且还明确说了出来，但她总算还是借到了薄薄一本诗集。她深情地把书拿在手里，坐在电车上就看起来。她每天、每天晚上都要念几首给我听，因此我就记住了。那首《祖先的墓碑日久天长》写得好，我感到真不错。另外一首我觉得更好：'含羞不语的姑娘，在门前向花花世界张望；一张张润湿抖动的嘴唇，勾画出姑娘们心中的憧憬。'我听了简直要号咷痛哭，就是在今天也要号咷痛哭，因为这首诗勾引起我对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回忆，而且年龄愈大，感触愈深：那个时代的我，是多么向往美好生活和无忧无虑啊。莱尼最配胃口的是另外一首，我们俩很快就背熟了：'黎明破晓时分，井台边辄见她的秀丽身影；迎着晨曦汲水，水桶儿上下不停。'她把这本诗集中的这些诗背得滚瓜烂熟，到了车间里，旁若无人地信口套上一个调子哼个不停——为的是想叫他听了高兴。他听了真高兴，可也触怒了第三者，就是那个纳粹分子。有一天，他气势汹汹地责问她到底要干什么。她回答说，她不过是念一个德国诗人的作品罢了。这时，博里斯偏不识相，还插了一句，说他知道，这是奥地利的德语诗人——他的确说了奥地利！——，名叫 Georg Trakl 云云。这可更气坏了那个纳粹：一个布尔什维克，竟然比他更懂得德文诗——他去找党的领导或什么人打听，了解这个 Trakl 是不是布尔什维克。人家大概答复他，这个诗人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一个苏俄人，一个劣等民族，共党分子，竟然如此熟悉这个 Trakl，是否有问题呢。肯定人家又告诉他，神圣的德意志文化遗产，当然不容许被劣等民族的嘴巴作践。的确，气人的事情还远不止这一桩，因为莱尼这一阵

子，真是笑在眉头喜在心，仗着有人爱她，简直忘乎所以，脸皮也厚了——不象我，从来没有谁这样爱过我，连施勒默尔也没有，也许只有一个海因里希除外——，所以，她不早不晚偏偏还要在这一天哼索尼娅的诗：'暮色苍茫日影斜，索尼娅悄悄返故园'——一连四次提到索尼娅。那个纳粹分子跳了起来，朝她吼道：告诉你，索尼娅是俄国人名字，这可是背叛人民的行为哪。莱尼应答如流：索尼娅·海尼[①]不也是叫索尼娅么；一年以前，她还看过《邮政局长》[②]这部电影，里面全是讲的俄国人，还有一个俄国姑娘哩。后来亏得佩尔策出来打圆场，这场争吵才算结束，他说，这是瞎斗气，还说莱尼当然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唱歌，只要不是唱攻击国家的东西，就没有理由加以干涉，于是大家就进行表决，由于莱尼那略带女低音的嗓子很迷人，加以当时大家心情都不舒畅，干活时个个闷声不响，谁也没有兴致开口唱歌，所以大家也都一致表示反对那个纳粹——从此，莱尼可以继续信口唱她那特拉克尔之歌了。"

赫尔特霍内、克雷默尔和格龙奇三人一致证明，莱尼的歌声是动听的，虽然他们的具体评价各不相同。赫尔特霍内说："天啊，在那种苦闷的日子里，居然能听到这种悦耳的歌声：这个姑娘的女低音很甜，她高兴唱就唱。我们看得出，她对舒柏特的曲

---

① 索尼娅·海尼（Sonja Henie, 1913—1969），美籍挪威人，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奥林匹克女子滑冰世界冠军三次获得者，后入好莱坞，主演多部冰上舞蹈故事片，旧译宋雅海妮。

② 根据普希金同名小说（收入《别尔金小说集》）改编拍成的电影，由海因里希·格奥尔格和希尔德·克拉尔主演，一九四一年起在德国各地映出。

子背得滚瓜烂熟，能够巧妙地套上优美动人的词句唱出来。”克雷默尔说：“每当莱尼唱歌时，真犹如风和日丽，听了感到心里暖洋洋地舒畅。连万夫特和舍尔夫都没有反对过她唱。我们当时就已能看出，听出，并且也感觉到，她不仅有了意中人，而且对方也爱上她了。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因为那个俄国人始终一声不吭，只顾埋头干活。”

格龙奇说：“看到那个路倒尸克雷姆普暴跳如雷，我真笑破了肚皮。他听到索尼娅竟会那样气急破坏！取名索尼娅的女人何止成千上万呢，莱尼真机灵，马上举出索尼娅·海尼，给了他一闷棍。这个姑娘一开口唱，就好比寒冬腊月的旷野里突然长出了一朵向阳花。真好听啊，我们个个看出，她是沉浸在爱情的涟漪中了——那个时候，她真象一朵含苞欲放的鲜花。当然，除了小瓦尔特以外，没有人知道谁是她的心上人。”

佩尔策说：“听到她的歌声我当然高兴，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她有那么优美的女低音。但是我也要告诉您——恕我讲得比较笼统——，这给我格来了多少麻烦呀。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老是有人来问，是不是唱的俄国歌，是不是这个俄国人在搞什么鬼等等。后来，事情总算过去了，但麻烦并未结束，而且并非毫无危险。我可以告诉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危险的。”

这里需要扭转一种可能出于误解而造成的印象：似乎博里斯和莱尼是终日闷闷不乐，或者说博里斯未免过分热中于考验或提高莱尼的德国诗歌散文的修养。正如这段时期前后他每天音诉博加科夫的那样，他对他干的工作感到高兴，并且是快乐的，因为不仅能够见到莱尼，而且可以趁战争、空袭以及整个局势的变化见机行事，得便就与莱尼“变际”。有一次，由于他在电

车上唱歌，被别人狠狠被训了一顿；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他懂得尽力克制自己，不再随便唱出声来。他知道许多德国民歌和儿童歌曲，会用低沉的嗓音演唱，但这只给他招来了维克托·根里肖维奇和集中营里一些难友的恼火，因为他们不一定有心里欣赏德国歌曲（这是可以理解的。——笔者）。最后，大家达成一项协议：鉴于《莉莉·玛琳》这支歌既经批准，又备受欢迎；鉴于大家一致公认博里斯的嗓子的确不错，允许他唱一次《莉莉·玛琳》（他和博加科夫都不太欣赏这支歌。——笔者），再唱一支其他德国歌。他和博加科夫最欢喜听的德国歌有：《在门外井台旁》、《野玫瑰》、《牧场》。至于每天早晨，博里斯恨不得要在电车上对着那些心情沉闷、默然凝视的乘客放声高唱的《注意，外面有人来了》，这是可想面知的。经过唯一的那一次出于误会触犯众人而被压制的歌唱，无论如何他也得到了一点安慰：那个当场憧悄给他鼓励的德国工人，几乎每天早晨同他乘一辆电车。当然，他们再也不能谈上一句话了，只能四只眼睛深情而又亲切地双双对视。面唯有处境相似的人才能体会到，就在四只眼睛深情和亲切地相互对视中，能代替多少千言万语啊。现在他即使在花场里唱歌（博加科夫语），事先也采取聪明的预防措施。一来这里的人几乎个个少不了要同他讲话，甚至包括克雷姆普和万夫特——即使只是含含糊糊说一声“有”、“就来”或“怎么啦”——；二来佩尔策必须经常找博里斯长谈——有关飘带、花圈和花草用料记帐、劳动进度等等——，于是，博里斯有一天向佩尔策提出要求，允许他也间或“唱支歌”给大家听听。

佩尔策：“我感到非常惊奇，小伙子居然还有这份心思。可

这是继那次在电车上唱歌碰钉子之后的又一件为难事，那一次幸好当场没人听清他唱的内容。我问他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唱歌，并且给他把话讲明：鉴于战局的发展，一个俄国战俘唱歌，当然只能被看成是存心挑衅——您想，当时是四四年六月，罗马已经落到了美国人手里，塞瓦斯托波尔也被俄国人收复——，他对我说：'唱歌使我高兴。'老实讲，我听了很感动，真是感动：唱德国歌居然使他高兴。于是，我就对他说：'我说，博里斯啊，您知道，我不是个不近人情的人，就我来讲——就我来讲，您尽可以象夏里亚宾[1]那样放开喉咙唱，不过您知道，上次普法伊费尔太太（我从来不在他的跟前称莱尼）唱歌闹出多大的乱子，现在怎么办呢，如果您……'最后我决定冒险试试看，我向大伙简单地讲了这么几句话：'大家注意啦，我们的博里斯在我们这里已经干了半年了。大家都知道他劳动表现好，也不乱说乱动，他喜欢德国歌，喜欢唱德国歌，想要在工作的时候间或唱支德国歌给我们听听。我建议大家表决一下，同意的请举手，'说着，我立即带头举起手来——您看，果然克雷姆普不肯举手，嘴里在嘟嘟囔囔——，我赶忙又说：'博里斯想唱的反正是德意志文化遗产，我认为，一个苏联人这么爱好德意志文化遗产，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博里斯确实聪明，他没有马上急着唱，而是又等了好几天，才唱了卡尔·马利亚·冯·韦伯[2]的咏叹调，告诉您，我过去在歌剧院听到的也不见得有他唱的好哩。他还唱了贝多芬的《阿德莱德》，在艺术上无懈可击，德语也字正腔圆。可是，后来他情歌唱得多了一点，最后终于抛出了：'马哈贡尼好地方，空气新鲜

① 夏里亚宾(1873—1938)，俄国男低音歌唱家，著名歌剧演员，一九二二年随苏联剧团出国演出，中途叛逃。

② 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1786—1826)，德国作曲家，浪漫主义歌剧创始者。

又清凉，我们去吧，那儿有桥牌和威士忌，马肉、女人也不缺。'我后来才知道，他老爱唱的这一首是布莱希特的作品——我不得不承认，回想起来我还心惊肉跳——，我觉得歌词怪好听，后来还买了唱片，今天我还经常听，喜欢听——但我确实心惊肉跳，因为想到布莱希特的东西，从一个俄国俘虏嘴里唱出来，这还了得！当时是四四年秋天，英国人已经打到了阿纳姆①，俄国人兵临华沙，美国人快打到了波伦亚②……事后想想，叫人连头发也能急白啊。不过话说回来，谁又知道布莱希特呢，连埃尔泽·克雷默尔都不知道嘛——他放一百二十个心，反正没人知道布莱希特是谁，也没人知道这个 Trakl 是谁：直到后来待在那个地方时③我才发现：原来这就是他与莱尼的情歌对唱！真可说是情歌对唱。"

玛格丽特："他们俩胆子越来越大了，我真替他们捏一把汗哪。这时候，莱尼每天，每天都要塞点东西给他：香烟、面包、糖、黄油、茶叶、咖啡、折成巴掌大的报纸、刮脸刀片、衣服——因为冬天临近了。简直可以说，从四四年三月中旬起，没有一天断过。她在泥炭堆的下面一层掏了个洞，将东西藏在洞里，再用一块结成坨的泥炭堵住，当然是选在靠墙壁的一面，让他自己去取。另外，她自然也得对看守兵献殷勤，好叫看守兵给他来个免抄身——这可需要小心行事，因为这家伙是个厚脸皮，快快活活，但脸皮厚，想要拉莱尼去跳舞，而且还想——用他的话来

① 阿纳姆，荷兰东部城市。
② 波伦亚，意大利北部城市。
③ 指一九四五年二月底三月初佩尔策、博里斯、莱尼等人躲在"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里。事见后文第八章。

说——‘搂抱一次’——真是不要脸的小畜生，十有八九很内行，只是有的话不放在嘴上。他硬要莱尼陪他上外面去逛，最后实在摆脱不了，莱尼就拉我一同去。于是，我们去了几趟军人饭店，这地方莱尼从未去过，我可非常熟悉。小畜生毫不知羞耻地说，同莱尼相比，还是我更配他的胃口，莱尼太斯文，我倒更‘风流多情’一些——大概也是活该如此，因为莱尼非常担心，生怕这家伙——他叫博尔迪希——看出问题，给她吃苦头。我自己——叫我怎么说呢——，我自己倒也并没有吃什么亏，我二话不说，代莱尼上阵，干脆一句：我答应了他——就我来讲，这也算不了什么吃大亏，而且，四四年年底那个时候，多一个少一个也根本无所谓了。这个花花公子相当阔气，每次要我陪他去‘放唱片’——他也这样说——时，专门住大饭店，还有香槟酒，诸如此类的东西。最要紧的是，我发现他不仅脸皮厚，而且喜欢自吹自擂，几杯酒下肚，他就按捺不住，把老底全抖出来。他样样买卖都干，烧酒、香烟自然不在话下，还有咖啡和肉，但收入最大的是卖勋章颁发证书、残废证和军人身分证——不知他是趁哪一次撤退时偷了一大批这些玩意儿。您可以想象，我一听说有军人身分证，当然马上注意起来，为了博里斯和莱尼嘛。我让他先天花乱坠胡扯一通，然后我笑他是瞎吹牛，他一听急了，终于把家伙亮了出来。果然不差：他一直藏着一只有大词典那么大的纸板匣子，里面尽是盖有关防大印和签名标记的空白表格，也有休假证和车票。好了，我没有再同他多谈——这个家伙已经捏在我们手里了，而我们的底细他还一点都不知道哩。我非常小心地向他打听俄国人的情况，他认为俄国人都是穷猪猡，有时候他也给他们一点甜头，反正他的烟屁放都是赏给他们的，他自己并不想多结几个仇人。博尔迪希的一等铁十字勋章证书，每份售

价三千马克，他说这是‘血本奉送’，一张军人身分证五千马克，因为这‘有时可以救人一命’——而他的残废证更是一抢而光，因为当时有大批人马从法国倒流回来，许多逃兵猴在断垣残壁之间，暗中一帮一，相互开枪把自己打伤——打四肢部位，枪口当然得离开适当距离——然后，再买上一张残废证，就是名正言顺的伤兵了。我当时在军医院已经干了两年，了解这种自己把自己弄成残废人的情况。”

佩尔策："这个时候，花圈业务开始出现暂时清淡。一直嫌假腿装得不如意的克雷姆普，正好需要到军医院住院治疗几个月。我本可以直截了当裁减两三个人——理由是：死人数字虽然没有减少，但城市疏散工作抓得比过去紧了。伤员已经不再老是由我们这个城市收容，而是直接往来因河右岸送。这时，幸而舍尔夫和策芬两人自愿疏散到萨克森去——最后，我们剩下来的几乎可以说都是‘自己人’了；——不过尽管如此，还是人浮于事，即使勉强安排活计都不容易。我只好决定叫大家统统进花房——但这样一来，花圈场就完全停工了，连杂费开支也无法维持。四三年我们曾经做过两班制，有时甚至还开夜班，现在却是冷冷清清。后来情况又陡然好转，原因是英国人空袭次数增加了——我们本来就是丧葬行业嘛——，全市的死人又再次多得不得了；我把大家重新调出花房，恢复两班制。就在这个时候，莱尼搞出了一项可说是创造发明，招来了大量顾客：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来一批花盆打破了的盆栽石楠，干脆就用石楠扎成不带架子的小型花圈，非常精致，样子当然又有点象罗马式——不过这时候已经是四四年下半年了，只有几个白痴还会去考虑

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莱尼扎这种花圈，功夫可说是炉火纯青。这种花圈小巧玲珑，一个人就可以拿得动，简直象是用金属做的，后来甚至还涂了一层上光剂；她还在上面扎出死者或送花圈者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遇到名字不长的，有时甚至扎出全名：例如，海因茨和玛丽亚都可扎出全名，而且颜色也配得很雅致：绿色名字紫色底。再说，她一回也没弄错扎花圈的根本要领，即重点突出左上方三分之一的部位。我简直心里乐开了花，顾客看了非常喜欢。加以当时我们行动上不受限制，过来因河也无特殊危险，因此用车子过河拉石楠也不成问题。有时她在花圈上扎出象征宗教的十字架、鸡心和锚，她连自己也不相信居然会扎出这些东西来。"

玛格丽特："莱尼选中石楠扎花圈，不用说是有由衷之隐的。她自己曾说过：要用石楠给自己做新床；再者，由于他们两人平日活动范围一直限于陵园，因此，除了在这些大型家墓群中挑选一处作为谈情说爱的地方外，别无其他办法；她相中了博夏姆普家的大型私人礼拜堂，这个礼拜堂那时已经相当破旧了，里面有凳子，一个小祭坛，石楠就摊在架坛后圈，别人站在祭坛前面，是看不出后面另有秘密的。她没花多大力气撬开了祭坛的一块砖头，把里面作为放香烟、酒、面包和糖果的小贮藏室。同时，莱尼比以前狡猾了，早已不再是每天，而是隔上四五天才给博里斯喝一杯咖啡。取花圈时她有时避开他，在车间里几乎不再同他呆在一起，也不再和他唧唧哝哝。藏东西的地点，已由泥炭堆转移到博夏姆普礼拜堂。五月二十八日是她的大喜之日：一连两次空袭，都在白天，大约在十三点至十六点三十分之间。炸弹虽然

不多，但的确是名副其实的空袭。反正她在傍晚回来时满面春风，说道：'今天是我们俩成亲的日子——三月十八日那天是订婚，你知道博里斯对我说什么来着：听英国人的话，他们是不撒谎的。'打从这次以后，一连熬了两个多月，没有白天空袭，空袭大多在夜间，有几次是将近半夜里。我们躺在床上，莱尼自言自语地埋怨开了：'他们为啥白天不来了，什么时候再白天来呢？美国人为啥按兵不动，这么一点点路为什么要拖那么长时间？'原来她已怀孕了，我们考虑给孩子找个父亲。最后在圣母升天节①这天，终于盼来了一次大规模白天空袭，持续两个半钟头——我想——，炸弹落下不少，有几颗甚至炸中了陵面，一些弹片击穿博夏姆普礼拜堂的玻璃窗，从他们俩头上飞过。再后，就是莱尼称之为'良辰美景'的时期，所谓'良辰美景的念珠月'——即十月二日至二十八日之间发生九次大规模白天空袭。对此，莱尼说：'我感谢拉埃尔和圣母玛利亚，她们俩都没有忘记我多么爱她们。'"

这里应当迅速地作个所谓小结，提供几点事实材料：莱尼这个时候是二十二岁，按照习惯讲法，不妨将四三年圣诞节至四四年三月十八日第一次"交际"之间的三个月称之为定婚期；从四四年耶稣升天节这天起，我们就必须称他们为"燕尔新婚"了。这一对露水夫妻，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们当时不知大名的空军元帅哈里斯②之手。证据确凿的统计数字，比之佩尔策和玛格丽特

① 圣母升天节为每年八月十五日，下一段中所述耶稣升天节，则为每年复活节后第四十天，两处原文均用Himmelfahrtstag，这个词本可用于这两个节日，加以上文明确提到五月二十八日，故下段中一处应为耶稣升天节。

② 哈里斯(Sir Authur Travers Harris, 1892—)，一九四一年起为英国空军中将。

的陈述，更能帮助我们看清楚这一点。四四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三十日之间，共计进行十七次白天轰炸，投下约一百五十枚航空水雷，一万四千余枚炸弹和近三十五万枚燃烧弹。不言自明，警报一叫必然会出现的混乱局面对这对露水夫妻是有利的：混乱之中，谁躲在什么角落里，谁和谁一道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即使是从一个家墓墓地的礼拜堂里钻出来，都不会象正常情况下那样，引起旁人认真注意了。老老实实的情侣，在这种时刻都是就地卧倒，而莱尼和博里斯却不然，他们两人显然谁也不会老老实实。他们当然有充裕的时间，叙谈父母、兄弟姐妹、家世、学历和战局。根据有关空袭的统计数字，几乎可以科学地确定，在四四年八月至十二月这段时间内，莱尼和博里斯总共几乎足足有二十四个钟头待在一起，单是十月十七日一天，就一连三个钟头。因此，倘使有人认为他们两个值得可怜，那么，只要考虑一点，就会迅速改变自己的看法：有几对情侣，不论正式夫妻或露水夫妻，不论良民百姓或战俘囚犯，能有这么多时间紧紧依偎在一起啊。由此观之，我们也必须在这一点上把他们看成是天之骄子——他们巴望英国飞机白天来狂轰滥炸，以便钻进礼拜堂相会。

有一件事情博里斯蒙在鼓里，大概也一直都不知道：莱尼陷入了经济危机。试想，她每月的工资不够买半磅多咖啡，房租收入约值一百支香烟，而她一个月差不多要消耗两磅咖啡，不少于三四百支香烟——把她逢人就"塞"的也计算在内——，谁也不难看到，她很快就陷进了入不敷出这条最简单的经济法则的桎梏。正确估算一下，或者说尽可能地正确估算一下，维持咖啡、

糖、酒、烟和面包的开销，按照四四年时价计算，莱尼每月需要四千马克，有时要五千马克。她的收入，包括工资和房租共约一千马克。结果不用说：靠借债过日子。此外还得考虑一点，一九四四年四月，她知道了吃官司的父亲的下落，从此，间或总要通过复杂的门路"接济"他一些东西，所以从四四年六月起，她每月开支增为将近六千马克，收入则照旧只有一千马克。莱尼向来无积蓄，即使在博里斯和她父亲要求她接济之前，她一个人的开支就大大超过了收入。一句话，截至四四年九月，她已债台高筑，积欠达两万马克，债主已经几次催她还债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她的挥霍浪费癖反而变本加厉：她追求如刮须刀片、肥皂等奢侈品，甚至巧克力——还有酒，没有酒简直过不了日子。

对于这一点，洛特作了如下陈述："她倒从来不曾找我借过钱，因为她知道，我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够困难了。相反她有时还塞点什么东西给我，面包票呀，白糖呀，也送过几根香烟或烟丝。不，不，她这个人板板正正，只不过四月到十月这段时间里很少回家。可以看出，她是有了意中人了。当然，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她的对象是什么人，只当她是在玛格丽特家里和情人相会。那时候，我自己也离开格记建筑公司有一年了，先在劳动局干了一个时候，后来又进了房管局，挣几个钱，刚刚够买配给的物资。格记建筑公司是在一年前改组的，四三年六月起，部里下来一个大家都不熟悉的人，担任公司领导，这个家伙很厉害，我们大家管他叫'新风'，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基尔温德①，而且口口声声说

① 原文为Kierwind，德语Wind为风。

什么要'捅开旧有的安乐窝，让小天地透透新鲜空气'！我的公公和我也属于应予清除的废料。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你和你公公待在这里时间已经很长，太长了——我不想和你们生气，我们眼下要在西部边境上挖战壕，修工事。对于俄国人、乌克兰人、俄国妇女和德国劳改士兵，那是不讲什么客气的。对你们是另一回事。你们最好是自动离职。'基尔温德是典型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讲话有些挖苦，但也不是一点不客气，这种人倒是常常可以碰到的。他还说：'你们身上都还有格鲁伊滕的气味。'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公司，我进了劳动局，公公到铁路上当会计。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究竟霍伊泽是当时就露出了他的本性呢，还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变得相当卑鄙了，而且直到今天也相当卑鄙。当时我们几家住在一起，那是什么滋味啊，说它象阴曹地府也一点不过分。格鲁伊滕被捕后，我们几家一段时间合在一起过日子，集体开伙，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也算一个，那时他还在家里待命入伍。起初，由玛尔雅和我婆婆负责采购，照看孩子；玛尔雅经常也到托尔策姆或吕塞米希乡下去，回来时至少带上点土豆和蔬菜，有时甚至带上个鸡蛋。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情况很好。后来，我公公就开始搞花样了，他把中午在铁路上领到的免票汤带回来，留到晚上热一热，当着我们的面，一个人点头咂舌地吃得津津有味，这当然是集体伙食以外的额外收获。接着，我婆婆也变得——玛尔雅称之为——'两两计较'起来，开始样样东西都要过秤。这样一来，我们各人都将自己的零碎物品放在一只橱里，用一把大挂锁锁好。结果不用说，人人都叫喊东西不翼而飞。我婆婆将人造奶油放进橱里，每次都是先过秤，后上锁，等到下次开锁取出来时，她总是说有人偷了。据我所见，她——我婆婆——甚至连我孩子吃的牛奶

也不放过，总要多少刮一点，给她自己或我公公做个布丁。在这种情况下，我改变方针，请玛尔雅给我买东西和烧饭，不再与老两口吃在一块儿了，图个安静。莱尼也好，玛尔雅也好，她们从不吝啬小气——但是，老两口仍不罢休，只要灶上烧点什么东西或烧好端上桌，他们就盯住不放，鼻子伸来伸去。这又使我产生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想法：羡慕。我实在羡慕莱尼，她可以一抬腿走开，和她的相好到玛格丽特那里去安身——我这样想。再说老霍伊泽吧：自从进了铁路，据他自己说是专门花功夫搞好人缘关系。他给火车司机管私房帐。当时是四三年，他们还可以开车跑遍欧洲几乎所有的地方，从那里捎回热门货、或者从这里把热门货带去。他们用一袋盐可以从乌克兰换回整整一头猪，带上一袋粗面粉去饿死人的荷兰或比利时可以换到雪茄烟，从法国当然可以换到酒，香槟和白兰地。总之，霍伊泽神通广大，由于后来还负责抓货车的使用和运行计划，他摇身一变成了大老板，欧洲某地什么东西紧张，他肚皮里清清楚楚，相应地组织货运：从荷兰运雪茄烟到诺曼底——当然是在入侵①以前——调换黄油，接着，再将黄油运往安特卫普或其他什么地方换雪茄烟，一转手数量就翻了一番。加以他主管列车段，司炉和司机都由他调配，他当然挑那些最得力的伙计专跑油水最厚的区段。同时，即使在德国国内市场上，各种商品在不同的地方市价也各不相同。在大城市里，吃的东西也好，奢华的日用品也好，样样都能卖好价钱；咖啡在乡下当然是更吃香；而且通过以货易货，例如用黄油换咖啡或其他什么的，据他自己承认，可以获利百分之

① 原文如此，指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盟军在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

百。不用说，他借钱给别人最多的是莱尼，表面上他也提醒她不要随便借钱，但只要她开口，就有求必应。到后来，他不光是她的债主，也成了她的采办，更可从中浮报花帐，捞几个外快；莱尼哪里知道这一经。她总是只开借条。后来他打听到老格鲁伊滕的下落：先是在法国大西洋沿岸修工事，同一队劳改犯在水泥搅拌机旁干活，后来又转到柏林，每次空袭后出动清除被炸的现场。我们总算找到了一条门路，不时托人捎给他一个小包裹，也知道了他的情况——多半是他托人捎口信告诉我们：'不必惦念，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这时，钱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该发生的事借终于发生了：到了四四年八月，莱尼共积欠霍伊泽两万马克，您猜他要什么手段啊：逼莱尼还债！他说，孩子，不还给我钱，我的买卖就没法搞了。您知道最后怎么解决的？莱尼将她的房子典了三万马克，还给老头两万，自己剩下一万。我曾劝过她，在通货膨胀的年代把硬货典给别人，这是神经病。可她听了只是付之一笑，还买了点东西送给我孩子，给了我一包十支装的香烟；恰好这时海因里希跑到房间里来，找我们讨东西吃，她也送给海因里希一份，并且冒里冒失一把搂住他跳起舞来，弄得小叔子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是好。莱尼满面春风，无忧无虑，兴高采烈，真是不可思议。我不仅羡慕她，也羡慕她心爱的那个家伙。此后不久，玛尔雅到乡下去住一个时候，海因里希应征入伍，单单剩下我和公公婆婆，我只好仍旧把孩子交给老人带。至于莱尼，该发生的事情又发生了：再次典房子，这样，唉——我真说不出口——，他真的买下了莱尼的房子。这栋房子只是部分地方有些破损，当时是四四年年底——情况已经很困难，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变钱的东西了——他补给莱尼两万马克，一手交钱，一手交字据，房子就归了他，达到了他显然渴望已久的目的：当房东

老板。他这栋房子，今天少说也将近值五十万马克。他还有一个心眼，这是四五年一月一日起开始由他收房租时，我才看出来的：可以肯定，长期以来他就梦想，每个月一号一到，他就四出收房租——只是四五年一月还收的不多，因为多数房客疏散下乡去了，顶上面两层被烧坏——尤其滑稽可笑的是，他把我也列入房客名单。普法伊费尔一家当然也是房客，可是他们一家到五二年才搬回来。直到他第一次收了我的房租——两间不带家具的房间，月租三十二马克六十芬尼——，我才想起，我们以往住了莱尼那么久的房子，都是不付房租的啊。过去，有时候我认为莱尼是糊涂虫，我甚至还警告过她，但今天看来，我认为她一点也不糊涂，她把所有家当同她心上人一道吃光用光，到了和平时期，她也没有饿死。”

玛格丽特："我现在谈谈莱尼自己所说的第二次排队摸底。她告诉我，第一次排队摸底，是刚刚同博里斯搭上手时进行的——她对所有亲戚朋友一个个进行了排队分析，甚至在家里，她也几次钻进防空地下室摸底。她'摸清'了霍伊泽一家、玛尔雅、海因里希以及花圈工场所有同事的看法，结果发现，唯一有资格给她当参谋副官的就是我。一想起她如何一个个地摸底分析，我就感到，她没有当上个神机军师，实在太可惜了，例如，她本能地知道，洛特虽有可能成为盟友，但由于为人'嫉妒'而不予考虑；老霍伊泽夫妇也不能用，因为'脑筋古板和反俄'；海而里希·普法伊费尔过于'固执'，也不行。她确信克雷默尔太太是一个潜在的盟友，甚至移樽就教，到她家里和她进行一次善意的对话，但结果发现她'简直是惊弓之鸟，而且稍力不济，再也不想

干什么事情，我自然谅解她’。她对赫尔特霍内太太进行了认真考虑，但也‘由于她道德观陈腐而不是其他原因’不能用。‘这就，这就当然需要摸清楚，究竟谁腰板子硬，能够让他知道这件事，并且可以帮忙帮到底’。她下定决心打赢这一仗，要打仗当然就少不了钱和根据地。通过第一次排队摸底，审时度势，她发现唯一一个根据地就是我——这对我是一大光荣，也是一副重担子。我成了腰板子硬的人了。在地下室里，在家里，在霍伊泽一家和玛尔雅跟前，她都系统地逐一摸底。她编造各种故事，引起大家发言：例如，她讲起一个德国姑娘如何爱上一个英国俘虏，虽然招来的不啻是当头一棒——听众多数主张将他们枪毙，不准他们生儿育女，将他们驱逐出境等等——但套出了大家的观点啊。接着，她又将英国人换成法国人，另编一个故事，这一次反应比较好，听众表示法国人算得上是‘人’，是可以考虑的情人。”（也许是因为法国人精于房中术吧。——笔者）“大家报以微微含笑，可是进而一想，法国人不是‘敌人’么，那可断断不行。最后，她话头一转，归到本旨，提出波兰人和俄国人试试，说得更恰当一些，是引听众上钩。这一来得到的反应是，一致认为至少得‘砍头示众’。在家庭小范围内——包括霍伊泽一家和玛尔雅——的调查，当然要坦率一些，真诚一些，不那么顾及政治。玛尔雅甚至令人惊讶地夸奖波兰人，说波兰人是‘英俊的军官’，法国人‘缺德’，英国人‘大概不能作为爱侣——俄国人则看不透’。洛转和我的看法一样，认为这些话都是乱弹琴，或者按照我的说法是瞎扯。洛转的评语是：‘男人就是男人’，她还指出，她的公公婆婆和玛尔雅虽然没有摆脱民族偏见，但完全不带政治偏见。法国人风流，惜乎为人狠毒；波兰人风度好，热情，但不忠实；俄国人爱情专一，非常专一，但在现实情况下，包括洛特在内，大家都认

为：‘同一个西欧人搭讪至少是危险的，同一个东欧人搭讪，则是要掉脑袋的’。”

洛特·霍伊泽："有一天，莱尼又来看我们，和我公公谈金融交易的问题。我发现她把自己关在浴室里，脱光衣服，对着梳妆镜仔细品鉴她那富有弹性的肉体。我从后面给她披上一条浴巾，上前看时，只见她羞得脸上通红——我从来不曾见过她这副样子——，我用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说：你真开心，还能再找到一个心爱的人，要是你真爱上了谁，就别再把那个讨厌的求婚者放在心上了。我是忘不了我的维利的。——如果是个英国人，你就同他结婚吧。我这个人并不太傻，不至于傻到四四年二月听到她编造那些古怪的故事时，还看不出她是和一个男人（也许是外国人）搞上了。不过说实话，当时要晓得对象是个俄国人、波兰人或犹太人，我是说什么也要极力劝阻她的：那岂不是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么！而今天我倒感到高兴，亏得她当时没让我知道。一个人知道的事情太多，的确不会有什么好处。"

玛格丽特："莱尼第一次排队摸底时，连佩尔策也列为是可以争取的盟友。格龙奇本来也可以考虑，无奈此人太喜欢饶舌。后来进行了第二次排队摸底，这一次考虑到莱尼这时已经怀孕，以后要生产，要带孩子，唯一可靠的人又是我。最后，我们选定佩尔策作为战略后备力量，划掉了经常押送博里斯来场的那个年龄大一点的国防义勇军① 士兵，因为他爱动手动脚，又爱搬弄是非。另一方面，我们也始终注意那个胆大包天的博尔迪希，有

时我还和他见面，他的买卖一直不错——但由于过于放肆，没过多久，于四四年十一月被抓住，抄出全部空白表格和伪造证件，在车站后面被就地枪决了。原来，这次他是在车站上搞交易时被捕的，就此一命呜呼，可惜他的那些军人身分证也全完蛋了。”

行文及此，有必要从风俗习惯方面说明几个重要问题，借以对莱尼和玛格丽特的身世作出持平之论。严格说来，莱尼根本不是什么寡妇，而是艾哈德的未亡人，有时她甚至将博里斯和艾哈德相提并论："两个诗人，如果你问我的话，都是诗人。"这么一个二十二岁的少妇，失去了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心上人艾哈德，失去了哥哥，失去了丈夫，她经历了大约两百次空袭警报和至少一百次轰炸，她不仅和她的男人在家墓礼拜堂幽会，而且必须每天早晨五时半起床，梳妆一番，乘电车驶过昏暗阴沉的街道去上工——对于这样一个少妇，阿洛伊斯的胜利者的喋喋絮语，定然还余韵未灭，只能象一支缠绵悱恻的流行歌曲那样慢慢地消逝——大约二十年前，人们曾随着这支歌曲的旋律，通宵达旦地翩翩起舞哩。出乎任何人的意料和违反当时的情况，莱尼是存心挑逗似地快快活活。她周围的人则个个胸襟狭隘，叫苦不迭，垂头丧气，试想，莱尼难道不可以将她父亲那些贵重的衣服，拿到黑市上去卖好价钱么，但她不仅不那样做，反而去送给饥寒交迫的人，甚至送给被宣布为敌国的人员(一个红军战俘代丧身上就穿着她父亲的羊毛背心！)——因此，倘使说给莱尼再加上一

① 国防义勇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属国防军的德国武装，包括所有十七岁至三十九岁无兵役义务和三十九岁至四十五岁的有兵役义务的国民。

个乐善好施的形容词，即使最不相信事实的观察家，也是不能不同意的。

对于玛格丽特，也还得补充一两句。说她专操皮肉生涯，那是错误的。她只是在嫁人时才是为了钱。打从四二年在一所大型后备军医院服役起，她的日子就远比莱尼难过得多。莱尼可以坐在车间里太太平平地扎花圈，经常与心上人待在一块，有佩尔策好心保护。由此观之，莱尼并不是什么英雄，也算不上一位英雄，她直到四十八岁时，才生平第一次对一个男人发慈悲（好心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就是那个名叫梅赫梅特的土耳其人）。玛格丽特则截然不同，她从来没玩过什么花招，即使是处在军医院护理病员的日日夜夜，她也对"所有长得漂亮和神色沮丧的人一视同仁，不折不扣地发慈悲"——而她之所以和一个国防义勇军士兵，厚颜无耻的狂妄之徒博尔迪希逢场作戏，也完全是为了掩护莱尼，转移博的视线，成全她在博夏姆普家墓礼拜堂中的石榻床之欢。我们想趁此机会主持几分公道，提请读者注意玛格丽特慈悲一世之余自己所说的话："爱上我的人很多，我爱上的只有一个。我常常看到许多人脸上流露出的无限喜悦，我自己只亲身体验过一次。"不，玛格丽特决无资格属于有福之人的行列，她远比莱尼不幸——和苦痛的洛特不相上下。然而，这两个女人之中，谁也不曾对莱尼心存嫉妒。

第八章

笔者现在一心一意充当情况调查员的角色(因此总是冒被人怀疑为密探的危险，其实他只是想把象莱尼·格鲁伊滕-普法伊费尔这样一个平时沉默寡言和遇事守口如瓶、从不饮悔于怀又自命清高的人物的本来面貌，如实反映出来而已，要知道，这既是一个庄严肃穆、又是一个崇高的人物呀!)，不惜四处奔走，向所有有关人士具体了解他们在战争结束时的遭遇。

这些人士的介绍和回忆尽管有的详细，有的简单，但显然只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当时都不愿离开城市，甚至连博加科夫和博里斯这两个苏联人也不愿东去，因为这时美国人(莱尼对玛格丽特说："他们总算来了，花了多长时间啊。")已经兵临城下，唯有美国人可以实现结束战争的渴望，尽管大家一时还不相信终于能有这么一天到来。打从四五年元旦起，有一个问题，即博里斯和莱尼——干脆直说吧——两人的"交际"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因为莱尼已怀孕六个多月，虽然"劲头还很足"(范·多恩语)，奈何珠胎已结，"交际"、同房、肉搏——不管你怎么说——已"无从谈起"了(莱尼告玛格丽特)。

这时的问题是：躲到什么地方去？怎么个躲法？不曾身历其境的人，怎么也想象不到当时的难处啊。比方说玛格丽特吧，她的处境和军人一样，行动得服从命令，按规定应随军医院过来因河东撤。她不愿意，但又不能开小差回家藏起来，藏在家里是

会被抓走的。洛特的情况也差不多，她是机关职员，那个机关同样奉命东迁。她怎么办呢？试想：四五年一月还往西里西亚附近一带撤，岂不是等于送到红军枪口上去么？说到这里，有必要顺便提一下地理方面的情况：时至四五年三月中旬，这个曾提到过几次的德意志帝国，从东到西大约还有八九百公里长，南北也不比此数长多少。往何处去的问题，对各式各样的人，一时都变得极为现实了：纳粹分子往何处去？军人士兵往何处去？战俘和奴隶往何处去？当然，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有的，例如枪毙等等。但枪毙也不见得那么容易，因为执行枪毙的人意见也不都一致了，他们中间有些人却很想反其道而行之，宁愿枪下留情，救人一命。一些奉命开枪的人，尚且变成了不肯开枪的人，至于那些开枪的对象，即等着挨子弹的人，会有什么表现，就更难说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现在有人以为，似乎一觉醒来，战争就突然结束了，什么地方写明几月几日战争结束，这一天一到，就没有事情了。其实哪有这么简单，那个时候，谁能知道自己会落到什么样的行刑队之手啊：是放下屠刀的呢，还是执迷不悟的呢？或者甚至是那种原来倒不肯轻易擅开杀戒，到此时方显出杀人不眨眼的本领的新出现的英雄好汉呢？另一方面，就连党卫队的有些单位，也不愿再背上原先的枪毙人的名声！党卫队和光荣的德国国防军之间相互有公函往返，互相将死人象烂土豆似地踢来踢去！随着战争大势已去，人们将"消灭"和"处理"工作，踢给一向受人尊敬的人和部门，可这些人和部门象对方一样，也已有心及早洗手不干，从而创造出一种说不上是和平，但可称之为战争结束的局面。

例如，笔者看到这样一份材料："据集中营长官纷纷报告，在押送来营处决的苏俄俘虏中，约有百分之五至十在到达集中营时即已死去或奄奄一息，这就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老营一贯这样对待苏俄俘虏。

"经特别查明，不少俘虏在下火车后步行来营时，途中即已疲惫至死或半死，以致不得不由随行汽车收容。

"此种情况无法不让德国居民知晓。

"尽管押解俘虏来营任务大都由国防军担负，但此种情况，居民不免总要记在党卫队的帐上。

"为尽量防止今后发生类似情况，特命令：今后应对确定送集中营处决的苏俄战俘事先进行一次清查，发现有行将待毙（如患有斑疹伤寒）而经不住哪怕是短途步行者，原则上一律不送集中营处决。此项命令立即执行。

米勒（签字）代"

对于生命垂危者的人数，这份材料中用了"不少"二字，读者应自行思考其中的含义。早在一九四一年德意志帝国幅员还算辽阔时，问题即已存在。四年以后，德意志帝国版图已远为缩小，而且有待于消灭和处理的不仅有苏俄人、犹太人等，还有相当大量的德国人、逃兵、破坏分子、思通外国分子。此外，集中营在押人犯和城市人口均需全部撤退，疏散妇女、儿童和老人，这样，一旦敌人来了，得到的也只是废墟一片。

当然也产生了种种有关风化和卫生方面的问题。请看下面一份材料：

"过去和现在都有这种情况：不少贪赃枉法的乡、村长，深更

半夜把由他们指定的技术工人从床上拖起来，先关在地下室里，再送走，常常不给他们时间收拾行李物品，以致这些工人到达集中地点后，许多人没有带足生活必需品(鞋、换洗衣服、餐具、口杯、被褥等等，均未带足)。问题严重时，往往不得不让刚刚抵达的工人立即回去取东西。据大部分地区报告，遇有行动稍示迟缓的工人，村警们动辄咆哮如雷，拳足交加，已成为家常便饭。许多女工被打得无法行走。有一起情节特别严重的事件，职已报请治安警长(扎梅克上校先生)作出严肃处理(事情发生在杰尔加奇[①]区佐措林科夫村)。受处分者大都以'一切均系以德国国防军之名义行事'为自己辩护，足见乡长村警们横行霸道到何种严重程度。事实上，国防军对待技术工人和乌克兰居民相当通情达理。而有些部门则不然，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某次一个妇女进营时，身上只穿一件衬衣。"

"根据各地报告，还有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必需予以指出：在用火车押送工人途中，他们往往被长时间关在车厢里不准下车，以致无法解大小便。照理应给他们提供领取饮水、洗脸和解手之便。有人让职看了一些车厢，这些车厢都被这些人凿上了洞眼，为的是能够解手。当然，列车驶近大站时解大小便必须尽量远离站台。"

"除虱所的流弊为人们所知的限于以下情况：有的地方，男管理人员或其他男人在妇女和年轻姑娘使用淋浴室时值勤或鬼混——甚至干擦背的活！——相反，男的使用淋浴室时，则由妇

---

① 乌克兰哈尔科夫附近地名。

女值勤。有的地方，男的长时间待在女淋浴室里拍照。由于最近几个月送来的大部分是乌克兰妇女，她们向来重视风化，讲究规矩，受到此种待遇，必然感到是对一个民族的侮辱。据悉，此种现象已由押送队负责人予以纠正。关于拍照问题，我们得到的报告来自哈勒。淋浴室男女混杂的现象，发生在基韦尔塞。”

莫非早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性浪潮么？象我们今天张开眼睛到处可见的那些照片，说不定有些就是当年东欧奴隶除虱所的作品哩！

看来重要的是，要知道：征服地球上的一部分或征服全世界，并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就连当年这些英雄好汉们也困难重重，他们曾经试图本着德国式的彻底精神解决这些困难，并运用德国式的一丝不苟精神记录在案。事情来不得半点马虎啊！不是吗，大小便就是大小便，里说是注定要消灭的人，也不能在他们死了以后再行押送！否则就是不成体统，必须查究惩办。除虱洗浴时也不可以男女相互擦背，更不可以拍照！不然，非但手脚不干不净，而且银幕也被弄脏。这样看来，难道不是咎在一群流氓和歹徒趁机插手，才将“本身”完全正当的事情弄糟了么？

由于死人之争＝争夺死人肢体时至今日已成为现代常规战争的典型特征，身披军服的流氓歹徒侮辱妇女，甚至还将这种行径拍成照片，因此就用不着再指出类似的事情来使读者生厌了。

言归正传：怀孕的莱尼、非常敏感的博里斯、生性恃强的洛传、善良的玛格丽特、足不出陵园的格龙奇、不是不近人情的佩尔策，一句话，所有这些人往哪儿躲呢？怎样才能熬过战争最后这一关呢？一九四五年三月，我们的玛尔雅、博加科夫、维克托·根里肖维奇、老格鲁伊滕和许多其他人，他们一个个的情况如

何呢？

首先是博里斯，他在四四年底四五年初左右惹了一场麻烦，这完全是多此一举。关于这件事，莱尼丝毫不曾透露，洛特和玛尔雅两人则一无所知，完全是玛格丽特告诉笔者的。自从笔者上次看过玛格丽特以后，她被院方严加看管，不让笔者私下塞东西给她（医生关照笔者："您知道吗，现在需要让她饿上四五个星期，这样我们就多少有办法帮助她恢复内分泌和外分泌的功能。要知道，她已经一塌糊涂了，甚至有可能眼泪从乳头往外流，尿从鼻孔里撒出来。因此，和她谈话是可以的，但不准送东西给她。"）。她已经习惯过清心寡欲的生活，甚至希望用这种办法使病体痊愈："不过香烟您倒可以放心大胆给我一支（笔者满足了她的要求！）。哦，那个时候我真讨厌博里斯，对他一肚子火，直到后来我们大家一道躲在那个洞里，对他有了了解，我才改变看法——想不到他是那样聪明，又懂得体贴人——不过四四年年底时，大概是圣诞节前后，或者是四五年年初，也许是主显节[1]左右，但肯定不会更晚，有一天莱尼下班回来时，脑袋瓜里又装了一个人的名字，不过这一次她总算知道这个人是个作家，而且已经死了，因此我们至少用不着到处打电话去问别人了。这一回又是因为一本书，作者名叫弗兰茨·卡夫卡，书名是《在流放地》。后来我问博里斯，他难道真没想到，他在四四年年底（！）时介绍莱尼看一个犹太作家的作品，会闹出什么乱子吗？他回

---

[1] 西俗以一月六日祝耶稣出现，称主显节，由于是在圣诞节后第十二天，故亦名十二日节。

答说：'我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了，考虑的事情太多了，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是后话，反正莱尼又赶到图书馆去，填了一张借书单，那时图书馆还有一个中年妇女在工作。莱尼总算运气好，碰到这个管理员相当通情达理，她看了看莱尼的借书单就一把撕掉了，将她拉到旁边，对她说：'孩子，您怎么这样不明事理啊，是谁让您来借这本书的？'就象她那次追问拉埃尔的下落时，修道院长对她讲的话一模一样。莱尼这一回仍然坚持己见。大概图书管理员也看出，她并不是存心上门来捣乱的人，就将她拉到角落里，一五一十解释给她听：这个卡夫卡是犹太人，他的作品全都属于禁书，都得烧掉等等。可以肯定，莱尼听了她的解释依然无动于衷，照例又是毫不在意地反问一句：'嗯，那又怎么样？'于是，这个管理员又源源本本——尽管不够及时——告诉她犹太人和纳粹的事情，还拿出《冲锋队员》周刊[①]——这种东西图书馆当然是有的——给莱尼看，把问题讲得清清楚楚。莱尼回来时很吃惊。她总算明白了几分。不过她并未死心，仍旧想搞到卡夫卡的作品看，后来果然搞到了！有一天，她上波恩去看望几位她父亲曾经给他们帮过忙的教授，她记得他们家里藏书都很丰富，其中有一位称得上是老爷爷，当时就七十五岁了，已经退休，成天待在家里看书。您猜这位老爷爷对她怎么说的：'孩子，您怎么这样不明事理啊，偏偏要看卡夫卡——为什么不要海涅呢？'当然，这位老教授对她很好，还谈起她和她父亲的往事，但他自己没有卡夫卡的书，只好去找别的同事，最后才找到一个不仅他信得过他，也得到他的信任、而且又有这本书的人。好不容易啊，花了整整一天时间，那天她是半夜里回来的，手提包里装

① 当时纳粹出版的一种杂志。

着这本书。真不简单呀，因为她和那位老教授要找到一个这样的人，这个人不仅得和老教授相互信得过，也得信任莱尼，不但要有这本书，而且还肯往外借！他们找到两个有这本书的人，头一个就不肯借。真不知道她和博里斯在想些什么，说不定是神经错乱，要知道，这是性命交关，要掉脑袋的事呀。至于说到我自己，运气真是坏透了，就在这个当口儿，那个与我结过婚的施勒默尔先生不知打什么地方钻了出来。我和他蹲在他的小别墅里，他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处世有方、仪表堂堂的施勒默尔了，他已精疲力尽了，不知什么时候起穿上了国防军军服，但又没有军人身分证，他是在法国被游击队抓住，正要枪毙时逃出来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舍不得他，他过去对我很好，很大方，也喜欢我，说不定还真心爱我。可这个时候的他，显得那么卑微，那么可怜，他对我说：'玛格丽特啊，我干的事情，不管落到哪一方手里，都会要我的命的：法国人也好，德国人——不管是亲政府的，还是少数反政府的——也好，英国人、荷兰人、美国人和比利时人也好，我都活不成。要是俄国人抓到我，查出我是什么人，我也会完蛋。就是现在还在掌权的德国人抓到我，也会完蛋。救救我吧，玛格丽特。'您真不知道他从前是个什么样的人，过去他来看我时，都是坐出租汽车或公家的车子，一年休三次假，带回来的东西多得数不清，一向仪表堂堂，高高兴兴。而现在，简直成了一只穷耗子，看到那些走狗也害怕，怕美国人，怕所有的人。这时，我第一次想到了一个早就应该可以想到的主意：军医院里不是死了好多人吗，他们的军人身分证，不是照例收起来，等登记后再寄回他们原来的部队或其他部门吗。我当然知道这些军人身分证放在什么地方，而且也知道有些士兵根本没交出他们的身分证，或者是，有些重伤员入院时身上满是血污的破衣服，

一向是扒下来丢掉的，身分证自然无处寻找了。我是怎么干的呢？当天夜里我就偷了三张军人身分证——医院里多的是，我挑选了照片上容貌和年纪同施勒默尔和博里斯差不多的，一共三张，两张相片是金发，戴眼镜，二十四五岁；一张是淡褐色头发，不戴眼镜，四十左右年纪，象施勒默尔。我把这后一张身分证给了他，还把我所有的钱、黄油、香烟、面包全拿出来，给他包好，送他上路。他按照身分证改名恩斯特·威廉·凯佩尔，我甚至把这个名字和他的住址都记了下来，因为我想知道将来他到底怎么啦。虽然我们俩结婚后不经常在一起，但毕竟快六年了嘛。我告诉他，最保险的办法是去参加国防军，到前线指挥机关或诸如此类的部门去，因为人们全都在追捕他。他按我的话做了。他还哭了呢，如果您不认识四四年以前的施勒默尔，您就体会不到他的哭说明什么问题：施勒默尔对着我痛哭流涕，低声下气，感激不尽地吻我的手，哭得象一只小狗——然后，就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后来有一次，我出于好奇，按记下的地址到布厄[1]附近的煤矿区去找这个凯佩尔的妻子，我是想看看——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她那时已经改嫁了。我对她说，我在军医院护理过她的丈夫，后来他死了，生前曾托我来看看她。告诉您，这个女人是个浪荡货，脸皮三尺厚，她反而问我：'您是说我哪个男人呀？如果是恩斯特·威廉的话，他已经死过两次了，一次死在军医院，另一次死在你们那里一个叫维尔塞伦[2]的小村子里。'听她这样讲，施勒默尔是死了。不瞒您说，我倒松了口气。他这样死，也许比被纳粹分子或游击队绞死或枪毙好受

① 布厄，鲁尔地区小地名，在埃森附近。

② 维尔塞伦，亚琛北面小城市。

一点。嗯，他是个名副其实的战犯——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抓过劳工，从三九年起就干上了，早先出身是商人。为了他的事我曾多次受到传讯，后来房子也被没收，包括里面的所有家当，只准我把我个人的旧衣物拿走。显然，施勒默尔不知发了多少洋财，贪脏枉法，结果害得我四九年流落街头，后来也经常在外面流浪，尽管莱尼和大家都设法帮我找个地方安身，我还是在街上游荡。也曾有过半年时间住在莱尼家里，但由于我跟男人来往，没法长住下去，因为莱尼的儿子已经长大了，有一天他问我：‘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干吗哈里’——一个英军中士，那阵子正和我相好——，‘干吗哈里他老是要钻到你身子里面去呀？’”（玛格丽特又一次红脸了。——笔者）

关于席尔滕施泰因战争结束时待在什么地方，前文已有介绍：他在列宁格勒和维帖布斯克之间的某地给苏联军官弹钢琴，弹《莉莉·玛琳》。这个人，甚至连莫妮克·哈斯也对他肃然起敬。“当时我的最大愿望，天大的愿望”（席告笔者），“是想填饱肚皮，想活命。哪怕叫我用口琴吹奏《莉莉·玛琳》，我也会遵命照办。”

战争结束时的朔尔斯多夫博士，作出了简直不愧为英雄般的事迹：他回到“来因河右岸的一个小村庄里居住。因为我有手续完备的证件，又没什么政治问题，所以纳粹分子没找我的麻烦，我也用不着怕美国人，一心只等战争结束。为了伪装得更加巧妙，我自告奋勇出面当国民冲锋队长，领导十名队员，这十名

队员是：三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两个不满十七岁的毛孩子，三个缺腿将军（两个截去大腿，一个截去小腿），一个独臂将军，外加一个患低能症的，也就是全村知名的傻子。我们拥有的全部武器装备是几副拐杖、一块一裁四的白床单、发给我们炸桥用的几颗手榴弹。就这样，我带着队伍出发了。到时候，我们把四片床单布往棍子上一扎，桥连碰也没碰，把村庄完完整整地交给了美国人。此后，我在村里（这个山村名奥斯勒米勒。——笔者）一直很受欢迎，人们经常请我参加教会或其他节日活动。直到两年前我开始发觉气氛不对了，来了个大转变，耳朵里常常听到有人讲什么失败主义者——这是事过二十五年之后，而且当年还是多亏我出头，拿自己一条命向美军少尉厄尔·威特尼担保，保证教堂钟楼里没有藏人，也没有驻军，才保住了这座建筑。现在呢，可以肯定人心是向右转了，至少我上那儿去时，心情不象早先那样平静了。”

黑尔岑夫妇俩不存在战争结束时在何处度过的问题。原因很简单：汉斯·黑尔岑是一九四五年六月才出生的，至于他在娘肚子里是否流露过人而兽心的性格，笔者就无法知道了。格蕾特·黑尔岑出生更晚，是在一九四六年。

战争结束时，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二十一岁，左腿刚刚做完截肢手术，躺在班贝格附近占用一所巴罗克式修道院设立的军医院里。据他自己说，他“刚刚从麻醉中醒过来，难受得要命，这时美国兵已经到了大门口——幸好他们没有对我怎么样。”

老普法伊费尔说，“吃败仗那天”，他和他的妻子待在“离德累斯顿不远的地方”，拖着他那条一连跛了二十六年多（今天说来，则有三十四年多）的腿，也就是莱尼父亲被捕入狱前，即一九四三年还说过的“我所见过的最能骗人的腿”。

范·多恩说：“我原以为我们门槛最精了，因为我在四四年十一月就回到了老家托尔策姆，用胡贝特成包成包地送给我的钞票，赎回了我父母典出的房子和地皮。我一再叫莱尼到我家里来住，安安心心待在乡下生孩子——我们一直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我还告诉她，美国人到我老家这个地方，肯定会比到她那里要早两三个星期。可结果呢？亏得莱尼没有来。他们一顿炮火把托尔策姆——按俗话说的——夷为平地。他们只给居民半个钟头时间撤退，我们匆匆忙忙乘上汽车被送过来因河，后来就再也回不去了，因为河那边是美国人，河这边还在德国人手里。哦，还好莱尼没听我的话。我那个老家，哪里还有什么田野、安静、新鲜空气和鲜花啊——隔着来因河望过去，我们只看见那一带尘土遮天，天昏地暗，灰蒙蒙一大片。这就是当时的托尔策姆——现在当然又重新建设起来了，不过您要问当时情况的话，那的确是尘土遮天，天昏地暗，灰蒙蒙一大片。”

克雷默尔说：“他们把我儿子抓走后，我想：往哪儿去呢？是向东好还是向西好呢？或者说一动不如一静呢？考虑再三，我

决定还是留在城里，哪儿也不去，因为往西走路已经封锁，除了军队和修工事的人员外，普通老百姓一个也过不去——往东走吧？据我了解，他们还可以拚老命，再打上几个月或年把时间，也去不得。于是我就留下来，待在自己家里。‘三·二’（指一九四五年三月二日，留在城里的一些人，都把这一天简称为‘三·二’。——笔者）这一天，大轰炸开始了，不知有多少人就在这次轰炸中被吓成了神经病，或者几乎成了神经病。我躲在对门一家酿酒厂的地下室里，我想：天塌下来了，天塌下来了。老实告诉您，我这个人，早从一九一四年十二岁起，就没有再进过教堂大门，也不再信教会兜售的那一套了；我并不是后来看到纳粹装模作样（着重点不是笔者加的）反对教会时，才随风倒的，因为我本来就懂得了不少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尽管大部分同志还把我看成是个傻乎乎的黄毛丫头——可是不瞒您说，当我躲在那个地下室里时，竟会一个劲地做起祷告来，不由自主地连连念‘万福玛利亚’和‘我们在天上的父’，甚至还念‘拯救我们脱离凶恶’——我只顾得上做祷告。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厉害和最可怕的一次空袭，整整持续了六小时四十四分钟，有时酒厂地下室的天花板微微抖动起来，好象一顶帐篷被狂风吹得晃晃悠悠——外面炸弹就象冰雹似地落在这座几乎人烟绝迹的城市里，劈头盖脑地一阵阵泻下来。我们一共只有六个人躲在地下室里。两个女的：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个年轻妇女，她还带着一个三岁大的男孩。这个女人的牙齿在格格地发抖——我算是生平头一次真正看见了小说里常常描写的所谓牙齿咯噔咯噔地作对儿厮杀样子；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机械动作，是下意识的——最后她把嘴唇也咬出血来了。我们从地上捡了一块光溜的小木片，也许是散了箍的酒桶上的一块板，塞进她的嘴里。我想，她大概要疯

了，你也要疯了——待在地下室里，听外面的声音倒不见得怎么响，只是感到大地在不停地颤动，天花板有时象一只漏气的大皮球，被什么东西压得一沉一升。小男孩睡着了，他累了，睡着了，小脸蛋还在微笑，八成是梦见了什么好玩的事吧。除开我们两个女的和一个男孩外，还有三个男人，其中一个是集中营的工人，年纪很大了，穿一身冲锋队制服——'三·二'还披这块皮！——，他吓得拉了一裤裆屎，满满一裤裆，象打摆子似地直哆嗦——紧接着又尿了一裤子，屎尿直流，他再也吃不消了，一头钻出地下室，嘴里还嗷嗷地嚷着什么——就这样跑到外面去了。哼，他这一出去，连骨头碴子也找不到了。另外两个是穿便服的小伙子，德国人，我想他们准是逃兵，原来藏在外面瓦砾堆里混日子，遇到这场空袭，他们害怕了。起先他们老老实实，一声不响，面无血色，一等那个老头跑了出去，他们就突然——我现在已经是六十八岁的人，您听我介绍当时发生的情况，一定会感到非常恶心。当时我四十三岁，那个年轻妇女——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过她，也没有看见过那两个小伙子和小孩——大概三十岁左右。那两个小伙子至多才二十二三岁，他们突然——叫我怎么讲呢，……您现在听了准会感到太不象话，但您要知道，一连六个半钟头飞机不停地狂蛋滥炸，航空水雷和近六千颗炸弹象冰雹般落下来，那是多么叫人难受啊……过了一会，默不作声地坐着，我们不约而同地把各人手提包里的香烟和面包拿出来，那个年轻女人还带了腌黄瓜和草莓酱，大家把所有东西放在一起，一道吃，没有讲一句话，似乎我们约定好了相互不问姓名，闷声不响只顾吃，灰沙在我们嘴里咬得嘎嘣嘎嘣直响，我的口里有那个小伙子口里的灰沙，他的口里也有我口里的灰沙。后来，轰炸停止了，大约是下午四点半光景。外面静下来了，当然还有

响动，有的地方还传来东西掉下来和楼房倒塌的声音，有的地方还夹杂着爆炸声——丢了近六千颗炸弹嘛。因此我说的静下来，只是指飞机已经走了。我们大家钻出地下室，各走各的——连再见也没有说。一走到外面，唉呀，眼前只见尘土遮天，浓烟滚滚，一片火海，我顿时吓得昏了过去，几天以后我才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嘴里还一直在祷告，不过打这以后就不再念了。我总算是命大，没有被他们当成死人三锹两铲刨个坑埋掉，您想，有多少人没有断气就这样被埋掉了啊。还有一点，您猜酿酒厂那个地下室后来怎么着？塌掉了，我们走出来后第三天就塌掉了，我想，准是地下室顶部象只大皮球似地越来越往下沉，最后撑不住，终于塌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原是想赶回家去看看我的房子：哪里还有什么房子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荡然无存——连一堆象样的瓦砾都没有。在我出院的第二天，美国人也就来了。"

我们知道，万夫特是疏散到外地去的一个。显然她受了气，吃了苦头（由于她不愿讲出来，笔者无法断定究竟是别人之过还是她自已有错而受气吃苦头）。她只透露了一个地名："施奈德米尔"。至于克雷姆普，他是为保卫公路死在公路旁，断气时嘴唇边可能还挂着"德国"两个字呢。

据亨格斯博士自述，他"同我那位伯爵出身的上司一起，躲在我们有把握不会被当地农民出卖的一个村子里。我们乔装改扮成林业工人，住的是木头盖的小屋，但却受到了象老爷一样的

款待，甚至还有伯爵府上那些听话的娘们不仅不拒绝陪我们寻欢作乐，而且自己送上门来。说句老实话，我认为巴伐利亚式的恋爱性欲太俗气了，我向往来因地区那种高雅细腻，从其他方面说也是一样。由于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到一九五一年我就可以回家了。伯爵先生不得不一直等到一九五三年，然后主动到法院去自首，不过这时候清查战犯的运动已经雷声大、雨点小，成了强弩之末了。他在韦尔[1]还关了三个月，出来后不久又重新投身外交界。我却不想政治上再出头露面，情愿靠我那精湛的语言学知识吃饭。”

老霍伊泽说："我当时怎么也舍不得丢下自己的房产，我不仅买下了格鲁伊滕的房子，而且还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和二月里先后搞到了另外两栋房子，原来的房主都是政治上最受迫害的人物。如果您愿意的话，不妨说我这是反亚利安化或再反亚利安化[2]。两栋房子原先都是犹太人的财产，由两个老纳粹转手卖给我，有公证人，有支票，完全合法。这是正正当当的财产转让——毕竟没有哪条法律规定禁止买卖房产嘛，对吗？'三·二'轰炸我没有碰上，因为那天我正好下乡去了，但尘土遮天我是看到了的，在四十公里外的地方看到的，尘土遮天，灰蒙蒙一大片。当我过了几天赶回来时，我发现西城区自己的那栋房子完好无损，英国人来了后，我才从那儿搬走。原来英国人早有打算，没有轰炸自己入城后想要居住的地区。莱尼和洛特她们，她们完

---

① 韦尔，多特蒙德东面的一个小城市。

② 法西斯希特勒鼓吹日耳曼民族高于一切的反动人种学，将迫害其他民族（特别是犹太民族）的种种暴行称之为亚利安化。

全把我扔在一边，一点没告诉我她们在陵园墓穴里修的那个小小的苏维埃天堂。哼，我这个老头子——我当时已六十了——她们是不高兴我和她们待在一起的。

“我妻子是头年十月里过世的。妻子一死，洛特就完全变得不象话了，她干脆带着两个儿子在城里东游西荡，先是住在她娘家亲戚家里，后来和玛格丽特这个娘子住在一起，再后来又住到熟人朋友家里，千方百计赖在城里，不肯疏散到外地去。您知道为什么？原来她一心想趁火打劫抢仓库，而且她早就详细打听到了国防军军用仓库的地址。等到坐落在前卡美尔派修道院附近的那个大仓库抢开了的时候，她当然不会给她的公公打一声招呼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冲进仓库，用手推车推，用麻袋装，用旧自行车拉，甚至停在街头烧坏了的旧汽车，只要还能推着走的，全用上了。他们从仓库里抢走了大批鸡蛋和黄油、猪油和香烟、咖啡和种种生活用品。而且这些亡命之徒，手里还在抢，嘴就馋得等不及了，他们捡只防毒面具的铁罐罐，就在街上煎荷包蛋吃，还有烧酒和其他好吃的东西——就象法国革命时那种当街狂欢乱舞、大吃大喝的场面，而且是女人在前面开路，我家的洛特就一马当先，活象一尊美该利神[①]！那个时候，还正打得凶呢——城里还有德国兵。所有这些情况，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也为自己及早离开了这一幢住宅而高兴，因为她们从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搬回来不久，洛特开始同胡贝特乱搞，她们那里简直就象是妓院。您简直认不出洛特了，这个女人一向冷酷无情，出口伤人，嘴巴厉害得不得了，可那时显得兴高采烈，象是变了一个人。战争期间她讲的那些社会主义奇谈怪论，我们

---

① 美该利(Megäre)为希腊神话中司复仇的女神，又作泼妇解。

听在耳里，没有拿她怎么样，虽然她当时讲的有些话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她还怂恿我儿子威廉去信赤色宣传那套鬼话，真叫人痛心，但我们原谅她，她总算是个规规矩矩的贤妻良母。可是后来呢？肯定从三月五日起，她就满以为要开始搞社会主义，一切东西，动产和不动产，都要打乱平分了。她确实当了一段时间房管局的头头，起初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原因是房管局的人都逃光了。后来是正式委派她当头头，因为她不是法西斯分子，不过单凭这一条是不够的啊。但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掌了一年印把子，大笔一挥，把一栋栋空别墅分配给一些人住。那都是些什么人啊，他们拉了大便连抽水马桶也不会摆弄，用浴缸洗衣服，养鲤鱼，在浴室里腌大头菜，有一栋别墅里就发现有半浴缸咸大头菜，一点不假。幸好这种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混淆没闹多长时间，她又乖乖地官复原职：仍旧当她的小职员。但在大肆抢掠的那几天，她的确是同那一帮人住在他们的墓穴天堂里，带着她的两个孩子，虽然她分明知道我住的地方，可没有向我透露一声。啊，她这个人哪里知什么恩怨啊，您仔细想想就可以看到，她一条命都是靠我们保牢的呢。我们只要动动嘴，只要把她对战争和战争目的发过的牢骚向上面报告一句，只要提一下她老爱讲的'乱弹琴'这几个字，她就得乖乖地坐牢或蹲集中营，说不定还要上绞架呢，哼，还会有她的今天么！"

也许还有人乐于知道 B. H. T. 的情况吧：B. H. T. 受拉埃尔的启示在小便上玩弄的障眼法，本身并未失效，屡试不爽，只是——只是到后来再也无法帮他的忙了：四四年九月底，他被征集，编进一个害胃病的病号营，人家根本不管他这个害糖尿病

的、一日三餐饮食要求不同于胃溃疡病患者。B. H. T. 还参加了阿登高地攻势和许特根森林战役，最后在一个叫维尔塞伦地方的附近被美军俘虏，而且不排除有可能他曾同摇身一变成了凯佩尔的那个施勒默尔“肩并肩地战斗”过。不管怎么说，B. H. T. 战争结束时是待在兰斯①附近的一个美军俘虏营里，那儿“关了近二十万名各种军阶的德国官兵，而且我可以告诉您，一点也不开心，这么多人待在一起也好，物质待遇也好，都谈不上开心，尤其是别想，恕我直说，别想有女人作伴——单是这一点就够戗。”（笔者对这一点颇感意外，因为他原以为B. H. T. 在女色方面是可有可无的。）

向玛尔雅·范·多恩打听格鲁伊滕的情况，笔者诚然感到为难，但为了被实事情真相，他还是作了几番小心的尝试，不料结果引起对方对洛特连声辱骂，究其原因，显然是由于“某些事情”使范·多恩醋意大发。“胡贝特回家时，我还没有回来，否则我可以肯定，他会来求我，从我这里得到她给他送上门去的那种安慰的，显然我比她大十三岁。可惜我当时陷在来因河对岸回不来，差不多过了伍佩尔河，蹲在威斯特法伦这个村子里，那里的人把我们来因人看成放纵任性、好吃、专爱挑剔、道德败坏，对我们不怎么友好——美国人四月中旬才到我们那个地方，您不知道，当时要到河这边来多不容易啊。我们在那边一直待到五月半，面胡贝特五月初就回来了，而且显然一进门就钻进了这个洛特的被窝。等我回来时已经迟了，木已成舟了。”

① 兰斯，法国北部城市。

洛特说："我对四五年二、三月间和四五年三月到五月初这两段时间，老是缠不清楚，那会儿事情实在太多，尽管是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恐怕也难说得有条有理。不错，我参加了抢国防军军用仓库，尽我的力气拿了不少东西，而且我当时就打定主意，情愿靠佩尔策而不愿靠我公公这位老太爷帮忙。我们遇到了多少难题要解决啊！家里我是再也没法待下去了，唯一可以不走的是莱尼，但她那时即将临产，我们又不能将她一个人丢在家里，因此我们才一道进了他口口声声说的那个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进去以后，莱尼的秘密包不住了：原来孩子的父亲是个俄国人，可她一直说是另一个人，因为打从四四年九、十月起，她就有了孕妇配给证——是玛格丽特帮她搞到的，申报孕妇丈夫姓名时，用的是一个死在军医院里的军人的名字：延德里茨基。可她们两个实在太草率了，没有考虑这个死去的延德里茨基是有老婆的——要是给死者老婆知道了，准会惹一场麻烦，并且我认为是不小的麻烦，怎么也不能叫一个死人背黑锅啊。三月中旬起我给军政府负责房管局，我就设法纠正了这个错误。我们手里掌握了印把子，并且同哪一个机关单位打交道都不成问题，于是我们设法让孩子有了真正的父亲：博里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您想，当时所有机关都挤在三个房间里办公，给这个可怜的延德里茨基摘掉莱尼孩子的父亲的帽子，办妥一应手续，那还不容易吗。当然，这些都是'三·二'以后的事了，所有德国白痴都已经滚蛋，他们六日还在城里吊死了一批逃兵，然后才撤退并把桥炸了。接着美国人进了城，我们终于走出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回到自己家里。但那阵子，就连美国人对乱糟糟的局面也傻了眼，不知如何是好，城市成了那个样子，肯定把他们吓坏了。我还看见，有些美国人，特别是一些女的，站在大教堂旁

边的饭店门口流眼泪哩——一眼望去，满街都是些什么人啊：德国逃兵、隐藏的俄国人、南斯拉夫人、波兰人、俄国女劳工、集中营逃犯、躲藏起来的少数犹太人——您叫美国人怎样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属于哪个营垒呢。他们原先的想法肯定比较简单，也许太简单了：只要按纳粹和非纳粹这条杠杠分成两档就行了，事实上哪有这么简单，他们这样想是太天真幼稚了。一切都得进行整顿，分类排队——等到胡贝特大约在五月初终于回来时，情况已经有点眉目了，我是说有点眉目。而且讲句老实话——我是大大方方利用公章和介绍信给不少人行了方便的，本来嘛，公章和介绍信是干什么用的呢？说到胡贝特，他回来时身上穿的是一套意大利军服，这是那些和他一道在柏林抢修工事和地下铁道的伙计送给他的。他们替他仔细考虑过：明打明以德国犯人的身分回西边来，那是太危险了，因为从柏林到来因河这段路上，不少地方还藏有纳粹分子的老巢，落到他们手里就会被吊死。打扮成普通老百姓呢，他又太年轻了，才四十五岁呀，很可能被俄国人、英国人或美国人抓住，送进战俘营。所以最后他还是装成意大利人，这样当然并不能保险无生命危险，但的确是够聪明的办法了，因为他们见到意大利人，只是瞧不起而已，不一定马上就吊死，妙就妙在这里：不一定马上就吊死或枪毙。果然，他也就靠着这身意大利军服和口称'德国话不懂'走了运——只不过要是穿意大利军服被送到意大利去，最后被查明是德国人，那当然就不一定保险活命了！这同样会丢脑袋的。总之，他成功了，进门时高高兴兴，您怎么也想象不出他有多高兴。他对我们说：'孩子们，我下定决心要微笑地度过我的后半辈子，微笑地。'他一一拥抱了我们大家：莱尼、博里斯，对他的小外孙高兴得发狂，拥抱了玛格丽特和我的孩子，自然也拥抱了

我。他还对我说：'洛特啊，你知道我是喜欢你的，有时我想，你也喜欢我。干吗我们不待在一起过日子呢？'就这样，我带着孩子和他住了三个房间，莱尼、博里斯和孩子住三间，玛格丽特一个人住一间，厨房公用；大家都是通情达理的人，住在一起再也没有过去那种扯皮的事了。我们要什么有什么，从国防军仓库里抢来的东西用不完，玛格丽特也从军医院捞回来大批药品。我们考虑，最好还是让胡贝特把这身意大利军服穿下去，只可惜我没办法给他搞到意大利证件，他自己向军政府申请了一份，用的意大利名字叫芒佐尼。这是博里斯给他出的主意，博里斯就知道这个意大利名字，他一定是看过这个芒佐尼的一本著作。我们考虑，把他说成是释放回家的德国犯人也不行，因为他不是政治犯，是刑事犯，而美国人对刑事犯是相当严厉的；真正的刑事犯，他们也不愿让之逍遥法外。谁也没法向他们讲清道理，他本来倒真是个政治犯啊。所以说，最妥当的办法还是让和我同居的这个人叫路易吉·芒佐尼，变成意大利人。可是他娘的，得注意不能让他落进任何一个集中营，哪怕是遣送回国的士兵营或难民营都进去不得；一旦进去，天知道要被送到什么地方去啊。不过好在直到四六年初都没出什么问题，到了四六年初，美国人也不再怎么严格了，不再抓到德国人就往集中营送了，外加不久英国人也来了，我同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关系都很不错。当然，许多人想不通，为什么我们两个不正式结婚，我不是寡妇吗，他不也是没老婆了吗？有些人说，我不结婚是舍不得丢掉抚恤金。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原因，而是我没有兴致了，简单说吧，我不想和他正式结成夫妻。到今天，我才后悔没有结婚，因为我的孩子就为这个完全落到了我公公的手里。莱尼本来是很想同她的博里斯结婚的，博里斯也很想同她结婚，但不行，因为他没有任何

证件，又不愿公开自己俄国人的身分。的确，当时也有一些俄国人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但大多数人在违背他们意志和前途莫测的情况下被遣送回国，回去见亲爱的父亲斯大林去了；更何况他通过玛格丽特已经搞到了一张德国军人身分证呢，这张身分证的名字是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不过这是一个二十四岁的身体健康的德国人，只是从照片上看有些营养不良，谁知道，给这么一个死鬼作替身，前途是好是坏啊？辛齐希或维克拉特①，我们也不想叫他去，那些地方也不能保证生命安全。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不出去，唉，要是您能亲眼见到他们一家三口如何过日子的，该多好啊！就象是玛利亚、圣约瑟和耶稣。他坚持不违反妻子分娩后三个月不碰她的规矩，并且从怀孕的第六个月起也不碰她。他们俩就象玛利亚和圣约瑟那样生活了半年，当然有时也和她接个吻，除此以外，真象个孩子似地老实！他们俩很爱孩子，宠他，唱歌给他听。不过到了四五年六月，他们每天傍晚都到来因河边去散步，而且不用说直到宵禁时间才回来，这样做未免太性急了一点。我们大家，我、胡贝特、玛格丽特，都警告过他们，可他们不听，每天晚上都去来因河边。按说那个地方也确实吸引人，我和胡贝特常常跟他们一起去，我们坐在河边上，静静地享受已经十二年来没能享受过的东西：平安宁静。来因河上没有船只航行，船都破了，桥梁也只剩下一摊摊残骸，只有几条渡船和美军军用浮桥。有时候我想，在来因河上最好是别再造桥了，就让德国西边的这块地方永远成为德国的西方算了。可后来情况并非如此——博里斯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六

① 辛齐希在波恩和科布伦次之间，维克拉特靠近比利时，均系小城市，此处泛指让博里斯去外地谋差事，冒充德国人长期留在德国。

月里的一天晚上，他碰上了一支美军巡逻队，拦住他进行盘查。没想到他那么不乖巧，身上偏偏带的是那张德国军人身分证，这一来就坏事了：我认识的那些美国军官帮不了忙，玛格丽特的美国朋友帮不了忙，我甚至赶忙去找城防司令官，源源本本地告诉他博里斯的情况，也无济于事。博里斯被抓走了。起初，事情也不象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危险，因为反正人是扣在美国人手里，只要他坚持不愿回苏联，就会被当成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放回来，只不过蹲在美军俘虏营里日子不怎么好过罢了。我们哪里知道，就在这年夏天，美国人已经开始将他们手里的德国俘虏移交给法国人——也许可以说是卖给法国人，因为美国人要求把这些俘虏的吃住费用都用美元归还。就这样，博里斯辗转落进了洛林地区的一个矿山，他身体弄得很差——的确，小伙子完全是多亏莱尼，或者说，多亏莱尼典卖房产，才没有饿死，可身体也谈不上很壮。再说莱尼吧，您怎么也想象不到：她一听说发生了意外，立即跳上一辆旧自行车去找他。她跑遍了各区，甚至越州过境，进入法占区，去萨尔区，进入比利时，又折回萨尔区，到洛林，从一个集中营到另一个集中营，向驻军长官打听她的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的下落，向他们求情。她胆子大，锲而不舍。她不知道，当时欧洲各地大概有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德国战俘。她只顾骑着自行车四处奔波，一直找到十一月，有时偶尔回家一趟，添足干粮，又上路了。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懂，就凭身上一张普通德国居民身分证，怎么给她到处越过边界又回来的，她也从来没告诉过我们，只是有时给我们唱她经常唱给她儿子听的那几首歌：'一年圣诞又今宵，苦命的人思主恩，北风呼啸打入门，坐在小屋里冷冰冰。亲爱的主耶稣今夜降临，主啊，衷心求你拯救我们'——哎，她一唱起来，谁听了都忍不住要掉眼泪。

她好几次从艾费尔地区过境去阿登高地一带，又返回德国，经辛齐希上那慕尔①，再从那慕尔南下兰斯，然后东行到梅斯②，再去萨尔布吕肯，而且往返好几次。象她这样就凭一张德国身分证在欧洲这个角落里来回跑，可不是什么百分之百无生命危险的事。哎——皇天不负苦心人，您看，果然给她找到了她的博里斯，她的延德里茨基，她的科尔托夫斯基或布尔霍斯特——您随便叫哪个名字都可以。她找到了他，在一处公墓里找到了他，不是在墓穴中的一个苏维埃天堂里，而是在坟墓里找到了他。他死了，死于梅斯和萨尔布吕肯之间，即洛林地区某褐铁矿的一次矿井事故。她刚满二十三岁，严格地讲，已经是第三次守寡了。从此，她真的变成了一尊默然无语、冰凉肃穆的青铜雕像，每当她晚上给孩子唱博里斯生前最喜欢听的歌时，我们感到仿佛万箭穿心，根根血管都要爆裂开来：

祖先的墓碑日久天长，
而今我们好似异教徒，
凄凉寂寞地坐在你身旁。
雪花扑面刺骨寒，
雪儿啊，你为何偏要凌空降？
难道说茫茫寥廓的霄汉，
也没有你容身的地方……

“接着，声音陡然一变，由忧郁而为放荡不羁：‘马哈贡尼好

① 那慕尔，比利时中部城市。
② 梅斯，法国东北部城市。

地方，空气新鲜又清凉，我们去吧，那儿有桥牌和威士忌，马肉、女人也不缺。马哈贡尼的皎皎月光，今宵照得人们分外欢畅，我们来了，汗衫兜里钞票一大包，定叫你的笨嘴哈哈笑’——随后，突然又出现了庄严高亢的歌声，听了使人惊惧：‘上帝怜我一少年，常拯救我脱离凡尘的喧嚷和罪孽，神林的鲜花向我娇嗔，玉宇的清风随我蹁跹，你能使伸出柔枝的草木欢笑，给予我内心无限喜悦。’啊，这些歌，即使再过五十年我也背得出来，我们几乎每天晚上，有时甚至大白天也曾多次听见她唱这个。您想想：莱尼唱这些歌时，都是用的标准德国话，而平常讲话，您只能听到硬梆梆的来因腔。告诉您，小伙子生前忘不了她的歌声，我们大家忘不了她的歌声，连玛格丽特也不例外。每当莱尼朗诵和唱歌，特别是给她孩子唱来因之歌时，玛格丽特的一些英国朋友和美国朋友，总是感到百看不厌，百听不厌……她年轻时是个了不起的姑娘，后来是个了不起的妻子，我还要说，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至于她的儿子后来出了毛病，那个责任不在她，而在那些坏蛋，其中就有我那两个不成材的儿子，即‘穿连裆裤的霍伊泽祖孙’——他们坏透了，特别是我公公这老家伙。每次他上门来收房租，三个房间收我们四十六马克十五芬尼，胡贝特都不和他多搭讪，只是冲着他嘿嘿冷笑，象魔鬼一样嘿嘿冷笑，每次都一样。后来他不再亲自上门收了，而只是用书信往来，他列举一套凡夫俗子常用的理由，说什么住了人家的房子理当主动交房租，而不是等房东上门收——好吧，既然这样，胡贝特就在每个月一号亲自去西区老霍伊泽的别墅里交房租。不过就是到了他的别墅里，他也可以象魔鬼一样嘿嘿冷笑，直笑得老霍伊泽再也吃不消了，又提出要将房租改为邮汇。这一次胡贝特可不客气了，跑到法院里告了一状，要求法院判决，房租究竟应该主动交，还是

上门收，还是邮汇。不过要邮汇的话，可别指望他额外担负十个或二十个芬尼的汇费，即使是汇划支票，因为他是靠做小工维持生活的人，这话一点也不假。嘿，他们双双真的上了法院，结果胡贝特打赢了官司，于是，老霍伊泽只好二者择一，要么送上门到我们家来听鬼笑，要么坐在自己屋里等鬼笑上门了。总之，先后三年零四个月，每月一号他都听到鬼笑，最后他想出一个主意：找了个人替他代收——不过我告诉您，胡贝特那魔鬼一样的笑声，直到今天还深深印在老霍伊泽的脑子里，而莱尼也就不得不为这个吃苦头了；只要我们转租房间有一点欠考虑的地方，他就把莱尼骂得狗血淋头，要把她赐出去。（叹气，喝口咖啡，抽烟——请参看上文——，拢一拢花白的短发。）我们的好日子一直过到四八年，不久胡贝特·格鲁伊滕就在一次可怕的工伤事故中死了——死得一钱不值，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愿看见佩尔策这个人，也不愿听到任何人谈起他，实在气死人啊。而且打胡贝特死后不久，我的两个儿子也被夺走了，老家伙可厉害哪，什么手段都用上了，那时候，只要有男的住在我们这里，或者哪怕是来我们家作客的，他就说我坏话，用这种手段把我儿子夺走。开始时孩子是送给慈善机关代管，后来就被他领走了。甚至连可怜巴巴的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他也不放过，这个可怜虫当时还没装假腿，每次拖着一条断腿去医院或上民政局时，都在我们家里打住，老家伙就造谣，硬说海因里希跟我乱搞。我们出于不得已要转租房间，非转租不可，因为他提高了房租，一点不肯照顾我们——事情也正是无巧不成书，偏偏又碰上慈善机关的那个女人，她经常到我家里来，而且老是搞突然袭击，真他妈倒霉，倒霉透了，您想想，居然先后三次被她发现我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照她的说法，两次是在'一清二楚的暧昧状态'，就是指她两

次闯进来时，我正好同博加科夫睡在床上；博加科夫是博里斯的朋友，曾经多次来我们家作客。另一次'暧昧状态'，是指有一次她来时，博加科夫正穿件衬衣，站在窗口对着我的小镜子刮脸，脸盆就搁在窗台上。她在她的调查报告中写道：'这种情况说明关系的亲密程度，对于教育未成年子女，实属不能容许。'说得的确也对，当时库特已经九岁，维尔纳十四岁，也许我真是做了错事，特别是我根本就不爱博加科夫，连喜欢也谈不上，我们只是一时冲动，就睡到了一起。他们当然也仔细询问了孩子的意见——就这样，我两个孩子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他们要离开我时，起初还哭了一阵，等到后来修女把他们送到祖父身边，他们就再也不问亲娘的死活下落了。我不仅被人家看成是娼妇，而且背上了共党分子的名声。不过有一点倒值得佩服老鬼：他送他们念了中学，上了大学，格鲁伊滕太太早年送给库特的那块宅基，他也经营得很好——今天，三十年后的今天，那里盖起了四排公寓房子，底层全是铺面，十足值三百万，按说单靠坐吃租金，也足够养活我们的，包括莱尼在内。想当年，库特得到送给他的这块地产时，我们都只当是个中看不中用的金杯，没有多大油水，想不到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当然要比一个精力衰竭的母亲为了每月挣一千一百十二个马克的薪水天天早晨得去上班强得多。这一点倒真要佩服他，换了我就没有这种本事，没有这种能耐。至于同这个博加科夫的事，只怪我自己不好，干了蠢事。胡贝特不幸惨死以后，我心灰意冷，正碰上这个可怜的博加科夫拿不定主意是回俄国还是留下来，成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还象博里斯一样唱那种叫人听了心酸的歌子——天啊，就在那种心情支配下，我们搞了几次关系。后来我到底还是弄清楚了：原来是老霍伊泽这家伙向德国辅助警察告了我们的密，说我们有一

个黑市地下仓库。他没有和我们一道抢仓库发财，死也不甘心，到底密告了我们。于是有一天，大概是四六年年初，一群可恶的德国包打听上门来了，不用说，查出了我们藏在地下室的东西：盐渍的黄油、腊肉、香烟、咖啡、成堆的袜子和内衣——统统都给没收了，要不，我们还可以舒舒服服坐吃两三年哩。不过有一点他们也奈何我们不得：我们反正没有在黑市上出卖过任何东西，至多搞过几次物物交换，甚至还有不少是无偿地送给别人了，莱尼就是靠这个过日子的。由于案子是德国包打听经办，因此我们的英美两国朋友也没法插手帮忙。这伙包打听还搜查了我们几家，抄出了莱尼那几张可笑的全校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证书。有一个家伙当真准备就凭这几张擦屁股的纸头，去告发她是纳粹，那还是她十岁和十二岁时得到的呢。说来也巧不过，我正好认识这个家伙，曾经看见他穿过冲锋队制服，因此，他也只好乖乖地闭上他的鸟嘴，否则莱尼免不了要吃苦头：您怎么能向英国人或美国人说得清，有资格得到'全校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证书的姑娘不是纳粹的人啊？当时的佩尔策倒确实慷慨大方，他从仓库里抢得的那一批货太太平平，没有被人告发，他一听说我们的东西全被没收了，就主动拿出一些来送给我们，一不要我们付钱，二不要任何回报，大概是存心讨好莱尼吧。不管怎么说，这个流氓做事到底比老霍伊泽漂亮。这是事过之后很久，我想已经是五四年了，我才从这些警察中的一个口里知道：原来是我自已的公公出卖了我们。"

为了了解赫尔特霍内在战争结束时的情况，笔者这一次特地邀请她在一家高级时髦的小咖啡馆相会，一来是有意献殷勤，

二来是想自由自在地吞云吐雾，不受那内在的和外部的种种限制。赫尔特翟内正是躲在上面提到的那所前卡美尔派修道院内熬过战争最后几天的，她就蹲在修道院教堂的地下室里，“那间地下室过去大概是修女们关禁闭用的。我对那次抢掠一无所知，‘三·二’那天，我只是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吓人的轰鸣，闹了很久，听起来非常可怕，但离开很远。在没有得到确信美国人过来以前，我不想钻出地下室，因为我怕出事。那个时候不知有多少人被枪毙和吊死，我虽然也有完备的、有效的正式证件，但怕给巡逻队发现，引起他们怀疑开枪把我打死。我躲在地下室里，到后来只剩下我一个人，上面那些人如何趁火打劫，如何欢天喜地，我一概不管。直到我知道美国人确实来了，我才走出地下室，一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顿时我禁不住哭了起来，悲喜交集，喜的是终于熬到了解放，悲的是好端端一座城市平白无辜地成了一片废墟。接着，当我看到一座座桥梁都被破坏无遗时，我又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到底能有这么一天，来因河又变成了德国的边界，再次变成了边界——这是一次天赐良机，可不能放过。——索性不必再造什么桥了，只要设立边防哨卡，严加管理来往的渡船就行了。于是，我立即与美军当局取得联系，打了一阵电话，找到了我那个法军上校朋友，获准在英占区和法占区自由乘车进出往返。我还有幸帮过莱尼两三回忙，当时她正在到处乱钻，一门心思寻找博里斯，这样，难免半路上遇到麻烦。还在十一月里，我就领到了营业执照，租了一块地皮，拼搭起几间花房，开了一个店铺，同时将莱尼安置到我的花店里。当我申请营业执照和新发身分证的时候，我考虑了一个重要问题：是用萨尔路易的埃莉·马克思这个真名好呢，还是仍旧用莉安内·赫尔特翟内好？考虑结果，我决定仍旧用后一个。我的身分证上填的是马克思，

乙
三

平常还是叫赫尔特霍内。啊，您在舍下喝的茶，大概比这家有名无实的咖啡馆好吧。”（笔者彬彬有礼地心悦诚服地承认这一点。）“这里真正不错的倒是那些小点心，我是很欣赏的。说到某些提供情况的人告诉您的那个墓穴中的所谓苏维埃天堂，他们也曾邀格龙奇和我一道躲进去，但我们胆子小，没有敢去，原因倒不是怕死鬼，而是怕活人。因为陵园夹在老市区和郊区当中，正是飞机轰炸的中心地段。至于说死鬼，我倒认为待在那个天堂里没啥好怕的，反正几百年以来，人们一直都在墓穴的上面举行丧礼，早已习惯了。我认为躲在卡美尔派修道院教堂的地下室里更安全——即使巡逻队进来盘查我的证件，也不要紧，相反，躲在陵园的墓穴里，倒容易引起怀疑。而且说到底，当时你根本就吃不准什么身分最保险——是改名换姓的犹太人或分离主义者保险呢，还是没有开小差或开小差的德国士兵，还是逃犯或在押犯保险呢——，当时城里到处是逃兵，在他们附近可一点也不好受，双方都在乱打枪。格龙奇也同样害怕，他可的确是四五十年来一直未离开过陵园的人，现在，即四五年二月中旬，他离开陵园，短时间到乡下去居住，最后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参加了国民冲锋队，混了一阵子。他说得对：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当口上，不论捞个什么合法身分，都是最保险的护身符。我的信条是：现在可别轻举妄动。身边带上大毛病挑不出的证件，找个地方藏起来，不出头露面，静观事变。我是完全有意地——这对我来说可不容易，您知道，因为有些东西是我们做梦也不敢去想的——我是完全有意地不去参加抢仓库，那当然是犯法的事，要掉脑袋的，而且抢仓库时，城市还在德国人手里，只要两天、三天或四天了，我不想还去背要掉脑袋的罪名。我要活，要活命——我当时四十一岁，我不想临到快要熬出头的这几天，还拚着性命

去冒险。所以，我老老实实待着，什么话也不乱说，连再过三天就能看到美国人的时候，我也不敢说什么战争结束了或者败定了。的确，打从头年十月起，标语和传单上就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全体德国人民一定要严惩制造恐慌情绪的人、失败主义者、消极悲观论者和敌人的应声虫——所谓严惩，就是格杀勿论。他们越来越疯狂了：有个妇女洗好一块床单晒在外面，他们就只当是竖白旗投降，不问青红皂白，端起机枪朝窗子里一顿乱扫，将她打死了。哼，宁肯饿着肚子等上几天，这就是我的原则。'三·二'这天大轰炸之后抢国防军仓库，我认为太危险了，抢了东西再要往陵园里拉，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德国人那阵子还守在城里，他们想背水一战。待到德国人终于弃城逃跑以后，我就不再犹豫了。我立即去找美国人，立即与我的法国朋友取得联系，人家拨给我一所不错的小房子，头一个发给我经营花场的执照。在老格龙奇回来以前，我一直使用他的设备，我将应付的租金如数给他立了帐，等到他四六年从乡下回来时，我把代他经管得井井有条的企业交还给他，自己另行开店营业。佩尔策这个好人四五年八月就回来了，虽然他长袖善舞，但还是需要搞到一张证明，证明他这个纳粹党员不是骨干分子。谁给他开这种证明呢？是谁帮他向审查机关讲的好话呢？是莱尼和我。不错，是我们俩帮他开脱的。这样做，有两方面违背了我的本意：一是违背我的良心，因为不管怎么说，我始终认为他这个人坏；二是对我的买卖不利，因为他毫无疑问成了我的竞争对手，并且到五十年代中期一直是这样。"说到这里，介绍情况的赫尔特霍内突然显得十分苍老，几乎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原来一直绷紧的脸皮，突然松弛下来，玩弄着茶匙的那只手举措不定，声音在哆嗦，几乎是在颤抖。"直到今天我也分辨不清，究竟替他洗刷，帮他开脱是对

是错——不过您要知道，我从十九岁起到四十二岁止，一直是受人迫害的。从埃吉丁贝格之役到这次美国人过来，受了二十二年政治迫害，种族迫害，随您怎么说——我是有意识地投靠佩尔策的，因为我这样想：待在一个纳粹分子手下最安全，而待在一个贪污腐化、为非作歹的纳粹分子手下，则尤其百分之百安全。我何尝不知道人家对他有种种议论，格龙奇也给我介绍过他的一些情况。可是，陡然之间，他来有求于我了，站在我面前，吓得面如白纸，并且还带来他那个善良的、对他三三年以前所作所为的确一无所知的妻子，以及两个长得确实逗人喜爱的孩子——一男一女，年纪在十岁和十二岁之间。那个面色惨白、有点歇斯底里、毫不知情的女人，使我感到难过。他问我，在我在他的花场里待的那十年中，是否能举出事例说明，他在花场内外，对我也好，对其他人也好，做过哪怕是一桩不近人情的事；他还问我，一个人是否有时也得原谅和忘记别人年轻时做过的错事——这都是他的原话。他手法非常高明，没有公开拿钱财收买我，只是给我施加了一点小小的压力，提醒我他曾让我参加零星材料加工组扎花圈，也就是说，我是他信得过的人——当然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我的手脚也并不怎么干净，因为从垃圾堆里捡来花圈加工，甚至连飘带也以旧顶新，怎么说也不是正大光明的事——，于是，我终于心软了，给他写了清白证明，并请我的法国朋友为我具保等等。他在莱尼跟前也是用的这套手法，那会儿莱尼政治上正红着呢，和她的女友洛特一样，她们俩有可能出人头地——无奈莱尼这个人本性难移，始终无意往上爬。佩尔策提出要送给她一部分股金——后来我也这样提过——，随后又提出送给她父亲一部分股金，但她父亲和她一样不肯接受，好象真正是无产者，再也不愿做买卖了，他只是笑笑，劝莱尼答应佩尔

策的'要求',给他写一份证明。莱尼这样做了,当然没有接受任何回报,这是在博里斯死去,她完全变成一尊青铜雕像的时候。总之,她和我一样写了证明,证明他清白。这样,他就得救了,因为我们两个说话还是有些分量的。如果您问我是否懊悔,我既不说不懊悔,也不说懊悔或可能懊悔,我只说:一想到他的命运捏在我们手里那阵子,我就感到一点也不好受——您懂得我的意思吗?捏在我们手里,凭着一张纸头,一支自来水笔,往巴登巴登和美因茨打几个电话就行了。当时正是乱糟糟的时候,莱尼有点倾向于德国共产党,而甄审机关里就坐着一个共产党,不费吹灰之力。所以说,是我们帮他讲了好话,保他过了关——而且我还要告诉您,佩尔策这个人,平素多么会投机取巧,事事显出他那弱肉强食的本性啊,可是他倒真是从未再成为法西斯分子,即使后来法西斯身分对他完全有利或重新有利时,他也没有。不,从来没有过,这是必须承认的,必须肯定他这一点,他从来没有玩弄不公正的手段同我抢生意,同格龙奇抢生意,这是应当承认的。尽管如此,一想到他的命运捏在我们手里那阵子,我就很不好受。这件事,最后连埃尔泽·克雷默尔也参与了——佩尔策把她说通了,她原是证据确凿的政治犯,也象我和莱尼一样,说话有一定的影响。虽然有我和莱尼两人证明就足够了,他还想找克雷默尔也给他开一份清白证明,后来他也拿到了这个证明——,克雷默尔什么都不在乎,她不理会佩尔策的建议,不理会我的建议,也不理会这时已经重新出头露面的过去的那些同志。早在当时,她的脑子里就只想到一点:'我不想再干了,不想再干了。'她很本就不想再和过去的同志来往——她称他们为台尔曼分子,是他们在法国出卖了她的丈夫,或者说她的朋友,那是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生效的一年半时间内,她丈夫一开

始就反对这个条约。战后，埃尔泽·克雷默尔仍旧做小工，先是待在格龙奇店里，后来终于又给佩尔策干活，最后我才把她接到我的店里，与莱尼一道，重操我们战时干过的旧业：扎花圈、插花饰、装飘带、捆花，直到她年老体弱做不动为止。虽然她们俩一没想过，二没说过或者哪怕是话中有过暗示，我总感到比她们骂我还难受：她们不分红利，好处没她们的份，完全象战时一样——克雷默尔每天早晨煮咖啡，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咖啡的混合比例甚至比战时还要差。上班时，她们依然是围着头巾，自带黄油面包和咖啡口袋。亏得克雷默尔到六六年、莱尼到六九年连续参加了三十年保险，但莱尼不知道，我也一直没让她知道，是我一手负担了她的养老金保险费，私下给她交款，好让她手头至少有几个零花钱。当时她身体很结实——可是想到一旦完全靠吃养老金过日子，她能有多少收入呢？充其量四百马克，也许还到不了这个数字。您知道，我为什么——这当然完全是瞎想法——感到比她骂我还难受呢？虽然她并未说过我一句，只是偶尔难为情地找我借钱，因为她典押了一些心爱的东西，再不还债，这些东西就要归别人所有了。现在我已经熟悉了企业管理，甚至还会合理化经营，我把几月花店整置得井井有条，并且还在进一步发展扩大，这是很开心的——但总觉得有什么事情使我过意不去，这是实话。还有一点，我没有能帮助或搭救博里斯摆脱不幸：他在大街上被当成德国兵抓走不算，偏又遇上矿井里出事故丧命，怎么会这样祸不单行呢？为什么我会无能为力呢？咳，我明明有要好的法国朋友，他们甚至可以帮我保一个德国纳粹分子过关，搭救博里斯自然更不成问题，只要我开一句口的话。哪知道等到好不容易打听出来，他根本不在美国人手里而是落到了法国人手里时，已经晚了，人已经死了，而且连他

那个杜撰的德国名字，她们也都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叫博尔霍斯特或伯尔霍斯特呢，还是叫布尔霍斯特或巴尔霍斯特呢？莱尼也好，这个玛格丽特也好，洛特也好，谁都不清楚。话说回来，倒也确实没有必要搞清楚。就莱尼来说，他是博里斯，这就行了。她们当然没去仔细看他那张军人身分证，更没想到有必要把身分证上的名字记下来。”

为了弄清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的确切情况，需要找一些人交谈并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反正时间可以肯定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七日，莱尼、博里斯、洛特、玛格丽特、佩尔策、洛特时年五岁的儿子库特和十岁的儿子维尔纳躲在中央陵园内一整套“坟茔体系”（佩尔策语）的地下墓穴中。如果说莱尼和博里斯以前一直是在地上的博夏姆普礼拜堂里“交际”，那么，这段期间内就被迫“转入地下了”（洛特语）。这个主意出自佩尔策，此君可以说为此提供了心理根据。他一如既往，再次（始终还不是最后一次）在他那间紧靠花圈陈列馆的活动室里友好地接见了笔者，在活动餐柜旁就坐。他在这里举杯独酌威士忌，啜饮竟日，一只烟灰缸大得惊人。作为一个几经历史风云变幻而终能丝毫无损的过来人，主人的忧郁使笔者颇感意外。他年届古稀而无心肌梗塞之危险，每星期依然打两次网球，天天早起在林中跑步，“五十五岁时”（佩尔策自述）还学会了骑马，而且“我们都是男人，不妨讲句私房话（佩尔策对笔者谈），人家都说年纪大了房事不济，我可根本没那种体会”。就是这么一个人，笔者感到他的这种忧郁情绪在几次的访问中一次比一次厉害了，不言而喻——如果允许笔者作出此种心理结论的话——佩尔策的忧

都，自有其意想不到的原因：相思病。他至今还在渴慕莱尼，只要能博得她的欢心，他甘愿豁出性命"为她爬到半天云里去摘星星，可她偏偏情愿同邋遢的土耳其人乱搞，而不肯和我温存一时片刻，而这全都是为了一件事情，可这件事情又确实不是我的过错。我究竟做了什么呢？如果仔细看一看的话，倒正是我救了她的博里斯的性命。怨只怨他自己不肯老老实实藏在家里，单靠身上一套德国军服和一张德国军人身分证，能顶什么用呢？有谁知道，美国人对死人和陵园怕得要命，特别是听到与死字相连的东西就吓破胆呢？只有我嘛。我有经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通货膨胀时期，我在迁尸连服役时就摸出了这条经验，美国人什么地方都要进去搜查，唯独不搜查死人洞洞，这是肯定的——他们的警犬和所有流氓光棍，也都不会来的——，他们是不会轻易进陵园钻坟堆的。当时莱尼产期在即，不能没有人照看，再说洛特和玛格丽特也得找个地方躲起来，所以莱尼又不能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怎么办呢？我当时是这几个人中间唯一有劳动力的男人，我的家小已经安置到巴伐利亚某地去了，我既不高兴参加国民冲锋队，也不想当美国人的阶下囚。怎么办呢？我把黑里格尔、博夏姆普两所家墓和冯·策克家的大型祖茔挖通，里面用一根根坑道木加固，真象是下矿井采煤一样，挖一段支几根坑道木，挖一段支几根坑道木，总共修成了四间既干燥又干净的砖砌的地下室，每间五个平方，成了一套地地道道的四居室住宅。地下室修好后，我从自己花场把电线拉进去，反正距离也不远，只有五六十米长。我准备了几个炉子，以便照顾小孩和怀孕的莱尼，而且——为什么要隐瞒呢——那里也有已砌好但尚未使用的椁室，也就是给博夏姆普、黑里洛尔、冯·策克他们三家人准备的地方。这可都是理想的储藏室。于是就把干草、床垫以

及还有一个以防万一的小炉子都放了进去——当然炉子是夜里用的，只有神经病才会在大白天生炉子，后来有一次玛格丽特想白天生炉子，足见她对伪装隐蔽的常识一窍不通。我干这种地排子打洞的工作，前前后后格龙奇也帮了不少忙——所有这几处家墓的墓主，都是我们的老顾客——，但他不肯下洞，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吃过一场虚惊，有一回不知什么东西倒塌下来，他被埋在里面，几几乎送了命，从此他再也不肯进地窖和地下酒馆了。我只好用篮子装上土递给他，叫他下墓穴，说什么他也不干，他也不肯和我们一道住进去。他这个人哪，住在地面上是不怕死人的，可是住在地下倒怕自己会死哩。四五年一月底，情况确实吃紧，他回到老家去，他老家在西边，在蒙绍和克罗南堡之间的农村里。他是自己送上门去当国民冲锋队的，活该年纪一大把还免不了进战俘营。唉，坟堆里这四间地下住宅，我是在二月中旬全部完工的，二月里很平静，只有一次空袭，前后半个钟头，扔了几个炸弹，几乎听不出来。有一天，我趁夜里先把洛特母子三个安置进洞，其次是玛格丽特。如果有人告诉您，说我乘机占过玛格丽特的便宜，我说：也对，也不对。我和她蹲在冯·策克家墓的两个小间里，隔壁黑里格尔家墓住的是洛特母子三口。莱尼和博里斯，我们让他们俩住原来的洞房，即博夏姆普礼拜堂底下一间，里面铺了床垫、干草，还有电炉、面包干、水、奶粉、一些烟丝、燃料酒精、啤酒——宛如一个地堡。那时我们已经断断续续能听到埃尔夫特①前线的隆隆炮声，他们还在一个劲地把俄国人装到那边去赶修工事——博里斯的行装中有一套

① 埃尔夫特，小河名，从艾费尔山区北向经波恩西面，于杜塞尔多夫对岸流入来因河。

德国军服，还有与那张晦气的军人身分证相符的勋章奖章——俄国人还在挖战壕，赶修工事，就住在仓库里，监视得也不如过去那么严了。有一天，莱尼骑着她那辆顺手牵羊捞来的自行车，带着博里斯来了。他穿着德国军服，非常合身，装样子的绷带也缠得很象样，看不出破绽，外加还有大印和签字完全符合手续的伤兵证，他们就依靠这些东西顺利地通过了配备警犬的岗哨，大约在二月二十日前后住进了给他们俩在陵园中安排的这间小公馆。果然不出我所料：德军巡逻队也好，美军巡逻队也好，都没有胆量钻坟堆。我们整天待在里面，那里就象是世外桃源，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到。为了维持门面，白天我仍在花圈工场照料，因为一直还在死人，也一直还需要办理丧葬业务，虽然不再举行隆重仪式，不再鸣放礼炮，不再献象样的花圈，但总还得好歹供应儿把枞树枝叶，摆上几朵花儿应应景——这已经是在发神经病了。等到晚上打烊后，我先走回家——后来是骑莱尼那辆捞来的自行车——然后折转身回到陵园，钻到坟堆里。霍伊泽家两个讨厌的小子当然很叫我们恼火，真是您所能想象的最淘气的小畜生，既狡猾又天不怕地不怕，要想叫他们安静，唯一的办法只有教他们学点什么东西，可他们肯学什么呢，当然只有生财之道了。他们死乞白赖地要我教他们算帐、记帐等等。当时他们才那么点点大，就把自己母亲讲的话完全当成耳边风，倘使那会儿就时兴垄断地皮[1]这种游戏的话，我们保险可以叫这两个小坏蛋安静几个星期。他们当然心里有数，懂得不能大声吵闹，也不能钻到外面去，因为钻到外面去可能被抓住强迫疏

---

[1] 西德流行的一种赌博游戏，即在地上划出许多格子，编成号码，玩者轮番掷骰，凭所得点数占有地皮，占得最多者获胜，类似旧时的玩"升官图"，大人亦有用此游戏作为赌博者。

散，那他们是不干的，他们门槛可精哩。但是他们待在洞里搞什么花样啊！我是说，一个人不论干什么都不能太放肆，对死人总该有些敬畏吧，任何一个人，甚至连我自己都是这样的，不敢乱来呀！可这两个小家伙却一心想的是埋藏在坟墓中的珍宝，有时竟敢动手撬墓穴的嵌板，想他妈从死人身上发财。倘使有人说我是靠撬死人嘴里的金牙发财的，那我就要说，那两个小子是恨不得想撬活人嘴里的金牙发财哩。要是洛特今天埋怨说别人从她手里夺走了她的孩子，那我就要说，她的孩子从来就没有在她的手里过。他们早就跟去世的祖母和在世的祖父学会了唯一一门本领：搜刮聚敛。我这个人，有一件事从来不干——其他的人，玛格丽特、莱尼、洛特，甚至博里斯，都干过——，我从来不积自己的烟屁股，更不去拾别人丢掉的烟屁股，那多恶心啊。我生来爱整洁，任何人都可以向您证明：哪怕天气再冷，我每天夜里也要到外面去，敲开墓地周围大水沟——供浇花用水——的冰层，从头到脚洗一洗。此外，那阵子只要有可能，我也坚持我的早晨跑步，后来变成了夜间跑步。象他妈拾烟屁股吸，我是最看不惯的。二月底左右，即'三·二'抢仓库发大财之前不久，在墓穴中的这个苏维埃天堂里，情况变得相当困难了，因为我们事先没有算准，把美国人过来的时间早估了一个星期，以致面包干不够了，黄油、甚至咖啡代用品也不多了，特别是香烟。这时，两个小狗日的拿来了卷得好好的香烟卖给我，那是他们向好心肠的玛格丽特讨到烟纸，用母亲的卷烟机卷的。事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些香烟竟是他们用我自己丢掉的香烟屁股做的！他们讨价十个马克，还说价钱并不算贵。几个娘们看了哈哈大笑，对小畜生居然懂得按时价出售赞不绝口。我嘴上在与这两个小鬼头讨价还价，心里可凉了大半截。问题并不在于要多少钱，钱我有的

是，即使五十个马克一支，我也会照付不误。问题是原则嘛！这样做是错误的。毛孩子就学会了搞钱，大人看见还感到滑稽，甚至发笑！只有博里斯连连摇头。后来，过了'三·二'，他们动手给自己在墓穴角落里设了一个小仓库，一会儿塞进去一听熟猪油，一会儿塞进去一包香烟，还口口声声说什么这是他们日后起家的资本，这时，莱尼也摇头了——我们大家非常不安，没有去注意这些事情。就在'三·二'这天晚上，莱尼生产了，她原来就不肯让孩子生在墓穴里——我当然理解她的心情——，她的圣约瑟也不希望这样，因此莱尼临盆时，她和博里斯从地下搬到了地上，待在被炸坏的陵园中的花场里，玛格丽特准备了药品，大家七手八脚用泥炭、旧被褥和草席打好一个地铺，让她躺在上面分娩，说不定那儿正是她当日受孕的地方哪。孩子是足月出世，七磅重，生在三月二日，按九月怀胎推算，应当是头年六月二日左右怀的孕——您可以查明，这段时间前后没有白天空袭，一次也不曾有过！而且我还可以根据我的工资单证明，六月二日这天没有开夜班，博里斯更不做夜班——这就说明，他们俩一定是在大白天钻空子干的好事。反正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只不过所谓苏维埃天堂倒是根本无从谈起的。'三·二'轰炸后陵园变成了什么样子啊：天使和圣徒塑像的脑袋都给炸丢了，坟墓一座座被炸得底朝天，有的里面还可以看见棺材板，有的连棺材板也无影无踪了。我们豁出命到仓库里去搬东西，一天下来个个精疲力尽，当晚又遇上莱尼分娩！亏得分娩又快又顺利，这已经算是万幸了，哪里谈得上什么苏维埃天堂啊！还有，您知道是谁又教会我们做祷告的吗？正是这个苏联人！不错。正是他教会我们做祷告。这小伙子真不简单，说真的，他要是听我的话，是不会死的。多么失策啊，就在六月七日那天下午，他和女人孩子

们一道到城里去，身上什么都没带，就带了那张倒霉的德国军人身分证。倘使小伙子守在墓穴里不出去，安心读他的克莱斯特、荷尔德林或其他人的作品，连普希金的作品我也有办法给他弄到的；倘使他在里面多躲上一个月，等搞到了真的或假的释放证，那就好了。那年夏天，美军战俘营已经在纷纷释放农民了，而他所缺少的，无非是一张英军或美军的正式释放证而已。娘儿们没有想到这一点，而是让和平冲昏了头脑，让快活冲昏了头脑，她们高兴得太早了一点，尤其是一连几个月，天天下午和傍晚抱着儿子，带着霍伊泽家两个孩子，同始终笑容满面的格鲁伊滕爷爷，到来因河边上去坐。小伙子太忘乎所以了，要不今天还可以到来因河或伏尔加河边上去坐嘛。我为什么直到六月初才公开露面呢，还不就是为了忙着给自已弄一张释放证么，有了释放证，填明我的姓名和真正的俘虏号码，盖上俘虏营的大印——因为我们这一行如今属于农业——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出事情的。您知道，干我们这一行实在够忙的，我是说，用不着再死人了，死人已经够多的了——这些全都得安葬入土呀。可洛特也好，玛格丽特也好，都不曾想到去利用她们的关系，给小伙子弄一张正式释放证——玛格丽特只要屁股扭几扭就能办到，而洛特手里掌握了那么多公章和介绍信，又有那么多熟人，只要想到，也不会费什么力气的。过了五月或六月，还不给小伙子搞到合法的身分证明，实在是太轻率了，即使非取名弗里德里希·克虏伯[1]不可，也行嘛。唉，我要是为这件事多操点心就好了——我不仅喜欢他，而且爱他。也许您会见笑；他，他曾经教训我，说

---

[1] 弗里德里希·克虏伯(Friedrich Krupp, 1787—1826)为德国最大的军火钢铁垄断资本家族创建人，依靠战争发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克虏伯第五(阿尔弗雷德)以曾助希特勒肆虐，被捕判刑。

关于劣等民族的那一套理论全都是胡说八道。劣等民族现在就蹲在这儿哩。”

一瓶威士忌还不曾喝完，佩尔策的眼睛里就泌出了泪水，他悄悄地将泪水揩去，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这个人果真是动了感情，还是惺惺作态呢？“莱尼父亲的死，难道是我的过错么？能赖我吗？为了这件事，她们见到我就得象见了瘟神一样避开么？难道不是我诚心给莱尼父亲帮忙找出路的吗？即使三岁小孩和外行人都知道，他是个连粉刷墙壁也干不来的人，哪怕是给他顶好的材料，他也干不好。人家请他那个泥工队修房子，是因为实在找不到第二家，没有办法，可是由他经手修的房子，过不了几天，天花板就掉下来了，或者是墙上的灰粉一片片往下落——他根本没学过粉刷墙壁，对技术一窍不通，不会使劲。他不想再做买卖人，要当无产者，看来完全是蹲监牢或集中营蹲出了神经病，要不就是听信了同他一道蹲监牢的共产党的宣传。我可以告诉您，象他这么一个吃官司轰动整个建筑界的大人物，事实证明竟然毫无本领，连墙也砌不来，真叫我们感到失望。不知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推着一辆旧的手推车，上面装几只铅桶、几把泥刀和铁锹，走东家串西家揽活计，给别人修房屋，换点土豆、面包，有时换一支雪茄烟抽。每天傍晚，和女儿、女婿、外孙到来因河边上去闲坐，唱唱歌，看看来往船只——这哪里象一个具有巨大组织天才和胆略的人干的事啊。我有好几次向他提出公正的建议，对他说：‘格鲁伊滕，您看，我手头有三四十万马克，实在吃不准派什么用场好，您拿这笔钱去做买卖吧，等通货膨胀过去了再还给我，到时候按三倍数目还本就行了，利息一个也不算您的。您是个明白人，知道象现在香烟就是钞票这种世道，赚钱实在太容易了，这是因为有那么多刚从集中营放出来、过去长期抽

不上香烟的虚无主义者，因为有那么多学时髦的小青年和有烟瘾的丈夫被炸弹炸死的婆娘或军人寡妇。您我都懂得，有朝一日香烟又会只值五芬尼或至多十芬尼一根的，您今天五十五芬尼买进一根，一转手就好卖五十六芬尼，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倘使您想把香烟囤积起来，等到钞票值钱了再卖的话，那我可以预言，您的五十五芬尼到时候只能卖五芬尼，如果香烟到那时没有发霉的话。'他听了哈哈一笑，以为我是劝他做香烟买卖，其实我不过是打个比方罢了。我倘是想，他准要重整旗鼓，再开建筑公司的，要是他脑子灵活的话，满可以以政治上受迫害者的身分招摇过市的。可他不愿意。我的钱总得有个去处呀，经营地产吗？那会儿地产还不怎么吃香。如果莱尼及早把她的房子以五十万马克的代价卖给我，我会立出字据，答应向她提供一套住宅，一辈子不收房租。可她偏偏把房子卖给了霍伊泽，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呢？总共才作价六万马克抵债，只够四次还地税的钱，而且是在四四年十二月——真叫人想不通！我的钱却空着没地方用。——我尽量动脑筋花，买家具，买画和地毯，甚至还买书，但三四十万怎么也花不完啊，都是现款摆在家里。有一天，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大家都笑我说：'佩尔策变得近人情了，生平头一次做起蚀本生意来了。'您猜我干什么：我决定收废钢，不是收废钢烂铁，而是专收优质钢梁，当然是合法的，我还找到门路申请到所谓废钢利用权。我干这一行，大多数人都很高兴，因为这等于是帮他们清除他们地皮上的断垣残壁。那个时候钢梁多得很，问题是得有堆放的地方，而我有的是空地皮，我打定主意干！您知道，当时象莱尼或克雷默尔这样一个花圈女工每小时工资是多少？五十芬尼，建筑业小工大概是一个马克，运气好时可挣一马克二十芬尼，重体力劳动者当然还补助油脂、面包、

糖等配给票，要弄到这种票证，当然需要正式开店，我正式开了一爿店，招牌是'废旧房屋建筑拆除工程股份公司'。嘿，我择吉开张收钢梁那天，全城不知有多少人讥笑我，因为当时有的是钢，整个欧洲遍地都是钢，不消花两包香烟钱就能买一辆破坦克——我就让他们去讥笑。我雇了四个工程队，带上工具，搞到了废钢收购证，有计划地边拆边收。我心里想：由你们去笑吧，钢总归是钢，而且永远是钢。那个年头，你不花钱也可以弄到旧兵舰、坦克、飞机，只要你拉得动，我就拉了坦克回家哩，反正我的地皮那时候还没盖房子，不愁没地方堆放。就这样，四五年到四八年期间，我把本钱全花在废钢上，经常有成十万米的优质钢梁一捆捆堆放在我的地皮上。我一开始就没有搞八马克或十马克一天的固定工资，我给工人出高价按件包工，三马克一米，遇上拆除工程方便的建筑，有的人往往一天能挣一百五十马克以上，外加还发给照顾重体力劳动的食品配给票，这是一种额外优待。我们有步骤地从市区边缘一带拆起，向市中心发展，到了市中心，那儿都是大商店和办公大楼。工程越来越困难了，因为钢梁上还带有好多混凝土，有时碰到整块整块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需要一段段焊开。遇到这种情况，我当然得增加工资，通过谈判，就象煤矿根据煤层深度而谈判一样，将每米钢梁工价增加到五六个马克甚至到十马克。莱尼父亲就是给我负责带一个这种工程队，他自己当然也动手干，每天晚上收工时，按实收钢梁米数付现款，货银两讫。有时有的人一天能挣三百马克，有时当然只能挣八十马克，不过从来不会低于此数，而这个时候我花场的工人，一个星期还挣不到六十马克哩。这时，不知道有多少人始终还在笑我收钢梁，笑我让钢梁堆在舍恩施特特街我的地皮上生锈，那个时候，连现成的高炉都在一座座拆除① 呀！不管三七

二十一，我反正固执己见，一收到底。我承认，干这种活不是永远没有危险的，可我并未强迫谁干啊，我没有强迫过任何一个人：这是两相情愿的买卖，自愿者干，何况他们还有外快可捞，在断壁颓垣中有时能找到家具和零碎物品、书籍和家用器械。这是他们的副业。人家走过我的地皮时，个个笑破肚皮说：'瞧，佩尔策把钱堆在这里生锈哪。'我那些'花开不败'狂欢节俱乐部的朋友中，有的很会打算盘，又是说笑话的大王——都是建筑师之类人物——他们仔细给我算了一笔细帐，说明我确实有多少钱放在那里锈掉了，他们这一套计算方法都是从造桥等方面学来的，有精确的面积数字，说实话，这笔投资是否值得，连我自己也没有把握了。但事情偏偏就这么怪：到了一九五三年，由于住房紧张，为了腾出地皮盖房子，我不得不设法将那些堆了五年到八年之久的那些破烂货脱手，竟卖了花花绿绿一百五十万马克[②]，这时他们都骂我是无赖、投机商、发战争财的家伙或者其他什么。同时旧坦克也突然值钱了，还有那些卡车和我顺便弄到手——当然是完全合法的——的一切，因为两处大地皮都腾空了，等着要钱盖房子。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了可怕的事情，出了娘儿们永远不肯原谅我的事情：莱尼的父亲摔死了，在拆除前卫生局大楼的钢梁时摔死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干这种活有危险，弄不好就要死人，因此我也付了危险补贴，或者说提高了每立方米的工价——实际上就等于危险补贴在内。当老格鲁伊滕自己动手拿焊枪干这种危险活时，我也警告过他大意不得。

---

① 指德国投降后根据波茨坦会议决定拆除用于军事目的的工业设备。

② 这是指币制改革以后的新马克，下面提到的币制改革是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日宣布实行的，十个旧马克兑换一个新马克，因此一百五十万新马克为原来三四十万旧马克的四五十倍。

请问，我又怎么知道他这样脓包，不懂得'登高作业，防止踏空'这条要领，竟会连自己脚下踩着的一块也焊断，以致从八米高空一个倒栽葱摔下来呢？天啊，他可是吃建筑饭的人，还有工程师头衔，他早年开建筑公司与钢梁打的交道，胜过我五年中收到的钢梁的十倍——我怎么能知道，他会一焊枪把自己焊得掉进深渊里去呢？我能事先知道这一点吗，这是我的责任吗？在成为一片废墟的城市里焊拆炸毁的钢筋水泥房屋，哪一个不懂得危险啊？我不是还考虑工程危险多付了工资吗？而且坦白地说，事实证明，这个几乎神乎其神的建筑行家格鲁伊滕，在收钢梁、撬钢梁或焊拆钢梁方面，是个十足的脓包，甚至在理论技术上也一窍不通——看在莱尼的分上，我多付了几个钱料理他的后事，因为莱尼和博里斯的命运使我感到伤心。"

说到这里，佩尔策泪如泉涌，以致谁也不能怀疑他的确是在哭，从动作来看是完全真实的，至于感情上是否真实，笔者则不想妄下断语，因为这不是他分内的事。佩尔策这时双手握住威士忌酒杯，两只眼睛东瞧瞧，西看看，似乎对自己的活动室、酒柜和隔壁陈列的花圈，都不认得了，低声说："可怕啊，一个倒栽葱掉在一截翘起的钢筋水泥上，几根断头钢条给他来了个大穿孔，没有大开花，只是穿孔：脖子、右上臂、胸口、小腹，一共四处穿孔，而且——多可怕啊——他微笑，一直还在微笑哩——就象一个疯子，象个钉在十字架上的疯子。真荒唐，钱们想把过错推到我的头上！而且"（佩尔策的声音迟疑了一下，眼睛露出痛苦的神色，手发抖。——笔者）"而且，焊枪还挂在格鲁伊滕刚刚焊拆的那根凸出的钢梁的剩余部分上，咝咝地直往外冒气哩。真是倒霉，事情就发生在币制改革前一个月，我正打算停止收钢梁，因为我的旧马克也用光了。不用说，这次事故一出，我立即解散

了所有工程队，关门大吉，倘使娘儿们说我是巴不得出事故好歇业，那可是天大的冤枉：老实说，如果四六年年中币制改革，我也会歇业的，可你叫我怎样证明这个'如果'和'也会'呢。反正当时是币制改革前一个月，这是事实，我坐在家里，忍受着娘儿们的痛恨，眼看着别人的讥笑，笑我收购的废钢还堆在那里生锈，整整堆了五年。由于老格鲁伊滕没有参加保险，我把他当作同事，不是作为我手下的工人或职员，而是作为所谓的合同公司，主动提出付给莱尼和洛特一小笔抚恤金。可结果呢，好心不得好报，有一次我找上门去，洛特竟在我背后吐唾沫。她出口大骂，什么'吸血鬼'和'杀人犯'，还有更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还连连吐口水。她这个人呀，按说我还救过她的命哩，是我答应让她躲在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里；那次她冲进仓库抢东西时，突然象疯了似的高呼社会主义口号，也是我赶忙用手捂住她的嘴巴。我与她那两个不成材的儿子打过交道，二月底我们蹲在墓穴里，香烟告罄时，我还买了两个小畜生用我的香烟屁股卷的香烟。'三·二'那天，我们几乎一连七个钟头待在一起，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大家的牙齿格格地直抖。不瞒您说，连素来相信无神论的洛特，也喃喃不停地念着博里斯教我们的祈祷文。就连她那两个小流氓儿子也吓得老老实实，不吵不闹了。玛格丽特哭个不停。在那种大难临头的时刻，我们几个就象兄弟姐妹一样紧紧依偎在一起，好象世界正在毁灭似的。那阵子，什么纳粹也好，共产党也好，什么俄国兵也好，菩萨心肠的女护士玛格丽特也好，一切都不分了，唯一的问题是：生或死。一个人尽管不再经常进教堂，心里总还是想到教堂的，因为画片上和现实生活中都有教堂啊——现在教堂已毁于一旦，化为灰烬，我们好几天牙齿缝里、嗓子里还都是泥沙呢。轰炸停止后，我们立即动手，一块

儿动手去接收德国国防军的遗产，而且就在当天断黑时，莱尼和博里斯的儿子出世了，我们还帮了忙呢。"这时的佩尔策，一直还在流泪，声音愈来愈低："您知道，唯一一个了解我、高兴和我结识的人，我恨不得将他当成我的亲儿子、一家人、一道开店，甚至比我妻子儿女还亲的人，您知道是谁？不是别人，就是博里斯·利沃维奇。虽然他抢走了我至今还在思慕的姑娘，我还是喜欢他，看来他也确实是我的知心，他了解我，求我给他的儿子行洗礼。哎，叫我给他的儿子行洗礼，老实说，我一听连自己也打了个冷战，我想，我的一双手这辈子什么东西没有摆弄过啊：活人死人、女人男人、支票和现金、花圈和飘带，等等等等。可他坚持一定要我用这么一双手给小孩行洗礼。博里斯对我说：'瓦尔特'——'三·二'以后我们都以你相称了——'瓦尔特，请你现在就给我儿子临时行洗礼。'他这么一说，连'乱弹琴'这几个字想必已经到了口边的洛特，也闭上了她的鸟嘴，她既没吐口水，也没吭声。我遵命照办：我走进办公室，拧开水龙头，等发黄的锈水流光，水干净一些以后，把我的玻璃杯冲洗干净，盛了一杯水，给孩子行了洗礼。我按平常在教堂里看见执事行洗礼的那副架势——由于我给孩子行洗礼，不能兼做孩子的教父，所以孩子是小维尔纳和洛特两人抱着——把水洒在孩子头上，一边说：'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给你行洗礼，给你取名莱夫·博里索维奇'。就在这个时候，甚至库特这个小坏蛋也号啕大哭起来，甚至长舌妇洛特和博里斯也哭了，玛格丽特反正泪水一直未干——只有莱尼未哭，她躺在地铺上，被灰尘刺红了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容光焕发，一把接过小家伙抱到了她的怀里。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些，好啦，您请便吧，让我静一静，我心里实在太激动了。"

笔者坦白承认，听到这一切，他的心里也非常激动，只好忍住两三滴眼泪，辞别主人，登上汽车，为了不使自己过于感伤，驱车直驶博加科夫的住处，高兴地在一个有玻璃屋顶的平台上见到了他：他坐在一张装有轮子的靠背椅上，身上裹着一条被子，沉思地注视着远处两条铁路的交叉口。近处是绿油油的园地，两条铁路当中可以看见一处碎石坑、一家花场和一个废铁堆放场，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网球场。原来是红土的地面显得有些发白，还有一个个积水坑，天空中有几架屋式战斗机在轰鸣，夹杂着迂回公路上传来的汽车行驶声。小菜园中间的路上，一群孩子在用空牛奶罐头当曲棍球玩。博加科夫一个人坐在平台上，情绪也颇为伤感，没有看见他那只吸烟架，也不接受笔者敬的香烟，只是紧紧抓住笔者的手腕，似乎要给笔者切脉。

"我把老婆和一个儿子丢在那边不管了。我的儿子要是能逃过九九八十一难，现在差不多象您一样大哩，他叫拉夫里克，四四年时十九岁，他们肯定是把他拉走了——天知道给拉到什么地方去了——；有时我想还是回去吧，让自己这把骨头埋在老家吧——可我的拉丽莎·伊凡诺娃是不是还活着呢？四五年二月，他们把我送到埃尔夫特前线修工事，那次遇上一个机会，我就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和她分别四年，我头一次抱住一个女人睡觉了——当时我们躺在一间黑洞洞的仓库里，俄国人、德国人、士兵、俘虏、女人，大家横七竖八地挤在一起——我也说不上那个女人有多大年纪，她没有反抗，只是事后掉了几滴眼泪，想必是因为我们头一次在黑暗中干这种所谓通好的事情吧，所以双方都感到很难为情，而且当时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是

死是活都说不定哩。那个村子叫格罗斯比莱斯海姆，很富庶，就象俄国的那种富农村庄，我们躺在干草和萝卜堆中间。天啊，我和她都哭了——哎，说我们就那么提心吊胆在黑暗中困了一觉，那还形容不出当时的尴尬；我们脚上全是泥土，也许她还把我错当成德国人或美国人呢。因为那个地方的确躺着一些已经快要冻僵了的美国伤兵，他们都是年轻人，本来是有一个人送他们上军医院或收容所去的，但那个人半路上开了小差，将他们丢在那里不管了。可怜这些美国伤兵连话也说不清，只是结结巴巴地骂什么'他妈的战争'、'日他娘的将军'、'短命的许特根森林'——这可不是易北河会师①，而是在埃尔夫特这条荒凉的小河上会师啊。这条河，你一口口水就可以吐到对岸，要是以这条河作为来因河和西部边界之间的防线，那连一个十岁的娃娃尿尿也能尿到对岸去的。嗯，有时我的确念念不忘这个曾经和我一度有缘的女人，我亲过她的脸蛋，摸过她又密又软滑的头发，我不知道头发是金色还是褐色，不知道她是三十岁还是五十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因为我们是夜里到达那个村子的，离开时也是夜里。我只看见一所所大院子，一堆堆火，有人在火上煎煮什么东西，四周围都是士兵，冻得半死的美国人和我们被夹在当中，博里斯也在——莱尼就象童话中那个有七双铁鞋和七根节杖的姑娘一样跟着他。我想您不会不知道这个美丽的童话的。黑暗里，脚上是泥土，旁边是萝卜，女人的脸颊，她的头发、眼泪，当然还有她的怀抱。也许她叫玛丽，也许她叫保拉或卡塔琳娜，但愿她永远不会想到告诉她的丈夫，不会向任何一个神父低声忏悔这段经历。您过来，我的孩子，把您的手伸给我——给一个人切

---

① 指美苏两国军队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易北河中游托尔高会师联欢。

脉可是做好事。黄瓜迷和列宁格勒乡思病一道上电影院去了，他们去看一部描写库尔斯克战役的苏联影片。是啊，四一年八月初，我就在基洛夫格勒附近一次战役中不幸被包围，当了德国人的俘虏。这个城市当时反正还叫基洛夫格勒，谁知道它今天叫什么，你也知道他们是如何对待基洛夫的——他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基洛夫——现在他不在了。当你们德国人的俘虏，可谈不上怎么实惠啊，老弟，如果你对我说，当俄国人的俘虏也不见得怎么实惠，那我就要告诉你，我们的待遇和德国俘虏一样苦：我们穿过村庄，走过田野，一连走三四天，喝不上一口水，渴得几乎昏过去，只要看到一口井或一条小溪，我们就渴得直舔嘴唇，连肚子饿也忘记了。五千人挤在一个集体农庄的牲口院子里，头顶青天，一滴水也喝不到啊。有时遇上老百姓即我们自己的同胞想给我们送点吃的喝的，他们根本没法接近我们——人家二话不说朝他们开枪——；同样，假使我们中间有谁接近老百姓，机枪一扫射，老弟啊，他也就没命了。有个女人打发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天真可爱的小娜塔莎，送面包和牛奶给我们，她准是想，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女孩，左手拎罐牛奶，右手拿块面包，他们总不至于对她怎么样吧，可是，不然，照样一顿机关枪，我们的小娜塔莎象任何别的人一样一命呜呼了，牛奶、鲜血和面包洒了一地。就这样，我们从塔尔诺夫卡走到乌曼，从乌曼走到伊凡-戈拉，经过盖辛、文尼察，直到日美林卡，这时已经是第六天了，接着继续西行，来到普罗库罗夫附近的拉科沃[1]。我们每天吃两顿豌豆清汤——所谓开饭，再简单不过了：到时候，有人扛来几只炊事桶往我们当中一放，两三千人一拥而上，光着手往

---

① 这些均为苏联乌克兰西南部地名。

桶里捞汤，象饿狗抢食一样舔着吃，有时能捞到几块半生不熟的萝卜、菜皮或土豆，吃下去就胃痛，拉痢疾，倒在路边上再也起不来。我们就这样过一天算一天，拖到四二年三月，有时一天要死掉八九百人，还打骂交加，甚至还朝人群开枪——他们既然没什么东西给我们吃，或者据说没有东西给我们吃，那么老百姓给我们送吃的他们为什么不让呢？后来，我被送到柯尼斯堡①，分派在克虏伯一家履带厂干活，做夜班十一个钟头，做日班十二个钟头。我们挤在厕所间里住，个别运气好的可以找到个狗棚，狗棚虽小，至少算是住独间。最倒霉的要数生病或被认为磨洋工——磨洋工的被送交党卫队。一旦生病没法出工，他们就给你送大军医院。这种军医院的招牌完全是骗人的，实际上是杀人院，死亡营，收容的人数四倍于病床，里面脏得要命，病人每天供应二百五十克代用面包，两公升清水罗宋汤②。所谓代用面包，大部分是没有切碎的麦秆、稻草和木质纤维。那些糠秕、麦芒和草料，吃下去肠胃怎么受得了啊，根本谈不上什么营养，而是有计划地摧残身体——，外加动不动就打骂，叫病人吃棍子。后来显然连草料也供应不上了，又在面包里掺木屑，三成里倒有两成。清水罗宋汤是烂土豆，杂七杂八的泔水下脚，还有老鼠屎作香料呢——吃下去叫你拉不出来，有时一天要死百把人。象您已经是走运的人了，我大概也算运气不错：我干脆不再吃那玩意儿。不吃，肚子当然是饿，但至少不生病，吃那种东西，我一看就知道等于是吃毒药。所以说，我情愿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克虏伯先生的厂里装履带，每天干十二个钟头的活。不比不知道，一

① 柯尼斯堡，原东普鲁士首邑，一九四五年起改名加里宁格勒。
② 原文 Balanda-Suppe 是俄文 баланда 的译音，指很稀的坏汤菜。

比就清楚，现在你可以看到，有机会派在一个城市里收死尸和清除瓦砾堆，条件是多么好啊。至于当时的博里斯，在我们的眼睛里更是神话中的王子，最后会继承王位。他从未学过栽花种草，居然能到一家花场去扎花圈，每天早晚专门有卫兵接送，又不挨打，甚至有人送东西给他，并且——除我以外的确谁也不知道——还有人爱，他也爱人家。这可是王子似的生活啊！我们呢，我们当然比不上王子，但也算运气不错了。我们虽然不配收理德国人的尸体，但我们有资格清除街头的破砖烂瓦，抢修铁路，在清除瓦砾时，往往免不了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只要俄国人的手，或俄国人手里拿的铁锹碰上一个死尸，就免不了可以休息一会，等人家将死尸搬走——博里斯就是专门给这种死尸扎花圈，装飘带的——，这还不是意想不到的好处吗。有时候，瓦砾堆里还会有砸碎了的橱柜碗架，里面往往有点有用的东西，如果发现有吃的东西，只要不被看押我们的哨兵看见，就是意外的幸运。如果发现了东西，哨兵没有看见，又没有被搜身的话，那就是三倍幸运。不过要是谁不小心露了馅，可就要倒大霉，因为按规定，连德国人发现东西都不准私入腰包的，要是俄国人把什么东西藏进自己腰包——象如夫里尔·奥西波维奇和阿列克赛·伊凡诺维奇两个，就被送到党卫队，给他们砰砰砰几枪毙掉了。最好当然是发现有东西就赶快吃掉，不过吃的时候又得小心，因为虽然并没规定干活时不准吃东西——这一条根本用不着规定——，但象我们这种人怎么会有东西吃呢？那还不肯定是偷来的吗？我们老营的那位少校倒是个好人，谁要是告我们的状，除非他手下有哪个上士坚持要送党卫队，一般他只是关关我们的禁闭了事，而且偷一直尽力设法，给我们争取至少按规定领到定量口粮。有一次我被他们抓住送到他那里时，听到他正

在不知同哪个上级部门打电话，不知同谁争吵：我们干的活是不是值得一提？如果干值得一提的活，每天定量大约是三百二十克面包、二十二克肉、十八点五克油脂、三十二克糖。干不值得一提的活，则只有一百二十五克面包、十五克肉和油脂、二十一克左右糖。他同柏林或杜塞尔多夫的什么人狠狠吵了一架，争取将我们的活列为值得一提的活，无论如何，我亲爱的，这一架可不简单，这关系到多领或少领一百克面包、七克肉、三点五克油脂、十一克左右糖啊！这个少校可厉害哪，他比普通人少一条胳膊、一条腿和一只眼睛。当我那次被抓到他那里时，他简直咆哮如雷，可后来倒是他救了我们集中营剩下来的十二个人的命。具体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遇上大轰炸，我们当中有三十个人趁机溜之大吉，钻进了瓦砾堆或朝西跑去投奔美国人，领头的是我们那位孜孜不倦的维克托·根里肖维奇——事后我们再也未听到他们的音讯。剩下来我们十二人，包括博里斯在内，还在高高兴兴等着照常去他的花场。我们那天早晨一觉醒来发现，看押我们的哨兵全都行动一致地开了小差，没有岗哨，看守室的门敞开着，铁栅门敞开着，只有带刺的铁丝网还在——当时我们眼前看到的，就象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平台上看到的一式一样：铁路、花场、碎石坑、废铁堆放场——我们坐在那里，得到了自由。不过告诉你，那种自由可一点也不惬意，自由了往哪儿去呢？谁能确保我们的生命安全呢？就这么以获得自由的苏联战俘身分到处跑么，那生命可没保障啊——要知道，看押我们的哨兵并不是正式而是自动结束战争，说不定他们还抓住了他们中间的几个，把他们吊死了或枪崩了呢。我们合计了一下，决定还是向老营如实报告情况，只要这位少校没有同样开小差，他准会帮助我们摆脱这种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和弄不好就性命难保的自由

的——就这么大模大样走，那可是瞎胡闹，说不定半路上碰上巡逻队，落到那些走狗们手里。谁都知道，他们抓到人有一种最省事的处置办法，一不用派人看管，二不用找地方关押，更不用审讯判决，这些他们都嫌麻烦，他们的办法是：抓到人就就地枪毙，我们可不想讨这种下场。是啊，我们当时已经听到了断断续续的炮声，这种炮声倒有点象是预告真正的自由——可是我们的自由未免来得过于轻易，看来反而凶多吉少。维克托·根里肖维奇的行动，是经过周密准备的，他早就准备好地图和食品，还有也许是靠他的间谍卫星或内线了解到的几个接头地址，他们分批分开溜，约定在靠近荷兰边界上的海因斯贝格会合，打算从那里越境去阿纳姆。我们可毫无准备，被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弄得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睡一觉醒来就自由了。我们中间有五个人胆子大，不愿失去争得自由的好机会，他们收拾一下东西，稍为换一下衣服，抄起一把锄头或铁锹，装成出工的样子，穿过铁路走了，这个主意的确不坏。剩下我们七个都是胆小鬼，博里斯当然舍不得丢下他的莱尼，但又不敢没有科尔布保驾一个人去花场，于是，他立即跑去给花场打了一个电话，发出了警报。过了半个钟头，那姑娘骑着一辆自行车来了，站在内格拉特路维尔德斯多夫路口等他。随后，博里斯又打了一个电话向老营报告：看押我们的士兵都不见了。半个钟头不到，这位一条胳膊一条腿的独眼少校，带着几名士兵乘汽车来了。他装了一条很合适的假腿，行动自如，甚至可以骑自行车——只见他下得车来，一声不响地穿过营房，先进看守室看了看，再出来找博里斯盘问了几句，向他表示感谢，那是一本正经，真心实意地同他握手表示感谢，而不是装装样子，敷衍了事哩。要命啊，当时是美国人进城前十四天的时候，你猜这个少校怎么处置我们啊？他把我

们往埃尔夫特前线送，迎着美国人上！他对博里斯说：'科尔托夫斯基，我不得不遗憾地认为，您的花场工作已经结束了。'这时，我看见那姑娘在和汽车司机交头接耳，司机肯定给她讲了现在要去的地方，我还清楚看到，她挺着个大肚皮，就象一只快要落蒂的大西瓜，我又禁不住想起了我自己的那个她。这样过了二十分钟，我们乘上一辆卡车走了，先到格罗斯比莱斯海姆，再到格罗斯费尔尼希，接着又连夜开到巴尔克豪森，等我们到达弗雷兴[1]时，又是在夜里。这时只剩下我和博里斯了，其他几个明白了少校的意思，乘着黑夜，贴地面爬过萝卜田，跑到美国人那边去了。于是，我们在弗雷兴下车，我们的王子由他的王妃给他换上一套德国军服，缠上涂有鸡血的绷带，送进了中央陵园。至于我本人，我的做法可说是发神经：我一个人连夜赶回城里。这时是二月底，我又回到一片废墟的城里，在这里，我曾铲过一年破砖乱瓦，收过一年死尸，也挨过骂，受过讥讽，有时遇到看押我们的士兵不注意或不屑注意时，过路人给我丢过一个香烟屁股或一支香烟、一个苹果或一片面包——我回到了这个城市，钻进一幢破别墅，藏在它那已经倒塌半边的地下室角落里等待着。我身上带着从农民家里偷来的面包和鸡蛋，渴了就喝洗衣间里积的雨水，白天我把客厅里的地板木头拾来，这种木头烧起来可炀哪。我还到破家具堆里东翻西找，最后给我找到了一只资本家用的皮雪茄烟盒，上面印有'洛桑一九一九年'字样，里面装着六支高级大雪茄。达只盒子今天我还留着，可以拿给您看。六支高级大雪茄，如果您不大手大脚的话，足足可以卷成三十六根香烟，要是您再有火柴，那就可以说是一笔财产了。我不仅有火

① 弗雷兴：科隆西郊小城市名。

柴，还有卷烟纸哩，这是一本格罗斯费尔尼希出版的薄版祈祷书，五百页，扉页上写有：卡塔琳娜·韦默尔斯基兴，一八七八年初领圣体留念。不用说，动手卷烟前，我也看了撕下来的那一页上面的几句话：'扪心自问，你在思想言行上可曾不敬上帝？啊，天父，我有罪，我对上天和你大大不敬，我象一只失群的迷途羔羊，不配称为你的儿女。'这就是这张可怜的纸片化为灰烬以前我对它犯下的罪过。我蹲在地下室的角落思，身上裹着拾来的破窗帘布、破台布、衬裙和破地毯，到了晚上，堆几块地板木头烧点火取暖。我亲身经历了'三·二'大轰炸，那真是天崩地裂，简直是世界末日来临呢。现在，我要告诉您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并且也还没有对我自己说过的一点：我爱上了这个城市，爱上了我吃过的这个城市的灰沙，爱上了它那连连抖动过的大地，爱上了它那倒塌的教堂钟楼，爱上了后来在寒冬腊月和我睡在一起的女人；如果你没有东西取暖，同你睡在一床的女人就是一只火炉。我再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城市了，但愿我的拉夫里克和拉丽莎原谅我这样做，但愿她原谅我在这本祈祷书上读到的一段话：'你在圣洁的夫妻生活中有过不端的行为吗？你在思想言行上有过这种不轨吗？你有过同有妇之夫、有夫之妇或未腊男女犯罪的想法——即使未曾见之于行动——吗？'这些问题都是针对卡塔琳娜·韦默尔斯基兴而提的。如果问我，我只能回答一声'有过'，而就她来说，但愿她能回答一声'没有'。啊，一个人在动手撕祈祷书卷烟之前内心感到非仔细看看、读一读每一页不可，这也许是做祷告的最好方法。好啦，现在把您的手伸给我，不要说话！"（笔者莫名其妙地把手伸给博加科夫，发现他也在W.和流T.，有S.，而且十拿九稳有L.2。）

为了对博加科夫陈述的具体情况稍作补充，笔者谨再摘引一些高级人士讲过的一些未完全核实的原话，或高级人士的谈话记录和报告，作为所谓的示例。

罗森贝格[1]："诸位当中有些人这样想，似乎到德国来的路程几乎和去西伯利亚的路程差不多远。

"我知道，如果弄来三百五十万人，那是无法妥善安置他们的。在我们这里，成千上万的人得不到妥善安置，或者受到不好的待遇，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用不着为此而操心。但有一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想党的区领袖绍克尔[2]已经谈到了或还将会谈到——，那就是：把这些东方人弄到德国来，目的是让他们劳动，而且要尽量达到高标准的劳动效率。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为了达到高标准劳动效率，自然不能让他们中间的四分之三冻死，不能一天站上十个钟头，相反应该让他们有吃的，使之具备后备力量……

"每个企业领导人均有权自行惩办波兰籍农业工人……遇有此种事件，任何部门都不得因此而指责企业领导人。

"应使波兰籍农业工人尽量与其家属分开，可以让他们住牲口厩栏棚圈，必须防止任何怠工破坏活动。"

---

① 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 1893—1946），法西斯纳粹头目，反动透顶的纳粹人种学创始人，一九四一年任德国东方占领区部长，对东欧各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被纽伦堡法庭判处绞刑。

② 绍克尔（Fritz Sauckel, 1894—1946），法西斯纳粹头目，迫害东欧各国和苏联人民的所谓"劳动力分配全权总代表"，是首要战犯之一，被纽伦堡法庭判处绞刑。

"施佩尔[1]：现代化流水作业线，必须要求全月生产时间保持均衡。由于空袭轰炸，工厂缺少零件，原材料供应不足，工厂每天开工时间少则八小时，多则十二小时，摇摆不定。根据我们的统计，每星期生产时间可保持六十至六十四小时的幅度。

"弗莱希斯内博士：分派到工矿企业中劳动的集中营俘虏，他们的劳动时间多少？

"施保尔：和厂矿企业中其他工人一样。因为集中营来的工人通常只占职工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人担负的劳动也与企业中的其他工人一样。

"弗莱希斯内博士：为什么会这样？

"施佩尔：党卫队要求将集中营来的俘虏集中在工矿企业中的一个车间部门劳动，由德国师傅和工长监督。劳动时间必须考虑到整个企业的情况，同这个企业的时间保持一致，因为在一个企业里只能采取统一的步调。

"弗莱希斯内博士：我将另外上报的两份材料一致说明，在陆海军军工企业和空军军工企业中劳动的集中营俘虏，每星期劳动时间平均都是六十小时。

"施佩尔先生，为什么现在要在厂矿企业劳动的同时，建立集中营特别营即所谓劳动营呢？

"施佩尔：建立这种劳动营是为了免得走远路，借以达到经常能有精神饱满和乐于劳动的工人的目的"（着重点系笔者所加）。

---

[1] 施佩尔(Albert Speer, 1905—)，希特勒法西斯军备部长，纽伦堡法庭判处二十年徒刑。

"布尔什维主义乃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之死敌……因此，布尔什维主义的士兵，业已无权称为正直的士兵，无权按照日内瓦协定[1]提出任何要求……奉命看押苏联战俘的德国士兵，必须时刻也向公众显示自己的自豪和优越感……为此，对于最微小的抗拒迹象，特别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煽动，自应无情地断然予以镇压……凡苏联战俘胆敢违抗纪律者，得坚决使用武器对付之。"

"国防军必须立即将战俘中被认为是布尔什维主义骨干分子的人全部清除。东方作战部队由于其地位特殊，尤需采取不受官僚机构和行政命令干扰的措施，执行中可以独立负责，便宜行事。"

"枪决苏俄战俘。（基本条例）

"枪决苏俄战俘及苏俄战俘工伤毙命事件，即日起不再作为特殊事件用长途电话上报战俘营长官。"

"全日出勤之标准劳动力战俘，每劳动日基本工资为：

非苏联战俘	零点七马克
苏联战俘	零点三五马克。"

"但每劳动日最低工资为：

非苏联战俘	零点二马克

---

[1] 指一九二九年缔结（现经一九四九年修订）的国际公约：《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

苏联战俘　　　　　　零点一马克。”

我们既然正在引述资料，这里不妨再原文照录一份文件——新发现的已故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一封信——，这是笔者借助骆驼牌香烟（无过滤嘴！）之功，凡香运动希望莱尼搬到乡下去住的孜孜不倦的玛尔雅·范·多恩，在收拾东西时，在莱尼的未收拾的衣柜中找到的。笔者敢于称这份文件为“记事诗的遗留下来的一例”。

“房间分配应有精确计算，以期说明，严格按最节约的房间利用原则（见利用计划的‘规定安置能力’栏）需要多少房屋，特别是现有房屋，用以安置所有居住兵营的部队人数。至于部队按计划配得房屋后如何具体使用，则不在考虑之列。除计划允许的单人房间外，其他房间均应反复计算，以全部容纳居住兵营的士兵为原则。所有计划外的房间，均不属分配范围。军官住宅的勤杂人员房间，军官之家中规定给军士及士兵居住的房间，均应由部队常年经费支付租金和维修费用，因此理应计入分配之列。

“如现有房屋不够，即兵营满员，则所有房间必须考虑按部队供应标准，改为购置小号家具用品。在这种情况下，居住兵营士兵的分配房间一律不按计划规定标准，而按实有人数。

“兵营士兵人数如有改变，房间分配亦应相应作出调整。

“部队占用国有建筑作为宗教活动场所（驻地教堂和部队演习场地教堂）、占用驻地公墓以及它们的维修和管理，均由驻地行政管理机关决定。每个大型军医院内设立一所祈祷堂。

“新建驻地教堂和驻地公墓及其附属建筑物，部队将本单位房屋辟为自用宗教活动场所或改变已有的此种房屋，一律需经陆军总司令部或海军总司令部批准，并应事先征询随军主教的意见。部队驻地如无适合部队用作宗教活动的国有房屋，可以征用或与居民合用民用教堂。部队与居民合用民用教堂的现成圣器什物，应与居民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无效，则根据第二章第一一三条 a 款规定，由管理部门供应。驻地行政管理机关订立协议时，应有随军（海军）教士、驻地民间教士和武装部门（兵站）教士参加，并由经济代表或兵站部批准。参照陆军勤务条例第二十九号第三七〇条（A.B.）执行。

“对接受坚信礼者（初领圣体者）布道，可在教堂或其他房屋内辟出适当房间进行。必要时可报经经济代表或兵站部批准，由驻地行政管理机关租用。也可按情况让圣职人员自行寻找房屋解决，在此种情况下经济代表或兵站部应确定向他提供适当的报酬。

“驻地教堂、根据第一五〇条辟出的专用房间和驻地公墓及其附属建筑物的维修费用，购买或添置计划规定的家具什物（包括第二章第一一三条 a 款所指的圣器用品）的费用，取暖、照明和教堂、公墓礼拜堂的清洁费用以及教堂服装的修补和洗熨费用，均在‘安置’经费内按有关科目报销。

“部队单位自行经营厩肥者，应将每次出售厩肥所得纯收入（出售金酬扣除销售税，见国家财政条例第六十九条二款）的一半上缴本部队的主管军需部门，由主管军需部门记入‘杂入’科目。另一半归该单位自己，按第二二四条规定在‘马厩帐’内辟出‘厩肥收入’栏做帐。

“自理厩肥单位应负责：

1．清理堆肥场地(见第二章第四〇八条d款)，

2．自行维修和添置饲料车，

3．改善厩栏和骑术训练房（例如购置骑术训练镜）、跑马场、跳马场的设备和装置，相应减少按计划由上级经费担负的此类开支(第一七九条e款和第二四六条)，

4．饲料补贴和其他开支，把马匹养好。

“‘马厩经费’的其他支出不得在‘厩肥收入’内开支。自理厩肥单位有责任同驻地行政管理机关协商以最优惠价格出售积肥，后者应为前者介绍出价优厚的买主。如用厩肥调换饲料，有关双方可直接成交，无需主管军需部门派人到场。作价金额应分别记入开支帐，将厩肥收入的一半列入‘杂入’项目。本单位自用肥如用作牧场施肥，亦应作价，将其金额的一半记入‘杂入’项目。

“自理厩肥由经济核算单位(骑兵团、营等)掌管。也可由骑兵中队、炮兵中队和连部独立经管。均按第二四四条和二六一条规定记入‘马厩帐’。

“一个单位‘马厩帐’上的‘厩肥收入’，在该单位调动换防时仍归该单位所有。如该单位的一部分编入另一部队，可酌情划出适当部分‘厩肥收入’带往新属部队。自理厩肥单位全部解散时，应将厩肥收入的余额悉数转记‘杂入’项目，同时将由肥料收入购置的工具什物全部无偿上缴管理部门，由管理部门出具收据，并记入工具什物帐。”

由于需要了解或补充某些情况，也由于一些情况需要核实，笔者不得不再次麻烦那位职位显赫的先生，电话请求允许登门

造访。先生得知笔者有此心意，当即表示欢迎，并且声称："如有必要，三次四次也无妨。"鉴于这位先生在电话中的声音非常友好，几乎是兴高采烈，因此笔者这一次乘为时三十六分钟左右的火车，用不着象上次那样忐忑不安。下火车后，他还冒里冒失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以致错过了先生特为派司机直放车站前来接他的本特莱轿车。笔者实在没料到会有这种荣幸，再说主人事前也未给他打声招呼，结果使他白白浪费了十七点八马克，连同小费十九个半马克——因为先生的住宅距离市区颇远。笔者为此而多花了财政局一点七五至二点二马克，深感遗憾之至。虽然这是第二次拜访，笔者考虑还是不宜空手见主人，他决定选购一张象他在赫尔特霍内太太府上见到的那种光泽宛如珍珠般明亮的来因风景画，售价四十二马克整，配上镜框五十一点八马克。这位先生的太太——以下简称米策——果然"对这件礼物（而且不仅是口头上）欣喜若狂"。至于先生本人，笔者奉送了一本初版《共产党宣言》，当然是影印本（实际上只不过是简单的拍照本，带一点美术装潢，竟也博得先生欣然哂纳）。

这一次气氛不象前次初会时那样紧张。米策没有露出怀疑的神色，只顾忙着沏茶——其质量与赫太太在咖啡馆里认为并不特别好的那一种差不多——，送上点心、雪利酒、香烟。这对敏感的夫妇，脸上略为带有忧郁的神情，说不上在流泪，但眼眶是润湿的。这是一个令人舒适的下午，没有含沙射影的攻击，但不是完全没有率直无隐的敌意。花园、客厅上次均已作过介绍，不再重复，这次要提的只有平台了：它是巴罗克式的，两端各连着一个小亭，中段突出在花园正中央。草地上摆着卷叶形的花盆，连翘正在蓓蕾初放。

来策有着黑褐色的皮肤，虽已五旬有六，看上去真象只有四

十六岁，长长的大腿，樱桃小口，胸脯丰满适度，穿一件朱红色针织紧身上衣，她的肤色配上她的风度，显得恰到好处。“象您说的那个姑娘，骑着自行车一个个集中营找她心爱的人，最后在公墓里才找到了他，这真有意思啊。我说有意思，当然不是指公墓和她在公墓里找到他这件事，而是指年纪轻轻一个女人，骑着自行车在外面走东闯西，穿过艾费尔和阿登高地，直到那慕尔，甚至到了兰斯，再转梅斯，再回家，又穿过艾费尔，越过占领区界和国界，几进几出哩。哎，我认识这个年轻女人，我要早知道她就是您当时讲的那个人，我会——我说不出具体会怎样——反正我说什么也会设法使她高兴的，虽然她这个人相当沉默寡言。我丈夫是直到五二年才获释的，他一出来，我们就找到了那个花场老板，从他嘴里了解到她的地址，立即前去看她。这个姑娘漂亮极了，她对男人的媚力，连我一个女人也能加以判断(？？——笔者)。她的孩子长着一头光洁的金黄色长头发，象她一样漂亮，我丈夫见了非常激动。见到孩子，我丈夫就想起年轻的博里斯，虽然他人很瘦，又戴眼镜，可孩子的确象他，不是吗？(先生点点头。——笔者)当然，她的教育方法是错误的，不该让孩子长到七岁半，还不送他上学校念书，而且象她那样对待孩子，尽搞浪漫主义一套：唱歌、讲童话，给他朗读内容相互格格不入的荷尔德林、特拉克尔和布莱希特的作品。我不知道，给刚满八岁的孩子朗读卡夫卡的《在流放地》是不是合适。我也不知道，自然主义的作品，特别是所有那些人体器官挂图，会不会使孩子从小养成过分讲求唯物主义的人生观。不过她确实也有一些了不起的地方，虽然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我不能不说，让孩子看这种人体她器官挂图，而且是放大了的，我真不知道是不是早了一点——在今天来说，几乎又已经是太晚了(夫妇俩笑了。——笔

者)。但孩子长得非常逗人，也很任性——加上这个年轻女人又是这种命运，当时大概刚三十岁吧，据说就失去了三个男人，失去了哥哥，失去了父母，她自己又骄傲！不，我再也没有勇气再去看她了，她是那么骄傲啊。五五年我丈夫随阿登纳出访莫斯科时，我们还同她通过信呢。那一次，我丈夫的确在外交部里找到了一个柏林时期的熟人，见面之后，立即向他打听科尔托夫斯基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不幸：可爱的孩子的祖父母都死了，姑姑吕迪娅也下落不明。"

先生说："我毫不夸大地说一句：博里斯的死，过错在于西方盟国。我这样说，不是指我那张背时军人身分证的麻烦和矿井事故，不，不是指这些。西方盟国错就错在不该将我逮捕拘押了整整七年，关在牢房里，尽管没有上锁，门闩也闩得不怎么紧。我本来和埃里希·冯·卡姆商量好了，一到博里斯处境危急，就向我报警，谁知道他手下的看守兵一开小差，他就昏头转向乱了套，按说这也正好是他做手脚的机会嘛，可以趁机将博里斯送往埃尔夫特前线，让他一有机会就能顺利地跑过去。按照我们原来商量的计划，则是另一个做法：由卡姆负责给他搞一套英军或美军军服，将他藏在关押英国人或美国人的战俘营里——等战争结束后再说明真正身分。给他弄德国军人身分证，穿德国军服，还假冒负伤，这些做法不用说是糊涂透顶，糊涂透顶。当然，我和卡姆都不知道，后面有个姑娘粘牢了他！已经有了孩子，外加又遇上轰炸！失策啊！我当时了解这姑娘的情况不多，当她听说博里斯到花场是我帮的忙时，她来向我道谢了！可那算什么谢啊——就象不懂事的毛丫头差不多：吃了你送的一块巧克力糖，嘴唇一抿，朝你笑一笑了事。她哪里知道我冒的危险多么大，哪里知道，如果博里斯不死，能在纽伦堡① 帮我多大的忙啊。

我真是体面扫地了，在法庭上，我当着同案的其他被告说：我救了一个人的命，他叫博里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多大年纪等等。苏联一方的原告人说：'好吧，既然您连老营号码都能讲出来，我们可以设法查查这个博里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的下落。'可是过了一年也没有结果！我认为这是一个卑鄙的花招。只要博里斯还活着和允许他出庭作证，他就可以救我啊。在法庭上，他们将一些最恶毒的话硬往我身上栽，不错，我参加过一些会议，的确听到过这种话，可那都不是我说的呀。也许您认为我是否会说这种话？（他从口袋里掏出笔记簿，念道：）'即使是对老实听话和卖力干活的苏联战俘，也不能心软。他把心软看成是软弱无能的表示，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还说，四一年九月陆军军需首脑开会时我曾建议改装多层铺位，将原来住一百五十名俘虏的 RAD 营房（国家劳动服役营房。——笔者）改住八百四十名俘虏。还说什么在我的一家厂里，早晨不给俄国人开饭，让他们空着肚皮上工，不发劳动服，他们只好找德国工人讨面包吃——还说有关禁闭的牢房。实际上哪有这种事啊，恰恰相反，是我在四二年三月向上级反映，分派到我厂来劳动的俄国人由于集中营伙食太差，体力实在不行，连车床上的车刀也转不动。有一次，我参加负责主管战俘工作的赖内克将军召集的会议，我在会上发表意见，反对规定的所谓俄国人专用面包的原料比例，即百分之五十粗黑麦，百分之二十甜菜渣，百分之二十纤维粉，百分之十干草或树叶粉。我坚持主张将粗黑麦和甜菜渣各增加百分之五，相应减少了另外几种难以下咽的东

---

① 指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的审判。

西。至少我的所有工厂全是这样做的，而且为此而增加的开支都是由我的工厂担负。做到这一点多么不容易啊，可惜人们太健忘了。我提醒粮食部国务秘书巴克和莫里茨处长注意，不能把参加军火工业劳动的战俘当成死囚对待，军火工业生产需要强劳动力。最后，我还是成了众所周知的所谓面粉汤日制[①]的提倡者。我同绍克尔干了一仗，他威胁我说要送我坐牢，不准我透露OKH、OKW和RSHA(陆军总司令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和德国中央保安局。——笔者)半个字。由于让俄国人吃这种比猪狗食还不如的东西是保密的，不能叫德国公众知道，我冒着天大的危险，有意将透露这一情况的消息暗中寄到瑞典，目的是想提醒世界公众舆论注意，可结果得到了什么好报呢：两年拘押，五年监禁，罪名是我在柯尼斯堡开有分厂，而实际上那些厂的管理大权根本不在我手里。哼，是啊，比比别人，有的死了，有的比我更倒霉，我总算身体还好端端的，没有吃大不了的亏(？？指哪些方面呢？——笔者)。审讯中那一整套掩人耳目煞有介事的做法，我也不再放在心上：他们当醒将一叠叠文件摆到我眼皮底下，硬要把那些实在不是我说的话栽到我头上。我原希望小伙子能平平安安活到战争结束，可希望落空了——我没有能够再次见到他的父母和妹妹。我最大的失败，是对他儿子的教养没有起到作用。归根到底，事实证明我在文学方面对博里斯的指点是成功的。没有我，他怎么会知道特拉克尔、卡夫卡和荷尔德林呢？这个学识上有欠缺的不太开窍的女人，难道不是多亏我的间接指点，才知道这些作家，然后又教给她儿子的么？如果说，我感到有责任教养科尔托夫斯基家仅存的这点骨肉，难道是

① 指一星期或一月内吃几顿放有面粉的汤，以示"改善"战俘的伙食。

不自量力，越俎代庖？我敢肯定，要是博里斯自己活在人世的话，是不会拒绝这种出自衷心的好意的，凭什么要把好心当作驴肝肺，叫我碰一鼻子灰呢？特别是那个臭不要脸的女人，即和她住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我忘了她叫什么名字——，一脑袋庸俗社会主义的胡思乱想，臭骂了我一顿，最后还将我撵出大门。别人告诉我，这个女人同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合不来，而且一向道德败坏，只差没有公开挂牌当妓女了。再说，这个言语少得出奇的女人的父亲，即那个臭不要脸的暗娼后来的相好格鲁伊滕先生，难道在战争年代中是上帝的羔羊①吗？我是说，这个女人犯不着那么神气活现地将我撵出大门，犯不着轻易相信那种尽人皆知未必公正的法庭的判决嘛。不，不，我做的事情，的确没有得到丝毫好报啊。"

先生陈述这些往事时，声音很低，主要是发泄怨气，而不是攻击谁，当他的太阳穴开始胀得鼓鼓的时候，米策就抓住他的手，叫他别激动。"汇款去被退回来，写信去不回信，提建议根本不理睬，那个臭不要脸的女人，有一天写了一张条子寄给我：'您难道看不出，莱尼不想跟您搭界吗？'哼，好吧，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去自寻烦恼了，但为了博里斯的儿子，我当然还是经常了解情况的。您知道小家伙出了什么事？我不想说他成了罪犯，因为我不会不作调查研究就相信任何法院的判决的。我自己犯了罪，我自作主张将俄国人吃的面包增加了百分之五的粗黑麦和百分之五的甜菜渣，相应地减少了纤维粉和树叶粉的含量，为的是使面包好吃一点，这样就犯了法，有可能让我进集中营。我是罪

① 上帝的羔羊指耶稣，此处系讽刺洛特，盲格鲁伊滕在战争中也犯有罪行。

犯，就因为一些工厂中有我的股份，并且由于复杂的家族关系和复杂的经济关系，变成了阔得连自己有多少财产也说不清的大企业老板。嗯，我自己犯的罪够多了，不论哪一朝代我都是罪人，因此我不想那么轻易地说小伙子是罪犯。可他把自己毁了，这是确确实实的——糊涂透顶啊，而且是错误教育的结果，才二十三岁，就伪造支票和期票，一心想要把已经归了别人的家产重新捞回来。这些家产显然是由于现在的主人精明乖巧弄去的，你说他狠毒吧，但又是经过合法手续，虽然讲起来痛心，可已经是既成事实，唉，本来嘛，自己的家产，送掉了就是送掉了，卖掉了就是卖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可小伙子偏偏死心眼，想要重新捞回来。从心理学分析，他是既从母亲身上继承了一种危险性格，又念念不忘父亲遭受的创伤。做娘的可没想到，让儿子读卡夫卡的作品，对儿子起了什么影响，也不知道，一头钻进象卡夫卡和布莱希特这种相互格格不入的作品，是再也出不来的——，还有荷尔德林的狂热激情和特拉克尔那种迷人心窍的颓废抒情诗：打从孩子刚刚会讲话和听别人讲话起，就向他灌输这套东西，外加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肉体唯物主义：不错，我是反对清规戒律，百无禁忌的，但那么细致入微地醉心生物主义，美化一切人体器官及其功能，难道是对的么？——总而言之，我们断绝往来了，性格不合，分道扬镳。哦，只不过一想到爱莫能助，真使人难受，受到逐客令，真叫人痛心。”

笔者感到不可能的一点是，这里的主人竟然也W. 出了T.，而且这显然又是藏之心头的L.2造成的结果。这时，美丽的草坪上跑过来几条很好看的阿富汗种狗，它们对笔者根本不屑一顾，只是在他的裤腿边闻了闻，就跑到主人跟前，舔主人的眼泪水去了。真见鬼，突然之间，大家都变成多愁善感的人了：佩尔

策、博加科夫、职位显赫的先生，不都是这样吗？甚至洛特的眼睛不也有润湿的莹光，玛尔雅·范·多恩不也公开哭了吗？玛格丽特不是几乎成了泪人儿么？唯独莱尼自己眼睛里的泪水，还不超过使这双眼睛能保持明亮和张开的最低限度。

离别米策和先生时，宾主双方客客气气，主人夫妇俩请求笔者尽力居间调解，言词显得颇为痛苦，他们表示始终愿意再次“帮助”博里斯的儿子“重新做人”，要知道，正因为他是博里斯的儿子，莱夫·科尔托夫斯基的孙子啊。

最后还有一位格龙奇，战争结束时他待在什么地方，身体情况如何，心情如何，政治情况如何，我们都还不清楚，几乎一点也不知道。访问他的联系工作毫不费力：一个电话，约定好时间，格龙奇就在陵园打烊过后，等候在生了锈的铁门旁边了。这扇铁门平日不开，是专门用来运垃圾的——指扎花圈的边角余料和花草树叶下脚，由于其中混有零碎塑料，不能用来当肥料。格龙奇象前几次一样，客客气气，高高兴兴地拉着笔者的手，免得他踩着地上那些“特别滑溜的垃圾”摔交。他住在陵园里，迩来情况已有很大改善，新近配了一把开公共厕所门的钥匙，还可以进市陵园工人淋浴室洗澡，有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和一台晶体管电视机，正在准备迎接复活节后头一个星期天的绣球花利市。这是三月里一个寒冷的傍晚，长凳上不能坐，宾主只好在静寂的陵园中一边散步，一边交谈，这一次也是朝陵园大道即格龙奇所谓的大马路走去。他吃吃地笑着说：“我们最好的住宅区，我们最值钱的地皮，而且，如果您不相信小瓦尔特的话，我还可以指给您看几样东西，可以证明他没说假话。他这个人从来不撒谎，

就象他从来不是不近人情一样”（窃笑）。格龙奇带笔者看了佩尔策四五年二月和他一道在那里架的电线的痕迹：一截质量很差、有点发黑的电线，从花场里拉出来，架在一株长满常春藤的栎树上，经过一株接骨木树（树干上还可以看见生了锈的铁夹子）和一株水腊树，再拉到冯·策克家墓的坟头。在这座庄严肃穆的祖茔墓墙上，也留有铁夹子和一截质量很差、有点发黑的电线——到了这里，笔者（他不能不承认有点毛骨悚然之感）就站在紧闭着的青铜墓门前了，这就是当年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的入口，可惜在这个春寒料峭的薄暮时分，有铁将军在把门。“电线从这里进去，”格龙奇解释说，“再拉到黑里格尔墓穴，最后通到博夏姆普墓穴。”冯·策克和黑里格尔两座家墓保护得很好，上面长满了青苔、蝴蝶梅和玫瑰，格龙奇说：“是啊，小瓦尔特把这两家老顾客的生意让给了我。当年为了连接三家祖坟打通的洞口，战后他又请人砌上了，还重新粉刷过，可惜相当马虎，是老格鲁伊滕的手艺，但后来出现的裂缝和灰粉脱落，他都说成是炸弹震坏的，这也不是他撒谎，因为‘三·二’那天这里确实震得够戗。墓后面还有一尊天使塑像，头部嵌了一块弹片，就象是有人一斧头砍进去拔不出来了似的。”（尽管天色已晚，笔者还是看到了这尊天使像，足见格龙奇所言不假。）“您看，黑里格尔和冯·策克两座家墓花了不少钱修缮，绘上拿撒勒画派① 的壁画，虽然画得并不高明，总算是面目一新，只有博夏姆普府上听任自已的祖坟败落得不象样子。博家这位少爷——现在也有六十五岁了，不过在二十年代初，我还看到他穿一套水兵服，站在这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做祷告，样子相当滑稽可笑。也就是说，当年他穿水

① 十九世纪初期兴起的德国画派。

兵服就显得年龄太大，配不上，可他偏偏不肯脱掉——他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梅兰疗养院里，说不定现在还穿着这身水兵服东游西荡呢。有时他的律师出几个钱，雇上人总算是把讨厌的野草除除干净。律师还坚持不肯放弃这块地方，以便到时候安葬这位至今还靠开香烟纸厂生活的滑稽可笑、身穿水兵服的老爷。否则，城市建设局的推土机准会把它碾平的。目前还在为葬身之地打官司呢。”（窃笑。——笔者）“其实，一个人两眼一闭，随便找个地方都可以入土嘛。那边就是博夏姆普礼拜堂，大门已经坏了，您要是高兴，可以进去看看，看看莱尼和博里斯当年的石楠床是否还留有什么痕迹。”

笔者真的踏进了这所破旧的小礼拜堂，仔细察看了造型非常动人的半圆形穹窿，拿撒勒派的壁画业已多处斑剥脱落。礼拜堂里面很脏，阴凉潮湿，为了看清祭坛的全貌，笔者擅自擦了几根火柴（他是否能向财政局报销此项开支，尚不明确，因为象他这种烟大王，火柴消耗量无疑是很大的，还需要由领高薪的官方专家会同私人专家审定，十三至十六根左右火柴是否可以列为正当的调查经费报销），祭坛的有色金属已经被撬拆一光。在祭坛的背面，笔者发现一种紫红色的灰屑，闪闪发亮，十分显眼，很可能是石楠腐烂风化后留下的痕迹；还看见一块女人衣服的破布头，大概是女人穿的贴肉内衣或穿在绒线套衫里面的衣服。当笔者头昏目眩地走出礼拜堂时，格龙奇抽着烟斗说：“看到了吧，十有八九是少数几对情侣，他们既找不到一处适当的门楼角落，又没有钱上旅馆去开房间，不怕撞上孤魂野鬼，有时就双双钻到这里来。”

这天夜晚，寒风凛冽，宾主在室外散步，尽兴而归，最后又在格龙奇的小窝窝里喝光了一瓶樱桃烧酒。

“是啊，”格龙奇说，“四五年二月里，听说我老家一带仗打得很凶，我坐立不安，决定回乡去看看母亲，我想也许能帮她找个地方躲一下，她那时已经是快八十岁的人了，我还是二十五年前回去看过她一次的，尽管她一辈子跟在教士后面转，但不能怪她，只怪那个(窃笑)世道。虽说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去看母亲的想法很不现实，我还是去了，已经晚了，我仗着自己对那个地方很熟悉，早在童年时代，我就在那里放过牛，经常循着林间小道走出森林，有时直到高高低低的荒丘一带。谁知这一回我刚刚过了迪隆①，就被那些白痴抓住了，他们塞给我一支步枪，一个袖章，把我和一群半大的毛孩子带进森林。好吧，我索性一本正经装成巡逻队的领队——这种把戏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学会了——，让几个毛孩子跟着我。可是，尽管我路再熟也不起作用了：因为压根儿就没有什么路了，只有坑坑洼洼，残存的树干，脚下到处是地雷，要不是很快被美国佬抓住，我们早给地雷炸得粉身碎骨了——美国佬知道哪些地方没有埋雷。幸好这群孩子总算是得救了，我也得救了，不过又给美国佬关了整整四个月，才放我出来。四个月挨饿住帐篷，又脏又冷，呐，当美国俘虏日子可不好过啊，我的关节炎虽说彻底治好了，可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母亲。不知道是哪一个德国狗杂种开枪打死了她，因为她挂起了白旗——那个傻地方长期双方拉锯，今天美国佬过来，明天德国人过去，偏偏老人家又不肯离开那里。我那快八十岁的老母亲到头来还免不了挨枪子儿，这肯定是德国人开的枪，说不定就是今天有人在那个地方要给他们树纪念碑的那些猪猡开的枪。可当地的教士始终不反对给这些混帐王八蛋立纪念碑。美

① 迪隆，科隆西南、亚琛正东城市名。

国佬六月里终于将我和农民一道放出来，那时我已经只剩半条命了。尽管我确实属于农业部门，放出来也真不容易。这个俘虏营里关了不少科尔平的徒子徒孙[1]，他们用一种同行的帮话编成顺口溜相互进行联络。由于我本来就倾向于科尔平，倾向于基督教工人，几句虔诚的格言不离口，终于在六月里把我放出来了。回到这里，我发现自己的小花铺整治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赫尔特霍内将它连同租金如数移交给我，这是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的，我至今还按成本价格供应她鲜花。小瓦尔特不曾找我给他写清白证明——我真恨不得叫他至少也坐上几个月牢，出几身冷汗才好，这家伙以往次次有难都能太太平平度过，没损一根毫毛。当然，我只是想让他心惊肉跳一段时间，给他治治毛病，对他是有好处的。后来他对我也不错，补给我股金，还给我一笔贷数，使我终于能够自己开店。我们将老顾客的生意划开，分别由我们两家归口，互不相扰，他还慷慨地支援我种子，不过要是当年用什么办法叫他坐上半年牢，让他生受生受就好了。"

笔者在格龙奇的小窝窝里还坐了一些时间（约一个半小时），格龙奇丝毫没有显出要哭的样子，始终舒舒服服地不声不响。他的这个窝窝相当舒适，又有啤酒和樱桃酒，而且坐在这里，笔者可以抽烟，而在陵园里，四周围一片空旷（"一根香烟头，几里路以外都可以看见。"），格龙奇是不让抽烟的。直到格龙奇送笔者走过满地滑溜的垃圾，来到陵园门口告别时，他才用一种并非泣不成声但却十分激动的口气说："无论如何，也得想尽一切

[1] 科尔平(Adolf Kolping, 1813—1865)是鞋匠出身的德国天主教传教师，一八四九年创立第一批天主教的帮工协会，此处指农业部门中的帮工协会会员。目前西德以科尔平命名的天主教帮工协会拥有约二十五万名会员。

办法将莱尼的儿子莱夫救出来。他尽干蠢事。他想到的，只是私下代母亲向可恶的霍伊泽祖孙还债。小伙子人好，和他父母一模一样，而且说到底，他就是在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出生的，在我手下干了三年活，再去陵园管理所，最后才当清洁工。是个好小子，并且一点也不象他娘那样沉默寡言。对这么一个小伙子，不能见死不救，他小时候，每当忙季莱尼来给佩尔策帮忙以及后来给我帮忙的时候，他总是待在这里玩耍。如果能够出狱，我倒有心把他藏在他父亲当年藏身的这个陵园里。藏在这里谁也发现不了他，他也不象我害怕钻墓穴和地窖。”

笔者衷心告别主人，并答应——他存心说到做到——下次再来，还答应一旦小将鲁伊滕有幸挣脱牢笼，立即告诉他格龙奇进献的这条“陵园藏身计”。“还有，”将龙奇向走远了的笔者大声嘱咐道，“您告诉他，就说待在我这里，管他天天有咖啡、菜汤和香烟，保管天天有。”

写到这里，笔者回头翻阅一下前述各章，发现其中直接引述莱尼本人的有关言论为数不多，也颇分散，现特将其归纳于下：

“去当马路天使”（为了避免典押她的钢琴）。

（宇宙间有）“神灵”。

“冒险的舞”（与汉斯·黑尔岑谈）。

“到时候她想穿着它入土呢”（指浴衣）。

“真要命！从我身上钻出来的这些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呀？”（莱尼还是小姑娘时，看到自己的大便说的话。）

“张开四肢，放松肌肉，和大自然紧紧拥抱”；“祖怀”；“施”；“受”（石楠之夜）。

“快点呀，您快给我那块活命的面包呀！干吗让我老等呢？”(由于说这种话，未获准在女子中学初领圣体。)

“可是，放在我舌头上的，竟是一块白不corresponding咧的、又干又瘪的、说不出什么滋味的东西——我差点没一口吐出来”(指真正参加初领圣体)。

“肌肉玩意儿”(指她大便达到“免纸”水平)。

“一个她心爱的人，无条件以身相许的人”；“想出种种大胆的亲昵动作——让他在我身上得到快活，我也在他身上得到快活”(谈她理想的“意中人”)。

“那小子的手不会体贴人”(第一次幽会)。

“为的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暗处哭一会儿”(看电影)。

“讨人喜欢，异常讨人喜欢，善良”(谈哥哥海因里希)。

“怕他，因为他的学问多得吓人”(谈哥哥海因里希)。

“感到惊奇，因为他可爱得令人发疯，令人发疯”(谈哥哥海因里希)。

“日子一直过得不错”，“收过废钢”(谈一九四五年后的父亲)。

“洛特对父亲当时大概就已算得上是一种诱惑了，我的意思并不是指勾引”(谈洛特·霍伊泽)。

“糟，糟，糟”(谈哥哥海因里希和全家一起喝咖啡)。

“我们的诗人都曾经是最勇敢的厕所清洁工”(她在疏通玛格丽特家的抽水马桶后，对海因里希和艾哈德的评论)。

“这件事情”(不可能也不允许)“在床上”(做)。“到野外去，到野外去。按老一套双双上床，我才不希罕哪。”(当着玛格丽特的面，就人们常说的“同房”发表高见。)

“对我来说，他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掉了”(讲她丈夫阿洛伊

斯·普法伊费尔如何逼着她行房)。

"她已经只剩一把骨头了，是活活饿死的，虽然最后我经常给她送去吃的东西。后来她死了，他们将她草草埋在园子里，没有立墓碑或标记；那次我一进修道院，就感到她人已经不在了，朔伊肯斯对我说：'晚了，小姐，已经晚了——难道您想用十个指头刨地三尺么?'于是，我去找修道院长，一定要她说明拉埃尔的去向，她回答说拉埃尔出门去了，我又问上哪里去了，这时修道院长就紧张起来，说：'我说，孩子，您怎么这样不明事理啊?'"(谈拉埃尔之死)

"说不出的难为情"(谈与阿洛伊斯的孟浪)。

"看到这大堆大堆崭新的钞票"(就恶心)(谈战争期间她在父亲建筑公司办事处工作的经历)。

"报复"(莱尼推测父亲玩弄死魂灵把戏的动机)。

"一拍即合"(同博里斯捏手示情)。

"比我对你讲过的那次仲夏石楠之夜要有意思得多"(同上)。

"这个当口上正好外面该死的礼炮声震天价响"(谈她同博里斯海誓山盟的时刻)。

"同房"(莱尼对玛格丽特讲述通常被人们描写得不堪入目的那种活动时，用此字眼)。

"告诉你，我一张开眼就看到警告牌：小心，生命危险!"(谈她与博首次同房后的感受)

"干吗非得去问那个，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谈呢。而且我告诉他，我姓格鲁伊滕，而不是身分证上写的普法伊费尔"(莱尼对玛格丽特讲一次与博里斯的谈话)。

(美国人)"毫无进展"。

“总共不过八九十公里的路”“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呢?”(同上)

“他们为啥白天不来了,什么时候再白天来呢?美国人为啥按兵不动,这么一点点路为什么要拖那么长时间?”(埋怨美国飞机不在白天进行轰炸和美军姗姗来迟)

“良辰美景的念珠月”(指四四年十月白天空袭频繁,莱尼与博里斯得以趁机同房)。

“我感谢拉埃尔和圣母玛利亚,她们俩都没有忘记我多么爱她们”(指念珠月)。

“两个诗人,如果你问我的话,都是诗人”(谈博里斯和艾哈德)。

“他们总算来了,花了多长时间啊”(另一次谈美军进展)。

(同房)已“无从谈起”了(怀孕后的莱尼)。

第 九 章

笔者实在很想略去有几位情况提供者在谈话中曾经隐约提到过的莱尼一生中的一段经历：莱尼在四五年以后为期不久的政治活动。对于这一点，他并不缺乏观察能力，只不过难以相信而已。或者说，莫非他还是应该相信人们陈述中听来可信的东西？笔者遇到的使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都很感兴趣的这么一个左右为难的问题，就这样严峻地摆在读者面前了！莱尼对政治并非不感兴趣，已经由常常和她一起看电视的汉斯·黑尔岑和格蕾特·黑尔岑所证实，他们的作证，足以使公证人和记者都无法否定其确凿性。莱尼(这一点得到黑尔岑夫妇的有力证实，他们在莱尼的黑白电视机前和她一起看了将近两年电视)"最爱看那些谈论政治的人士的脸孔"(莱尼的难能可贵的原话之一！)。她对巴泽尔、基辛格和施特劳斯的评价，不便在这里重复：笔者觉得这样做未免花费太大。他不能这样做。涉及到这三位先生，他的处境有点象那位职位显赫的大人物。他——笔者——本可以根据记者的职责，引用莱尼的原话，让她承担作证的义务，拖她出庭，虽然他确有把握，莱尼是不会不认帐因而叫他和黑尔岑夫妇难堪的。但他还是觉得在这里不引用原话，而是略提一笔为好。原因很简单：他不愿看到莱尼站在法庭上。他觉得莱尼的困难已经够多了：她十分宠爱的独生儿子正在坐牢，最近甚至她的钢琴也有被典押的危险；她感到害怕，或者是神经紧

张——她吃不准自己是不是和那个土耳其人同居而有了“身孕”（据汉斯·黑尔岑和格蕾特·黑尔岑引莱尼的原话）；有一点生理上的具体情况是确实的：她一直还有明显的妇女生理特征；她面临被用毒气杀害的威胁，没有人知道这一点是否会付诸实现——这是从她邻居中的一个退休官员的口中说出来的，此人曾经几次企图亲近莱尼未遂（在昏暗的过道里用极其粗暴的方式调戏她，在面包店里抚摸她，还有一次，也是在昏暗的过道里，扒下自己的裤子）；财产被扣押抵债和扣押抵债的威胁其势汹汹，有如人们“甚至无法用砍刀稍许劈除一些的”莽莽丛林（洛特·霍伊泽语）。难道还得让她站在法庭上重复她那些把巴泽尔、基辛格和施特劳斯说得体无完肤的、就其一针见血的程度（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委实难能可贵的评语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不，不，决不。

好了，不要再兜圈子了：是的，莱尼“参加过”德国共产党的活动（洛特·霍伊泽、玛格丽特、老霍伊泽、玛·范·多恩和该党从前的一位干部都这样说！）。我们不是看到过那些上面写着“承蒙……参加”的海报吗？这通常是用以暗示重要人物，他们到时候从不出场，人们事先也没有问过他们，或者他们也没有答应过出场，人们只把他们看成是具有号召力的人物。莱尼是不是也被认为具有号召力呢？显然是的，即使是出于误会。那位从前的德共干部，目前正在市区的中心地段开设一间生意兴隆的报亭，他自称“六八人”，是一个——至少在笔者看来——讨人喜欢的人。此人大约五十五岁，给人以心灰意懒（如果不说愤世嫉俗的话）的印象。笔者请他对这个令人误解的简称“六八人”稍加

解释，他只是说："啃，我从六八年起就不干那个了。嗯，我不干了。"这位情况提供者象那位职位显赫的先生一样不愿意透露姓名，他的下述这些前后连贯的话都是断断续续说的，因为他的话一再被买报的顾客所打断。正因为这样，笔者了解了"六八人"极端自行其是的发行政策；在不到半小时之内，至少有十四五名顾客问他有没有色情书刊，对此，他不是用厌恶的语气就是用傲慢的口吻回答说："这儿不卖！"笔者感觉到，甚至连比较正派的报纸，如小报、严肃的和不严肃的日报，以及部分正派或中等正派的画报，这位"六八人"也都是皱着眉头勉勉强强拿出来的。笔者小心翼翼地预言，这样一种销售政策会使他的书亭的利润受到损失，这种担心遭到了这位情况提供者十分明确的否定。"一旦争取到养老金，我就关掉这个烂摊子。到现在为止，我还只领取小小一笔补偿金，在批准我领取这笔补偿金时，我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巴不得我早就死了。这对他们当然要更合适。不，这些资产阶级臭玩意儿，这种色情帝国主义，我是不卖的，尽管有人想方设法迫使我这样做，说是因为'一个设在如此引人瞩目的地段的报亭，有责任为潜在的顾客提供符合市场需要的商品'（引自基督教民主联盟一位市议员的呈文）。不，我是不干的。还是请他们把这种脏东西一总拿到合适的地方去推销吧：挂在教堂的大门上，夹杂在他们教会的下流小报和假正经的玩意儿中去卖吧。不，在我这里可不行。不管南宁还是金德勒①，也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嘿，让他们继续对我进行抵制吧，让他们继续对我怀疑吧，我还是要继续把好关。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东西我是死也不卖的。"也许还需要补充说明一下：这位

① 金德勒(Kindler)系西德出版界知名人物。

情况提供者是连续不断吸烟的人，脸色和眼睛带有肝病患者的征象，头发浓密而又灰白，戴一副度数很高的眼镜，两手颤抖，脸上集中地流露出蔑视一切的神情，致使笔者也无法幻想把自己排除在被蔑视的对象之外。“我本可以看出苗头来的，当时那些维希法西斯分子，他们把埃尔泽·克雷默尔的维尔纳从法国的集中营里弄出来，把他交给了纳粹，这是我后来听说的。谁也无法想象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生效的那一年半里我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呀！后来他们把维尔纳枪毙了。他们向我们放空气，说什么他是法西斯叛徒，尽可心安理得地借法西斯分子的手去除掉法西斯叛徒。这种混帐话，我一直到六八年还是相信的。‘要清除你们队伍中的法西斯分子，办法就是向法西斯分子密告，说他们是密探。’看，这样一来，发号施令的无产阶级双手至少就保持干净了。真不坏！我可不再干了。不。四五年我本应该听埃尔泽的话的。可是我没有听。我继续合法和非法地干了二十三年，让人家告我的密、逮捕我、监视我、嘲笑我。现在，等我关掉这爿店，我就到意大利去，那里可能还有几个人，还有几个不象我们这样溜须拍马的人。唉，关于那个普法伊费尔或格鲁伊滕姑娘的事，当年我就已经感到很不是滋味，因为我那时还象十七个红衣主教加在一起那样笃信教条。我们正好听说，她在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和一个红军士兵成了露水夫妻，偷偷塞给他食品、地图、报纸、战情报道，甚至还同他生下一个孩子，取了俄国名字。我们曾经想使她变成一名抵抗运动女战士，可是您知道，这个红军士兵教会了她什么？祈祷！真是乱弹琴！当然，她长得很漂亮，是个美人儿，这对我们那些可怜巴巴的集会倒也有好处；我们当时不得不反对一支所谓社会主义的军队在东普鲁士等地方搞的那种荒谬勾当。我要是听了埃尔泽的话就

好了，她对我说：‘弗里茨，你应该承认，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可不象我们在二八年所希望的那样了，那时候，大家可能出于策略上的原因还不得不支持特迪·台尔曼。你还是承认吧，是兴登堡胜利了，四五年也是如此。你们就别老缠着这个好姑娘了，你们只会给她带来麻烦，而她对你们也没有什么用处。’是啊！但她毕竟是个工人嘛，地地道道的工人嘛，虽然出身破落资产阶级。而且有几次，我们让她举着红旗跟我们一起上街游行，虽然我们几乎得用酒将她灌醉，因为她胆怯得不得了。后来有几次，我在台上讲话，她也打扮得花枝招展，坐在主席台上。今天一想起这些我还感到很不是滋味。”（弗里茨本来就是黑皮肤，现在明显地变得更黑了，不知是否是一种脸红的现象？人们还不妨提出这个问题。顺便提一下：弗里茨这个名字是虚构的；“弗里茨”的真名笔者是知道的。）“她这个人非常无产阶级化——完全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利润思想，更谈不到实际运用——，不过埃尔泽没有说错：我们害了她，于我们自己也一无好处，因为有一两次她确实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当记者问到她的博里斯以及她在‘地下’向他学会了什么时，她回答说：‘祈祷’。这是她说出来的惟一的词儿，而这个词儿当然正是反动报纸求之不得的东西，它们提住机会给我们来上这么一条大标题：‘向德共学习祈祷！德洛克洛瓦[1]笔下的金发女郎露出了特洛伊木马的本来面目。’她还不知在什么时候多此一举地真的成了党员，而且还忘了退党。后来当我们遭到取缔时，马上就有人登门去找她，惹得她十分恼火，她说她‘就更’不退党了！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要真的跟我们一起干，她说：‘因为苏联造就了象博里斯这样的人。’一

[1] 德洛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法国浪漫主义画家。

想到她通过非常复杂的方式确确实实成了我们的人，而我们却没有成为她的人，真会把人气疯。——是啊，叫你脑子里一团乱麻，因为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为什么西欧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会彻底破产。唉，别提这些啦！我要到意大利去。听说她现在的情况很糟，这使我难过。她现在不会愿意想到我的，不然的话，我倒想请您代我向她问好。我是应该听埃尔泽的话的，应该听姑娘的父亲老格鲁伊滕的话的，当他的莱尼举着红旗往外跑的时候，他只是一味地笑，一边笑一边摇头。”

也许有必要再补充一点：弗里茨带着一种几乎是乐此不倦的蔑视神气出售那些受到他如此蔑视的资产阶级报纸，一边和笔者频频互相敬烟。他卖报时的手势和姿态，会使一个敏感的买报顾客感到受了侮辱。弗里茨的评论是："让他们去看这些破烂，去看这些封建主义的乌七八糟的东西！如果您也看看这些东西的话，您甚至还能听得出作者的那种少不了的傲慢腔调；让他们去抢着吃黄色的东西和印度大麻，就象他们从前抢着吃牧师的泔脚水一样，让他们去大胆穿超短的和超长的玩意，就象他们过去穿那种一本正经的修女服一样。我要给您出个好主意：您去投巴泽尔或者克普勒①一票，这样您就至少能够从第一手了解自由派的胡说八道。至于我，我要学习讲人话，学习意大利语，并且宣传这样的口号：印度大麻是毒害人民的鸦片。”

笔者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因为他总算在一定程度上

---

① 克普勒(Köppler)，基督教民主联盟头面人物。

澄清了莱尼一生中这段难堪的经历。但在进一步走访有可能提供情况的人时，他却一无所获，因为他一敲开主人的大门或房门，迎面就遇到这样一句问话："您赞成还是反对六八年？" 由于笔者怀有种种不同的动机，思绪万千，无法立即领会，至少无法在第一次就领会，为什么他应对二十世纪的整整一年表示赞成或反对，因此他对这一年冥思苦想良久，最后终于出自——正如他坦率承认的那样——一种几乎是习惯性的否定本能，回答道："反对。"——这样就终于使自己吃了闭门羹。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一个档案室里找到了弗里茨所说的与莱尼有关的那份报纸。那是一份一九四六年的基督教报纸，经核实，弗里茨所说的话"字字相符"（笔者语）。除此之外，还有两样东西令人颇感兴趣，因此也许还值得交代一下：一是文章本身，二是一幅新闻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装饰着德共党旗和党徽的讲台，可以看到弗里茨以其训练有素的演讲姿态站在台上——年纪轻得令人吃惊：约莫二十四五岁至二十八九岁，还没有戴眼镜。后面是莱尼，她手持一面有苏联国徽的小旗，斜着举过弗里茨的头部，看她那副样子，不禁使笔者想到在某些礼拜仪式中，在极其庄严的时刻必须降旗的情景。这张照片上的莱尼给笔者留下了双重印象：既讨人喜欢，但又不伦不类，且不说是——可不能随随便便这样乱说——招摇撞骗。笔者真想让自己的全部视力通过一块尚待发明的透镜集中到这张照片上来，以便烧掉莱尼的形象。好在这张照片复制技术颇不高明，虽然还能认得出是她，但只有熟人才能认出来。但愿不会在某个档案室里还保留着这张照片的底片。报上的文章也许应该在这里全文援引。照片说明已见前述，下面是文章的提要："受过基督教教育的少妇向红军大兵学祈祷。令人难以理解但又千真万确的是，一个少妇（我不知道对

她更确切的称呼应是格小姐抑或普太太）自称向一名红军士兵重新学会了祈祷。她是一个私生子的母亲，并自豪地声称该私生子的父亲系一名苏联士兵；同她正式结婚的普在私生子父亲的国土上阵亡两年之后，她与这个苏联士兵开始了偷偷摸摸的非法的两性关系。她恬不知耻地为斯大林作宣传。无须告戒我们的读者谨防此类荒唐怪事，但也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该把某些伪装幼稚的表现形式列入政治罪行的范畴？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学会祈祷的：在宗教课上和教堂里。我们也知道，我们为什么祈祷：为了一个基督教的西方世界，变得沉思起来的读者也许应当有时为格小姐或普太太默默祈祷。她有此需要。不管怎么说，我们觉得，作祈祷的老市长阿登纳博士，比起这位据说出身于一个良好的但从任何方面来说都已经破落的门第、误入歧偷、可能已经神经错乱的太太（小姐？）的小手据所能遮盖的东西来，还要更有说服力一些。”

笔者恳切希望，当年的莱尼象今天一样也是难得看报的人。他——笔者——实在不愿意看到她被这种基督教文笔肆意糟蹋。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得到了核实：玛尔雅·范·多恩当年在普法伊费尔夫妇到格鲁伊滕府上来替阿洛伊斯向莱尼求婚时所划下的统计杠杠，核格蕾特·黑尔岑在门板上发现了——当年确实说了六十次“名誉”。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玛·范·多恩是一个可靠的情况提供者；莱尼家的门板三十年来未曾油漆过。

费了一番(可以说是多余的)周折，那个令人莫名其妙的“修炼”一词也核实清楚了。笔者作了一些尝试(同样是多此一举)，想从比较年轻的教士那儿得到解释，因为极其可信的科默尔老太太谈到这个词时与教会有关，虽然笔者本人觉得这个词听起来倒有点象卫生保健方面的措施。结果是一无所获。于是又打电话问各种传教机构，听电话的人(毫无理由地！)感到是受到了嘲讽，支吾其词，以令人难以忍受的小心翼翼的口吻要求说明其上下文，但又表示对这个词的字义完全不感兴趣，末了干脆把电话听筒一挂了事，结果给笔者带来的只不过是气恼和浪费时间而已。最后他想到了一个本来早就应该想到的主意，因为这个词他是在韦尔彭—托尔策姆—吕塞米希三角地带听到的，于是他就去问玛·范·多恩。她毫不犹豫地说这个词在当地方言中就是“基督教理”的意思，是一种祈祷仪式，“本来是给孩子们搞的一种辅助宗教课，但我们成年人有时也去参加，长长见识；不过举行这种仪式的时间，通常总是当我们在家里饱餐一顿后睡午觉的时候：星期天下午三点钟左右”(玛·范·多恩语)。大概这是和福音派新教会的“主日学”差不多的一种天主教活动。

笔者（反正他的调查工作由于克莱—弗拉齐尔① 的拳击比赛而拖延了下来）陷入了某些内心苦闷——完全是担心走访调查的费用以及由此而给财政局造成损失——：他是否应该冒一

① 两人均为拳击明星。克莱(Cassius Marcellus Clay)为美国黑人，一九六七年重量级世界冠军。

次风险到罗马去一趟，在修道总会的档案库里对肠卜僧的命运作一番查考呢？在弗赖堡和罗马同两位耶稣会长老的会见，从人情上来说固然是珍贵的，但从记者的观点来看却无所收获。无疑——包括电话、电报、邮资以及旅费——可以说是投资错误；他们向笔者提供的无非是一张小圣像画而已。倒还是那个外分泌和内分泌完全失调的玛格丽特，却提供了一些关于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很有分量的、意想不到的详细情况。当然，要拜访玛格丽特，笔者常常也得掏掏腰包，给她买几束鲜花、一小扁瓶杜松子酒，有时还送几支香烟；至于出租汽车，那是从来不用雇的——出于健康上的原因，他通常是步行前往。除了以上情况之外，不仅还要考虑税收政策上的问题，也还必须考虑到对于某些人可能产生的影响：他会不会给和蔼可亲的切契莉阿修女制造麻烦？会不会使萨皮恩蒂阿修女为难？会不会使阿尔弗雷德·朔伊肯斯（尽管他并不十分讨人喜欢）再一次受到调离的处分？

为了能够安安静静地对所有这些问题也作一番思考，他首先乘车去下来因，登上一列不带餐车、甚至不供应饮料的火车的二等车厢，经过圣地克弗拉尔和西格弗利德[①]的故乡，接着到了洛恩格林[②]的头脑曾经失去自制力的城市，从那儿乘坐出租汽车，又走了大约五公里，经过约瑟夫·博伊于斯[③]的故乡，来到

---

① 西格弗利德（Siegfried），德国著名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他来到沃尔姆斯，用"魔术帽"帮助国王贡特尔战胜力大无比的冰岛女王布龙希尔德。

② 传说"天鹅骑士"洛恩格林从远方前往布拉邦特，帮助求援的埃尔萨，后与埃尔萨结婚，订下不得问他出身的盟约，但因埃尔萨违约，洛即乘天鹅返回故乡。

③ 约瑟夫·博伊于斯（Joseph Beuys，1921— ），西德现代造型艺术家、画家。

了一个几乎一派荷兰风光的村庄。经过将近三小时旅途跋涉，笔者感到疲劳，甚至有点烦躁，决定先到一家点心铺去吃点点心。一位讨人喜欢的金发妇女极其亲切地给他端上了蛋糕、蛋黄羹和煎肉丸子(热的)，后来他要喝咖啡，则被介绍到对面的一家饭馆去。那一天，大雾弥漫，人们象是掉进了一个大蒸笼，显然，当年西格弗利德骑马向沃尔姆斯进发的时候，不仅是取道尼菲尔海姆，而且也是从这个村庄过来的。饭馆里既暖和又安静；昏昏欲睡的店主用烧酒伺候着两个昏昏欲睡的男顾客，也给笔者推过来一大杯烧酒，并说："这种天气最好喝这个，能给你解寒，而且刚吃过蛋糕和蛋黄羹正需要这个"，随后又悠闲自得地继续跟他的两位顾客谈下去，说的好象是普林登地方的方言，还带有喉音，是地道的荷兰话。这个地方离开笔者的出发地虽然只有一百公虽左右，但相形之下，他已经感到自己好象是南方人了。使他心显舒坦的是，两位昏昏欲睡的顾客和已经把第二杯烧酒给他摆上柜台的店主，对他并不表示多大的好奇；他们谈话的主题好象是"教堂"，听上去既涉及具体的、建筑学和组织机构方面的内容，又有抽象的、几乎是形而上学的东西；他们有时大摇其头，有时低声嘀咕几声，接着又议论起神父来，不过决不至于是议论那位倒霉的德国总理；① 大概因为他根本不值得这些可敬的人一提吧。在这三位竟然例外地不谈战争（对于酒店里的德国人来说，这岂不希罕！）的男人中间，不知是否有一位曾经认识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大概、也许、或者很可能他们三位都曾经跟他同过学，星期六和他一起舒舒服服地洗个澡，将湿

---

① 指前德国总理巴本（Franz von Papen, 1879—1969）。在这里的方言中，"神父"(Paapen)的发音类似巴本。

漉漉的头发梳一梳就去做忏悔，星期天一起去做弥撒，下午又去参加那种在稍南一点的地方叫做修炼的讲道，穿着木拖鞋在滑冰场上滑冰，有时到克弗拉尔朝圣，并从荷兰偷运香烟回来。从年龄看，想必他们一定是认识他的，一九四四年底，他在玛格丽特工作的军医院里两腿截肢后死去，并且被取走了军人身分证，用来移花接木——至少是暂时——使一名苏联士兵取得合法身分。笔者拒绝了第三杯烧酒，为了不让自己从舒适的昏昏欲睡的状态中进入梦乡，他要了咖啡。想当年，在尼菲尔海姆这样一个大雾弥漫的日子里，洛恩格林因为埃尔萨真的问了他而头脑失去了自制力吗？就在这儿的什么地方跳上了一只天鹅，一只正好让后人用来做人造黄油商标的天鹅吗？咖啡好极了，它是一个女人隔着窗口递进来的，笔者只看到她的两截红润白嫩的丰满的手臂，店主热情地往茶碟上放了许多糖，还按规定给了一小壶代替牛奶的奶油。谈话一直在低声地继续进行，可以听出，有关教堂和神父的话题引起了几分愤慨。为什么，为什么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不是出生在这儿西而三公里的地方呢？如果是的话，那么玛格丽特那一天给博里斯偷的军人身分证又可能是什么人的呢？

吃了一点东西以后，笔者首先去教堂，那里有阵亡将士登记表，可以权当姓名地址录使用。他看到有四个姓布尔霍斯特的，但叫阿尔弗雷德的只有一个，这个阿尔弗雷德(二十二岁)所注明的死亡年份不是一九四四年，而是一九四五年。这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难道也象凯佩尔那样，由于施勒默尔顶替他的姓名因而阵亡过两次，登记了两次死亡么？一个教堂司事嘴里自由自在地衔着烟斗，从圣器室里走出来，以便为某种祈祷仪式做准备工作——看看在什么地方是铺绿布、紫布好，还是

红布好。此人能提供情况。由于笔者很不善于撒谎或无中生有瞎编一气(大家现在一定已经看到，他拘泥于事实的做法已经到了令人难受的程度)，因此他不知所措，含含糊糊唧唧咕咕地提了提他在战争中曾经遇到一个叫做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的人。听了他的话，司事不相信，但没有进一步产生怀疑，立即说："他们的"阿尔弗雷德当了法国战俘，在矿山里死于非命，葬在洛林；目前正在圣阿沃①城的一家花圈工场定制他的墓饰；他的未婚妻——"一个温柔美丽、又可爱又聪明的金发姑娘"——进了修道院，阿尔弗雷德的父母至今还在伤心，因为他偏偏是在战争结束以后被夺去生命的。对了，他原是人造黄油工厂的工人，为人正派、文静，不愿当兵；那么请问笔者是在什么地方遇见他的呢？秃顶的司事仍然并不怀疑，但颇为好奇，紧紧地注视着笔者，致使笔者急急忙忙行了个屈膝礼，赶紧告辞而别。他实在不愿意更正阿尔弗雷德的死期，实在不忍心告诉阿尔弗雷德的父母亲说，他们是在为一个苏联人的遗骸、骨灰定制墓饰，这倒不是因为他——笔者——不想让那堆遗骸、那摊骨灰享用墓饰——不是的。只不过人们毕竟很想知道，自己所想象的那个墓中人确实也是长眠在墓里，而这里看来却显然并非如此。而最令人不安的是：德国的丧葬官僚机构显然出了大纰漏。这太叫人莫名其妙了。反正对这位司事来说，大概也够莫名其妙的了。

叫出租汽车的困难，就不用在这儿加以叙述了。至于在克

① 圣阿沃，法国东北隅小地名。

勒弗逗留了比较长的时间，乘坐十分不舒适的火车再次经桑顿和克弗拉尔的将近三小时的归程等等，也毋庸赘述了。

就在当天晚上，笔者走访了玛格丽特，她“指天发誓”，说这个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是在她的手里死去的：他一头金发，满脸悲伤，急着要求能有个牧师来，他还截掉了两条腿。他一断气，她就赶紧跑进已经下班的办公室，用另一把正好相配的钥匙打开柜子，偷出了他的军人身分证，把它藏在自己的手提包里，然后才去报告阿尔弗雷德的死亡。是的，他向她谈起过自己的未婚妻，一个漂亮、娴静的金发姑娘，也提到了他的家乡——正是笔者为了弄清事实不辞劳苦所走访的那个地方。但很有可能的是，在军医院即将迁移的忙乱之中忘了办“例行手续”，她所说的“例行手续”不是指办丧葬，而是指向死者亲属报丧。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德国的官僚机构果真是闹了个纰漏吗？或者说，笔者有义务跑上门去找布尔霍斯特老两口，把他们每年万圣节都让人在旁边种上一些石楠或三色紫罗兰的那副死人骨头的真情实况向他们说个明白，问问他们，难道他们从来没有注意，那里有时放着一大束由一位名叫莱尼的女子及其儿子莱夫上坟时所献的鲜红的玫瑰花？或者说，笔者是否能在布尔霍斯特老两口家里找到一张博里斯填的红色卡片，上面写着他“已安全无恙地被美军俘虏”么？这些问题只能搁起来。事情不可能全都搞清楚。笔者坦率承认：在距离尼伊姆维根不太远的地方，他——就象布拉邦特的埃尔萨或洛恩格林那样——在一位下来因的、几乎可以说是荷兰的教堂司事好奇而又不信任的目光注视下，失去了自己对大脑的控制力。

出乎意料的是，有关肠卜僧的一些情况倒弄清楚了，虽然不是全部，不是有关她的死，但总算是弄清楚了她过去的部分事情，以及不是她本人的未来打算，而是别人为她的将来所作的打算。笔者后来终于下定决心前往罗马，竟例外地得到了收获。关于罗马这座城市，笔者敬请读者诸君自阅与此有关的旅行指南和导游书刊，还有法、英、意、美、德等国摄制的影片以及内容丰富多采的德文版意大利文学，对此，笔者不想作任何补充；他想说的只不过是，他——甚至在罗马——理解了弗里茨的愿望；在这里可以研究耶稣会神学院和修道院的不同之处；他受到了一位美得令人销魂的、年纪至多四十一岁的修女的接待，当她听到笔者对哥伦巴努斯、普鲁登蒂亚、切契莉阿以及萨皮恩蒂阿等修女赞不绝口的奉承话时，她向笔者报以并非故作亲善而是出自真心实意的会心的微笑。甚至还提到了莱尼，并且可以看出：莱尼是庄严地坐落于罗马城西北角高地上的主教廷的一个知名人物。瞧，那儿人们竟然知道莱尼！在意大利五针松和棕榈树的绿荫丛中，在大理石和黄铜构成的金碧辉煌的大楼中的一个华丽凉爽的房间里，坐在黑色的莫理斯式[①]皮沙发上，桌上放着一杯珍贵的香茗，茶托边儿上搁着一支青烟袅袅的香烟（不是故意，也不是表示高雅，而是确实忘了吸它），——一位着实迷人的修女，她曾经以研究冯塔纳[②]的论文而获得博士学位，目前正在写关于戈特弗里德·本[③]（!!）的论文准备取得大学（虽然只是教

① 莫理斯(W. Morris, 1834—1896)，英国诗人、艺术家，曾对工艺美术进行革新。

② 冯塔纳(Theodor Fontane, 1819—1898)，德国小说家，诗人。

③ 戈特弗里德·本 (Gottfried Benn, 1886—1956)，德国诗人，文学理论家。

会大学)授课资格，甚至熟习海森比特尔①的著作，一位水平很高的日耳曼语言学者，身穿朴素的修女服——她竟然知道莱尼！

试想：这是在罗马！意大利五针松的绿荫！蝉鸣，空气调节设备，茶、杏仁饼干、香烟，时间大约是傍晚六点，一位肉体和精神同样迷人的女子，一位甚至在提到"《O侯爵夫人……》读后感"时也不流露丝毫尴尬神色的女子，当笔者干脆把茶托(一只仿造得很好的迈森瓷器赝品)上的第一支香烟按灭，点上第二支烟时，她突然沙着嗓门低声说："真要命，请您也给我一支吧，这种弗吉尼亚烟草的香味叫我憋不住了！"她吸烟的那个样子只能给人留下"有罪"的印象。接着又轻声地，这回可是带着鬼鬼祟祟的口气说："如果索菲娅修女来了，那就说是您的烟。"这么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地方，在世界的中心、整个天主教界的心脏，她认识莱尼，甚至知道她姓普法伊费尔，而不仅仅是姓格鲁伊滕。她，这位天使般的人物，在一只面积为DIN $A_4$②、高约十厘米的绿色纸板箱里，以学者所具有的那种求实态度翻寻着——只是为了帮助回忆才偶尔看一眼那些零零星星的文件——滔滔不绝地讲道："修女拉埃尔·玛丽亚·京茨堡，波罗的海地区人；一八九一年生于里加附近，一九〇八年在柯尼斯堡高中毕业；在柏林、格廷根和海德尔堡上大学。一九一四年在海德尔堡获生物学博士学位。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犹太籍非战社会主义者曾多次被捕。一九一八年提出关于克洛德·贝尔纳③的内分泌学原理的论文，由于此文内容涉及医学、神学、哲学以及伦理学等各个方面，

---

① 海森比特尔(Helmut Dietrich HeiBenbüttel,1921— .)，西德现代作家，主张抒情诗和散文破传统造句法和语法结构，致力于写"视觉诗"。

② DIN 通译"德国工业标准"，A_4表示面积为 210×297mm 的纸张。

③ 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 1813—1878)，法国生理学家。

丙

四

因此很难确定应该属于何种范畴，最后，还是由一位内科医师评定为医学论文加以承认。此后，在鲁尔区工人居住区行医。皈依于一九二二年。在参加青年运动的人士中作报告。入修道院是在遇到重重困难之后，其原因与其说在于她的假唯物主义信条，毋宁说在于她的年龄。一九三二年她毕竟是四十一岁的人了，而她以往的生活——说得委婉一点——并非是彻底柏拉图式的。由一位红衣主教批准她进了修道院，半年后被停止教学活动。嗯，”——说着，这位美丽的克勒门蒂娜修女毫不客气地拿起笔者的那盒烟，“抽出了一根往嘴里塞”（笔者）——“后来的事情您已经知道一些了。我只需要更正一点可能产生的印象：似乎她在格尔塞伦修道院里受到了虐待。正好相反：人家是将她藏了起来，上报‘人已调走，下落不明’。格鲁伊滕小姐，或者说普法伊费尔太太对她的仁爱，可能也有点同性恋爱的关系，她所表示的关怀，实际上对于京茨堡修女，对于修道院，对于格鲁伊滕小姐本人，都是性命攸关的。花匠朔伊肯斯把普法伊费尔太太放进修道院，那样做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好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即使有痛苦，双方都有意见。况且，由于我认为您至少会用辩证的观点分析动机，因此就用不着向您解释，为什么人们为了不让一个人被关进集中营，却不得不将他藏在类似集中营的环境之中。这样做是残忍的，但是，把他交出去岂不是更残忍吗？她本来就不讨人喜欢，也暗中做过手脚，有过不怀好意，常常是双方面的，因为她是一个执拗的人。总之一句话：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您将会相信我吗，如果我告诉您，教会根本不把造就一个女教徒或女圣徒放在心上，但由于发生了某些现集，某些它急于压制的现象，它就象有人逼着它似地做出那种反常的事情来？这样说，您将会相信我吗？”将动词“相信”用于

将来时问句，而且是出自这样一位日耳曼语言学者，一个“罪过”地吸着弗吉尼亚香烟的修女之口——每当照镜子的时候，她一定会满心喜悦地注意到自己那两道美丽无比的细密的深色眉毛，十分合适的修女帽，性感毕露的丰满的嘴唇有着令人心醉的线条；她也会深深意识到她那双十分动人的手所具有的吸引力；尽管衣着是那样端庄，甚至也叫人不难“想象”裹在她那修女服里面的完美无疵的乳房——但将动词“相信”用于将来时的问句竟出自这么一位女子之口，不免使笔者觉得太不规范了！使用简单的将来时形式的问话，如“您将跟我一起去散步吗？”，“您将向我求爱吗？”，在此种场合倒是完全可以的，但她却问一个人是否将会相信他根本还没有听到的事！对于点头表示相信，笔者尚且感到没有勇气，更何况用目光紧紧盯着他，要他说出口来，要他象只有在婚礼圣坛前才要求启口的那样回答一声“同意”。他——笔者——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罗马之行并非徒劳，这一点眼下已经是无可怀疑的了。现在，这种逼着人家回答“相信”的手法，还让笔者领略到了修养甚高的柏拉图式的禁欲恋爱术的高雅意境，这种意境，切契莉阿修女在这以前也只能让笔者意会而已。甚至连克勒门蒂娜修女也似乎感觉到，她未免走得太远了一点，于是她收敛了一下迷人的眼睛的魅力，不高兴地噘起——不得不这样说——玫瑰花似的小嘴，使笔者感觉到，她接下来要谈的是存心采用心理战术。她的睫毛并不是一动不动，相反，几乎象两把扫帚似地——意想不到但又显得恰到好处地又短又硬——忽闪忽闪连连抖动，一面说：“还有，如果我们今天讨论‘《O侯爵夫人……》读后感’提出的问题，女学生们就会无动于衷地对我们说：‘哪怕她是个寡妇，也该吃避孕药片！’——这样，甚至就连象克莱斯特一流的作家的作品也被贬低到廉价通

俗画报的水平了。但是我并不想回避问题。京茨堡事件糟糕的地方，并不象您可能以为的那样，似乎奇迹是有人捏造出来的！恰恰相反：那起奇迹我们想摆脱也摆脱不了！隆冬腊月在埋葬拉埃尔修女的地方长出玫瑰花来，我们想尽办法也没法除掉！说实话，是我们不让您去见切契莉阿修女和朔伊肯斯的（顺便提一下，他得到了非常好的照顾，您不必为他担心），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捏造了这一奇迹，而是这种奇迹搞得我们晕头转向。我们拒绝接待爱好采访报道的局外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想搞加入圣列典礼的活动，而是因为我们正好不愿意这样做！您现在相信您答应相信我的事吗？”这一回，笔者没有急于作出回答，而是沉思地看看她，用“探索的眼光”打量着她，只见克勒门蒂娜修女突然显得十分——笔者找不到其他字眼来表达——憔悴，而且变得坐立不安，她挪了挪自己的修女帽，露出了——同样不得不遗憾地说——一头浓密的暗红色头发；她一伸手又抽出一支香烟，这一次的样子就象一个连续不断吸烟的女大学生，在凌晨四点左右失望地意识到自己准备好应当在六小时后宣读的关于卡夫卡的报告彻底失败而疲劳不堪的惯常动作。她给茶添上水，按完全合乎笔者爱好的分量加进牛奶和糖，甚至还为他搅拌好，把杯子推到他跟前，然后带着一种——无法用另外的字眼来形容——求援的神态看着他。这思有必要再次点明一下现场环境：夕阳西斜的春天傍晚，罗马、意大利五针松的清香，渐渐消失的蝉鸣——教堂的钟声，大理石，莫理斯式皮沙发，木花盆思正在盛开的牡丹，这一切，直截了当地渲染出不时受到新教徒们狂热醉心的那种天主教的气派。克勒门蒂娜几分钟以前还象花儿盛开般的美貌突然间萎谢了；她冷静地评述着O侯爵夫人。她叹息着从深绿色纸板箱里拿出一份份文件，用回形针别在一起或

用橡皮筋拢住的一扎扎文件，五、六、十、十八——总共二十六扎："每年一个报告，都是同样的内容：十二月里突然从地里冒出来的玫瑰花，直到正常情况下玫瑰开始开花时才凋谢的玫瑰花！我们走投无路，采取了也许会使您感到毛骨悚然的办法：把她的尸体刨出来，将她——当然是残骸，腐烂的程度按她死去的年头计算完全正常——改葬到修道院的另一个公墓里，结果发现在那里仍旧开出这种可怕的玫瑰花。于是我们又把她挖了出来，埋到原来的地方，后来再挖出来，把她火化，将骨灰盒摆在礼拜堂里，这下可没有一丁点能滋生万物的母土了吧，哪知道：照样是玫瑰花！它们从骨灰盒里钻了出来，在礼拜堂里蔓延开来；把她的骨灰再埋到地里去——仍然一样：玫瑰花！我敢肯定，如果我们把骨灰盒从飞机上甩下来，从大洋里、从沙漠里照样会长出玫瑰花来！这就是使我们大伤脑筋的问题。不能张扬出去，要保守秘密，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因此，因此我们才不得已不让您接近切契莉阿修女，才不得不将朔伊肯斯调到维尔茨堡附近一个农庄去，升任管理员。普法伊费尔太太之所以使我们感到不安，并不是因为她对这种——我们不妨说——怪事表示异议，而是因为，根据我对她的全部了解，现在又有您所说的有关她的补充情况，她十分可能会认为，每年在十二月中旬左右从她的肠卜僧的骨灰中开出玫瑰花来，那是非常自然的事。对于我来说，这种密密丛丛、带刺的玫瑰，只有在叙述带刺小玫瑰的童话故事中才听到过。如果这一切是发生在意大利，那倒也没什么，在这里我们连共产党都不必害怕，可那是发生在德国呀！简直不知道要倒退到哪个世纪才会有这种事情。礼拜仪式改革也好，从物理生物学的角度对所谓奇迹的解释也好，还会有什么结果呢！再说，要是这件事张扬出去了，谁能担保玫瑰花会

继续开放呢？如果突然不开花了，我们又怎么办呢？甚至相当反动的罗马人士也都彬彬有礼地劝告我们了结这桩事。我们请植物学家、生物学家和神学家在他们答应绝对保密的前提下观看了这一现象。您猜，事后声称自己很受震动，而且以此大做文章的竟是哪些人？是植物学家和生物学家，而不是神学家。您考虑一下事情的政治含义吧：一个加入我们教会的犹太女人，做了修女，随后立即被禁止从事教学活动，然后在——我们尽管说吧——很不愉快的情况下死去了，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她的骨灰里不断地开出玫瑰花来！这简直是巫师作祟，是妖术魔法，是神灵显圣。我是一个对戈·本的生物主义持有不同看法的人，而这些案卷又偏偏交给了我！您知道，昨天有一个高级教长在电话里用讥笑的口吻向我讲了些什么：'保罗已经让我们听够了奇闻，现在请不要再干这种事啦。他已经足足可以说得上是我们的 little flower[①] 了，因此我们已经有的是花了。'您将会保持沉默吗？"对于这个问话，笔者不是点头，而是用力摇头，同时清清楚楚地讲了一个"不"字加强这一动作。这时，克勒门蒂娜微笑着，显出疲劳的样子，用空烟盒把自己茶托上的烟头和笔者茶托上的烟头扫在一起，接着，还是那样疲惫不堪，又用空烟盒将所有烟头和烟灰一股脑儿扫进蓝色塑料字纸篓，然后微笑着站在那里，表示要走了。由于看到这一切，笔者怀疑，这儿是不是表面上否认而实际上真要制造一桩奇迹了。

在克勒门蒂娜送笔者到大门口的路上，他们聊起了文学。那是一段比较长的距离，大约有四百米光景，越过一大片空地。翠柏、意大利五针松、夹竹桃——这些都是认得的。走到前面公路

---

① 英语：意为"小花"。

旁的时候，那座微带黄红色的永恒之城[1]在望，笔者把一包还没有启封的香烟偷偷塞给克勒门蒂娜，她微微含笑接住，藏在修女服的袖口里，干脆把它塞进了衬衫模样的上衣；由于上衣腰部有弹性很好的松紧带，藏一包香烟是绰绰有余的。他们在这里等候开往梵蒂冈方向的公共汽车，笔者感到这正是打破柏拉图禁谕的合适时机；他将她拉到两株幼小的柏树中间，放肆地吻她的前额，又吻她的右脸颊，再吻她的嘴。她不仅没有反抗，而且轻声哼着说："啊！"微微含笑地沉默了一会，然后也回吻了他的脸颊。当听见公共汽车驶近的声音时，她说："下次再来吧——不过请别带玫瑰花。"

笔者感到不虚此行，这一点是任何人立即都会理解的；他又不想推迟启程的时间，以免使各种人物过早地陷入矛盾的境地，这一点想必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对他来说不存在所谓欲速则不达的问题，所以他决定乘飞机回来，他内心里——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极其不平静：从费用上考虑，不知是否由于这次旅行而涉嫌公私不分，如果是的，又严重到何种程度？此外，同样还有一个问题也属于公私关系，也使笔者感到不平静，哪怕是部分的：克勒门蒂娜是否十分巧妙地为格尔塞伦的玫瑰花奇迹进行了宣传？或者说她用同样巧妙的手法企图加以保密呢？另一方面，如果他从已成为他心上人的嘴唇上猜中了她的愿望的话，那么他下一步该怎样行动呢？是客观地尽他应尽之责呢，还是从主观考虑，迎合自己的爱好和愿望，使克勒门蒂娜高兴呢？

---

[1] 指罗马。

笔者神经质地，可以说带着烦躁的情绪考虑着这四重问题，从春光明媚的罗马，回到了天寒地冻的祖国：尼菲尔海姆在下雪，路滑难行，出租汽车司机情绪坏透了，一路上恨不得随便拉来一个什么人，用煤气将他毒死、枪毙、干掉，或者至少揍他一顿。而使人深感失望的是，在格尔塞伦修道院的大门口，笔者受到了冷遇——一个脸色阴沉的老修女，粗声粗气地冲他说了一句"我们对新闻记者已腻烦死了！"就关上了大门，笔者被弄得莫名其妙。使他感到告慰的是，他毕竟还可以沿着修道院的围墙（成四方形，全长约五百米）走一圈，可以欣赏来因河的风光，乡村教堂（曾经被玛格丽特的皮肤逗得心花怒放的教堂执事们，当年就是在这里工作）的大门紧闭。这儿是莱尼生活过的地方，这儿是肠卜僧埋葬的地方，后来被掘了出来，重新埋葬，再一次被掘了出来，被烧成灰——可是在修道院的围墙上却没有一处地方，没有一处地方能找到一条缝隙！只剩下一家乡村客店可去了，它一点也不象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的家乡那样宁静和令人昏昏欲睡。完全不象，这儿人声鼎沸，人们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笔者，他发现自己跟前的这些外地人的面孔，毫无疑问都属于同一范畴：确实都是记者。当他在柜台前向店主人订一个房间时，他们就象拉拉队似地带着嘲笑口吻齐声为他补充道："上格尔塞伦来租房间，而且偏偏是在今天，此外"——这下嘲讽的口吻变得更厉害了——"也许甚至要的还是一间能看得见修道院花园的房间——对吗？"当他果然天真地点头表示同意时，立即引起了哄堂大笑。穿着时髦的男男女女放声大笑不止，由于他被他们新的虚情假意所蒙蔽，肯定了他们提出的问题，说自己一

定要看看修道院花园的雪景，他们终于认为他是一个大傻瓜。这下他们变得比较和气了，就在店主不断忙着从酒桶里放酒和往杯子里斟酒的当儿，他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难道他还不知道大家都在谈论的事情吗？——修道院的花园里发现了温泉，它使一丛老玫瑰开了花；修女们仗着修道院不受侵犯的合法权利，亲自动手砌起墙壁，把出事的地方围了起来。她们把通向教堂钟楼的路堵死，人们只得到临近的那座大学城去（正是 B. H. T. 和肠卜僧当年幽会的地方！——笔者）向一家拆房公司借来一架高达二十五米的活动梯子，以便"看看修女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大家把笔者团团围住，以致使他自己都搞不清，究竟是不是他天真以及他天真到什么程度。他们有合众国际社的，有德新社的，有法新社的，甚至还有一位《消息报》的记者也赶来了，他决心和一位捷通社代表合作，"撕下教会法西斯脸上的假面具，揭露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这种竟选花招。您知道吗，"这位看来倒也和蔼可亲的《消息报》记者递给笔者一杯啤酒，接着说："每逢选举的时候，意大利的圣母们就得哭鼻子了。近来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修道院花园里，在埋葬着修女们的地方，冒出了温泉，长出了玫瑰花。有人企图向我们胡说什么这些修女在当年东普鲁士被占领时曾遭到强奸。反正有人硬说这被事同一起共产党案件有某种关系，而除了说强奸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把共产党和修女扯在一起呢？"笔者比大多数在场的人更了解内情，他在五小时之前还曾望着罗马城，吻过一个女人的远非羊皮纸皮肤所能比拟的脸颊，此刻却不得不投降了，并决定等着看报上的新闻报道。企图在这儿获得真实情况，是毫无指望了。难道人们真的用歪曲的手法将莱尼牵连进这个故事了吗？难道肠卜僧转化为热能了？他走出酒馆，正要关门时，还听到里面一个女记

者以嘲讽的腔调唱起这首歌来：“一朵玫瑰花破土而出……”

就在第二天，在他已经引述过的那家报纸的上午版上，他发现了一篇“完整的报道”：“现已查明，被东方报纸一味嘲笑为‘格尔塞伦玫瑰温泉奇迹’的怪事，其原因系由自然条件造成。格尔塞伦这个地名原来就含有日耳曼语 Geysir[①] 的意思（Gerselen 可能一度称 Geysirenheim）。事实说明，早在公元四世纪，格尔塞伦就出现过温泉，因而八世纪这里曾经一度建有一个帝王的小行宫，一直存在到温泉重又枯竭为止。正如修道院长萨皮恩蒂阿修女在一次接见本报独家采访中告诉我们的那样，修女们都强调指出：她们从来不曾想到这是什么奇迹，也未就此传播任何消息。‘奇迹’二字可能是教会女中一个早年的学生在报道中擅自加进去的，人们认为，她对格尔塞伦这所历史悠久的教会女中怀有复杂的矛盾心理，后来她靠拢了德共。最近专家们业已证实，事实上系温泉突然喷出，确使一些玫瑰开了花。萨皮恩蒂阿修女以一个开明通达的现代教会女士所具有的冷静头脑解释道，没有丝毫理由可以猜测是超乎自然的东西在作怪。”

笔者一刻也没有犹疑，立即将玫瑰温泉奇迹及其背景告诉了玛格丽特（她听了之后乐滋滋的，对一切全都相信，并殷切地劝他切莫冷落了克勒门蒂娜）。笔者甚至也告诉了洛特，受到她

---

① Geysir，德语，意为“间歇温泉”。所译“格尔塞伦”，德语为 Gerselen。

的冷嘲热讽，她当然把一切都说成是骗人的把戏，并把笔者称为可怜的"修女崽子"（"这是正经话，也是打个比方。"洛特语）；而对于莱尼，笔者却拿不定主意是否也要谈一谈格尔塞伦的这桩怪事，至少暗示一下在罗马的调查情况。笔者觉得，B. H. T. 也有权知道，无疑受到他尊敬的拉埃尔的骨灰在事隔二十七年之后还产生了什么影响。尽管已经有知名的地质学家在一家石油公司（该公司肆无忌惮地利用玫瑰温泉事件大作广告）的几名勘探人员支持下，在无可置疑的鉴定书上证实这一事件"纯属自然现象"，但仍有一部分东欧报纸顽固地坚持认为，"反动势力乞灵于格尔塞伦的竞选花招"，"只是在社会主义力量不断施加的压力下才破产，现在他们又搬出完全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冒牌自然科学家来，从而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科学可以被人任意操纵利用的本性。"

也许笔者在这个问题上是失算了。他本该插一手，本该在格尔塞伦翻过修道院的围墙；有可能在秃顶 B. H. T. 的协助下动员莱尼上那儿去一趟，至少为她采摘几束玫瑰花，在门口递给她。也许这些花儿能够把她那幅巨画"童贞女拉埃尔·玛丽亚左眼视网膜局部图"恰如其分地好好装饰一番。可是偏偏现在事情接踵而来，而且盘根错节，使笔者无暇屈从于个人私念，再到罗马走一趟了。职责在召唤，在以赫尔韦格·席尔滕施泰因的名义发出召唤，他组织了一个"莱尼处境困难—支援莱尼委员会"，打算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在道义上、经济上支持莱尼，抵御日益加剧的"霍伊泽压力"，有可能甚至考虑采取政治措施。席尔滕施泰因在电话中说话激动而又坚定，他那容易沙哑的嗓

子，和过去说话时象薄木板抖动那样有气无力相反，变得铿锵有力了。他向笔者索取所有“关心这位令人惊奇的人物”的人士的姓名地址，得到这些姓名地址后，准备在晚上召开一次会议。因此，笔者还有足够的时间，为了获得客观材料，为了正义，为了真理，也为了尽量避免感情用事，也为了新闻报道的义务，终于闯进了对方的大本营。霍伊泽祖孙也想要阐明他们对这一不幸事情的观点，肯定也担心对方计划采取某些行动，立即表示愿意“搁下手头哪怕是非常紧迫的事务”。困难的只不过是会见地点的选择问题。可供选择的地点有：前文已经描写过的那幢兼具豪华大旅馆和养老院特点的疗养院里老霍伊泽住的套间，赛马场老板维尔纳的办公室或私人住宅，“建筑业指导经纪人”（此乃自己创造发明的头衔，笔者的援引一字不差）库特·霍伊泽的办公室和私人住宅，以及霍伊泽两合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议室，这家公司“统一代表我们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投资”。（以上全都是库特·霍伊泽的电话通知的原话。）

笔者并非不从个人兴趣出发，建议选择霍伊泽两合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议室，它在来因河畔一幢高楼的第十三层楼上，了解情况的人知道，这个会议室可以眺望美丽如画的风景，也可以鸟瞰市容，而笔者事前是不知道这一点的。笔者抑制不住忐忑不安的心情乘车前往：高贵豪华的东西总是只会使他这个小资产阶级心情感到局促不安；由于他出身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待在那里虽然感到舒适，但显得生疏。他心里怦怦地跳个不停，跨进了这幢豪华公寓楼房的门厅，它那顶楼式的住宅实在叫人喜爱。一个分明既未穿制服也未穿号衣，但又确实给人一种既象穿制服又象穿号衣的看门人，带着谈不上蔑视而只是审查的目光，打量着他，显而易见：笔者脚上的鞋子没有能够通过这次审

查。电梯是无声的；这倒见过。电梯内装有一块黄铜的"楼层指示表"，由于电梯无声的速度快得惊人，不可能细致认真地加以研究，粗略一瞥，发现在这幢大楼里工作的几乎全是从事创造性活动的人：建筑师、编辑部、时装经理处。有一块牌子特别宽，分外引人注目："埃尔温·克尔夫，创造性活动者联络处"。

这里的所谓"联络"，是指体力方面的呢，还是指脑力方面的？或者仅仅是不带约束力的社交性的呢？再不然就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应召男郎或应召女郎组织？正在反复考虑想不出个所以然时，他已经到了第十三层。门毫无声响地打开了。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正在等候他，向他简单地自我介绍了一句："我是库特·霍伊泽。"此人不卑不亢，一点没有故显殷勤的样子，带着一种正常客气、但也决不完全排除出自衷心的友好态度，把他领进了会议室。这间会议室又清楚地使他回想起两天以前还面对克勒门蒂娜而坐的那个房间：大理石、金属门窗、莫理斯式皮沙发——只不过举目外望，看到的不是略呈黄红色的罗马城，而只是来因河及其沿岸的几个地方。这儿所处的地理位置，正是那条终年庄严雄伟的河流进入它最最肮脏的地段的一带，再往下游七十到八十公里左右，就是德国这条污秽之河或这条河中的全部污秽泻向那无辜的荷兰城市阿纳姆和内伊梅根的处所。

会议室呈扇形，包括陈设在内，其舒适程度令人赞叹不已。室内只摆了几张桌子，还有几张莫理斯式皮沙发足可以和罗马总教会里的那几张直接配套。也许这个地方重新勾起了他对远方人儿的思念，致使他昏头昏脑不知所措地站了一会儿。主人请他坐到那个最好的位置上：从窗口可以看到来因河和大约五座桥梁。在雅致新颖、与拱形窗相配称的桌子上，摆着各种酒类、果汁、装在保温壶里的茶，以及香烟和雪茄，不象暴发户那样

俗不可耐地一大堆，数量和花色品种都恰如其分。用两个字来说明这里的一切该是合适的：考究。老霍伊泽及其孙子维尔纳给笔者的印象，比他脑子中的印象显得要和蔼可亲。笔者赶紧按照自己的身分纠正自己的成见，并抱着客观的态度，认定同自己首次见面的、原先给人以不祥感觉的库特·霍伊泽是一个和蔼可亲、平和谦虚的人。他那套衣服按说是颇为考究的，但穿在他的身上显得稍有一点不够整饰，这与他慢条斯理的男中音嗓子倒很相称。他酷象他的母亲洛特：前额，圆圆的眼睛。难道他就是当年在戏剧性的情况下出生、按母亲的强烈愿望没有进行洗礼的那个婴儿？就出生在那间如今睡着五口之家的葡萄牙人房间里？他当年果真和看来比他严厉得多、如今已有三十五岁的维尔纳一起，在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里，用崭新的卷烟纸将佩尔策丢掉的烟屁股卷成香烟再卖给佩尔策，致使佩尔策至今还耿耿于怀吗？

会议室里出现了好一阵尴尬局面，因为笔者显然被误认为调解纠纷的和事佬了，笔者不得不作些必要的解释，以说明自己造访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情况，客观地了解情况。不是为了——笔者在简短的开场白中说——同情谁、倾向谁、讨价还价。他关心的仅仅是事实真相，决不牵涉意识形态，决不行使律师职务。他——笔者——未被授予任何权力，也不想谋求任何全权；那位“有争议的人物”至今还没有直接同他见过面，他只是在街上看到过她两三次，还不曾和她说过一句话。他的愿望是，哪怕可能是一鳞半爪地、但也尽可能不要太一鳞半爪地查明她的身世，他——笔者——既不是受地上的也不是受天上的某一个机构的委托，他是自觉存在论者。在他发言的过程中，霍伊泽祖孙三人都只是出于礼貌，才勉强注意听着，此刻他才在他们的脸上发现

一点感到兴趣的神色，因为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似乎在“自觉存在”这个词中闻到了一种单纯讲究物质的味道，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从各个方面对“自觉存在”进行一番解释。接着，库特·霍伊泽问他是不是理想主义者，他断然否认。再问他是不是实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他同样断然否认。突然间，他发现自己被置于老霍伊泽、库特和维尔纳的轮番审讯之下。他们问他是不是大学毕业生、天主教徒、新教徒、来因人、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自由派人士，他对性浪潮、避孕药片、教皇、巴泽尔、自由市场经济以及计划经济等是赞成还是反对？由于他——这时他已经仿佛是在玩轮盘赌，不得不把头转来转去，以便能看到提问的人——始终自信地对所有问题都给予否定的回答，终于意想不到地从一扇原来没有看见的门里出来一个女秘书，给他倒了一杯茶，把干酪点心向他跟前挪了挪，打开一盒香烟，然后一按电钮，打开一个原来显得天衣无缝的关得严严实实的壁橱，拿出三个文件夹，放到库特·霍伊泽跟前的桌子上；旁边再放上一本笔记簿、白纸和一个烟斗。然后她——一个姿色一般、胸脯不太丰满的金发女子，使笔者想起某些电影中在妓院里忙忙碌碌地应付客人的景象——又钻到那扇门里去了。最后还是老霍伊泽首先开了腔，他举起拐杖轻轻地敲了敲卷宗，随即又把它放在卷宗上，随时配合自己说话的抑扬顿挫用它敲上几敲。“现在，”他以克制不住的伤感声调说：“现在我们之间的联系，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切往事都结束了，而我和格鲁伊滕一家曾有七十五年之久保持密切的关系。我十五岁就做了胡贝特·格鲁伊滕的教父，这您是知道的，而现在呢，我和我的孙子，把所有的线都掐断了，一切关系都断绝了。”这里，笔者不得不例外地紧缩一下篇幅，因为老霍伊泽也实在扯得太远了——他从一八九〇年

左右六岁时在格鲁伊滕家的花园里摘苹果说起，详详细细描写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强调说明自己如何具有民主思想的基本立场，叙述了莱尼的各种（政治上、道德上以及经济上的）错误和蠢事，以及几乎所有已经介绍过的人物的生平——滔滔不绝地总共作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使笔者听得相当疲劳，因为其中大多数内容他都已经听到过了，虽然说法不同。有关莱尼母亲、莱尼父亲、曾有一次同她外出度周末的年轻建筑师、她的哥哥、她的表哥、死魂灵，等等，等等。笔者感觉到，连两个孙子也没有全神贯注地好好听他讲。老头还提出了"某些完全合法的交易"，不是用直接进攻的口气，而是以守为攻，几乎有点象那位职位显赫的先生的风格。那块库特一生下来就得到的地皮——听到这儿，笔者不禁警觉起来——"是格鲁伊滕太太的祖父一八七〇年从一个外迁的地主手里买下来的，每平方米的价格是一个格罗森①，这等于是免费奉送。其实他出价每平方米四芬尼也可以到手的，但他们家一向爱显示大方，而他又是一个疯子，往上凑成整数出价，付了两千泰勒②，而不是五千马克，这样，他每平方米就付了十二芬尼。今天每平方米价值三百五十马克，这能怪我们吗？如果人们也觉察到象我所认为的目前这种通货膨胀的趋势，甚至可以估价五百，这还不包括大楼，而大楼的价值您完全可以同地价作同样的估计。告诉您，就是您明天带一个买主来，给我五百万，我——我们也不卖。现在，您过来一下，看看窗外吧。"说着，他毫不客气地把他的拐杖当作钩竿，钩住笔者（他本来就一直在为自己身上快要落下来的钮扣提心吊胆）那件

---

① 格罗森，旧时银币，一格罗森合三十分之一泰勒，相当于十二芬尼。
② 泰勒，旧时银币，一泰勒合当时三马克。

扣得并不牢靠的上衣，二话不说，把他拖到自己跟前，那动作，不能说不粗暴，而且——得说句公道话——也不能不引起他两个孙子摇头。这样，笔者也不得不去看了看周围的楼房，那些参差耸立在这幢十三层大楼周围的九层、八层、七层的楼房。"您知道，"老霍伊泽以轻得出奇的声音问道，"您知道这一带市区叫什么名字吗？"笔者摇摇头，他对地形的变化谈不上了如指掌。"这一带市区叫霍伊泽林根——它就建筑在被白白荒废了七十年之久的地皮上，自从人家好心肠将这块地皮送给那边那位年轻先生"（拐杖向着库特一挥，带着挖苦讥讽的口吻）"当作镇摇篮之宝以后，我，是我，是我想方设法不让这块地皮永远躺在他的摇篮里，我按照我们的祖辈就曾听到的格言行事：'让土地为你们服务'。"

这时候，这位年龄本来就相当高的先生终究开始显得精力不济了；虽然自己不加掩饰地采取进攻架势，却把笔者企图摆脱他那根拐杖钩竿当作是进犯，尽管笔者的动作还是斯斯文文，而且为了提防自己衣服上的钮扣脱落，也尽量克制着自己。刹那间，老霍伊泽的脸涨得通红，果然把钮扣扯了下来，苏格兰呢上衣也跟着遭殃，扯下了老大一块！接着，他又咄咄逼人地举起拐杖朝笔者头顶上挥舞。虽然笔者随时准备好再把左脸也凑上去挨打，但此时还是觉得以自卫为上策，他脖子一缩，往旁边闪开，好不容易才体面地但过了这一难堪的场面。这当儿，库特和维尔纳出面进行斡旋了，显然是他们中间的哪一位通过外人看不见的电钮打了一个招呼，那个充当接客机器的胸脯不太丰满的金发女人，就行动了起来，只见她带着一种无法描写又难以模仿的冷冰冰的神态，淘老头咬了一会儿耳朵，哄他退场。这一幕表演，使两个孙子不约而同地拍案叫绝："嘿，特鲁德，您真是我们最好

的能干姑娘！”老头走出大厅(笔者在这里不敢使用“房间”两字，以免使人感到受辱而起诉)时，还回过头来嚷道：“胡贝特，你要为你的笑付出昂贵的代价，谁最后笑，谁就笑得最好。”

在这一幕表演中，要说维尔纳·翟伊泽和库特·翟伊泽两位先生心里有所触动的话，那完全是考虑到保险义务。关于损坏的上衣，进行了一次大伤脑筋的三人会谈。维尔纳自告奋勇，有意立即用现款赔偿，而且愿意多出几个钱；这个打算还没有正式提出来，就被库特丢过去一个眼色压下去了；不管怎么说，维尔纳已经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手伸向了钱包，这时又吃惊地把手缩了回来。说了些“我们当然要按新衣服的价钱赔偿，虽然这不是我们的责任”啦，还说什么“赔偿费”啦，“压惊补贴”啦，还提到了几家保险公司的名字，说出了保单号码，最后叫来那位令人生疑的特鲁德。姑请笔者给她一张名片；当结果发现笔者拿不出名片时，就显出一副满脸不高兴的神情，把他的地址写在她的速记本上，摆出一副面孔，好象有人逼着她收拾一堆令人恶心的臭狗屎似的。

说到此，笔者也想谈谈自己的态度：要说赔一件，哪怕是赔一件价钱贵一倍的新上衣，他都是不感兴趣的，他要的是自己原来的旧上衣，尽管这话听来象是快要掉眼泪的样子，他的确很喜欢这件上衣，坚持要求补好它。两位翟伊泽告诉他，现在的裁缝业已经衰落了，劝他不要坚持己见；他却说，有一个精工织补的妇女曾经多次替他修补过上衣，补得很巧妙。我们常常看到一种人：虽然谁也没有禁止，并且也不会禁止他们说话，他们却突然会说：“我也想讲几句，”或者说：“请允许我也说几句。”——

笔者也处于类似的情况，谈判到了这个阶段，他只能勉强使自己不要感情用事。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说出这件上衣的年龄，没有说出穿着它所作的多次旅行，那许多从它口袋里摸进摸出的纸条，那夹兜里的零钱、面包屑、松脱的毛头等等，难道还真要他说出，就在不到四十八小时之前，克勒门蒂娜的脸颊还曾经贴在——哪怕只是短暂地——它的右翻领上？难道他非得让人家怀疑自己感情用事，而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被维吉尔[1]称之为眼泪的回忆的西方人的愿望吗？

气氛早就不象原先那样融洽了；如果霍伊泽兄弟俩略为表示一下懂得这个道理：有的人更喜欢旧东西而不喜欢新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从保险义务的角度来考虑的，那末，气氛或许可能会融洽一些。"如果，"维尔纳·霍伊泽最后说，"有人撞坏了您的旧的大众牌汽车，愿意赔您一辆新的大众牌汽车，虽然他只应按照旧车牌价赔偿，而您却不要？那我就只能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了。"说话听音，说笔者用的是旧大众牌汽车，真是一种——哪怕是无意识的——侮辱，是影射笔者的收人情况和口味，这种影射虽然不是在客观上、但却在主观上带有一种羞辱人的性质。如果他——笔者——感情用事，用强硬的语言表示：什么旧的新的大众牌汽车，他一概不感兴趣，他只要求补好被一个老色鬼扯破的上衣，那会使人十分不高兴吗？这样的谈话当然不会取得任何结果。该怎样向人家说明他十分喜爱一件旧上衣，不能把它——为了鉴定它的实际破损程度，要求这样做——脱下来呢？要知道，——真该死，生活里就是有这样的事——他的衬衫上有一个洞，确切地说，有一道口子，那是在

[1] 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

公共汽车上一个罗马小伙子用钓鱼钩闯的祸；还有，这件衬衫已经不那么干净了，真该死，这是因为，为了调查真实情况，他一直不停地东奔西走，不断地用铅笔和圆珠笔作笔记，晚上累得精疲力尽，连衬衫也不脱就钻进被窝！“补”这个字不是很好理解吗？也许会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在自己的地皮上大兴土木，用他们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一带市区，而一旦听说，居然有一些东西，甚至是上衣，对于物主来说，是不能用金钱所代替得了的时候，就会几乎莫名其妙地显得神经过敏起来！这里而也许隐藏着一种甚至可悲的存心挑衅——但是，只要谁能多少看到笔者迄今一直严格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就会相信听起来似乎不可相信的东西：在这次争论中，他确实是实事求是的，平心静气的，彬彬有礼的，当然也是坚定不移的。而那两位霍伊泽却变得并不实事求是，他们的语调是激动的，神经质的，怨愤的，他们——在这一尴尬场面快要结束的时候，甚至也包括库特——老是颤悠悠地伸手去摸人们猜测藏钱包的地方——好象能从那里掏出一件上衣来似的，已经穿了十二年的心爱的上衣，对于一个人来说，它比自己的皮肤更可宝贵，更无法用别的东西代替，因为皮肤是可以移植的，而上衣却不能；人家舍不得这件上衣，并非感情用事，仅仅是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西方人，一个受过眼泪的回忆熏陶的西方人。

涉嫌存心挑衅的还有：笔者跪在地板上，爬着寻找那块连同一颗钮扣一起被撕了下来的布片；因为以后他去找那个精工织补的妇女修补时，还会用得着这块布片的。他终于放弃了任何赔偿要求，表示愿意自己花钱请人把上衣修补一下，暗示也许可以作为杂费开支一起报销，因为他毕竟是因公到这里来的。可是这么一番话也被认为是侮辱；岂能把人看得如此小气，等等。

天哪，一连串的误解！人家的愿望只不过是补好自己的上衣，除了要自己的上衣之外，别无他求，难道这样简单的道理，别人也不相信吗？难道就应该立即被怀疑为拜物主义的感情用事吗？究竟有没有一种更高尚的经济学，根据它的法则，不允许仅仅因为你有一个厚厚的钱包和不想生气，就把一件经过精工织补完全还可以穿的、而且使穿它的人高兴的上衣干脆丢掉？

这场令人不快的插曲大大地破坏了最初的融洽气氛，之后，总算言归正题，打开了显然构成莱尼档案的三个卷宗夹。"莱尼婶婶作风不正"，莱尼婶婶待人处世不切实际，莱尼婶婶的教育方式有错误，莱尼婶婶的社交往来等等，象报流水帐似地一股脑儿倒了出来，所有这些在这里又只能概括起来加以记述。"您可别以为我们是假正经、思想落后，或者说不进步，问题不在于什么情夫，更不在于什么土耳其人、意大利人或希腊人——问题在于地产的收益低于正常收益几乎达百分之六十五。单是变卖地产的钱，如果投资得当，每年就能生息四万到五万马克，也许还要超过，不过这里我们愿意公道办事，只按低标准计算——可是房子有几个钱收益呢？扣除修理费，扣除管理费用以及底层那一帮坏分子造成的后果——莱尼婶婶就住在底层，把比较有钱的人都吓跑了，因而租不到好价钱——，房租有几个钱收益呢？不到十五马克，勉勉强强十三、十四马克。"维尔纳·霍伊泽说。

库特·霍伊泽接着说（根据笔者的笔记概括整理），我们并不是反对外籍工，不是持有种族偏见，只不过是要坚持原则。如果莱尼婶婶肯接受合乎市场行情的租金，那么甚至可以商量将整幢房子向外籍工开放，按铺位租，按房间租都可以，让莱尼婶

婶当管理员，甚至可以免费向她提供住房，每月付给她一笔现金补贴。可是她收——这的确是神经失常，甚至违反社会主义经济学常识——她收别人的房租同她自己缴付的房租数目相等，一个也不多。我们将房租定为每平方米两点五马克，原是为了照顾她，而不是为了让别人得到好处。这样，那家葡萄牙人住五十平方米，付一百二十五马克，外加浴室和厨房十三马克；三个土耳其人（"其中一个一直同她睡觉，因此实际上住那间房间的只有两个。"）住三十五平方米，付八十七点五马克；黑尔岑两口子也是五十平方米，付一百二十五马克，各外加十三马克。"再者，她神经错乱到极点，浴室和厨房竟算自己的双份，因为莱夫眼下暂时住在不花钱的地方，她却让莱夫的房间空着不出租"。最岂有此理的是，她把带家具的房子按空房间租给人家，这可不象搞无政府主义一共产主义试验那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太大危害，这是破坏市场。说句不算太不公平的话，这幢房子的每个房间，连同浴室和厨房至少可以赚三四百马克，等等，等等。即使是库特·霍伊泽谈到下面这一点也显得为难，"但为了尊重事实，我不得不谈"，就是说十张床铺中，实际上只有七张属于莱尼所有，一张还是祖父的，另一张属于十分可怜的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还有一张属于老普法伊费尔两口子，"他们要是想到在这几张床铺上可能干些什么把戏，是会气得头发根根竖起来的"。所以说，莱尼不仅公然破坏了经济法则和使用权，而且也破坏了所有权，老普法伊费尔两口子因为一直没法直接找莱尼交涉，只好将他们的床铺所有权委托给霍伊泽两合股份有限公司代管，因此需要保护的不单是我们自己的权益，也还有依法委托的权益，这样事情就更加多了一层需要考虑的地方，即根本原则有遭到破坏的危险。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的床铺虽说是战争

期间莱尼婶婶的母亲送给他的，"当时他在莱尼家里待命入伍"，但既然送了，东西就归别人所有了，根据法律制定者的思想，送给别人一件礼物就永远让出了所有权。而且——这一点笔者尽可以讲出去——使入想不通的是，现在的所有房客和三房客全都是垃圾工和清道夫。说到这里，笔者表示有不同意见，指出黑尔岑夫妇并不是垃圾工，黑尔岑先生是市政机关职员，地位属于中上；黑尔岑太太的职业是受入尊敬的美容师；葡萄牙女人安娜-玛丽亚·平托在一家大商场的无人服务饭店的柜台上工作，笔者自己曾从她手里取过炸肉丸、奶酪点心和咖啡，帐也是找她结算的，并未出过差错。库特·霍伊泽点点头，同意笔者的这一更正，但又补充说，莱尼婶婶在经济上还有一点做得不对的地方，她身体很好，还可以工作十七年左右，可是听信了胡涂儿子的愚蠢怂恿，丢下工作不干，去带三个葡萄牙孩子，教他们唱歌，教他们德语，让他们和她一道"画那种破玩意儿"，经常叫他们——这有文件证明——逃学，就象她从前也让自己的儿子那样干一样。要说过失，"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一个人不遵守法纪，就要遭到周围人们的怀疑，这是事实；同样，清除垃圾和扫大街被看成是最下贱的工作，因而影响房子在社会上的吸引力，租不出好价钱，这也是事实。

所有这些都是平心静气地讲出来的，言之成理，明白易懂。上衣的苦恼早已被丢在九霄云外了，只是笔者的心头还隐隐有些余愤，他不禁抚摸着自己心爱的衣服，发现衬里被弄破一大块，同时他还感到，衬衫上那个被意大利小伙子弄破的口子越来越大了。不过主入有香茗、奶酪点心、香烟招待，隔着拱形窗外望，景色美不胜收，而且使人感到宽心的是，维尔纳·霍伊泽有节奏地点着头，不断证实他弟弟的叙述，相当准确地突出了弟弟

的每一个句点、逗点、连接号和分号——这样就收到了一种幻觉剂加爵士音乐的效果，气氛显得十分和谐。

说到这里，也有必要恭维一下维尔纳·霍伊泽的敏锐感觉，他一定已经感觉到，笔者完全怀着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机和谨慎，乐于接触一个可谓已经到了口边上的话题：洛特·霍伊泽；不论如何，她毕竟是这两位显得挺阔气的年轻先生的母亲啊。

也是他——维尔纳——这个人，毫不羞于谈起这种“令人遗憾和惋惜的六亲不认”。他说，一个人不应该自欺欺人，应该客观地分析具体事实，应该进行一次心理剖析，即使这样做是痛苦的。因为他知道笔者和他母亲之间有接触，也许甚至有好感，而他、他的弟弟、祖父同笔者之间的好感，则由于发生了一件“令人遗憾的、但究其实并不重要的事情”，再也无法恢复“平衡”了。他着重指出，他实在无法理解，有人宁可穿一件三流纺织厂生产的旧苏格兰呢上衣——看上去完全象“老兵游子穿的两尺半”——，而不要一流工厂出产的崭新的上衣。不过他是受过要宽容别人的教育的，而且也愿意以宽待人，即使只是按照来因人的格言“一个人不要挡住另一个人的路”。他也无法理解，有谁会公然厌弃象大众牌那样一辆很受欢迎的、到处流行的小汽车，他自己给老婆就买了一辆大众牌，作为他们家第二辆汽车。等到他现年十二岁的儿子奥托六七年后高中毕业，开始上大学或服兵役的时候，他将再买一辆大众牌汽车，作为第三辆汽车。这是顺便说说的，现在还是谈他母亲吧：她的主要错误倒并不在于歪曲阵亡了的父亲的形象，可是她庸俗地作践了父亲阵亡的历史背景，惋把这一切都说成是“乱弹琴”。“我们无疑是非常懂事的孩子，但总有一天免不了要问起父亲是什么样子啊。”他们的这个要求没有被拒绝；他们听到说，父亲是个善良、敏感的人，虽

然某些方面、至少在职业上不得意。母亲对父亲威廉的爱，也从来没有可疑的地方，但是她三句话不离“乱弹琴”，谈到历史上任何事情更是口口声声“乱弹琴”，这样父亲的形象就一步步被损害了，尽管也许不是有计划的。更不象话的是她偷人养汉。单是格鲁伊滕还情有可原，虽然不正当的关系给他们招来了冷言冷语和烦恼，可后来她的床上“甚至”睡过俄国人，有时也睡过“被这个可怕的玛格丽特甩掉的美国佬”。第三是她的反宗教和反教会情绪——他非常清楚，这两种情绪并不是一回事——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在她的身上，这两种情绪恰恰“无可救药地合二为一了”，她硬要他们讨厌地跑很远的路去上一所私立学校。在“格鲁伊滕大叔”不幸死去后，她变得越来越怨天尤人和愤世嫉俗，正是因为缺少了平衡。这种平衡——他不能不承认，而且到今天还深深感谢她——在莱尼婶婶那里找到了。莱尼婶婶一向和气、亲切、大方，又唱歌，又讲童话故事，而且从来不讲什么话损害她那死去的——嗯，也许可以这么说——丈夫的形象，尽管他是个红军士兵。而且莱尼不肯和母亲一起用口口声声“瞎胡扯”或“乱弹琴”来解释命运。有好几年，的确是好几年，她带着他们和莱夫晚上坐在来因河畔，“她的手几乎全被玫瑰花刺破了”。莱夫是受过洗的，库特没受洗，他直到七岁时才在修女手里受洗。当时，“感谢上帝”，是奥托爷爷把他们从“这种环境”下解救了出来，感谢上帝，因为莱尼婶婶对小孩来说是想象不到的好，对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却是毒药。她歌唱得太多，话讲得太少，尽管叫人高兴和具有叫人高兴作用，即莱尼婶婶“从来不跟男人们胡搞，而我们的母亲在这一点上就叫人捉摸不透，这个可怕的玛格丽特简直象是开妓院。”维尔纳·霍伊泽也夸奖了玛尔雅·范·多恩，甚至还说博加科夫的好话，“虽然有时候他的歌

也唱得太多了一点”。他们毕竟还是走上了正道，信奉了基督教，受过教育，懂得要作出贡献和担负责任，上了大学，他学的是法律，库特学的是国民经济，“而祖父所推行的政策，不能不说是天才的发家致富的政策，这种政策使我们有可能将学得的知识立即用于自己的企业。”

他只是附带开了一家赛马场，也许这会给人以不正经的印象，实际上这是他的嗜好，办一家业务牢靠的企业，借以满足自己的赌欲。不过说到底必须指出，莱尼婶婶比他的母亲来得危险；他母亲“只不过是失意的假社会主义者”，不会酿成祸害。莱尼婶婶则相反，他认为是名副其实的逆潮流而动，她本能地、顽固地、嘴里不明说但始终不渝地拒绝任何形式的利润思想——她不是否定，因为否定要明确表态，而是干脆不干。这是不人道的，或者按德国人的说法是不近人情。她起了毁灭和自我毁灭的作用，想必这是格鲁伊滕家的一种本性，她哥哥、特别是她父亲也是生就这种本性。维尔纳·霍伊泽最后说，他并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胸怀开朗，非常开明，达到了他所受到的教育给他指点的最大限度；他公开赞成避孕药片，赞成性浪潮，但尽管如此还是把自己看成基督教徒。如果人们愿意，也可以叫他“排除恶浊空气的狂热分子”，而莱尼婶婶是有必要这样来一下子的，她必须换换自己的恶浊空气。不近人情的不是他，而是她，因为健康的利润欲和占有欲乃人之常情，神学已证明了这一点，甚至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越来越肯定这一点。最后，也是他最不能原谅她的，是莱尼对不起一个人，这个人他不仅曾经喜欢，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喜欢：他的教子莱夫·博里索维奇·格鲁伊滕。“这个教子是我在十分富有戏剧性的场合下收的，我把收他看成是一种委托，尽管我对这一委托曾经一度报以嘲笑的态度。不

过我既然当了他的教父，那这就不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身分，不光是一种社会一宗教身分，这也是我想要遵守的一种法律身分。”他们兄弟俩“为了一些法律上无论如何都成问题的愚蠢行为”控告了莱夫，将莱夫判刑，关进牢狱。人们把这说成是一种仇恨，实际上这是出于爱护而采取的行动，是为了使莱夫头脑清醒，为了打掉莱夫那“归根到底的万恶之源：他的骄傲，他的狂妄”。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莱夫的父亲是个善良、感情细腻和文静的人。他可以肯定，那个人一定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几经周折最后变成一个垃圾车司机的。他不想否认垃圾工非常重要，属于第一流的社会职能，但不容争辩的是，莱夫“命中注定要干更大的事业”。（引号系笔者所加，笔者从维尔纳·霍伊泽的话中无法听清楚，这究竟是他引用别人的话，还是转引别人的话，或是用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里使用引号是否恰当，姑且存疑，不妨作为笔者的建议吧。）

人们必须想一想，从四点钟一直谈到七点钟，这时几乎已有三个钟头过去了。在近三个小时中，发生了达么一些事情，谈了这么一些话。那位能干姑娘没有再露面，保温壶中的茶已经变得太酽了，涩口了。由于房间里暖气太暖和了一点，奶酪点心最后失去了它的新鲜色泽，干巴了。尽管维尔纳·霍伊泽自称是排除恶浊空气的通风器，他却并不准备给这间被几个烟囱（维尔纳·霍伊泽抽板烟斗，库特·霍伊泽抽雪茄，笔者吸香烟）弄得烟雾腾腾的房间放进新鲜空气。笔者试图真的打开当中一扇拱形窗——铜窗格是分开的，并有把手，标有可以开启的记号——，被库特·霍伊泽微笑着婉转地制止了，并对复杂的空气调节装置作了说明，指出只有等调节大楼空气的某一信号亮起时，才可以“各个房间自行通风”。由于现在——库特·霍伊泽和和气气

地说——正是各家办事处和编辑部准备下班前的紧张时刻，因此必须再过大约一个半小时，等装在窗楣上的一个电眼亮起，才允许通风。同时空气调节装置负荷过大，现在也无法自动换进足够的新鲜空气。“这幢大楼共有四十八套——十二乘四——房间，这个时候都非常忙碌：口授打字函件，要紧的电话打进打出，举行重要会谈。四十八套房间，每套按四间、每间平均两个半人吸烟计算——根据统计资料的平均数，其中有一个连续不断抽香烟的人，半个抽板烟斗的人，约有四分之三个抽雪茄的人——，这个时候这幢大楼里平均有四百七十五个人在抽烟——不过我打断了我哥哥的话，我感到我们该结束了，因为您的时间肯定也是有限的。”

这时维尔纳·霍伊泽再次发言，他说（笔者作的录述非常扼要），问题并不象粗枝大叶的观察家——他这决不是指笔者——以为的那样是为了钱。他们答应给莱尼婶婶提供一套坐落在最好地段的住房，让她白住，不收房钱；他们表示愿意帮助即将获释出狱的莱夫上业余中学，然后送他上大学，但都被拒绝了，因为人家在这个垃圾工的圈子中感到惬意，因为人家对最小的一点调整也不干，对再舒适的条件也不动心，人家就是舍不得丢掉自己的老窝窝、老锅台、老习惯——在这一点上谁逆潮流而动，再清楚不过了。问题——他是以笃信基督教的基督徒和熟悉以法治国原则的待人以宽的国民经济学家兼法学家双重身分说这种话的——，问题是为了进步，而“谁进步，谁就必须踢开某些人。我们曾经听厌了母亲给我们唱的浪漫主义的‘当我们肩并肩前进’，现在再也不是那种时代了。我们也不可能随心所欲，象您所看到的，我们甚至不能在自己的房子里想什么时候开窗就什么时候开窗。”当然不可能在霍伊泽家新盖的房子里，给莱尼婶婶

提供二百一十一个平方米——那将意味损失几乎两千马克房租收入。也不可能有锅台和"什么时候想开就可以开"的窗子。至于说到她的房客、三房客或情夫，当然也必须给予某些"社交往来方面的微小"限制。"但是他娘的，"说到这里，维尔纳·霍伊泽第一次露出了咄咄逼人的面目，尽管只是一会儿的事，"我也巴不得象莱尼婶婶那样惬意才好哩。"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为了维护更高的利益，现在不能不开动看起来似乎无情的机器了。

这时候，笔者很想说一句和解的坦率话。考虑到这些连自己房子的窗户也不能随意打开的受苦人的问题的严重性，笔者也愿意承认上衣事件不过是区区小事；归根到底，这件事并不象开始时他感到的那么了不起。那么，是谁妨碍了他说这句坦率的、虽然谈不上和解——因为他和两位主人之间并无争论——但至少算得上谅解的话呢？是库特·霍伊泽。就在笔者拿起大衣和帽子，草草道别后朝门口走去的时候，库特·霍伊泽用一种并非威胁，而是请求的姿态挡住了通向门口的去路，作了一通类似结束语的发言。

说到库特·霍伊泽，笔者必须纠正许多偏见，因为他根据别人陈述的所有细节，曾在想象中把他看成是鬣狗和狼的混合体，是一个残酷无情的经济学骑士。但就近观看，库特·霍伊泽却长着一双十分温柔的眼睛，这对眼睛只是在外形上而不是在实质上象他母亲的眼睛。无疑，洛特那种尖酸刻薄的冷酷和几乎要化威泪水夺眶而出的苦痛，在这双圆圆的温柔的褐色——不妨尽可以说——鹿眼睛里，由于一种因素的作用而变得不明显了，这种因素只能是来自他父亲威廉，反正只能是来自威廉的世系，如果不是来自威廉的父亲即库特祖父的话。试想许多直接和莱尼有关的人，他们的所有遗传质都是韦尔彭—托尔策姆—

吕塞米希这一三角地带的产物，那么人们确实有必要对这块萝卜地略事赞扬一番，尽管它也长出了普法伊费尔一家这样的副产品。无疑，库特·霍伊泽是个敏感的人，虽然时间紧迫，还是应该让他有机会把这种禀赋表达出来。他毫不在乎地将双手搭在笔者肩上，这一姿态又是既非亲昵，也非故作殷勤，只不过是对任何人都不应吝惜的某种友好表示而已。"我说，"他轻声说道，"您不能带着一种印象走，似乎现在对莱尼婶婶来说，无情的历史车轮在滚滚向前，开始了一个会摧毁过时的结构的无情过程，连我们自己也得屈服于它。当然，如果我们下意识地、毫无反应和丧尽天良地执行强制迁居，那倒是可以这样说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这样做是有意识的，不是不讲天良的，至少不是没有问过自己的良心的。我不否认毗邻的房地产主和不动产集团正在对我们施加压力，但我们完全顶得住，或者说完全能争取放宽期限。我同样不否认祖父办事情感情非常冲动，不顾一切，但我们也可以再次顶住，我们可以继续做我们多年来、甚至可以说几十年来所做的事，即自己掏腰包填补莱尼婶婶房租帐户的亏空，用这种方法收到安抚和和解的效果。归根到底我们爱她，有很多事情要感谢她，宁可把她的古怪脾气当成是可爱，而不当成是讨厌。我向您保证，并全权委托您转达这一保证：如果明天执行了强制迁居，腾出了房子，我们，即我和库特将立即清偿帐户亏空，停止彻底执行。已经给她准备了一套非常漂亮的住房，就在我们的一幢大楼里，当然不是那种可以供她召上十个三房客的房子。不是那样的房子，但足够她儿子，也许也可供她的情夫居住，我们无意将他俩拆开。这是为了另一种需要，说句不怕难为情的话，为了对她采取教育措施，一种夹心体贴的管教，可惜只能采用相当无情的方法执行。现在已经没有私了的

办法了。这就是说将进行得既快又无痛苦，不过到了中午，一切就都过去了。如果她不过于激动——可惜这一点值得担心——，晚上她就会住在给她安排好的房子里了。一切准备都已就绪，等典当到期的时候帮她赎回或买回她那些心爱的旧家具。这一行动，更主要的具有着眼于进行教育、进行爱护教育的动机和原则性的背景。也许您低估了象房地产主这样一个社会集团所持的社会学见解，不过我可以向您透露：人家早已研究出，正是这种宽敞的老式住房，租金比较便宜，有着某些舒适设备，构成了向我们这个讲求效率的社会宣战的细胞。从国民经济的角度来说，外籍工的高工资必须以其一部分支付为房租，从而肥水不落外人田——而且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只有这样才合情合理。三个土耳其人的工资合计为两千马克出头，气人的是房租连同厨房和浴室他们只支付一百马克，只占百分之五，而一般职工则占百分之二十至四十。黑尔岑两口子总共收入将近两千三百马克，房租只有一百四十马克左右，包括家具在内。葡萄牙人的情况也不相上下。这样，竞争的条件就遭到了破坏，如果任其发展，真要象传染病一样，破坏、挖空、瓦解我们这个讲求效率的社会和自由民主法治国的一个根本原则。在这里，机会均等被破坏了，您听懂了吗？而且最主要的是，伴随着这种反经济法则，还有一种反道德法则。莱尼婶婶家里的这种情况，已经在助长公社的——且不说是共产主义的——空想，这种空想的危害性不在于空想，而在于人们把它看作是一曲田园诗，所助长的不是杂交——而是杂交主义，它慢慢地、但必然地要破坏羞耻之心和道德风尚，使个人主义遭到耻笑。我还可以从几个、也许五六个方面给您列举理由来说明。总而言之：这个措施不是针对莱尼婶婶个人的，不是仇恨，不是报复，相反，是同情，坦白说，是对这

种可爱的无政府主义有些恋恋不舍。嗯，我承认这一点，是有些嫉妒——但决定性的是：这种房子，根据我们协会正确分析得出的看法，是一种——让我们说句不动感情的话——助长空想的田园诗和天堂主义的公社主义温床。感谢您耐着性子听我讲完，如果您什么时候遇到住房困难解决不了，我们——不附带任何条件，完全是基于一种同情的宽厚——我们愿意为您效劳。”

第十章

在席尔滕施泰因的家里，情况仿佛有如一九一七年十月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的那几间侧屋。几个委员会正在分头开会。赫尔特霍内太太、洛特·霍伊泽和朔尔斯多夫博士三人组成所谓财务委员会，负责研究莱尼财政困难的大小、抵押契约字据、迁居控告等等。在黑尔岑夫妇、土耳其人梅赫梅特和葡萄牙人平托参与下，找到了莱尼的许多信件；她的做法真差劲，竟将这些信件连封也不拆，就塞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后来抽屉装不下了，又塞在床头柜的底下一层。佩尔策以一种总参谋长的身分参加这个三人委员会工作。席尔滕施泰因和汉斯·黑尔岑、格龙奇以及博加科夫——洛特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他接了来——一道负责研究"社会活动"问题。玛·范·多恩负责后勤，准备了夹肉面包、土豆色拉、鸡蛋和茶。象许多对俄式煮茶器是外行的人一样，她也以为茶叶是搁在壶里煮的，博加科夫给她讲了俄式煮茶器的功能。这只大家伙，据席尔滕施泰因说，是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施主送上门来赠送给他的，附有一张纸条，上面用打字机打了一句话："谨此志谢几千次演奏《莉莉·玛琳》。知名不具。"玛·范·多恩同所有年龄不相上下的家庭妇女一样，没有煮茶经验，几乎是在强力逼迫之下，才不得不将她原来准备的分量至少增加了三倍。不过在另一点上她表现得很了不起：后勤工作刚一安排妥贴，就接过笔者的上衣，东摸西找了好一阵，最

后在洛特的帮助下，在席尔滕施泰因的五斗柜里找到了针线，开始修补上衣上众所周知的令人痛心的伤口，里里外外都补好了，技术非常熟练，而且不用戴眼镜。虽然她没有得过大学文凭，但看看她的熟练技巧，的确不愧是精工织补。笔者走进席尔滕施泰因的浴室，这间浴室非常宽敞，浴缸很大，也象席尔滕施泰因那香气扑鼻的化妆品一样令人倾心。他甚至穿上了席尔滕施泰因借给他的一件衬衫——因为洛特发现了他衬衫上的口子，他没能来得及遮掩——，虽然胸围和领口尺寸不太合适，但穿在身上挺舒服的。席尔滕施泰因的住宅有种种理由说得上合乎理想：老式房屋，三个房间都朝院子，一间是书房，摆着大钢琴、书柜和书桌；第二间几乎可说是个特大间（面积为七乘六米，当然只是按脚步测算而不是用皮尺量的），里面放着席尔滕施泰因的卧床、一只衣橱、五斗柜，堆放着一本本卷宗夹，都是他收集的评论；第三间是厨房，不很大，但够用了，还有那间同新房子的浴室相比就其面积和设备而言说不上豪华但至少够奢侈的浴室。窗户开着，院子里有至少八十年的古树，长满常春藤的围墙。就在笔者慢条斯理洗澡时，只听见席尔滕施泰因使劲地"嗤——"了一声，隔壁两间房间里突然都静了下来。现在发生的事情一时打断了笔者对克勒门蒂娜的想念，或者说大大地、可以说是痛苦地加深了这种想念。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个女人在唱歌——这只能是莱尼。对于年轻美丽的莉洛费①从来不曾有过丝毫印象的人，也许听到下面这几行唱词会无动于衷，不过谁要是动过一点点脑筋想象过美丽的莉洛费，那么可以告诉他：只

① 莉洛费（Lilofee），似指受丹麦或斯堪的纳维亚古老水妖叙事诗影响形成的一种德国通俗叙事诗中的女妖形象。

有她才能唱得这样好。这是一个少女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听来却又宛如乐器的演奏。她站在敞开的窗前，对着静静的院子里唱，歌声飞进敞开的窗口：

我为自己的歌儿缝制了一袭披肩，
用古老的神话将披肩上下绣遍。
愚人们把它拿走，
穿上它四处招摇，
俨然出自他们自己之手。
让他们去穿吧，
不然他们哪有勇气
光着身子走路。

按自觉存在论来看，这种飞向院子的歌声——也许早在四十年以前就在这里唱了，只不过人们不曾听到和充耳不闻——竟使笔者好不容易才忍住了T.，而且由于他扪心自问为什么总是忍住，因此最后还是不加阻拦地让它夺眶而出。是啊，他止不住W. 了，但同时也感到G.，由于好不容易才克制住文学方面的难言之隐，他突然对知情人所谈的有关莱尼藏书的情况产生了怀疑；人们是否以必要的细心进行寻找了呢？是否都翻箱倒柜了呢？也许漏掉了莱尼母亲的几本藏书吧？也许是少说了一个作者——因为怕说错他的名字而感到难为情吧？莱尼的藏书无疑还有有待发掘的宝贝，即她母亲年轻时在一九一四年、至迟在一九一六年就知道的被埋没了的宝藏。

财务委员会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社会活动委员会已经注意到，无情的措施定于明早七点半钟左右开始执行，而有可能制止这一措施的机关七点半才刚刚开门，要赶在今夜设法制止是不可能的——席尔滕施泰因打电话找好几个律师甚至检察官就这件事进行了商量，均无结果。因此问题就在于如何争取时间，有一个问题几乎是无法解决的：怎样才能将强制迁出的时间拖延到九点半左右？佩尔策抽了一点时间给社会活动委员会出谋划策，打通熟人关系，打电话找"花开不败"狂欢节俱乐部他所认识的几个搬场公司职员、法警商量，由于他也是——直到现在大家才知道——一个"法学家之流群集"的男子歌咏团的团员，他至少知道，要采取合法手段制止迁居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再次打电话找一个名叫约普的人，向对方提出一个汽车抛锚计，并表示他——佩尔策——愿意"破费一些钱"，但约普——显然是那个受命的搬场公司职员——看来不肯上钩，以致佩尔策痛心地说："他始终对我不放心，不相信我的动机完全出于人之常情。"不过由于提到了汽车抛锚这几个字，这时博加科夫突然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莱夫不是垃圾车司机么？土耳其人卡亚·顿奇和葡萄牙人平托不也是垃圾车司机么？难道这些垃圾车司机，不会对坐牢的同行及其母亲表示声援吗？怎么——象顿奇一样纯朴的平托（显然由于财务委员会和社会活动委员会都用不着他，此时他正在厨房里剥煮熟的土豆皮，顿奇则在照看俄式煮茶器，负责供应茶水）说——怎么——现在他们两人同时说——才能做到真正的声援呢？难道叫他们——既伤心又轻蔑地——用资产阶级的字眼（他们的表达有所不同："话，话，不外乎是市民的话"）表示声援，同时却眼睁睁地看着十个人，其中包括三个小孩，合法地被强制撵走吗？这时博加科夫却摇了摇头，痛苦地吃

力地挥了挥手，叫大家安静，并解释说，他小时候在明斯克上学时曾经看见过人们如何阻止反动派运走被捕的人。在运送前半小时，人们虚构了一场火警，当然要设法使消防车由可靠的同志驾驶，让消防车在关人的学校前对撞，——甚至使人行道也堵塞——，伪造一场撞车事故；这样就争取了时间，把被捕的人——都是被控开小差和武装哗变、生命危在旦夕的官兵——从后门救走了。由于平托和顿奇，还有席尔滕施泰因和赶过来听的朔尔斯多夫始终还没有弄明白，博加科夫索兴把话讲明。"垃圾车，"他说，"都是相当笨重的家伙，对交通本来就不怎么实惠。它们到处都引起交通阻塞；要是有两辆或者更好是三辆垃圾车在这里十字路口相撞，整个这一带市区少说也得有五个钟头无法通行，而这个约普是无法将他的卡车开到离房子五百米的地方的，由于他只有两次从单行线开进来才能开到这座房子跟前，因此，象我了解德国人的那样，不等他开到房子跟前，我们早已在有关当局办好缓期执行手续了。但是，万一他真的买了月台票，也就是说获准为完成一项紧急任务而走单行线路，所以必须在另外一个街角上也让两辆垃圾车相撞。"席尔滕施泰因提出需要考虑，他们都是外籍司机，如果制造这种事件，是少不了要吃苦头的，应该考虑是否以争取用德国司机为好。为了做到这一点，大家给扎拉察尔弄了一辆自行车，派他出发了。博加科夫则使用朔尔斯多夫拿来的铅笔和纸绘制一张地图，在黑尔岑的协助下将所有单行线路都绘在图上。研究结果是，有两辆垃圾车相撞就够了，足以制造一场混乱，使约普的汽车卡在离房子约一公里以外的地方一筹莫展。由于黑尔岑了解一些交通统计数字，同时作为道路工程局的职员，也熟悉垃圾汽车的体积大小和吨位，因此他和博加科夫一道制定那张战略草图，得

出结论说，“只要一辆垃圾车撞在这根路灯柱或这棵树上，几乎就够了”。不过最好是再有一辆垃圾车从后面撞上来。“这样，警察调查和有关事项足足可以进行四五个钟头。”这时，席尔滕施泰因一把抱住博加科夫，问是否可以满足他一个愿望。博加科夫回答说，他最大的、几乎是最后的愿望——因为他感到不幸——是再听一次《莉莉·玛琳》。由于他从前不认识席尔滕施泰因，因此这一愿望说不上是什么恶意，只不过是俄国人的某种天真而已。席尔滕施泰因脸色发白，但还是表示，君子一言既出，说到做到，立即走到钢琴前，弹起了《莉莉·玛琳》——也许这是十五年来的第一次。他弹得十分够味。对这个曲子表示满意的，除感动得流泪的博加科夫外，还有土耳其人顿奇、佩尔策和格龙奇，洛特和赫尔特霍内太太侧耳静听，玛·范·多恩龇牙咧嘴地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顿奇又言归正传，声称他愿意去干这次撞车假事故，他已经连续八年安全行车，市车队对他满意。他可以制造一场事故，不过必须改变或换一条路线，这只需要请示一下，虽说有困难，但并不是办不到的。

这时财务委员会也算清帐了。“不过，”赫尔特霍内太太说，“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弄清这笔帐真叫人害怕。霍伊泽祖孙把所有的东西都算上了，连人家的债务也买下了，包括煤气和自来水设备。总共——你们别害怕——六千零七十八马克三十芬尼。”此外，这笔亏欠数字和莱夫因被捕入狱而少挣的工资差不多完全相等，莱尼本来是完全可以使其家用开支保持平衡的，因而这里只需要一笔借款，而不需要白白地给她补助。赫尔特霍内拿出支票簿，放在桌上，开了一张支票说：“先开一千二百马克，再多眼下拿不出来。我在意大利长梗玫瑰的生意上亏了本，

佩尔策，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佩尔策忍不住发表了一通鼓吹仁义道德的议论，然后也摸出支票簿。他说："她要是将房子卖给我，所有这一切气人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不过我还是给一千五。但愿"——他朝洛特瞟了一眼，"但愿我自己不只是因为慷慨解囊才摘掉无赖帽子的。"洛特没有理睬佩尔策话中的骨头，声言自己已经破产。席尔滕施泰因断言自己爱莫能助，最多只能拿出一百马克，说来是可信的。黑尔岑和朔尔斯多夫分别拿出三百和五百，前者表示愿意多出房租，以相帮偿付余下债务；后者红着脸说，他感到有责任承担其余部分，因为普法伊费尔太太财政拮据虽然说不上完全是他的过错，但他的过错恰恰是罪孽深重的，只不过他有一个恶习，一直使他手头的活钱不多：他在收集俄罗斯古籍，特别是手稿，他刚刚弄到了几封他十分珍爱的托尔斯泰书简。不过他准备明天一早就去有关部门催办手续，依靠他的关系肯定可以争取缓期执行，特别是如果他——明天会计室一开门他就去办理——预支到本人一笔工资，带着全部现款到有关部门去的话。再说，先付一半肯定就够了，余下的一半他答应在中午付齐。说到底他是公务员，人家知道他板板正正，而且他和莱尼的父亲战后曾经多次商谈，愿意私人作出赔偿，但遭到莱尼父亲拒绝。现在他总算有机会赎他的语言学罪孽了；这种罪孽的政治分量，他是很晚才意识到的。应当看看朔尔斯多夫：名副其实的学者，和叔本华①不无相似之处——他的这些话显然是带着T. 说的。"不过，女士们、先生们；我需要至少有两个钟头的时间。我不赞成采取垃圾车行动，我将它当成一种正当自卫加以接受，并将保持沉默，尽管我的公务员宣誓使

①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我内心感到矛盾。我向你们保证，我也有朋友，也有门路。我的工作虽然违背我的心意，但虽然并不违背我的天分，将近三十年来没有出过什么纰漏，这么长的工作经历使我结识了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他们可以加速制止执行。只不过你们要给我时间。”

这时博加科夫已和顿奇一道研究了市区地图，发现唯一的办法是在一条弯路上制造假事故，必要时将一条安静的支路上的交通堵塞。反正朔尔斯多夫答应了保证争取时间。席尔滕施泰因正要开始讲话，只见他尖起嘴巴用力“嗤——”“嗤——”了两声——莱尼文唱歌了：

> 象你的体态一样丰盈，
> 金色的葡萄熟遍丘陵；
> 远处的鱼塘闪闪发光，
> 镰刀在地里嚓嚓作声。

起初笼罩着一阵几乎是庄严肃穆的宁静，只有洛特的窃窃冷笑打破了这种宁静，随后佩尔策发表了议论：“果然没错，她真是和他在一起怀的孕。”似乎他可以证明，连高尚的诗歌也具有通俗易懂的泄露真情的作用。

在离开这次气氛隆重的聚会之前，笔者破天荒改变自己的中立态度，他也解囊相助，向莱尼基金捐献了一小笔款项。

第二天上午十点半钟左右，笔者就通过朔尔斯多夫获悉，争取缓期执行的计划成功了。第三天，他在一家地方报纸上读到

了题为"非有外国人不可吗？"的如下报道："昨晨七时许，一辆由一葡萄牙人驾驶的理应在布鲁克内街以西三公里处执行任务的垃圾车，同一辆由一土耳其人驾驶的、理应在克雷克曼街以东五公里处执行任务的垃圾车，在奥耳登堡和比策拉特街口相撞。此系有意进行破坏、事出偶然，还是有争议的垃圾事件的重演，抑或其他原因呢？还有一辆由一德国人驾驶的垃圾车，竟无视单行线路标，同样驶入比策拉特街，撞在一根路灯柱上，这是为什么？据本市享有声望、曾为市政建设作出贡献的经济界人士向编辑部提供的消息，此定为一有计划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该土耳其司机与葡萄牙司机同属比策拉特街某幢声名不佳的房屋的房客，该楼住户昨日本应由社会局和风纪警察协同予以强制迁出。由于有传闻属于操神女生涯的某女士之'恩主们'以巨额'贷款'相助，从中阻挠，制造了不可名状的交通混乱（见照片）进行破坏。该两名外籍司机被所属国家大使馆认为政治可疑分子，看来确有严加查究之必要。人们近来不是经常听到外国人靠拉皮条为生吗？我们再次提出——象老话一句——这个问题：永远非有外国人不可吗？这一显然可耻的丑行正在继续进行调查之中。一个至今尚不知姓名的'自觉存在论者'据猜测系此行动之主犯，此人以站不住脚的借口混入上述经济界人士之中，人们以诚相待，向他提供了某些情况。物质损失初步估算约为六千马克。至于因长达数小时之交通混乱而造成的损失，则难以估计云云。"

笔者乘上飞机，并非由于胆怯，而是由于想念——不，不是飞往罗马，而是飞往法兰克福，从法兰克提乘火车去维尔茨堡，因为克勒门蒂娜由于涉嫌向笔者泄露了有关拉埃尔·京茨堡的秘密，已被贬谪到这个地方。她——克勒门蒂娜——已不但不

再左思右想，还下定决心摘下头上戴的修女帽，完全露出她那紫铜色的头发。

这里也许需要多花费一点笔墨，谈些枯燥无味的事情：笔者虽然象某位大夫那样，努力“乘尘世间的车，非尘世间的马”，走在自己错综复杂的小道上，但他毕竟也只是一个凡人；他从某些文学作品中清楚地听到了“波罗的海之滨的艾菲”①的叹息声，并不感到良心上受到谴责，因为他没有一个可以陪同去波罗的海的艾菲，所以他干脆和克勒门蒂娜双双去——比方说——法伊茨赫希海姆，同她在那里讨论了自觉存在的问题。他不愿把她叫做“他的人”，原因是她不愿成为“他的人”；她具有一种明显的修女帽变态心理，因为这顶帽子在她头上已经戴了几乎十八年了，她不想再戴它了，人们认为是光明正大的提案，她却认为是不光明正大的。此外，她的睫毛的确比在罗马时一刹那间所感到的变长了、变软了；几十年来一向早起的她，现在享受着睡懒觉的乐趣，在床上用早餐，散步，午睡，大谈特谈（也许不妨可以称之为反省或独白）自己害怕的原由，同笔者一道越过美因河北上。她绝口不谈自己在法伊茨赫希海姆以前的生活。“假定我是个离了婚的女人或寡妇——那我也不会愿意向你谈我的婚姻情况了。”她的真实年龄是四十一岁，真名叫卡罗拉，但她不反对继续叫她克勒门蒂娜。经过进一步观察，经过几次交谈后发现，她是一个娇生惯养的人：不愁住，不愁穿，不愁无钱买书，不

① 艾菲是德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台奥多尔·冯塔纳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艾菲·布里斯特》中的女主人公。艾菲曾偕其情人漫游于波罗的海之滨。此处故云。

愁柴米油盐——因此害怕持家过日子，连下午喝一顿简单的咖啡——可能也上施韦琴根或宁芬堡去喝——也使她害怕，稍微动动钱包她就心惊肉跳。必要的经常打电话同"美因河以北"——这是她的叫法——联系，使她感到神经紧张，因为她把自己听到的有关莱尼的一切，都当成是虚构的。不是说莱尼本人，莱尼的名字她已经从教会档案中知道；她虽然无缘弄到和拜读有名的大作"«O侯爵夫人……»读后感"，但从普鲁登蒂亚修女的书面证明中早已了解这篇文章的结构和内容。一提到拉埃尔·京茨堡她就神经紧张；对于笔者提出和他一道去格尔塞伦采摘玫瑰花的要求，她象怕烫的猫儿似地将左手往怀里一缩，表示拒绝；她"不想与闻奇迹"。也许这里可以说明一下，她——不自觉地——无视相信和知道之间的区别；无疑，格尔塞伦可望成为一处温泉浴场，那里的水温为摄氏三十八度至三十九度，正合乎理想。此外，据从电话中得悉，朔尔斯多夫无疑特别忙碌（据席尔滕施泰因来电），正对上述那家报纸起诉，要求收回"声名不佳的房屋"和"操神女生涯"等字眼；唯一的困难是要说服法院相信"操神女生涯"这个好听的字眼应看作是一种侮辱。再有：洛特眼下住了莱夫的房间，顿奇和基利奇两个土耳其人也许会租下洛特的住房（假如外号为"欧亚混血儿之敌"的房东同意的话），因为莱尼和梅赫梅特决定先同居，这是暂时的说法，原因是梅赫梅特已有妻室，但回教徒根据他本国而并非侨居国的法律规定，允许娶第二个老婆，除非莱尼改信回教，这并非毫不可能，因为古兰经也给圣母玛利亚提供了一个位置。这时，买东西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因为岁数最大的葡萄牙孩子、八岁的曼努埃拉可以买小面包。黑尔岑在自己的机关里"暂时受到温和的压力"（均按席尔滕施泰因的陈述）。莱尼在此期间同"支援莱尼委

员会”见了面，“高兴和羞愧交集”得红了脸（也许是她一生第四次红脸。——笔者），她怀孕已为一位妇科大夫所证实，现在三天两头去看大夫，“上下左右”接受检查，因为她想向胎儿“提供一个美好的家园”（席尔滕施泰因引述莱尼原话）。内科、牙科、矫形、泌尿等科大夫检查结果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只有精神病科大夫提出了某些欠缺，查出自尊心受到了原因完全不明的提害和明显的环境损害，但认为一旦莱夫出狱，这些全都可以治好。到时候她应该——“这一点必须看成是医疗处方”（席尔滕施泰因引述精神病大夫原话）——尽量经常同梅赫梅特·沙欣和莱夫公开手挽着手去散步。精神病科大夫和席尔滕施泰因都不理解的就是：莱尼即使在梅赫梅特温暖的怀抱里入睡，显然也被一个靶、一块板、一个画家和一名军官的恶梦缠住了身子。这被——笔者可以证明这种说法十分愚蠢和完全不正确——解释为“寡妇的变态心理”，并——同样不正确——归咎于莱尼当年怀孕和生产莱夫时的环境。其实这种恶梦同——克勒门蒂娜也知道——墓穴、轰炸以及在轰炸时紧紧拥抱毫无关系。

笔者按照一个经过周密考虑的分段计划，先后在美因兹、科布伦茨和安德纳德等地稍作逗留，稳扎稳打，最后终于将克勒门蒂娜骗到了“美因河以北”。一面小心翼翼地安排游山玩水，一面小心翼翼地安排和人们会见；首先是拜会赫尔特霍内太太，为了一睹她的书斋、她那文明的气氛和几乎是修女般的生活环境；即使是有学问的人也要求别人不要忘记自己啊。这次会见是成功的，临别时，赫尔特霍内太太以嘶哑的嗓音轻轻说了一句“恭喜”（恭喜什么？——笔者）。其次是B. H. T.，他吃了一盘十分

可口的葱头汤、美味的意大利式色拉和煎牛排，红光满面，津津有味地仔细听了有关拉埃尔·京茨堡、格尔塞伦等等的各种详情，由于他不喜欢看报，因此他对这时定已调解妥贴的丑剧一无所知。临别时他轻声说了一句"您真运气"。访问格龙奇、朔尔斯多夫和席尔滕施泰因三人都获得圆满成功。这是因为格龙奇的"举止自然"，可能也因为古老的陵园对那个迷人的忧愁的女客决不会不起作用。朔尔斯多夫是因为现在成了一位真正吸引人的大人物了：谁能比得上他呢？自从找到了一个为莱尼效力的现实基础，他心情完全开朗了。此外他还以语言学家的身分成了克勒门蒂娜的同行，两人喝着茶，吃着杏仁点心，很快就一个俄罗斯苏维埃文化时代——克称之为形式主义，朔称之为结构主义——热烈地争论起来。相反席尔滕施泰因略显逊色，他老是埋怨某些冒牌青年作曲家的阴谋和瓦格纳[①]主义，同时也痛苦地朝克勒门蒂娜瞟了一眼，并且更加痛苦地瞟了院子一眼，叹息自己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相好过，也没有一个女人跟自己相好过。他诅咒钢琴和音乐，在色情受虐狂发作下，走到钢琴跟前，仿佛要毁灭自己似地用力弹了一曲《莉莉·玛琳》，然后表示歉意，一本正经地啜泣着请求"让他带着他的痛苦一个人清静地待一会儿"。席尔滕施泰因所说的这种痛苦，在对佩尔策作必不可少的拜会时，总算弄清楚了；佩尔策近来——在法伊茨静希海姆、施韦琴根或宁芬堡的五天左右中——惊人地消瘦了。他太太埃娃也在家，她带着显得厌倦但又不无好感的忧郁神情，端上咖啡和点心，身上系一条沾满颜料的绘画时穿的大褂，说了几句人们常说的听天由命之类的话，谈话显得有些不自然、伤感——

① 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德国作曲家、文学家。

话题是博伊于斯、阿尔特曼[1]和"意味深长的艺术荒唐"，她滔滔不绝地引述一家严肃的日报上的话——，然后说了一声"我失陪了，请原谅"，就回到她的画架前去了。佩尔策看来令人担心。他两眼盯着克勒门蒂娜，仿佛她是"捏在他手心里的一只麻雀"，正要看个仔细似的。当她由于紧急的和不言自明的原因（从三点到六点之间，她在朔尔斯多夫处喝了四杯茶，在席尔滕施泰因处喝了三杯茶，来到佩尔策府上截至此刻已喝过两杯咖啡）出去一会儿的时候，佩尔策轻轻地说："起初认为是糖尿病，可我的血糖量完全正常，其他方面也没什么问题。您可以相信我，也可以笑我，我第一次发觉自己有灵魂，这个灵魂有烦恼。我第一次体会到，不是随便哪个女人而是只有一个女人能治好我的病。我恨不得掐死这个土耳其人——她到底看上了这个乡下佬什么呢，一身羊膻气和大蒜臭味，外加还比她小十岁，有了一个老婆和四个孩子，现在又给她搞了一个。我——您帮帮我的忙吧。"笔者对佩尔策颇感同情，提出顾虑说，在这种难题上由第三者出面斡旋，根据经验是不会成功的，甚至会适得其反。这种事情，只能由当事人自己单独解决。"我，"佩尔策说，"每天给圣母烧上十二支蜡烛，我——在男人之间说句知心话——到其他女人中间去寻找安慰，没有找到，我喝酒、赌钱，但我只能说是输得精光了。请便吧。"如果这里说，佩尔策使人感动，那么并没有丝毫讽刺的意思，何况他自己恰到好处地对他的处境作了说明："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谁，从来没有。我同卖笑的娘们胡搞过，不错，我嫖过女人。我老婆，嗯，我过去很喜欢她，现在也喜欢她，只要我

[1] 阿尔特曼（Hans Carl Artmann, 1924— ），奥地利现代作家、语言学家。

一天不死，就不能叫她难过——但是我没有爱过她。而莱尼呢，打从我第一次看见她起，我就想她，可老是有什么外国人从中作梗，我没有爱过她，直到一星期前又见到她时，我才爱上了她。我……她父亲的死实在与我无关，我——我爱她——我对任何一个女人都还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时克勒门蒂娜回来了，不显眼但一望而知地催着告辞开路。她的议论比较不讲礼貌，至少是冷淡的和相当客观的：“你高兴怎么叫就怎么叫吧——佩尔策病或席尔滕施泰因病。”

去托尔策姆—吕塞来希旅行可以一举两得：一直称自己是坚定的山区人和巴伐利亚人的克勒门蒂娜，只是勉强承认，在美因河以北也有讨人喜欢的人，这一次让她领略到了平原地区的美和迷人之处，也许使她感到有点过于美不胜收了。她承认从来不曾见过这样一马平川的辽阔平原，使她联想到俄国，“倘使我不知道这里广袤只有三四百公里，而俄国有几千公里的话，不由你不承认，它使人想到俄国。”她不同意被限制在“围墙之内”的说法，因为她认为对围墙、樊篱、界标等作长时间的沉思，显得太“文学气味”；提到这些词的克勒特族起源，她又认为“太种族主义”，都不同意。不过最后还是承认——虽然又很勉强——“俄国有一种水平向的吸引力，我们这里有一种垂直向的吸引力。在这里你总感到仿佛是在水中游泳，即使乘汽车、也许乘火车也有这种感觉，而且你会害怕永远游不到岸，要不，这里真是有岸吗？”指出清晰可见的山峦和艾费尔山麓的丘陵地带，她只是不屑一顾地报之一笑。

相反，访问玛尔雅·范·多恩却是百分之百的成功。奶油

李子蛋糕(评论："你们这里一有机会就吃掼奶油。")，玛·范·多恩"理所当然"现炒现磨的咖啡，令人馋涎欲滴，"太好了，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咖啡，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咖啡"等等，等等。还说："你们大概是会享乐的人。" 告别时，玛·范·多恩也有评论："稍许晚了一点，但不算太晚，上帝降福于您，" 接着轻声说："她会教会您的。"(红着脸更正，同样轻声说：)"我是说，稍微规矩一点。" 然后眼泪汪汪："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永远是老太婆了。"

博加科夫在公寓里据报"已迁走"，意想不到地"新址不明"。他只留下一个条子："不必叫人找我，暂时谢绝，我将自己来报到"，可是四天过去了还不见人来。贝伦科以为博加科夫又去"逛窑子"了，基特金相反认为，也许是外出干"红色间谍"活动去了。和蔼可亲的护士坦率承认，由于看不见博加科夫而若有所失，并平静地说，这种情况几乎每年春天都要发生。"一到春天他就要跑开，只是越来越叫人担心，因为他需要打针。但愿他得到温暖。"

虽然克勒门蒂娜从多方面的反映中——这些反映有的很激烈，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B. H. T. 就加此，不过他能证实确有莱尼其人)——已经知道了莱尼的情况，但还是坚持要"实实在在地，摸得着、闻得到、看得见地"一睹莱尼。笔者带着不无提心吊胆的心情，通过汉斯·黑尔岑安排早就该进行的同莱尼的直接会见。由于莱尼"神经十分紧张"，商定参加这次会

见的只有洛特、梅赫梅特和"一个会叫您感到惊奇的人"。

"她在，"汉斯·黑尔岑说，"同梅赫梅特作了最初几次散步后神经非常紧张，会见时在场的人超过五个她就受不了。因此连我和我老婆都不会参加。使她特别烦躁不安的，是佩尔策和席尔滕施泰因的一往情深，和由此而表现出来的一副情急难熬的样子，甚至连朔尔斯多夫也有所表示。"

由于克勒门蒂娜用酸溜溜的口气解释笔者的紧张，笔者不得不向她说明，他对莱尼的种种情况全都了解，对她——克——几乎一点也不了解；他甚至在长期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掌握了莱尼内心深处的秘密，因此不免有叛徒或知情人的感觉，而她——克——同他亲近，莱尼尽管也讨人喜欢，但同他疏远。

坦白承认，笔者高兴的是幸亏有克勒门蒂娜陪同，幸亏克兼有语言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好奇心，因为如果没有她——归根到底，他是多亏莱尼和肠卜僧才和她相识的——，他肯定会传染上无法医治的席尔滕施泰因病或佩尔策病。

幸而他那紧张地全神灌注和迫不及待的劲儿被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吸引开了：是谁坐在沙发上，偎在脸蛋红得可爱的洛特·霍伊泽身边，公然抓着她的小手，尴尬得不是微笑而是龇牙咧嘴呢？原来就是博加科夫！有一点是肯定的：被他摆脱的公寓里和蔼可亲的女护士用不着担心，他有的是温暖！而且谁要是曾怀疑过洛特能够给人以温暖，在这里不能不改变看法了。在座的也有那个土耳其人，出乎意料和几乎使人失望的是，他不象东方人：土里土气、生硬、不显得尴尬，身穿一套蓝色西服，上过浆的衬衫，领带（褐色）系得端端正正。他坐在那里，握着莱尼的小手，摆出一副姿势，就象一八八九年坐在一台刚刚装好底片的大照相机前，被提醒不要动，等着肖像照摄影师捏一下橡皮球曝光

似的。至于莱尼呢，在笔者双眼的紧紧盯住下，显得惶惶不安；笔者在孜孜不倦的走访调查中，只是在街头匆匆见过她两次，看到的是侧面，是她那骄傲的步履，一直无缘正面欣赏。现在可没法回避了，必须正视现实了，这里可以简单地、毫不夸大地说一句：果然名不虚传！亏得有克在场，否则真会对梅赫梅特吃起醋来的。不过无论如何总还有一点酸溜溜的味道，对她躺在梅赫梅特而不是笔者的怀里做着耙、板、画家和军官之梦，多少感到有点遗憾的轻微痛苦。她剪了头发，将头发染成了银灰色，看上去真象三十八岁。两只黑眼珠水汪汪的，不无忧郁；虽然她的身高证实是一米七一，看上去却显得有一米八五，尽管那长长的腿表明坐着显不出她的美。她落落大方地给大家斟咖啡，洛特将蛋糕摆在碟子里，梅赫梅特则分不可缺少的掼奶油，一边问每个人要多少："一勺？两勺？三勺？"果然不假，莱尼不仅沉默寡言和守口如瓶，她的确是个没有多话讲的人，而且脸上始终带着一种羞怯的"苦笑"。她望着克，露出满意和好感的神色——这使笔者感到骄傲和高兴——，听克询问肠卜僧的情况，指给克看挂在沙发后面墙上的画，这幅画确实吸引人，一点五米见方，不是七彩，但是着了色的，而且——尽管没有画完——看上去仿佛放射出万道霞光，又清新悦目，难以名状。这幅尚未完成的毕生作品不是很多层，而是数得清的八层，六百万锥体细胞她大概已经画了三万，一亿杆细胞大概已经画了八万。她没有取横剖面，而是取水平角度，宛似一个无边无际的平原，人们越过这个平原向一个尚待形成的地平线前进。莱尼说："这就是她，也许是她的视网膜的千分之一，一旦画完的话。"她变得几乎健谈了，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的恩师、挚友。"在这次历时五十三分钟左右的访问中，她没有谈更多的话。相形之下，梅赫梅特显得没有什么幽默感，

即使分摄奶油时，他空着的一只手也拉着莱尼的手不放。莱尼斟咖啡时，他硬叫她一个手斟，自己紧紧拉着她的另一只手。这样手拉着手颇有传染性，以致克也终于拉着笔者的手，仿佛在久久地给他切脉。毫无疑问：克是感动了。她那学究式的高傲气已经无影无踪了，很明显，她过去听人家讲到莱尼，但不相信确有其人——只是教会档案中的人物。现在证实了有莱尼，而且就坐在自己对面，这使她激动了。她深深叹息，并使笔者受到感染，脉搏也象她一样越跳越快。

不耐烦的读者是否注意到：这里出现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吗？手拉着手，成双成对，旧情——象洛特和博加科夫这一对——重叙，而其他人如佩尔策、席尔滕施泰因和朔尔斯多夫则又饥又渴，一筹莫展吗？一个象勒恩或中艾费尔山区农民的土耳其人，会把新娘子领回家吗？这个家显已经有了一个老婆和四个儿女的人，根据一夫多妻制的权利——他知道这种权利，不过至今一直未能行使——这样做，不仅丝毫没有良心上的不安，甚至可能将情况坦然如实地通知了某个名叫祖莱卡[①]的女人吗？这个男人同博加科夫和笔者相比，不是恰恰显得干净，恰恰显得整洁——衣服烫得笔挺，领带端端正正——，十分欢喜上浆的衬衫，因为他认为在这种大喜的日子里应当穿一件上浆的衬衫？他始终还坐在那里，仿佛那位戴着艺术家帽子和系艺术家领带的虚构的摄影师、一八八九年左右一个安卡拉或伊斯坦布尔的未成名的画家，手指还一直捏着橡皮球吗？这个运送垃圾的垃圾

---

① 祖莱卡，为土耳其妇女的名字，此处喻梅赫梅特国内的妻子。

工，同一个女人结成一对，这个女人先后死过三个男人，读过卡夫卡的作品，非常熟悉荷尔德林的作品，是歌唱家、钢琴家、画家、男人们逐鹿的对象，有了儿子现在又身怀有孕，并使一个毕生致力于研究文学作品中的现实问题的前修女的脉搏越跳越快吗？

即使是伶牙俐齿的洛特也闷声不响，似乎她也感动、激动、震动了。她结结巴巴地谈起莱夫即将出狱，随之而来的住房问题，因为她的房东拒绝接受"土耳其垃圾工"，而黑尔岑夫妇则由于格蕾特·黑尔岑晚上需要一间房间搞美容师手艺，挣点"外快"，不能腾出一个房间，也不能让"五个葡萄牙朋友挤在一间房间里"，不过她打算和不得不带着她大大方方称之为"我的普约特尔"的博加科夫待在莱尼身边，以便同她的两个儿子和公公"对着干"。"这只是展期，而不是终局。"她愿意同博加科夫去办理结婚手续，他也愿意和她去登记，但他无法证明自己是老光棍或已经离婚的人。

莱尼最后毕竟还是开了腔，嘟囔了几声"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可怜的玛格丽特"，始则眼睛湿润，继而热泪盈眶。直到最后梅赫梅特莫名其妙地扭了一下身子，比他原来的姿势坐得更加笔挺，一清二楚地表示他认为会见应该结束了。

告别——克对莱尼说："但愿不是永别"，她听了亲切地微微一笑——也进行过了，象通常一样又拖延了一会儿，对照片、钢琴、房间整个陈设客气地称赞了一番，对挂在墙头上的那幅画热情地夸奖了一番，还在过道里站了一会，这时莱尼嘟囔着说："我们正应该继续努力乘尘世间的车、非尘世间的马前进。"这种哑谜，是学识显然有缺陷的克勒门蒂娜根本听不懂的。

来到外面相当平淡无奇的比策拉特街上，克终于又采取了

她那不可避免的、无可救药的咬文嚼字的姿态，说："不错，说有她，又没有她。说没有她，又有她。"笔者感到，这是一种远远低于克的水平的怀疑的姿态。

不过，她还补充了一句："总有一天，她会安慰所有这些被她引起痛苦的男人的，她会给他们一个个治好病的。"

过一会儿她又补充道："我怀疑，梅赫梅特对西方交际舞的看法是否同莱尼一致。"

第十一章

笔者感到如释重负，因为在本书的最后，他几乎只需要再援引一下三份书面文件就够了：一份心理鉴定书、一位老年护士的信和一位警官的记录。至于他是如何获得这些文件的，那是他的职业机密，不便透露。老实说，获得这些材料并不都是通过完全合法的途径，也并不是完全合乎保密规定的，但轻微的违法和泄密行为在这里都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实事求是。比如说——谈到那份其实并不包含任何歧视内容的心理鉴定书——霍伊泽的一位女雇员（不是那位能干女士！）把几页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材料通过干式复印机很快复制出来，那又算得了什么呢？霍伊泽祖孙三人（这里请想一想曾使笔者付出一颗钮扣代价的那五百万）为此而损失了大约二个半马克，有关的业务开支当然没有计算在内。价值四个半马克的一盒夹心巧克力难道还不能抵销？护士的信是通过不知疲劳的玛·范·多恩搞到的，是原件，但很长，笔者亲自在一家百货公司里花每页半马克的代价进行影印复制，包括送给玛·范·多恩的香烟在内，总共花了约八马克。警官的记录是笔者免费得到的。由于这份记录既不涉及警方，也不涉及政治警察的机密，仅仅是一种尽管并非自愿、却是成功的社会调查，虽然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际上也产生过一些顾虑，但这些顾虑立即就被几杯啤酒冲洗得一干二净了，而且连这几杯啤酒的钱，那位年轻的警官都坚持要自己付。这种愿

望是可以理解的，它受到了笔者的尊重。为了不愿挫伤这种愿望，他甚至没有为警官太太买上一束鲜花，或者为他一岁半的小儿子（"真逗人爱"，这是他看到照片后出自真心的评价，并非不得已而说的奉承话）带去一个漂亮的玩具。（太太的照片没有拿给他看！否则倒也会使他感到为难：当着一个男人的面，怎么好意思说这男人的太太"真逗人爱"呢？）

先说那份企业心理鉴定书吧。鉴定人的学历、背景、年龄等，都没有透露。仅仅听那位年轻女士说，鉴定人受到德国工会联合会的干部和劳工法官的一致敬重。

"鉴定人（以下简称 G.）在一次与本人初次见面的谈话中认识莱夫·博里索维奇·格鲁伊滕（以下简称 L. B. G.），那次谈话是根据城市环境卫生公司人事处长的倡议于 L. B. G. 被捕前四个月举行的。第一次谈话的内容为：L. B. G. 可能被提拔到公司内部行政部门上来，每天分别以半天时间担任为数众多的外籍工人的代表和计时员。当时是由 G. 推荐 L. B. G. 担任这两个职务的，但 L. B. G. 拒绝接受。当时对于 L. B. G. 的心理发展过程还只能作初步的简略的了解，后来，承蒙监狱当局又提供了每次为一小时的四次谈话机会，对他的研究就深入得多了，虽然对于这样一个内心世界十分复杂的人，按科学的尺度作出恰当的鉴定，这种研究仍然是不够详尽的。对于 L. B. G.，肯定值得写一篇详尽而深入的学术论文。G. 如今已在某高等专科学校讲授心理学，也正在考虑把 L. B. G. 作为学士论文题目推荐给他的一名学生。

"在这里给 L. B. G. 作一个心理图案试验，尽管也能反映出近于正确的概貌，但就其科学的实用性来说，毕竟还是有限制的。这种心理图案只有可能帮助该单位内部掌值情况，以便于今

后进一步和L. B. G.打交道，并且如上所述，只是对L. B. G.‘犯罪’行为动机进行解释的一种有限的试验而已。

“L. B. G.是在双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家庭之外的环境对他极其不利；家庭环境对他极其有利。如果后一情况所说的‘有利’也需要用‘宠爱’一词加以限制的话，那么——看一看这位现年二十五岁的人——这种‘宠爱’恰恰就是L. B. G.应被视为我们社会中一个完全有益的、甚至受人喜爱的一员的原因，尽管在他身上存在着相当大的社会破坏力。

“以下事实对于L. B. G.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因素：由于他是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下长大成人的私生子，不具备对于心理发展十分重要的孤儿甚或战争孤儿的基础。对于私生子来说，父亲死去并不能证明其为孤儿。此外，在街上和学校里，人家管他叫‘俄国小子’，他母亲也常常被骂为‘俄国佬的姘头’，他并非被强奸而是自愿献身所生，因此，这件事经常被人家——尽管不是十分明显地、却是无意识地——指责为极其肮脏和下贱。他是在有可能使他的父母亲受到严刑——如果不是死刑的话——的情况下出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还是一个‘罪犯的儿子’。任何其他孩子，甚至私生子，都可以以‘阵亡将士子女’的身分在心理上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高于L. B. G.。对于他，用句俗话来说，更为糟糕的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那个人们称之为教会学校的讨厌的机构(G.也在许多出版物上公开这样说！)的牺牲品。尽管他受过洗礼，甚至是按天主教的仪式，而且这次洗礼也为一个后来曾经一度当过他师傅的名叫佩尔策的人以及其他一些人所证实，然而，教会当局仍然坚持认为那是‘临时洗礼’，因而需要补行一次正式洗礼。在这个问题上所进行的煞费苦心、谨小慎微、拘泥于细枝末节的调查结果，给L. B. G.增添了一个令人

毛骨悚然的别名。除此而外，他还是一个‘公墓孩子’，一个‘墓穴孩子’，他是在‘死尸堆里投胎出世’的。总而言之：他母亲拒绝为他再次举行洗礼，因为L. B. G. 的父亲参加了原先那次洗礼，她是非常珍惜对此所作的回忆的；她不愿让自己对那次洗礼的回忆因‘另一个什么人’而冲淡，而另一方面，她又不想把儿子送到当时约十五公里以外去念‘私立学校’，更不愿意把他送到‘新教徒’那里去念书（人们毫不清楚他们是否也坚持要求补行洗礼），这样，L. B. G. 又具有最后一个污点：他究竟是不是‘基督教徒’，是‘天主教徒’呢，或者不是？

“鉴于上述背景，‘宠爱’一词也就具备了一种几乎自身抵消自身的相对性。L. B. G. 也有够多的‘阿姨’：玛格丽特阿姨、洛特阿姨、莉安内阿姨、玛尔雅阿姨，主要的是有自己的母亲，‘宠爱’他的全是女性；此外，他还有‘大叔’和‘表兄弟’，有代替父兄的人，有奥托大叔和普约特尔大叔，有维尔纳表兄和库特表兄，在他记忆中还有曾同他‘在来因河畔坐过多年’的外祖父。从事后来看，他母亲总是尽量地，尽管有时也是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而不让他去上学，这可以认为是完全正常的本能反应。尽管L. B. G. 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力，自愿脱离‘宠爱的环境’，跑到街上去玩耍，既不怕挨打，也不怕打人，但他在学校里是否忍受了日常的压力，还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作为假定——L. B. G. 长得稍微有点畸形或病态的话，他不可能经受周围环境这种巨大的、多方面的压力，活到十四岁；其结果将会是自杀、无法医治的意志消沉或挑衅性的刑事犯罪活动。L. B. G. 确实克服和排除了许多压力。但使他不能忍受和耿耿于怀的，是一直待他很好的奥托‘大叔’终于剥夺了他跟两位‘表兄’维尔纳和库特的来往，他们比他分别大五岁和十岁，是用不着他主观想象的、可以

信赖的庇护人。他和表兄之间从此而产生的社会鸿沟，那种报复和对抗的心理，显然也是导致他不高明地伪造两张期票的‘犯罪行为’的起因，不高明地伪造期票，究竟是否是对他大叔和表兄的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挑衅，经过总共五次的采访，G.仍然没有搞清楚。由于这种伪造行为一再(总共四次)重复，前三次被蒙混过去，只有第四次才被告发，而四次伪造的毛病都相同(问题出在用大写填写的款项栏内)，因此可以推测这是一种有意的挑衅，必须将它与格鲁伊滕和霍伊泽两家经济状况在战争期间发生的改变联系起来看。

“那么，L.B.G.在青少年时代是怎样弥补他的精神创伤的呢？想必他凭直觉已经明白：以‘宠爱’两字概而言之的这种家庭之内的弥补对于他是不够的，L. B. G.还必须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尤其是在两位‘表兄’搬走以后，他不能依赖母亲和众多的阿姨了；鉴于他母亲无依无靠和所受的创伤，他一定早已明白：他终究非成为‘一家之主’不可。

“这里必须开始采用‘抗拒成效’(以下简称‘抗效’)这一概念。首先是在学校里抗效：他一度有被降到补习学校或特种学校去的可能。他的表现与他所具有的无可置疑的才能和智力完全相反，这正是社会按其自发的趋势对一个集社会败类种种特征于一身的少年所期待的。作为一个学生，他的表现比理应具有的表现坏多了，他在某种程度上装成是低能儿。只是由于重读而有进补习学校的危险时，他才不让自己留级，而他之所以不让自己降到补习学校去，也仅仅是因为母亲害怕上学的路程太远。他向G.承认：他本来是‘很乐意上补习学校’去的，但在那时候，补习学校在离城很远的郊区，当时他母亲有工作，L. B. G.早已承担家务，因此，如果上补习学校，离家太远，就会大大影响

‘家里的事’。

“与在学校里所表现的抗效同时出现的，是于他的学业毫无‘裨益’的故意显示的‘提高成效’（以下简称‘提效’）。他十三岁时，母亲和外祖父的一位熟人十分热情友好地每周给他上三次课，因此他能够流利地阅读和书写俄文。请注意，这是他父亲的语言！在他的德语语法一直还停留在必须上补习学校的那种水平的同时，他竟能引用从普希金一直到勃洛克[①]的俄国抒情诗，这使他的老师们——可以这样说——诧异，但鉴于那个时候初级学校一般教学人员的基本心理状况，又不得不遗憾地说——使他的老师们气愤。而且，岂止气愤，简直还令人感到是挑衅，因为他——十三岁上五年级！——还在老师面前逞能，大谈——何况并没有问到他！——卡夫卡、特拉克尔、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布莱希特，甚至还有一个至今未弄清其名姓、用英语写作、可能出生于爱尔兰的诗人的诗歌。

“以上事例已经足够了。G. 得出结论：L. B. G. 与社会极端对立，其表现形式是：在效率可以‘带来’某些好处的地方，即在学校里，表现为抗效，而在效率不能‘带来’任何好处的地方，即在校外，却表现出提效。

“这种极端的对立，对于L. B. G. 的生活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他年龄越来越大，出于正常的反应，他要摆脱‘宠爱’的环境，因此这种极端的对立对于他是一种张力，从中可得到阻力和生存能力。十四岁以前，他的生活经历的模式一直无显著变化。就在这一年，即在毕业前不久，L. B. G. 首次‘犯罪’，可惜G. 只能谈谈这次‘犯罪’的经过，无法进行详细的分析，因为他没有

---

① 勃洛克（1880—1921），苏联诗人，早期作品充满悲观情调。

从内部和外部接触过所引用的履历材料，而详细的分析则是要以宗教心理学的和历史的广泛研究为前提的。因此在这里就只能摘录一些经历材料：L. B. G.是难得、而且多半是在对他本人和圣职人员都不愉快的情况下去上宗教课的，他——拿他自己的话来说——'被禁止参加圣礼忏悔和圣餐仪式，当时倒并不完全是因为我的受洗不正规，而是因为人家觉得我不听话、骄傲、自负，反正认为我不够听话，而我又对宗教文学有过一些接触，尽管当然是外行，但也是用心的，而且确实出于好学。这一点触犯了老师们，我指的是担任圣职的宗教课老师'，因为'分食圣饼'取决于你'是否服从'。然而，L.B.G.——他自己承认——此时已经出于原则性的和莫名其妙的考虑，坚持要分享圣餐，终于通过'盗取圣物的行动，通过偷盗，准确地说，通过亵渎圣坛'弄到了圣饼，塞进嘴巴里。这样，事情就闹大了。如果不是一位开明的、懂得心理学的圣职人员为他讲情，L. B. G.当时就会被作为少年犯抓起来了。'从那时起，'L. B. G.这样对G.说，'我只是同母亲一起在吃早饭时举行圣餐了。'

"另一种提效到十四岁前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比以前更爱整洁了，酷爱扫除，这是一种近乎自我强制性的意识，它无疑同正在萌发的青春期有关。他不仅打扫自己家门口的街道、院子和住宅，甚至在散步时他也顺手做做清理工作，拾起路上的树叶；从八岁到十三岁，他最喜欢的玩具是各种各样的扫帚，尽管在大多做是女人的圈子里人们把他玩这些东西说成是'女人气'或'女孩子气'。对于这种现象，还可以从心理学上补充解释一点：而对一直唾骂他、玷污他的周围世界，他有意显示和实行——又是作为对抗手段——自己的清洁。

"L. B. G. 从六年级毕业以后，得到一张评语不太佳的成绩

单，无法找到正常的学徒位置。他在一个名叫佩尔策的人所经营的花场里当辅助工——又主要是跟扫帚打交道！然后在一个名叫格龙奇的人那里干同样的活，后来被陵园管理所录用，其后从陵园管理所调到市清洁队去当垃圾工，依靠清洁队的钱弄到了一张汽车驾驶执照。他在那里工作了六年，如果撇开不谈他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延长周末和假期，也不谈这种明显不过的抗效引起人们理所当然的恼怒，那么，当时的雇主对他还是十分满意的。在这六年中，L. B. G.的提效全是为了母亲，他劝她放弃工作，尽管她年纪还不太大，还有工作能力。他给她领来了一些外籍工人及其家属，做她的三房客。其中一个工人后来成了她的情夫，这在极其眷恋母亲的L. B. G.的心灵中，令人困惑不解地并未引起多大矛盾。甚至当他听说母亲和这个东方籍外国人在一起确实身怀有孕时，他还坦然地——G.想着重指出——令人困惑不解地坦然地说了一句：'谢天谢地，我还能添个小弟弟或小妹妹呢！'不过，在他这句话中，还是清楚地听得出某种不自然的感情，尽管只有善于听话听音的人才能听得出来。

"如果把这种不自然仅仅归根于他的恋母之情，那就错了。对于周围人们将再一次冷嘲热讽怀有某种可以理解的惧怕心理，必然也是一个原因。L. B. G.认为即将出世的孩子肯定也会遭受这种压力，他无疑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设想未来的弟妹所面临的外界压力。

"在这里，猜疑他怀有嫉妒心，不用说，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它毕竟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向L. B. G.的同龄人和同事所作的调查表明，他不仅讨妇女们和姑娘们的喜欢，而且他也不回避由此而产生的后果。

"这里必须提到一种情况：垃圾工有时也满足为处理日常垃

圾大伤脑筋的居民们的额外要求，这就有可能产生一些不曾预料到的接触。对这种‘越轨’行为——通常以拿小费为报酬满足居民的特殊要求，运除额外的垃圾——，公司由于考虑到待运垃圾吨位的紧张状况而不加追究。

“尽管如上所述反映了L. B. G. 的形象比较平和，但从他身上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到某种社会破坏力，这种破坏力固然可以用迫不得已的一分为二的方法加以解释，但它终究是一种社会破坏力。

“即使不懂心理学的人，也能在L. B. G. 身上明显地看到：一、社会连带情结，它可以从不断被迫与其父亲和母亲保持的同一性中得到解释，但成年后，这种情结却表现为对外国人的休戚相关情绪，现在坐了三个月牢，又表现为对囚友的休戚相关情绪。假定囚犯也属于‘同社会不相容的人’，那么，就会从社会连带情结中产生出一种与此类似的二、亲外性，它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三、亲外国语言学，想学习外国人的语言。(L. B. G. 参加一个土耳其语学习班已有数月。)象L. B. G.这样的人(在这里，G.与其说是不愿意，倒不如说是更倾向于说‘人物’，虽然也有某些顾虑)，他的高度敏感性和智力，要么适应环境，从而‘背叛’自己及其同一性的固定点，要么始终不适应环境而确认自己及其同一性的固定点，别无其他选择，因此他始终处于社会成效和才华之间的矛盾之中。这样，这个人(人物?)总是需要新的、后来则是人为的抗力，以便向自己与周围环境表明这一点。如果给这个词抽去通常理应具备的前提，即他可以从中获得好处(延长住院时间，捞取年金或不拿工资的休假，等等)，那么，L. B. G.就是个四、弄虚作假者，他——说得夸张一点——弄虚作假，不是为了获得好处，而是为了吃亏，为了以此满足自己的社会连带情结

和亲外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伪造期票也可以理解为'弄虚作假'，而不是'真正的犯罪'。如果说，某些弄虚作假行为终究也给他带来好处(如外籍工人对他表示近乎尊敬的信任)，那么，这也是这样一种生存实验的辩证法：它'宣告'一种社会模式——或者按马克思主义同志们的说法——社会原则的诞生。

"这里还必须阐明 L. B. G. 为什么会有抗效现象。后来，他升任车队长('我不想再高升了！')，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他只要熟悉了分配给他的地段的垃圾清运和道路交通情况，就能出色地安排垃圾的装卸工作，有时能使他的车队从容不迫地比原计划提前两三个小时完成定额。后来人们曾几度发现他和他的车队的休息时间很长，但丝毫也没有降低工效。要他把组织经验提供给计划处，他却拒绝了，又按老一套规章和经验行事，因为居民们对他们——何况又是一些外籍工人——休息时间太长表示不满，甚至还反映到报纸上。这件事导致 G.和 L. B. G.之间的第一次见面，因为当时人们正考虑上书劳工法庭予以制裁，但由于G.的劝阻才没有这样做。(在这里，G.要提一下管理处职员 H. M. 一案；在该案中他同样充当 G.，并首次使用了'抗效'这一术语，现在这一术语已进入劳工法的文献之中。H. M.在两个半小时内完成了分配给他的八小时工作量，但后来，当他——这一点与 L. B. G. 的情况正好相反——作出一个样板向他的同事们推广时，却由于同事们的有意刁难而遭到失败，致使他精神受到严重刺激而得病；恢复工作能力以后，他转到另一个单位工作，被迫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地消磨六个半小时，他抱怨'每天白白浪费掉六个半小时的时间'，这些时间他本来是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当这种抱怨遭到批驳以后，他就病得更重了。由于这一事件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一家产业公司雇佣了

他，他——这时病已完全痊愈——为该企业的提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G.也参与其事的H.M.一案中，对抗效进行的指摘，只限于拒绝无所事事地泡完所规定的工作时间。抗效是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它还将给讲求效率的社会造成严重的问题。)

"L.B.G.一案中的抗效表现在：他虽然达到了应有的工效，但没有把他的才智、他的组织才能——甚至在工资高得多的情况下也没有——完全贡献给他的雇主。虽然效率社会可以通过电子计算机算出最低值、最高值或平均值，但要掌握象清运垃圾这样一种专门行业所具有的极其复杂的特点——如交通堵塞及交通事故、堵塞及事故的发生率，在不同的地段是不一样的——只有依靠象L.B.G.这样一个有经验的、具有抽象概括能力的工作人员提供情况才能做到。此外，如果人们考虑到，只要掌握了这些特点，就不仅能使一个地段的，而且也会使整个地区和全国广大地区的垃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合理解决，那么，L.B.G.给整个经济造成的损失，确实是无法估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就是严重的抗效。

"由于G.也很想了解掌握L.B.G.的整个身体情况，就请狱医测量了他的身高和体重，检查了各部位器官的功能。结果是：全部正常。L.B.G.的酒精和尼古丁消耗量也是正常的，反正不存在麻醉剂中毒问题。除了右眼视力为0.5之外，检查不出L.B.G.有任何病症。但由于一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社会破坏力和查有实据的错误行为，另一方面，几乎所有这些破坏因素也定会在内分泌系统中存在，因此G.认为，这种正常现象，正可以用使他得以保持平衡的那种经常性的剧烈对抗情绪加以解释。一旦失去这种复杂的、持续不断地在内心高度紧张状态下维持着的平衡，L.B.G.就会在短时间内得严重的糖尿病、严重的肝炎，

可能还会得肾痉挛症。因此建议不要提前释放他出狱，因为在狱中他能维持这种对抗情绪，也能满足他的社会连带情结和亲外性。甚至有可能——反正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坐牢这种非常情况正是他所寻求的，以便保持可能正在松弛下来的社会紧张。由于——据G.所知——在此期间发生了周围的人们大力支持L. B. G.母亲的行动，必须认为这种对抗的可能性已遭到削弱，因此目前只有让L. B. G.服满刑期才能有所裨益，而且这样也能使他的同事们已经在进行的英雄化的诉讼不致半途而废。

"G.不敢采用洪克斯教授提出的一个新理论，不敢将它用于L. B. G.身上。那是一个至今仍有争议的概念，叫做'伪装正常'，洪克斯教授认为这是他对人进行试验后得出的结论，即基于一种'歇斯底里地保持着的平衡'（洪克斯语）在强烈的异性恋爱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潜在的强烈的同性恋爱的禀性。在对旧的审讯报告进行新的、精确的科学分析中，洪克斯认为巫婆的'美貌'，她们的'身体魅力和吸引力'，她们那与其无疑是先于她们时代的内分泌知识联系在一起的'恋爱术'，这一切都起因于这种'歇斯底里地保持着的平衡'，在它的背后隐藏着她们的'真正本性'。

"G.无法得出L. B. G.也属于'伪装正常'的看法，倒是觉得他是正常禀性下的抗拒正常。清运垃圾的工作是他的职业志愿和目标，这一事实证明他是本能地寻找一种适合于他的对抗手段：一种有益于清洁但又被视为肮脏的职业。"

第十二章

年约五十五岁的护理员B. E. 给莱尼的信。

尊敬的普法伊费尔太太:

您给克恩利希教授大夫先生的信偶然落到我的手里，当时我受托给他收拾书桌，整理他通常用来对我口授写几份鉴定书所需要的笔记资料。我现在给您回信，就已经失信于人了，如果您对克恩利希教授、我的同事们以及在此工作并担任监视职责的修女不严加保密，我将会大吃苦头的。我恳切地请您注意这一点，这是我预先提出的一个条件。我这次泄密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泄露了在皮肤病医院工作十二年之后已成为我的第二天性的职业秘密。我之所以给您回信，不光是由于您那痛苦的来信，不光是因为我在参加施勒默尔太太葬礼时看到了您那深切的悲痛；不，我给您写这封信，是在履行饱受严禁来客探望之苦的死者的一种委托或遗言——在她去世前的最后十四天中禁止来访者探望她，而她的病情也确有必要禁止探望，这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您一定还记得起我，在还允许探望的期间，我曾经有机会两次，也许三次带您去看望死者。可是由于一年多来我几乎全都在教授先生的办公室工作，帮他整理写鉴定意见和病情报告等等所用的材料，您可能已经想不起我这个护理员了。不过也许您还记得那个不合适地号啕大哭的秃顶老先生，他个子微

胖，身穿一件深褐色雨衣，在安葬施勒默尔太太时站立一旁，您也许猜想他是您不认识的她的情夫之一吧。其实不是的；如果我再既不完全相信又非出自内心地说一句“可惜不是”，那么我请您别把这看成是对您亲爱无比的死者的侮辱或献媚。事实上我始终未能找到一个终身伴侣，有几次我真心诚意订了婚约——我愿对您坦率直言——，可是这些婚约不仅由于所选择的对象人格卑劣，而且也由于我的职业（这种职业使我必须经常接触性病患者）以及我多次自愿值夜班而终归告吹。

教授先生不会答复您的来信，因为您并非死者的亲属，即使您是她的亲属，他也没有义务象您所要求的那样把施勒默尔太太死亡的“详细情况”告诉您。医生的保密义务禁止这样做，护士的保密义务也禁止这样做，而我不愿违背这一义务。将您的故友临终前一个星期的某些情况告诉您，我已经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泄了密，即使不是全部泄密。正因为如此，我恳切地请求您一定不要利用我这封信。当然，官方发出的死亡证上注明的死因是确实的，即心力衰竭，循环系统完全失灵。但是，为什么施勒默尔太太在其急性病正在好转的情况下最后会出现此种结果呢？这是我想对您说明的。首先：使您的女友严重感染因而不得不来我院住院的人，经查明是一个外国政治家。您也许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您的女友两年前就已放弃了无疑是长期过惯的轻佻生活，她在继承了父母的家产之后迁居农村，想在农村安安静静带着悲伤的心情体面地度过余生。按照她的本性，这一点您肯定比我更了解，她绝对不是一个妓女，甚至也不是一个朝秦暮楚、水性杨花的女人，而是一个经常为某些男人所纠缠的对象。只要感到可以给别人以快活，她就几乎连一个“不”字也说不出口。我认为这样说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施勒默尔太太在临

死前的那天夜里几乎把她的一生经历全都讲给我听了，把她"堕落"的种种情况都谈了出来，尽管我无意——在大学皮肤病医院工作了十二年并经历了下面还要讲到的那些事情之后尤其无意——将妓女这行职业加以理想化甚至浪漫主义化，但我知道，这些女人大多数都是在悲惨、患病、肮脏和嘴里骂着最不堪入耳的亵渎神明的粗话中死去的，她们大多数已变得面目全非，以至于没有一家目前时行的色情刊物会在封面上刊登她们的照片。这是您所能想象的最悲惨的死：孤独、憔悴、愁闷、贫困——由于这一原因，这些女人的葬礼我多半都去参加，因为给她们送葬的往往只有一个女看护和一位办理例行公事的牧师。

我该怎样不再拐弯抹角来谈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呢？即使在我的想象中，您是一位新时代的、思想开明的妇女，已经结过婚，对还要提到的某些具体情况并非一无所知，这个问题也是很不好谈的。我也当过药剂师，尽管没有当上医生；由于战争环境造成的种种原因——不单是由于这些原因，老实说也由于害怕医科大学的前期考试——，我一直限于做护理工作。这样，我在德国和俄国的军医院里积累了许多知识和经验，以致一九五〇年我三十五岁那年从俄国战俘营获释之后，竟不加考虑地冒充医生挂牌开业，倒也干得不错。不料到了一九五五年，说我是高级骗子等等，将我判刑关了几年，后来亏得克恩利希教授大夫——一九三七年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曾同他合作过——出面干预，我才提前获释。他收留了我，在他手下工作，这是一九五八年的事。因此，我了解一个沾有污点的人的生活。再者，在我长达五年的"行医"业务中并未出过任何差错。现在您知道给您写信的是什么人了吧——这一点至少是清楚了。那么另外一点叫我怎么说呢？我想硬着头皮试试看！您的女友玛格丽特当时

健康恢复得很快，本来估计再过六至八星期她就完全可以出院了。每次探视都使她感到劳累，包括那位身分不明但却予人好感的先生——此人前一向常来看她(!!!——笔者)，我们起先以为他是她过去的情夫，后来以为是个拉皮条的，以后又以为是位礼宾官员，也就是极其不幸地把她和那个外国政治家撮合在一起的人。据她自己说，她是在其他女人同这个外国政治家没法“情投意合”的情况下，才不由自主地同他“情投意合”搞在一块的。

可是就在她行将出院之际，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不合情理的事情。尽管我学过医并有多年的“行医”实践，与“骑士城堡”俏皮的行话打过近三十五年交道并已司空见惯，我仍然感到难以把情况用书面告诉象您这样一位女士，而口头对您说就更难于启齿。尊敬的普法伊费尔太太，这里谈的就是那条引起极其复杂的物理学、生物化学和心理学反应及作用的肌肉，即俗话所说的男性生殖器。您不会感到惊奇（啊，这个词总算说出了口，我心情为之一松），平时在我们这里住院的妇女们竟未给这个定语安上一个雅号。任何男人的名字不论现在和过去总是都讨人喜欢的。十足粗野的形容词听起来刺耳，可是却适合环境气氛，并保持着一种近于客观的、几乎具有临床作用的性质，它使这些形容词并不显得粗野，而是变得似乎“高雅”了。正好就在您女友开始康复的那几个星期，我们医院里出现了一种相当无聊的风气，即时兴以男人的名字作为上述定语的代号。您一定知道，尊敬的普法伊费尔太太，在这些医院里有时会出现一股无聊的浪潮，也许只有女子寄宿学校才会有这种事。此外，它还会蔓延到护理人员和监督人员身上。据我在三年坐牢期间所了解到的，犯人和看守人员之间也有这种“辩证关系”。不管怎么说，尼姑、修女有时是喜欢干蠢事的，待在皮肤病医院里她们正乐得参与

其事。这不能说是不道德，而是一种自卫。修女们对您的女友特别和气，诸如来客探视、送东西、送烟酒之类，大都得到允许，不斤斤计较，因为她们有的人三四十年来一直跟患性病的妇女打交道，在某些情况下，她们——自卫！——把女病人的行话接过去，甚至常常还加以发展。现在我要告诉您非常奇怪的一点，它会使您感到惊奇，但更有可能会证实您的印象：施勒默尔太太十分怕羞。起先有人逗她，在碰到上面说的那种场合时冲她讲“古斯塔夫·阿道夫”或“埃贡”、“弗里德里希”等等，并对施勒默尔太太不懂其意思而乐不可支。有好几天、好几夜之久，这个玩笑开得真大，修女们也参与其事。这种残酷的游戏开始只限于十足的新教徒名字：“正因为古斯塔夫·阿道夫光顾您的次数太多啦”，或“你太喜欢埃贡了”等等。后来，当这种暗示变得十分明显，“为的就是要打掉她那见鬼的纯洁无邪”（六十多岁的以拉皮条为业的女病人 K. G. 语），施勒默尔太女明白了其中究竟时，只要一提到男人的名字，她的脸就立刻涨得通红。她经常脸红而且红得厉害，又被人家说成是装腔作势和假正经，于是使这种残酷的游戏变本加厉，发展成最粗暴的性虐待狂。最后有人甚至把女人的名字也加了进来，以便使残酷性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喜欢将十足的新教徒名字和十足的天主教徒名字配在一起，说成是“杂婚”，例如阿洛伊斯和路易丝等等。说句俗话，施勒默尔太太最后竟止不住脸红，连有人在过道里毫无恶意地喊一声某个来访者、某位修女或女护理员的名字，她也会脸红。人们一旦开惯了这种残酷的玩笑，并打心底里气愤她的敏感——人们不容许施勒默尔太太有这种敏感——，这种折磨终于又被升级到亵渎神明的程度，一个劲地谈那个一向给贞洁妇女当守护神的圣阿洛伊斯，谈论圣阿加塔等等。只要一提“海因

里希”或“圣海因里希”，施勒默尔太太再也不用心理上的过敏，就会不仅脸红，甚至精神上痛苦得叫喊起来。

尊敬的普法伊费尔太太，脸红这种现象在医学上也可查到解释。所谓脸红，通常是在兴奋或窘迫（施勒默尔太太就是如此）的情况下，生长性神经系统引起脸部皮肤血管和毛细管突然充血而造成的。造成脸红的其他原因，例如过度劳累等等，这里就不必提了。施勒默尔太太的毛细管渗透力无疑很强，这样很快就造成了所谓血肿（民间习惯叫“紫斑”）和紫癜，通常也可称红斑。尊敬的普法伊费尔太太，您的女友就死于此病。最后对尸体进行了解剖，结果证明诊断完全正确，她全身布满血肿和紫癜，生长性神经系统负担过重，循环系统梗塞，心脏功能失灵。由于施勒默尔太太脸红成了一种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所以在临死前的那个晚上，当她听到护士们在小礼拜堂做万圣节祷告唱诗时，甚至脸还发红。我知道我永远无法对我的理论或论断提出科学的证明，但我认为必须告诉您：您的女友玛格丽特·施勒默尔确系死于脸红。

在她虚弱到连话也说不成句的时候，她还不停地轻声念：“海因里希，海因里希，莱尼，拉埃尔，莱尼，海因里希”。虽然本来是想为她举行临终圣礼的，但我最后还是放弃了；如果举行的话，就会过于折磨她了，因为人们用上了更加亵渎神明的字眼，也把“仁慈的救世主”、“亲爱的襁褓中的耶稣”和圣母、圣母玛利亚以及万福童贞女等等称谓，乃至从连祷文中摘引的女神学家罗莎[1]等，都与上面说的那种意思联系起来。如果在她弥留之

---

[1] 罗莎(Rosa von Lima, 1586—1617)，北美洲女神学家，南美天主教多米尼克派创始人，一六七一年被尊为圣徒。

际念一篇礼拜祈祷文，对施勒默尔太太与其说是安慰，肯定还不如说是折磨呢。

我认为我有责任补充一句：施勒默尔太太除了提到海因里希、莱尼、拉埃尔等名字外，还和蔼地、几乎是亲切地提到“有时来探望她的那个男子”。也许她说的就是那个虽非神秘、但身分不明的来访者。

当我在信的结尾写上“致以诚挚的敬意”的时候，请您不要认为这是俗言套语。由于我不敢冒昧地使用可能表示带有某种强加之意的“亲切”一词，因此请允许我再一次致以友好的问候！

伯恩哈德·埃尔魏因

第十三章

克勒门蒂娜现在积极插手参与调查，经过较长一段时间考虑后，她决定对警官的报告还是以不作原文录述，改用间接引语为好。这样做，文体当然会有很大的改变，有些精采的细节就丢掉了(例如，那个头上绾着卷发夹子的女士，同一位身穿汗衫、胸口上的毛多得可以叫“毛人”的先生一起出现；还有一只“发出哼鼻子的哀鸣的狗”，一个分期付款收款员——他们都成了一种形象破坏狂的牺牲品。对此笔者并不以为然，实际上他们是笔者不抵抗主义的牺牲品)。至于他是抗效还是拒抗（拒绝进行抵抗)，姑且存而不论。克勒门蒂娜大胆挥舞她一向惯用的红铅笔，删去了她认为一切多余的东西，这样剩下来的就是“主要内容”(克语)了。

一、几天前，警长迪特尔·维尔芬驾驶巡逻车停在南陵园门口的时候，一个名叫克特·茨维费勒的妇女找他谈话，请他派人破门进入努尔格海默街五号埃尔泽·克雷默尔太太的住宅。当问到她为什么认为有必要这样作时，茨维费勒太太说，她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具体说：经过二十五年！)——如她所说，这二十五年当然并非光是进行调查——，打听到了克雷默尔太太的住址，抽空前去登门拜访，给她带去一个重要消息。茨太太由她儿子海因里希·茨维费勒陪同，他现年二十五岁，和母亲一样务农。他们来的目的是要告诉克太太，她一九四四年年底死

去的儿子埃里希生前曾在科默沙伊特和齐默拉特之间的一个村庄里打算投奔美国人。当时美国人和德国人双方都朝他开枪，他跑到茨维费勒家的农舍里来躲避一时，经同意后，在茨维费勒家待了好几天；她（克特·茨维费勒，当时十九岁）和埃里希·克雷默尔（当时十七岁）发生了肉体关系，双双"以终身相许"，"海誓山盟"，决定战斗再激烈，哪怕有生命危险，也不离开房子；这幢房子"夹在火线当中"。当美国人逼近时，埃里希在厨房里找了一块抹布（这块布虽然有红条子，但主要还是白色）打算挂在门上，作为投降的记号。就在这当儿，他被德国国防军一名射手"一枪打中胸口"死了。她（茨维费勒太太）甚至看到了这个射手，他就"埋伏在火线当中"的一个高处，他的枪不是对准美国人，而是对准村子里；从这件事发生以后，村里当然再也没有谁（"当时村里大约还有五个居民"）敢挂白旗了。茨太太说，她把死去的埃里希拖进屋，放在谷仓里，守着他痛哭了一场，后来美国人占领了村子，她才亲手将他"安葬"。不久她发觉自己怀孕了，"如期"在四五年九月二十日生下一个儿子，给他取名海因里希。她自己的父母——四四年年底她一个人留在家里——自从撤退后再也没有回来；她也不知道父母的任何消息，据说是失踪，也许是"半路上"被炸弹炸死了。作为一个没有正式结婚养了孩子的母亲，孤孤单单住在小田庄上，把田庄又经管好了，真不容易，但时间治好了"创伤"，她将儿子带大，儿子进了学堂，成绩不错，毕业后务农。不管怎么说，有一点他比许多孩子强：父亲的坟墓就在自己家门口，而许多孩子连自己父亲埋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呢。她（茨太太）一九四八年就"曾"（!!）设法寻找克太太，后来一九五二年又"曾"（!!）找过一次，后来以为毫无希望，死了这条心。一九六〇年（!!）又找了一次也失默了，当然那

时她也还不知道埃里希·克雷默尔也是私生子，也不知道埃的母亲的名字和职业。直到半年前左右，一个肥料代理商热情地答应尽力代为打听，承蒙他帮忙，她才了解到克太太的住址，但由于不知道“她会怎样对待他们”，所以还拿不定主意。最后在儿子的催促下，他们进得城来，找到了克太太的住宅，可是反复敲了半天门还是没有人开。向邻居打听（那个缩着卷发夹子的女士就是在这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那只哀号的狗等等——这些全都成了可鄙的形象破坏狂的牺牲品，和礼拜仪式改革如出一辙！！），据说克太太不可能出门去，也从来没有出过门。一句话，她（茨太太）“感到事情不妙”。

二、维尔芬心中犹豫不决。这是否属于“危险临头，祸不容迟”这个唯一合法的可能性对克太太的住宅破门而入呢？他终于和茨维费勒太太母子一道来到努尔格海默街五号，了解到克雷默尔太太有一个星期不曾露面了。一个邻居（不是那位胸部长毛的先生，而是一个被大家叫做酒鬼的退休者，来因人，讲到克雷默尔太太时口口声声“这个埃尔泽”——被删！）反映“听到她屋里养的那只鸟儿悲惨地叫了”整整三天。维尔芬决定——不是认为适合采用“危险临头，祸不容迟”这条规定，仅仅是出于恻隐之心——找人把门打开。正巧邻居中也有一个年轻人（一个有趣的人物这里竟用如此苍白无力的字眼一笔带过。这个人因行凶伤人、逼人卖淫、扒门撬锁等勾当吃过四五次官司，邻居都叫他“囚犯海恩”，甚至迪特尔·维尔芬警长也把他形容为“长着一头油腻腻、乱蓬蓬的褐色长头发和远近闻名的人”），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熟练技巧，嘴里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这一回我可是给警察干的呀”，打开了门。

三、克雷默尔太太死了，是服安眠药片死的，倚在厨房里的

长凳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尸体尚未腐烂。显然她只是(!!——笔者)用手指蘸着番茄沙司残汁，在挂在洗碗槽上方的一面旧镜子上写了许多"想"字："我再也不想干了。我过去就不想干了。我早就不想……" 可以看出写到这里番茄沙司已用完了。那只死鸟在厨房隔壁卧室的五斗柜底下找到了，是只虎皮鹦鹉。

四、迪特尔·维尔芬承认，克雷默尔太太的情况警察局是掌握的。人们——据十四分局了解——知道她原是共产党，但一九三二年以后就不再参加政治活动了，虽然——这也是警方掌握的情况——曾有过多次，特别是德国共产党被取缔后的那个时期，有人找上门来动员她参加活动。(这里克勒门蒂娜原来记下了"弗里茨"的全名，被红铅笔删掉了，这一次是笔者删的。)

五、茨维费勒太太母子提出遗产要求。迪特尔·维尔芬将一只有十五点八马克现钞的钱包和一个存有六十七点五马克的存折当场点清封存。唯一看得出值钱的东西，是一台九成新的黑白电视机，上面有克雷默尔太太贴的一张纸条："分期付款已全部偿清"，也封存起来。厨房长凳上挂着一个镜框，茨维费勒太太认出镜框里的照片就是自己儿子的父亲埃里希·克雷默尔。另一张照片"大概是埃里希的父亲，因为模样儿太象了"。在一只贴着一家有名的咖啡公司商标、上面画着花卉的白铁匣子里发现了："一块几乎不值钱、但好端端的男式手表。一只镶有一块假红宝石的旧金戒指，同样几乎不值钱。一张一九四四年发行的十马克钞票。一枚红色阵线战士同盟① 盟徽，登记者无法确定其价值。一张一九三六年的当票，当品为一只金戒指，当

① 一九二四年德国共产党建立的反对资产阶级武装组织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组织。

二点五旧马克。另一张当票是一九三七年的，当品为一条海狸皮领，当两个旧马克。一本完整的房租收据簿。”没有发现贮存值钱的食品；半瓶醋、一听几乎满满的油(小听头)、已经发硬的全麦面包(五片)、一听已开罐的牛奶、藏在白铁盒里的可可——约有六十五至八十克。半杯咖啡粉、盐、糖、大米、少量土豆，以及一袋尚未启封的鸟食。此外还有两叠卷烟纸和一包已经打开的“土耳其风味”牌细烟丝。一个名叫埃弥尔·左拉写的六本小说，袖珍本，已经破损，但干干净净，也许值不了多少钱。一本《工人运动歌曲集》。整个家具摆设，被挤进来看热闹的邻居们——他们被提醒不要乱动——瞧不起地称之为“全是破烂”。等法医来过后，房子依法贴了封条。至于茨维费勒太太所提出的遗产要求，已请她向司法机关申诉。

六、有人建议茨维费勒太太同先生(“弗里茨”)取得联系，也许他能告诉她有关死者生平的有趣细节以及已故埃里希·克雷默尔的父亲的情况。她拒绝了，她说，她不想同共产党发生任何关系。

第十四章

只要克勒门蒂娜不挥舞她那红铅笔，那她简直可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人儿了。她那不容争辩的德国语言学敏感性——只是当她雄心勃勃地起草行文或作编辑加工时，这种敏感性就不灵了——，她那多年训练有素的唯心论的实践，用于过世俗生活，并不能说毫无作用。正因为她以某种方式得到了解放，她积极投身于厨房和炊事工作，使笔者感到十分愉快；她兴致勃勃地洗衣浆极，皱着眉头记下肉价、房租，另一方面也喜欢乘坐出租汽车，有时碰到露骨的色情广告会脸红。至于说到摇笔杆子方面，她已经能够所谓独立活动了，就是说，除了自己的文章外，她不再挥舞红铅笔干预别人的东西了。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埃尔泽·克雷默尔之死使她感到"震惊"，流了眼泪（现在还在流），她想给这个女人写一篇小传，这个女人"当了五十年工人，身后之物只有一台刚刚分期付款还清的电视机、半瓶醋、一点卷烟纸——和一本房租收据簿。我想不通，我简直想不通"。这种见解和想法是值得赞扬的。

此外，克勒门蒂娜不是作为包打听，而是作为观察家作出了无可估量的成绩。笔者一直还极有达到渴望争取达到的完全抗效状态，而她却已经接近于这个目标：只做使自己开心的事情了。访问席尔滕施泰因和朔尔斯多夫，看到使们显得轻松愉快，这使她很开心。后来她又进一步发现了他们轻松愉快的原因：

席尔滕施泰因"同莱尼脸颊挨着脸颊、手拉着手地坐在布吕歇尔公园里的一条长凳上"。至于朔尔斯多夫，她两次亲眼看见他在施佩尔茨咖啡馆里和人手捏手；有一次她在莱尼家里碰到一个人，从她所说的模样来看，不太可能是别人，可能是库特·霍伊泽。由于她完全确信，莱尼在目前的情况下对梅赫梅特也不会同意发生亲密的关系，因此她认为莱尼对佩尔策是过于亲热了："她在离家不远的暗处，在汽车里吻他"。她不敢造访佩尔策，因为她相信，他"说到底是个不斯文的人，完全可能要求我作出明显的变相色情动作"。

对于莱夫·格鲁伊滕，她一点也不担心。"他马上就会出来的。"她非常积极，甚至参加了垃圾工人在刑事审判所前举行的一次示威，起草了这样的标语牌："团结有罪吗？""忠实该吃官司吗？"也有更富于威胁性的："要是我们的伙伴被判罪，管叫整个城市陷在垃圾堆里憋死。"由于这些，她挨了一家地方小报的头版头栏大标题："前红发修女充当垃圾工—雅各宾分子[①]！"除此以外，她还做了许多好事：她给莱尼房客中的葡萄牙孩子上德语课，同博加科夫谈论苏联的目前情况，找格蕾特·黑尔岑"舒舒服服地整容"，帮许多土耳其人和意大利人填写归还工资税表。她同检察官通电话（为了尚未了结的控告垃圾车司机一案），向主管官员（也是用电话）发出警告，一旦垃圾工人罢工将要出现怎样的混乱情况，等等，等等。她时而为"《O侯爵夫人……》读后感"落泪，尤其为追念《乡村医生》和《在流放地》哭泣，更是自不待言，不过尽管她流了许多眼泪，还是不理解"乘尘世间的车，

① 雅各宾分子为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常用来喻激进分子。

非尘世间的马”的寓意。她尽力、也许过于极端地背离一切非尘世间的东西。并不是她急于要去格尔塞伦，而是莱尼硬要她上那儿去，因为她听说当地果真要开办一座温泉浴场。一定要交代一下谁当“疗养主任”和“宣传干事”吗？不是别人，就是朔伊肯斯，他在那里为设计图样忙得团团转，用发号施令的口气同建筑工人和建筑师打电话，找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必要时用暴力将该死的玫瑰花祸害”加以遏制。在以“天下第一泉”为中心方圆五十米以内的地方，他掘了一条放毒药的水沟，里面不停地流着一种烈性农药，果然制服了玫瑰花。曾经名叫拉埃尔·京茨堡的那一抔黄土，对此当然是无可奈何了。反正博加科夫已经高兴地体会到了泉水对他那“该死的关节炎”的“实惠”。自从他成功地使洛特抗效以来，他们俩经常在那儿的疗养园里散步。

自然，在迄今提到的包括梅赫梅特在内的所有人物中，克勒门蒂娜有一点得天独厚的地方：不论是否当过修女，人人都生性执拗和有耐心，但谁也比不上她的执拗劲和耐心好。她不声不响地看莱尼作画，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帮女画家煮咖啡，洗画笔，满口奉承讨好的话，因此最后终于得到允许欣赏了电视中的圣母。她的评论水平简直太低了，不登大雅之堂：“那是她自己，是她，由于还未搞清楚的反射现象，她看到的圣母实际上是她自己。”“还未搞清楚的反射现象”一直还存在着，背景一直有浓云密布，预示风暴将临，凶多吉少：梅赫梅特的醋意和他迄来所表示的对交际舞的反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莱尼和他们
作者=
页数=436
SS号=10351321
出版日期=